

性別 的世界觀

Gender
In World Perspective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成令方 專文推薦



性別議題不只談男女之別，
也不單是個人問題，
更是跨文化與歷史脈絡的全球對話。

全球知名社會學家
性別研究學者

蕾恩·柯挪

劉泗翰 譯 Raewyn Connell 著

國家教育研究院 主編 國家教育研究院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合作翻譯發行

在越來越多元分歧的現代世界，我們如何理解性別這個概念？男性與女性的心理有何差別？男性特質與女性特質是如何發展出來的？全球化對性別議題有什麼衝擊？全球頂尖的性別研究學者之一蕾恩·柯挪，為我們解答這些問題，更為當代的性別研究、性別理論和性別政治提供了簡明易懂的導讀。

全球化的時代對性別議題產生深遠的影響。本書以實證研究入手，廣納全球的觀點，橫跨人文學科的光譜，兼具廣度與深度，極具啟發性。

這是一本關於「性別」很重要而且極好讀的介紹，對一個複雜及越來越國際化、跨學科的領域，提供非常有用的指引。柯挪的敘事風格及豐富的例證讓這本書非常可親，但絕不過度簡化。她處理橫跨個人與政治的論辯，同時還能關照社會結構及人類動力。很少有文本能包含這麼廣泛的觀點，還能避免顯得深度不足，但柯挪成功地辦到了。

加拿大安大略省特倫大學
(Trent University)
社會學教授Barbara Marshall

在性別研究的知識與理論地圖上，《性／別的世界觀》無疑帶來了最具影響力的民主革命。

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成令方

本書展現性別理論與研究的時代潮流，對當今重要的性別研究議題，有最睿智而令人信服的介紹。柯挪在性別與社會研究是一貫穩定而可靠的指導者。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定價280元

ISBN 978-957-445-417-4



00280

GPN 1010002130

性／別的世界觀

Gender In World Perspective

文化湯
10

蕾恩·柯挪（Raewyn Connell）◎著

劉泗翰 ◎譯

性別的世界觀／Raewyn Connell著．劉泗翰譯．
-- 一版．-- 臺北市：書林，2011.06
面：公分 -- (文化湯；10)
譯自：Gender in world perspective
ISBN 978-957-445-417-4 (平裝)

1. 性別研究

544.7

100007832

文化湯 10

性別的世界觀

Gender: In World Perspective

作者 Raewyn Connell

主譯者 國家教育研究院

譯者 劉泗翰

譯文審閱 成令方

編輯 周佩蓉

出版者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100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60號3樓

電話 02-23684938 · 23658617 傳真 02-23688929 · 23636630

台北書林書店 106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2樓之5 Tel (02) 2365-8617

北區業務部 100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60號3樓 Tel (02) 2368-7226

中區業務部 403台中市五權路2之143號6樓 Tel (04) 2376-3799

南區業務部 802高雄市五福一路77號2樓之1 Tel (07) 229-0300

發行人 蘇正隆

出版經理 蘇恆隆

郵撥 15743873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網址 <http://www.bookman.com.tw>

展售處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02-2518-0207 (代表號)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台中市五南文化廣場 地址：400台中市中山路6號

電話：04-22260330 傳真：04-22258234

著作財產權人 國家教育研究院

地址 23703 新北市三峽區三樹路2號

網址 <http://www.naer.edu.tw>

經銷代理 紅螞蟥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號4樓

電話 02-27953656 (代表號) 傳真 02-27954100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三一號

出版日期 2011年6月初版

定價 280元

I S B N 978-957-445-417-4

G P N 1010002130

Copyright © Raewyn Connell 2009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著作財產權人：國家教育研究院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需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發展中心（電話：02-33225558）

謹以此書紀念
潘·班藤（Pam Benton）
1942-1997

她，曾在這裡享受了這麼多人間精華的喜悅，
沒有任何機緣可以分神，更遑論毀滅；
……她已到了天堂，
她使得這個世界多少也像天堂；
給這個世界的我們
帶來人間歡樂的精華，（如果我們接受）。

目次

致台灣讀者序	蕾恩·柯娜	006
--------	-------	-----

推薦序

性別研究的民主革命～「南方性別版」	成令方	008
-------------------	-----	-----

序言	蕾恩·柯娜	013
----	-------	-----

第一章 性別問題 017

認識性別	017
了解性別	022
定義性別	027

第二章 性別研究：五個案例 033

案例一：校園生活中的性別遊戲	033
案例二：男性氣概與礦場	038
案例三：扭曲性別	042
個案四：女人，戰爭與記憶	047
案例五：由下而上的改變	053

第三章 性別理論家與性別理論 059

在多數的世界（一）：蕾登·艾珍·卡蒂妮	059
在大都會（一）：從克莉絲婷·皮桑到西蒙·波娃	061
在大都會（二）：從婦女解放運動到酷兒理論	068
在多數人的世界（一）：從「婦女十年」以降	077

第四章 性差異與性別化的身體 085

生殖差異	085
對差異的矛盾解釋	088
差異的事實：「性相似」的研究	099
社會體現與生殖場域	107

第五章 性別關係 115

性別範型：結構與變革 115

性別的四個面向 118

權力關係：直接的、論述的、殖民的 120

生產、消費與性別化的累積 124

情感關係 127

符號、文化、論述 130

交錯與交織 133

性別作為歷史 135

改變的過程 139

不穩定性 139

矛盾 140

殖民主義 142

第六章 個人生活中的性別 145

性別化的成長：性別角色的社會化、心理分析與體現的學習 145

性別認同 159

第三性、跨別性、變性 165

第七章 大規模的性別 173

性別化的企業 173

性別化的國家 180

全球社會中的性別 188

性別秩序之間的互動 189

性別關係的新場域 191

第八章 性別政治 199

個人政治 199

公共政治：運動與體制 203

利害關係：父權紅利、性別傷害與性別好處 208

性別政治的本質與目的 212

全球規模的性別政治 215

參考書目 223

致台灣讀者序

此書在澳大利亞完成，也是我長大成人，大半輩子工作的地方。

澳大利亞的人口與台灣相當，但是卻有非常不一樣的歷史、景物與文化融合。大約五萬年前，現今原住民的祖先定居在這塊大陸上，在艱困的環境中，創造了複雜的文化；到了約莫兩百年前，荷槍實彈的歐洲人來此屯墾，為了他們自己的經濟、殖民資本主義，掠奪了大部分的土地。現在絕大多數澳大利亞人的祖先，都是英國的屯墾殖民。最近幾個世代，來自地中海、南亞與東亞的移民，也加入了這個融合的文化之中，而澳大利亞的性別秩序也反映出這樣的歷史。

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自然也影響到我對性別的學習。性別配置既不簡單、也不僵化，而是多元、且隨著社會秩序的變遷而改變。「現代性」並不是像水流一樣順暢地從歐洲或北美洲流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我們都很現代，只不過現代的方式不太一樣而已。現代性的產生涉及了整個地球的暴力、帝國的誕生、巨額財富的累積與大量貧窮的形成。

一旦我們開始從整個地球的角度來思考性別，就必須採取不同的方法來研究性別。大多數的性別研究與理論都來自全球大都會，即西歐與北美；尤其是美國的女性主義性別研究更是成果豐碩，我在這本書中也廣泛應用。然而，在殖民與後殖民世界的知識份子，也一直在跟性別議題纏鬥長達好幾百年。

因此在這本書中，我特別著墨於那些來自多數世界、後殖民世界以及南半球的知識與想法，尤其是突顯那些在地球邊陲地域，像是拉丁美洲、非洲、阿拉伯世界、亞洲與大太平洋地區的情況。我鼓勵那些身處地球邊陲的性別研究學生與學者，除了學習來自大都會的概念之外，也要認真看待自己本地的歷史，建立屬於自己的社會經驗與智識資源。台灣與澳大利亞同樣也都可以成為這個領域裡的新思維中心？誰曰不可？

實際行動也很重要，因為性別研究這個知識領域，與性別改革息息相關。性別改變必須經歷一番艱苦奮鬥，只要性別秩序不平等、不公正、有暴力，這樣的奮鬥就一定會發生。正如這本書顯示，爭取自由、正義和關懷之生活方式的社會運動以多樣的形式展現；的確，新形式的奮鬥與抗爭不斷地浮現，因此我們也必須是創新者。現在的性別理論更樂於接受多元以及來自邊緣團體的改變策略。

因此，我衷心期盼這本書中的文字可以飄洋過海發聲，協助台灣的學生、學者和性別運動者——不是給予固定的配方，而是提供想法、事實、方法、經驗與策略，讓你／妳們融入自己的計劃之中。我曾兩度造訪台灣，都留下美好的回憶，也學到了很多，希望未來還有機會向大家多多請益。

蕾恩·柯挪（Raewyn Connell）

雪梨大學

■推薦序

性別研究的民主革命～
「南方性別版」

柯挪教授是國際聞名的澳洲社會學家也是性別研究專家，他一九七〇年代在澳洲的一間大學任教、一九八〇年代在美國加州大學與哈佛大學任教，一九九〇年代又回到澳洲雪梨大學任教。他／她著作等身，寫了二十多本書，一百六十多篇學術論文，被翻譯成十三國的語言，讀者除了澳洲之外，還擴及歐美、亞非拉等地區。八〇年代他最出名的著作是《性別與權力》（1987），該書指出個人認同必須放置在大規模的社會結構中才有意義。九〇年代的著作則是目前在性別研究中最具影響力的《陽剛特質》（*Masculinities* 1995，2005再版）。在書中，他提出四種類型的陽剛特質，其中「霸權式的陽剛特質」（hegemonic masculinity）被學者經常引述。除了在學術界有巨大貢獻外，柯挪教授也積極參與聯合國、澳洲政府關於男孩與陽剛特質、性別平等、和平相關的政策制訂。他／她關心知識的民主化、性別關係的平等、目前她正在思考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社會文化的影響。

《性／別》（*Gender*）第一版的英文版是二〇〇二年出版，二〇〇四年的中文版由書林出版公司邀請劉泗翰先生翻譯，那時我寫了推薦序。二〇〇九年英文第二版出版書名改為《性／別的世界觀》（*Gender: in world perspective*），二〇一一年由書林出版公

司再度邀請劉泗翰先生翻譯，我負責審稿並寫推薦序。在這七年中，有二件與這本書有關的重要大事發生了：

- 性別研究發生了南方革命，讓性別研究的知識更加民主化。
- 柯挪教授進行了變性手術，由男變女。

柯挪教授自從二〇〇二年完成了《性／別》第一版後，專心致力於寫作一本企圖重劃社會學知識版圖的重要著作，二〇〇七年出版了《南方理論：社會科學中全球動力的知識》（*Southern theory: the global dynamics of knowledge in social science*），而2009年英文的第二版《性／別的世界觀》可以視為是《南方理論》一書的性別研究版。以下先簡要說明《南方理論》的重要性。

《南方理論》主要是批評過去社會學的知識與理論都產出於歐美，也就是經濟優勢教育程度高的已開發國家，稱之為「北方」。這些國家之外籠統屬於「南方」，包括紐澳、拉丁美洲、印度、中東以及亞洲（台灣在內），其實「南方」也生產當地的社會研究知識，但很少出現在主流社會學知識與理論的體系中，更別說受到「北方」知識界的討論與重視。於是柯挪教授藉由介紹來自澳洲原住民、伊朗、印度、非洲、阿拉伯、墨西哥與中南美洲等地的社會研究，說明之前與殖民主義長年糾纏的關係，以及現在與新自由主義的矛盾關係。社會科學的知識若沒有放在全球動態相互纏繞的關係中來理解，我們現有以「北方」知識與理論為視野的知識地圖，必然是殘缺偏頗而且扭曲錯誤的，其中權力排擠的關係則是很明顯，這是不民主的。《南方理論》就是要把先前排除在知識地圖的「南方」知識與理論引進我們的視野，在既有的社會科學知識中進行民主革命。

若我們順著這邏輯來理解，就會恍然大悟，第一版的《性／別》是性別研究的「北方」版，第二版的《性／別的世界觀》是

「南方」版。仔細看過內容後，我更要大聲疾呼，讀者千萬不要丟掉第一版，只看第二版。柯挪教授與一般著者改寫第二版的策略非常不同，她不是在書中增加一、二章，而是在整本「北方」版的文字中，在適當的地方加入「南方」版的例證與討論。她這二版的內容雖然有一半重疊，但因加入「南方」案例的討論，使得原本論證脈絡與論證轉折，帶出不太一樣的意義來。由於篇幅的限制，很多「北方」版有趣的例證在「南方」版被刪除了，所以聰明的讀者其實需要二個版本並列對比閱讀，才會領悟到自從有了「南方」的視角，世界就長得如何不一樣了。在性別研究的知識與理論地圖上，《性／別的世界觀》無疑帶來了最具影響力的民主革命。

柯挪教授訪問過台灣二次，與台灣性別研究的社群有密切的互動。第一次是二〇〇六年春接受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的邀請（教育部補助），作為全國性別研究大專教師研習營隊的講座。來講課的前幾週寄來一封書信，告知「他」將以「她」出現在高雄，詢問與會的台灣性別研究者可否接受。當然會接受啊！在那次的研習週，有一時段柯挪教授告知與會者她成長的心路歷程，讓我們為之動容。

柯挪教授很早就知道自己是女人裝在男人的身體中，但當時社會嚴格的性別區隔，沒有變性的空間。當她遇到積極參與婦運的終身伴侶Pam Benton（是一見鍾情那種的！），兩人在外面扮演夫妻，在家中像二個母親一樣照顧女兒Kylie。約十多年前Pam因乳癌過世，原本可以隔絕外界的屏障突然消失，經過與積極參與環保運動的女兒溝通，獲得支持，在六十二歲時決定進行折磨痛苦的變性手術，還原女兒身，取澳洲女性Raewyn為名。

二〇〇九年三月柯挪教授再度來到台灣，距離上次已經整整過了三年了。她代表澳洲社會學會來中研院參加世界社會學會代表大會。這次她又來到高雄醫學大學，與很多南方社會學界與性

別研究的師生聚會。這次我們舉辦了二天的研討會，第一天討論社會學的「南方理論」，第二天則是「陽剛氣質與變性者」的工作坊，除了柯挪教授作為主講人外，我們還邀請二位願意現身的變性朋友與大家分享生命經驗。這次的工作坊的討論，已經轉錄成文章，刊於二〇一一年的《性別平等教育季刊》。臨別前，柯挪教授將剛出版的這本英文書交給我。回家後，翻開首頁看到她的題字「給令方，這是第一本！為慶祝友誼與共同的抗爭。」真令人感動，是的，我們有共同的學術與社會行動的承諾。

當書林決定出版《性／別》的第二版（2009），來電邀請我寫推薦序，我雞婆建議需要仔細的審稿，以便提升這重要的作品的可讀性。希望大專程度以上的讀者能領受到其突破性的創見，與論證複雜顛覆常規的思考，因此流暢精準的譯本是非常必要的。基於對柯挪教授的學術崇敬，對她努力推展知識民主化的認同，對她給我溫暖友誼的回報，我承接辛苦審稿的任務，花了六個半月終於完成。

關於翻譯與譯文，有些話要說。首先我要向翻譯者劉泗翰先生致敬。劉先生還真是翻譯高手，第二版的譯文算是相當精準，有時我在完全沒頭緒時驚見劉先生的神來之筆，拍案叫絕。審稿花的時間相當長，第一次審稿我逐字逐句地修訂，主要是調整譯文合乎性別研究專業概念的表達，其間還去信請作者釐清文字的原意，這工作進行了四個多月。然後送交譯者過目修訂。之後，譯者再度送回由我作全文的整體修改潤飾。最後才由出版社編輯挑檢文字的錯誤。這一版保證絕對好看順溜。

在此要特別感謝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學生蔡昌成在我正式審稿前，先協助快速掃過一遍，標出不順的文字，提醒我審稿時需注意的地方。當我拿到譯者修訂完的稿件，準備進行二度審稿時，天降神兵，感謝高雄師範大學性別研究所游美惠教授協助審閱第一、五、六、七、八章，同時也在「性別社會學」課上使

用後四章的初稿作為教材，請同學邊讀邊抓譯文的問題和漏字，在此要特別謝謝99學年修這門課的同學，讓這書的譯文更加完美。還有，要謝謝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學生王紫茵、古家餘協助校對前三章。在眾人的協力下，這本書的翻譯品質著實大大提高了。我可以拍胸脯向讀者保證：這書雖然有些閱讀的難度，但譯文不會阻礙讀者對概念與故事的理解，也不會產生閱讀的誤導。

因該書討論很多性別關係的pattern，譯者劉泗翰提出「範型」（學術用），雖我們一時不習慣，但的確很能表達原文的學術用意。若pattern在一般敘述中出現，就依照脈絡來翻譯，例如照護小孩的模式（pattern）。Radical一字，在台灣已經有一段時間翻譯成「基進」而不是「激進」，「基」與radical的原意「部首」接近，是字源的根基。「激」進重視情緒激動的面向，給人感情用事的印象。但對於radical nationalism，我則主張翻譯成「激進民族主義」。Masculinity與femininity是經常出現的詞，因為這詞不必然與生理男女緊密連結，故我主張翻譯成「陽剛特質」、「陰柔特質」。但在行文脈絡中，若這詞指的是生理男性，有時我會主張使用「男子氣概」或「像個男子漢」。

文字工作結束後，新的知識旅程即將啟航，期待讀者按圖索驥，探究書中「南方」性別研究具強勁生命力的世界吧！

成令方

高雄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序言

性別是個人生活、社會關係與文化中的一個關鍵層面，在這個領域中，我們面臨了許多艱難的實際議題，如認同、社會公義、甚至生死大事。

性別這個主題，同時也累積了驚人的偏見、迷思與徹底的錯誤。許多人相信男女的心理正好相反、男性比女性聰明、男性天生暴力，或是性別範型永遠都不會改變。其實，這些堅信不移的想法都錯了。許多人對陽剛特質、陰柔特質或性別關係的想像，都只侷限於當地的性別體系，而忽略了跨文化間以及歷史脈絡中性別範型的龐大多樣性。

人文科學的研究與理論則提供了重要的工具，讓我們撥雲見日，驅逐偏見，理解真正的議題。因此本書試圖以簡明易懂的方式來說明性別議題，而且這些解釋都有研究為基礎，還有涵括全球的資訊以及合乎邏輯的理論背景。

對於性別研究感到陌生的人來說，本書介紹了性別研究重要的案例，說明一些重要研究所獲致的主要成果，同時為不同的論辯與觀念提供指引。對於已經在這個領域的人來說，本書則提出一個整合不同議題的取徑（approach），從身體與人格差異到全球經濟與世界和平。要了解這些問題，我們必須跨越傳統學科範疇之間的藩籬，因此，這本書提出了人文科學的光譜，涵蓋的範圍從心理學與社會學，到政治學、文化研究、教育與歷史等眾多領域。

心理學與社會科學是相對比較新的知識型態。人文科學以實證研究與概念推論雙管齊下，隨著時間推移建構了知識體系；因此我們必須積極尋求新的資訊，同時也要以寬大的胸懷來接受批評，並且願意改變過時的想法。如果這個過程順利的話，人文科學可以提供有力的工具，讓我們了解社會生活。

女性運動爭取性別平等是當代性別研究的濫觴，理由很簡單：世界上大多數的性別秩序都是讓男性享有特權，讓女性居於弱勢。這是一個基本事實，但是細節卻不是這麼簡單，因為特權與弱勢都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從純粹的象徵到粗魯的暴力；各地性別不平等的情況也都不盡相同；享有特權的男性，也許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甚至連誰是男性、誰是女性的定義也衍生異議。

性別議題不只跟女性有關，同時也關乎男性。現在對於陽剛特質、父權、男性運動、男性暴力、男孩教育、男性健康和性別平等運動中的男性參與等議題，都已經有相當廣泛的研究與公開爭辯。我也在此書中有系統地將這些研究融入整個性別議題的圖像中。

同時，我也考量到性別改革與性別科學普及全球的事實。我們必須承認歐洲與北美的知識份子在理解性別問題上扮演了創造性的角色，然而北半球的觀點卻不是縱觀世界的唯一角度；因此我也留了很大的篇幅，容納在全球大都會以外的國家所做的性別研究與理論，涵蓋的地域很廣，從拉脫維亞、智利、澳大利亞、西南非洲到日本。

現在的性別研究格外需要國際化的取徑。由於經濟依存度加深，全球性媒體的誕生，政治體系的彼此連結等，形成了我們現在所謂的「全球化」，對於性別也有深遠的影響。新的性別秩序在我們眼前逐漸成形：就在勞工遷徙、跨國企業與全球市場、跨國媒體與國際化的國家結構之中。新的身份認同與運動應運而生，相關的新知識也在全世界流通。

全世界都面臨迫切的性別新議題。的確，全新的性別政治領域正在形成，關於人權、經濟平等、環境衝擊、世代關係、暴力與福利等等尖銳的問題，也一一浮現。

如果冀望這個成形中的性別秩序能夠公正、和平且符合人性——這是誰都無法保證的事——我們就需要對性別議題有穩固的知識基礎與細膩的了解；要產生這樣的知識與了解，必須是全球共同分享的計畫。我希望此書能夠在這方面有所貢獻。此書的第一版以英文寫成，已經譯成了義大利文、希臘文、中文、瑞典文與日文；第二版更進一步擴大國際研究與理論的涵蓋範圍，我希望藉此沿續這樣的全球對話。

這本書跨越許多不同領域的研究，試圖整合涵蓋廣大範圍的知識，當然需要許多人的共同努力——研究學者、理論學家、社會運動家，還有許許多多在研究計劃中成為「研究對象」的人。婦女解放運動強調觀念的集體產生，而我也在文中認肯這一點。

話雖如此，任何一本書都還是不免反映出作者自己的背景。我是專業的社會科學家，有長期的研究與教學經驗，有些與性別議題有直接的關聯，但是也有一些是跟階級、教育、兒童發展與社會理論有關。我這一輩子大部分時間都住在澳大利亞，這個位於全球邊陲的富裕國家，也是英國殖民主義的產物。我略通幾國語言，但是都屬於歐洲語系，因此侷限了我對全球研究與論辯的知識；我藉由閱讀翻譯和旅行來拓展自己在這方面的知識，到目前為止，我已經走訪了將近三十個國家，在絕大多數國家，也曾經跟當地的社會科學家交流。

對於這些議題，我不只是智識上的參與，也有個人情感的牽連。我有很多研究的設計都是以促進改革為目的，例如改進公共服務的性別平等，或是為了訴求，例如愛滋病防治。我對人際關係中的性別政治有特別濃厚的興趣，因為我跟我伴侶辯論這些議題，也身體力行這些議題，時間長達二十九年。我密切關注親子

關係，因為我本身也為人父母，而且有很多年都是單親。在我個人的性別經驗中，就曾經遭遇過強烈的衝突矛盾；或許身為變性的女人，讓我對傳統的性別分野感受格外強烈。

絕大部分文中提到的智識來源都已經註明出處，藉以致意。另外我要特別感謝幾個人：感謝約翰·費雪（John Fisher）在研究上的協助，克莉絲塔貝兒·德萊芬（Christabel Draffin）幫忙處理行政庶務；感謝派翠西亞·賽兒蔻（Patricia Selkirk）提供生物學的專業建議；感謝卡洛·海格曼－懷特（Carol Hagemann-White）提出理論與政治的關鍵問題；感謝勞勃·莫瑞爾（Robert Morrell）、烏拉·穆勒（Ulla Müller）、多賀太（Taga Futoshi）和泰瑞莎·瓦爾蒂（Teresa Valdés）為我打開了文化世界的大門；還要感謝東尼·斯格菲爾德（Toni Schofield）對關聯性的強烈要求、琳恩·沃克（Lin Walker）對條理連貫性的指教、克絲婷·歌瑪（Kirsten Gomard）對精確性的要求。我要感謝這些人和其他的朋友，給予不可或缺的鼓勵與支持。凱莉·班藤－柯挪（Kylie Benton-Connell）給我各方面的支持與啟發，遠超過文字所能表達。這本書要獻給她的母親、我的伴侶潘·班藤。本書卷首的題辭，出自潘最喜歡的詩人約翰·鄧恩（John Donne）所寫的長詩〈兩周年祭〉（The Second Anniversary）。

蕾恩·柯挪
於雪梨大學

性別問題

認識性別

每年都有這麼一晚，全世界電視觀眾的矚目焦點，都集中在好萊塢最耀眼的場合——奧斯卡頒獎典禮。知名人物搭乘禮車來到狂熱群眾的面前，在此起彼落的鎂光燈中，施施然地走進頒獎會場——穿著燕尾服的男士邁開大步向前，而女士則走得小心翼翼，因為她們都穿著低胸晚禮服和高跟鞋。這天晚上，隨著典禮進行，一座座的獎項頒給了電影音樂、攝影、劇本、導演、最佳外語片等等；但是有幾個獎項卻是頒給走進電影院時會在大銀幕上看到的人：最佳男主角與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與最佳女配角。

在我每天早上去上班的途中，總是會經過一個賣報紙的小店，門口張貼著各種海報，宣傳每週大量發行的幾本雜誌；幾乎每一張海報上都是年輕女性，通常是金髮碧眼，一定是骨瘦如柴、濃妝艷抹，個個美麗動人，而且什麼事都不做。在媒體界，這些就是所謂的「名人」。走進店裡，架上擺的是跟機車、汽車、運動、動力船、釣魚有關的雜誌；這些雜誌的封面上或許也有年輕的金髮美女照片，比外面那些照片更搔首弄姿，性感挑逗，但是也有一些男人騎著機車、開車、駕船或是抓到大魚的照片。

二〇〇七年九月，我的家鄉——以優質魚產聞名於世的雪梨

——舉辦了一場會議，名為「亞太經合會論壇」；市中心被厚重的混凝土塊、鐵絲蛇籠和從全國各地召集來層層警力團團包圍。在鐵絲蛇籠後方，則聚集了全球令人望而生畏的巨大勢力，完全不受市民侵擾；其中包括：中國國家主席胡先生、俄羅斯總統普丁先生、美國總統布希先生、印尼總統尤多約諾先生，還有一些次要角色，如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先生。會議結束之後，這些領袖照例會穿上主辦國的民俗服裝，拍張團體照，這一次呢，就穿上傳統民俗雨衣。這張在雪梨歌劇院前拍的照片上有十八名中年男子，極力掩飾他們的尷尬與不安，另外還有三名女性。

這樣的性別失調絕非特例。如果希拉蕊·柯林頓（Hilary Clinton）贏得民主黨內初選提名，她就會成為美國建國兩百年來第一位代表主要政黨出征的女性總統候選人；現代俄羅斯、中國、法國、巴西、日本、埃及、奈及利亞、南非或墨西哥等國政府，都從未出現過女性領袖；在德國、英國、印度和印尼的歷史上，也各有一位女性領袖而已；歷任的聯合國秘書長和世界銀行總裁都是男性；二〇〇七年，也就是舉辦「亞太經合會論壇」（APEC）的同一年，「國際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的統計顯示，在全世界的國會議員中，有82.5%是男性。

至於在內閣成員中，男性主宰的情況更嚴重。二〇〇五年，全球只有兩個國家的內閣成員有一半是女性（瑞典和西班牙）；女性在內閣中所佔的比例，比較常見的數字是14%（美國、厄瓜多）、10%（阿爾及利亞）、8%（義大利、阿根廷）、6%（中國）和掛零（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少數能夠爬到這麼高位階的女性，負責的工作通常也是主管社會福利或教育的部會；而男性則仍然掌控賦稅、投資、科技、國際關係、警政和軍事。

政界如此，企業界亦然。二〇〇七年，在澳大利亞股市掛牌上市的前兩百大企業之中（包括那些出版暢銷雜誌的公司），只有五家公司的執行長是女性；二〇〇七年，《財富》雜誌

(*Fortune*) 選出「全球五百大」國際企業之中，也只有十家公司的執行長是女性。這樣的數字通常代表一種說法：女性在全球頂尖企業領袖中只佔了百分之二；但是換一種說法：全球企業領袖中，有百分之九十八是男性——這句話可以傳達更多的訊息。

在有酬勞動力中，女性佔了很大部分，但是多半從事比較低階的工作；她們大多集中在服務性質的工作——庶務工作、電話服務中心、清潔工、端盤子，以及照顧幼兒或病人相關的工作，例如教書和看護等。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女性也在特定工業中（如生產微處理器的工廠）受到重視，因為理論上來說，她們都有「靈巧的手指」。儘管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區，男女細部分工的情況不盡相同，但是一般而言，在粗重的工業、礦業、交通業以及絕大多數跟機器有關的行業（除了縫紉機之外），男性都佔多數；放眼世界，在管理、會計、法律，還有像機械、電腦等專業技術領域的勞動力中，男性也佔絕大多數。

在這種有酬勞動力之外，還有另外一種形式的工作——無酬的家務與照護工作。在我們手邊有統計數字的所有現代社會中，女性擔負絕大部分的清掃、煮飯、縫衣，還有照顧孩童的工作，以及幾乎照顧嬰兒的全部工作。（如果你不覺得這也算是一份工作，那麼你一定還沒有做過。）這些工作通常都跟女性在文化中的定義有密切關聯，例如女性必須關懷、溫柔、自我犧牲、勤勞等，換言之，就是一個好母親；至於好父親的定義，則鮮少連結上為孩子做學校午餐三明治或是替小嬰兒擦屁屁——雖然墨西哥現在正推廣一種叫做「情感父親」(*paternidad afectiva*) 的觀念，也就是要求父親有更多的感情投入。傳統上，父親都是當家作主的人，在內享受女性提供的服務，對外則代表這個家庭。

女性比較少像男性一樣在外界拋頭露面，就算她們走出家庭，獲得的資源也比男性少，男性還是比較可能找到有報酬的工作，這一點放諸四海皆準。全球的女性「經濟活動率」(*economic*

activity rate) 已經爬升，但是也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二強而已；主要的例外是北歐和西非的部分國家，當地女性的相對勞動參與率出奇地高。然而在某些阿拉伯國家，女性的參與率只有男性的四分之一；而在南亞和中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區，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則大約是男性的一半。

女性加入勞動行列之外，她們的薪資如何呢？《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UN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已經通過了三十年，但是走遍全世界，還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女性所掙的錢跟男性一樣多。在瑞典，女性的平均收入是男性的81%；但是比較典型的數字是：法國女性收入是男性的64%、美國是63%、烏克蘭是55%、印尼46%，而墨西哥則是39%。

因此，世界上大部分的婦女，尤其是有孩子的婦女，在經濟上都必須仰賴男性；有些男人仍然相信，凡是依賴他們的女人就是他們的財產。這是家庭暴力中常見的場景：當依賴男性的婦女不順從她們丈夫或男友的命令，就會挨打。於是這就形成了女性的一種困境——家暴社服人員可能早就已經耳熟能詳——她們可以留下來，讓自己和孩子進一步陷入暴力的危機，或者她們可以選擇離開，喪失她們的家庭、經濟支柱與社區地位。就算她們離開了，有些暴怒的丈夫還會窮追不捨，追殺妻子甚至連小孩也不放過。

男人雖然不像女人那樣經常遭到配偶毆打，但是他們有面臨其他形式暴力的危險。在這方面有良好統計數字的國家中，向警方報案的攻擊事件，大部分都是男人施加暴力在其他男人的身上。有些男人只不過因為是同性戀者，就遭到毆打，甚至殺害；有些暴力還來自警察本身。監獄裡的囚犯大部分都是男性。美國有全世界規模最龐大的監獄體系，在二〇〇七年中期，囚犯人數高達一百五十九萬人，其中92.8%是男性。在戰爭中死亡大部分

也都是男性，因為在軍事部隊中，男人還是佔絕大多數。工業意外大多跟男性有關，因為在營造或採礦這一類危險的行業中，大部分的勞動人口也都是男性。

涉及暴力的男性多到不成比例，有部分原因是他們被如此教養的。儘管在不同文化中，扶養小孩的模式也有所差異，但是澳大利亞的情況並非特例。在澳大利亞，男孩從小就受到各方的引導——他們的父親、學校、媒體——參加足球之類的競賽運動，在運動場上歌頌肢體優勢；他們同時承受同儕壓力，必須表現出勇敢強悍的一面，也學會了擔心自己被歸類為「娘娘腔」或「poofers」（這是本地用語，指女性化或同性戀）。於是有施暴的能力便成了一種社會資源。勞工階級的男孩若是沒有其他資源可以讓他們成為專業人士，就只有加入必須使用武力的工作：警察、軍隊、私人保全、藍領犯罪和職業運動。至於年輕女性的主要工作，則是負責收拾暴力的殘局：如護士、心理治療師或社工人員。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列舉了有關媒體、有關政治與企業、有關家庭、有關成長的各種事實；這些都是隨機的巧合嗎？有關性別議題的現代思潮，就是從認知這些事實不是巧合開始的。這些事實形成了一種範型（pattern）：如果將它們視為整體性別配置（gender arrangement）的一部分，一切就都看似合情合理；這樣的性別配置，我稱之為當代社會的性別秩序（gender order）。

要發現這種性別秩序的存在很容易，但是要進一步了解就沒有那麼簡單。現存的性別理論，有些彼此矛盾；有些關於性別的問題，也真的很難解決。然而，經過了數十載的研究，我們對於性別的知識已經有豐富的來源，也從性別改革中，累積了豐沛的實際經驗。我們現在擁有比以前任何世代都要更好的基礎，去了解性別議題。

了解性別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對於性別總是視為理所當然，例如我們看到一個人，立刻就判定此人是男是女，若是小孩，則區分是男孩或女孩；而日常生活事務的配置也是以這樣的區別為基礎：傳統的婚姻需要男女各一，網球的混雙打則需要男女各二，但是大部分的運動每次都只需要一種性別。

據說全世界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僅次於奧斯卡頒獎之夜的，就是美國超級盃的實況轉播——又是另一個極度性別化的活動：穿著盔甲的彪形大漢彼此衝撞，競逐一個兩頭尖尖的橢圓形皮球，到了中場休息，就有窈窕苗條的女性穿著超短迷你裙，笑顏逐開地出來跳舞。我們大多數人都無法像足球隊員一樣在球場上橫衝直撞或是像啦啦隊員一樣輕盈熱舞，但是我們卻以其他方式盡己所能地區分這種男女差異：我們這些男男女女，穿著形狀不同的鞋子，從不同的方向扣襯衫的鈕扣，由不同的美髮師來替我們剪頭髮，在不同的店裡買褲子，然後去不同的廁所脫褲子。

這些安排配置都太普遍、太熟悉，似乎已經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這種認定男女「自然」有別的信念，讓不遵循這個範型的人彷彿鬧了什麼見不得人的醜聞——舉例來說，像是兩個相同性別的人墜入情網——因此，同性戀就成了「違背自然」的壞事。

可是，如果跟同性的男人或女人發生性行為真的是違背自然的事情，又何必立法來禁止呢？我們從未立法懲罰違反熱力學第三定律。像美國城市訂定反同志法令、塞內加爾的警察騷擾同性戀男人、伊斯蘭教法典認定婦女通姦有罪、以違背公共秩序的罪名逮捕並監禁變性女人，這些事情之所以被認為合理，全都是因為這些行為並不是由自然決定的。

這些事情是社會努力導引人類行為的一部分；性別適當的行為這觀念不斷地在社會上流傳，傳遞的媒介不只是立法機關，還

有教會、父母、老師、廣告、零售賣場的店家、脫口秀主持人和廣播DJ等等。像奧斯卡之夜和超級盃這樣的活動，不只是反映了我們對於性別差異（gender difference）的觀念，同時在活動中所展現出陽剛特質（masculinities）與陰柔特質（femininities）的典範表現，更有助於創造這樣的性別差異。

因此，不論是男是女，都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狀態，而是積極建構出來的一種轉變過程（becoming）、一種情況。法國女性主義先驅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以一句經典名言闡明這種情況：「一個人不是生為女人，而是變成女人。」雖然男女兩性的關係不是全然相對，但是這個原則也適用於男性：一個男人不是生來就有男性特質，而是必須變成男人。

在性別議題的討論中，經常將這個過程視為「性別認同」的發展過程。對於這樣的看法，我持質疑的態度（詳見第六章），不過仍然暫時採用這個名詞，因為「性別認同」可以說明對於某個性別分類的歸屬感。認同包括了我們身為男人或女人，對於這樣的歸屬所代表的意義，以及我們是怎麼樣的人等概念。這些概念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我們在成長過程中慢慢發展出來（至於什麼時候才開始發展，則仍有爭議），且經過長時間細細填補起來的。

西蒙·波娃更進一步發現，這種轉變過程有許多不同途徑，其中還有許多衝突與模糊地帶，有時造成不穩定的結果。性別議題之所以神祕難解，部分原因就是因為這種性別範型表面上看起來黑白分明，沒有轉圜空間，但是仔細研究起來卻是如此的複雜與不穩定。

因此我們不能把男性或女性視為一種被大自然固定下來的狀態，但是也不應該過於簡化的認為性別完全是由社會規範或是權威壓力，由外在形塑而成。人們建構自我的陽剛或陰柔特質，藉由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展現，於是在性別秩序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或是因應外在社會給予我們的定位。

大多數人都自願安於這樣的定位，對於這種性別兩極化（gender polarity）的二分法通常也很滿意；然而，性別模糊（gender ambiguity）卻不是如此罕見：有陽剛的女人，也有陰柔的男人；有女人愛上女人，也有男人愛上男人；有女人是一家之主，也有男人在家帶小孩；有女人從軍殺敵，也有男人擔任白衣天使。有時候，「性別認同」的發展結果成為介於中間的、混和的或是完全矛盾的範型，這時候我們就會用「女性化」、「娘娘腔」、「怪胎」和「人妖」之類的字眼來形容。

心理學研究發現，大多數的人都兼具不同比例的陽剛與陰柔特質，而不是絕對的男性或女性。性別模糊可以是遭人鄙視的目標，但也可能是引人遐思和幻想的對象，從莎士比亞戲劇中變裝反串的演員，到《沙漠妖姬》（*Priscilla*）這樣的變裝電影，變性扮裝在通俗文化和精緻文化中都不是陌生的題材。

這種性別交混（gender blending）的程度，顯然已經足以引起一些鼓吹重建「傳統家庭」、「真正女人味」或「正牌男子漢」等社會運動的強烈反對。一九八八年，教宗在憂心之餘，發表了一封名為《論女性尊嚴與職業》（*On the Dignity and Vocation of Women*）的宗座牧函，提醒大家：創造女人就是為了讓她們變成母親，不要將她們的功能跟男人的功能搞混了。維持如此堅定性別區隔的努力，本身就足以證明這樣的區隔不是太穩固。

但是，兩性之間非但只有區隔，還有不平等。大部分的教會與清真寺，都是由男性負責經營管理，這只是更大的範型中的一部分而已：大部分企業的財富都掌握在男性手上，大部分的大型機構都是由男性負責營運，大部分的科技也都由男性控制。在很多國家，包括人口眾多的國家，女性受教育識字的機會遠低於男性。舉例來說，最近調查的印度成年人識字率，男人是73%，女人只有48%；奈及利亞的成年男性識字率有78%，女性只有

60%；以全球的文盲來說，有三分之二是女性。在美國、澳大利亞、義大利和土耳其等國家，中產階級的婦女已經擁有與男性平等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的機會，有些甚至躋身中級管理階層和各種專業領域，但是即使在這些國家，還是有許多不成文的限制，讓權力與財富的金字塔尖端依然是男性的天下。

此外，也有尊重方面的不平等。在許多情況下——包括美式足球賽中的啦啦隊長——女性都被排除在主要的活動之外，或是被視為男性發洩慾望的對象。所有的幽默文類——大胸脯的笑話、女人開車的笑話、丈母娘的笑話——幾乎都是以鄙視女人的瑣碎和愚昧為基礎。整個產業界，從限制級的色情產業、娼妓到賣弄女人風情的廣告，無一不是把女性身體視為男性市場消費的對象。工作場所的性別機會平等改革，經常遭受到男人拒絕在女人手下工作的阻礙。而在宗教界，不但大部分的宗教都不讓女性出任主要的職務，而且經常把女性視為玷污冒瀆男性的象徵。

儘管男性通常是性別秩序不平等結構中的受益人，但也不是所有男性都利益均霑，的確，有很多男人也付出相當的代價。不論成人或是青少年，男性若是同性戀、女性化、甚或只是個性懦弱一點，就被視為偏離了男子氣概的主流定義，因此成為辱罵取笑的對象，甚至可能遭到暴力相向。即使符合主流對男子氣概的定義，也要付出代價。針對男性健康的研究顯示，男性受到工業意外傷害的機率，遭到暴力致死的機率都比女性高，也比較會有不良的飲食和酗酒的習慣，還有比女性更容易受到運動傷害（這一點不足為奇）。二〇〇五年，美國男性的平均壽命是七十五歲，女性則有八十歲；在俄羅斯，經過資本主義改造之後，男性的平均壽命是五十九歲，而女性則有七十二歲。

因此，這種性別配置不但是歡愉、認知與認同的根源，同時也是不平等與傷害的來源；換言之，性別本來就有政治意涵——但是這也表示，政治可能很複雜、很棘手。

性別秩序所造成的不平等與壓迫，也一再引起要求改革的聲浪，這些改革運動包括爭取婦女投票權、要求在反殖民運動以及獨立後的政府中必須有女性代表；有爭取同工同酬、婦女擁有財產權、修改同性戀法、爭取婦女工會制度、平等就業權、生育權、變性人與跨性人基本人權的運動；也有反對教育中的性別歧視、反對性別歧視的媒體，反對強暴與家庭暴力等等。

然而，抵抗這些改革，甚至反改革的政治運動也隨之而起。目前在性別政治角力場中可以看到的運動包括反同志運動、反墮胎（pro-life）運動、不同政治光譜的男性運動，另外在國際間還出現了一種複雜的爭辯，這是與西方女性主義與西方文化在全球優勢有關聯。

在這個性別改革的歷史上，一九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的婦女解放運動和同志解放運動，扮演樞紐的角色；這些運動並未達成所有的目標，但是卻造成了深遠的文化衝擊：讓人類現實中這個完全無人理解的領域開始受到重視，要求大家去理解這個領域，進而採取行動——這也是當代性別研究的濫觴。政治上的改革也啟動人類知識的劇變，而且似乎愈來愈像是一場革命，人類知識的革命。

本書的目的就是勾勒出這場革命：描述性別政治（gender politics）與性別研究發現的新領域、介紹一些如何了解進而改變這個領域的論辯，並且針對這些論戰所涉及的問題提出解決之道。

第二章以近年來在性別研究中五個著名的案例，說明以上所說的這些大問題如何在這些特別研究的個案中逐漸成形。第三章探討性別理論與性別模型，以及創造出這些理論的知識份子。第四章則回過頭來討論「差異」的問題，探討兩性差異的程度以及身體與社會互動的方式。為了討論這個問題必須把性別視為一種社會結構，因此我在第五章將進一步分析性別的不同面向及其歷

史演變的過程。第六章討論個人生活中小規模的性別問題，觀照逐漸出現的性別轉換（gender transition）的論辯。第七章則檢視性別在制度與全球社會中所引起的大規模問題。第八章可以說是綜合討論，焦點放在性別政治，討論改革運動的成敗得失。我在這裡提出來的問題，不但是關於個人生活的微觀政治，同時牽涉到社會制度與社會運動的宏觀政治，因此在結論中將會討論到全球社會中的性別政治。

定義性別

既然對於這些議題有了新的認知，也就需要一些新的詞彙。自從一九七〇年代以來，英文的「gender」一詞，已經廣泛用來描述整個領域（雖然從未廣為接受）。這個名詞是從文法用詞中借來的，但是最終根源是一個古老的字根，原來的意思是「製造」，如「產生」（generate）一詞就是源自這個字根；因此在許多語言中就從這個字根衍生出很多表示「種類」或「分類」的字，如生物分類學中使用的「屬」（genus）也是來自同一個字根。在文法中，「gender」一詞是指不同名詞種類之間的特定差異，十九世紀的《牛津英文辭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就中規中矩地指出：「gender」一詞「或多或少呼應其所指出物品之性（或無性）的區別」。

文字用法說明了這種性別差異對人類文化的影響有多深遠。在印歐語系和閃族語系[●]中，名詞、形容詞、代名詞都可以區分為陰性、陽性、中性或通性；而且不只是與有性生殖物種相關的

● 譯註：閃族語系（Semitic languages）係亞非語系的分支，泛指中東、北非和東北非一帶人民所操持的語言，包括阿拉伯語、希伯來語、衣索匹亞的官方語言阿姆哈語（Amharic）以及在厄立特里亞（Eritrea）中部流傳之提格利尼亞語（Tigrinya）。

詞彙才會有性別區分，就連物品、觀念、甚至一種思想狀態也不例外。相形之下，英文算是比較沒有性別化的語言，但是即便如此，英文中還是用女性的「她」來稱呼船舶，甚至用來稱呼油井（例如：「她就要噴發了！」）。

語言固然是性別中的一個重要層面，但是缺乏一致性，因此無法做為我們了解性別的框架。比方說，在德文中，「女人」（*die Frau*）是陰性，但是「女孩」（*Mädchen*）卻是中性，因為所有這一類的指小詞的字都是中性；又如，「恐懼」（*terror*）一詞，在法文是陰性（*la terreur*），在德文卻是陽性（*der Schrecken*）；至於其他語言，包括中文、日文和非洲的約魯巴語（*Yoruba*），則根本沒有在字形上區分性別。其實語言中的性別化，不只是文法而已，絕大多數情況必須視其使用的方式而定；即使比較沒有性別化的語言，也可以用來指稱性別地位或是表達對性別議題的看法。此外，在很多社群之中，有些特定的字眼或是聲音的音調都被視為專屬於男性或女性，甚或用來表示說話者的陽剛或是陰柔特質。

討論到社會中的性別問題時，大多只強調二分法；這是因為他／她們接受了生理上的男女之分，於是把性別定義為呼應這種男女之分、建立在這種區別之上，或是因此形成的社會或心理差異。

「gender」最常見的用法是指，男女之間依其生理上的區別而產生的文化差異，這種定義的本質是二分法和差異的觀點：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

對於這樣的定義，有些決定性的反對意見，包括：

- 人類生活並不能簡單地區分為兩個領域，人類性格也不只兩種。我們對於性別的意象往往只是二分法，但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本書會提供豐富的例證。

- 以差異為本質的性別定義表示，凡是看不見差異之處，就沒有性別。以這樣的定義來說，我們就無法確認女同性戀者或是同性戀情慾的性別化特質（基於二者的性別相似度）。此外，像心理學研究發現男女之間的心理差異非常小，也就是說，性別之分不復存在，那麼這樣的定義就會讓我們更混淆。（詳見第四章）
- 以二分法為基礎的性別定義，等於是從性別的角度，排除了女性之間或是男性之間的差異，然而同性之間確實有差異，而且與男女之間的關係形態息息相關。舉例來說，同樣是男性，暴力與非暴力的陽剛特質就有很大的差別。（詳見第六章）
- 以個人特徵為基礎的性別定義，忽略了個體以外的過程。大規模的社會過程是以男女共有的力量為基礎，而不是以他／她們之間的差異為基礎。現代經濟商品與服務的生產過程，就是共同的能力與分工合作的結果——但是製造出來的產品卻是高度性別化，其所孳生的財富，也是以高度性別化的方式來分配。因此，這一點也必須納入性別分析之中。

社會科學的發展已經足以克服這些困難，其關鍵就是把焦點從差異轉移到關係。因此，性別無非是一種社會關係，個人及群體都在這種關係之中運作。

社會關係中持續而廣泛的範型，就是社會理論中所說的「結構」，從這個角度來說，性別也必須視為一種社會結構。性別不是生理上的表現，也不是人類生活或個性中固定的二分法，而是我們社會配置、日常行動與生活中的一種範型，而這種社會配置可以支配我們的行動與生活。

性別是一種社會結構，不過卻是一種特殊的結構，因為性別

是牽涉到身體的一種特殊關係，這種關係即是我們對性別一詞最常見的定義——兩性的自然差異，也就是男女生理結構的不同。當然，我們仍是屬於有性生殖的物種，並非無性生殖（不過複製技術可能很快就會讓一切改觀！），而我們生理解剖結構的某些層面確實也因此會有所不同，我們身體上的許多生物過程也受此影響。（詳見第四章）然而，這樣的定義，最大的問題不在於只重視身體，也無關乎有性生殖，而是將生物的複雜性與適應性壓縮成刻板僵化的二分法，以及認定文化範型只是「表現」身體差異的觀點。

有時候，文化範型確實會表現出身體上的差異，比方說，有些文化認定初經是區隔女孩與女人的差別；但是文化範型通常不只是如此而已，有時候連身體差異都無法彰顯。以男女身體的差異來說，社會行為有時候會誇大這種差異（如孕婦裝）、有時候否認（許多聘雇行為）、有時候予以神話化（如電腦遊戲）、有時候予以複雜化（如「第三性」風俗）。因此我們不能說社會配置向來「表現」的是生理上的差異。

但是我們可以說，在所有這些案例中，社會觸及了身體的問題，也處理了身體的生殖過程和身體之間的差異。其實沒有固定的「生理基礎」（biological base）來進行性別的社會過程，而是有一個讓身體進入社會過程的場域，我們的社會行為就在這個場域中去處理生殖差異。我把這個場域稱之為「生殖場域」（reproductive arena）。

如此一來，我們對於性別一詞的定義就可以跳脫「差異」這個似非而可能是的概念。性別是一種社會關係的結構，以生殖場域為中心；同時也是將身體的生殖差異納入社會過程的一組實踐。講白一點，性別就是人類社會處理人類身體及其延續的方式，以及這種「處理」過程對我們個人生活與集體命運所造成的種種後果。在第四、五章中，我會更完整的解釋以這種定義使用

的「性別」一詞。

這個定義有重大的結果，其中包括：性別與其他社會結構一樣，都具有多面性，不只是關於認同、不只是關於工作、不只是關於權力，也不只是關於性特質（sexuality），而是以上種種同時存在的問題；性別的範型在不同文化脈絡中有驚人的差別，但是仍然是「性別」；性別配置由結構的力量依社會性（而非生理性）產生，藉以形塑個人行動，因此這些配置通常看似不會改變；然而，性別配置其實一直在變，隨著人類行為產生新的情況，或是隨著結構發展出危機趨勢；最後，性別有始，也可能會有終。上述這幾點，稍後都會在書中詳述。

資料來源：

本章提到的統計數字，如收入、經濟活動率和識字率等，請參閱聯合國發展計劃（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之《2007/2008 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2008*, 2007年，詳見書末參考書目），或是聯合國統計處（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經常更新之網站表格。國會代表和內閣官員比例的數字取材自國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2007），管理階層比例數字來自美國國會兩性就業平等委員會（1995b）與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出刊之《財富》雜誌。有關男性健康資訊請參閱 Schofield et al.（2000）。有關「女人」的引文出自西蒙·波娃《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 295）。「gender」一詞的字義與字源，參見《牛津英文辭典》第四冊（*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第100頁。

性別研究：五個案例

研究複雜的問題，通常最好是從細節著手，而且是透過觀察特殊個案來了解其研究結果。因此在這一章，我將討論在最近幾十年間所發表的五個著名的性別議題，它們分別來自五大洲，其中三個是以當地背景的日常生活為主題——學校、工作場所、個人生活；一個是探討在大的歷史變遷中的性別變化；另外一個則是從人們面對面的層面來討論性別改革。雖然這五個案例討論的議題有很大的差異，但是仍然可以從中看出一般性別研究共同關切的主題。

案例一：校園生活中的性別遊戲

社會研究中最艱鉅的任務之一，就是以大家都自以為了解的情況為主題，然後以前所未有的角度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美國民族誌研究學者貝蕾·頌恩（Barrie Thorne）就克服了這個困難，完成一項艱鉅的任務，寫出了一本觀察入微、引人入勝的大作《性別遊戲》（*Gender Play* 1993）。

頌恩著手進行這項研究計劃時，性別研究還很少以兒童為對象；每次提到兒童，總是預設他／她們都是經由成人世界由上而下地「社會化」（socialized）過程，使他／她們認同性別角色，

而且也總是假設只有兩種性別：一種是男性，另外一種是女性，而男孩和女孩各就各位，接受符合他／她們所屬性別應該有的常模與期許。這個概念來自於以相當數量填寫問卷的研究，而不是以實際觀察兒童生活中的性別為基礎。

頌恩就做了實地觀察。她以北美兩所小學做為田野調查的觀察對象，在其中一所小學花了八個月的時間，另外一所則是三個月；她在教室、走廊和運動場，跟每一位學童交談，觀察這些孩子在上課與遊戲時跟其他同學與老師之間的互動。

民族誌作為研究方法聽起來很簡單，但是實際執行起來卻很難做得好，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在「田野中」只要一天就可以觀察到大量的資訊，所以必須知道自己要找什麼東西；然而對於新的經驗與資訊又必須抱持開放的態度，才能看到原來並不在預期之中的新發現。

身為觀察研究人員，頌恩最感興趣的部分當然就是成人如何灌輸有關性別的資訊，以及兒童如何接受性別資訊的細節。在她書中，最好笑（毋寧也是最可悲）的一章叫做〈唇膏與『約會』〉（Lip Gloss and “Goin’ With”），內容是關於未達青春期的兒童如何學習青少年打情罵俏與約會的技巧。此外，她對男孩與女孩在非正式互動中的差異也深感興趣，例如他／她們玩的遊戲、使用的空間、講話的遣詞用字有什麼差別等等。

然而，頌恩跳脫了傳統性別模型所描述的範型。她開始察覺到這種模型會讓觀察人員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只看到兩性的差異；於是她不只注意男孩與女孩分開活動時的校園生活，也特別留意他／她們在一起的互動，因此她開始覺得性別差異會因情況而異：有些情況會造成性別的差異，但是有些情況下性別差異卻受到忽略或完全看不到。即使在課間休息的遊戲中，男孩和女孩通常各自聚集在運動場上不同的空間活動，但是有時候他／她們也會混在一起，不特別強調男女之分；在學校每天的例

行活動中，有很多這種「輕鬆跨越性別的互動」(relaxed cross-sex interactions)，顯然男孩和女孩並不是始終都處在性別區隔的兩個世界裡，也不是永遠都扮演對立的「性別角色」(sex roles)。

認知了這一點之後，其他的問題接踵而來：什麼情況會特別強調性別，什麼情況不會？頌恩發現，雖然老師偶爾會強調性別——比方說，在教室裡進行男女對抗的學習遊戲——但是大多數由老師控制的活動都不強調性別之分。舉例來說，學校裡最常用的教學技巧「灌輸式教學」(talk-and-chalk)就不強調性別區分；在這種情況下，老師站在教室的最前面，要求所有的學生都注意聆聽講授的課程內容，因為所有的學生都必須學習，不分男女，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基本區別是施教者與受教者之間的差異，而不是學童間不同群體的區別，因此男孩、女孩都處於相同的情況。

第二個的問題是：在強調性別的情況下，孩子們如何建立性別差異？頌恩發現一種她稱之為「劃清界線」(borderwork)的活動：「一旦性別界線被啟動，原本鬆散的『男女群聚』，就會凝聚成『男生群與女生群』，兩個群體涇渭分明。在這個過程中，原本在其他情況下與互動無關緊要的認同分類，就成了各自集體認同的基礎。」(1993: 65)

在小學裡有幾種不同劃清界線的活動，其中最有趣的一種是追逐捉人的遊戲，這種遊戲有時候有非常嚴格的規則，有時候沒有。我記得在我唸小學時有一種蠻可怕的追逐遊戲叫做「cocky-laura」，就有嚴格的規則；其中一個不成文的規則就是只有男生可以玩。因為這種遊戲的基地就在運動場上的一棵很大的尤加利樹附近，但是學校禁止女生接近那棵尤加利樹。至於頌恩研究的那所小學，男生和女生可以一起玩，還經常彼此追逐，有時候是「女生捉男生」，有時候是「男生捉女生」，甚至二者還常常合而為一，於是原來被捉的人可以反過來追逐捉人的人。頌恩發現通

常是男生捉男生、女生捉女生，這種情況就沒有什麼值得注意或討論之處；然而女生捉男生／男生捉女生通常就會引起熱烈的討論，因為在這種情況下：

性別詞彙明顯地凌駕個人身份，特別是提到另一群體時（「救命啊，女生在追我」、「莎拉，快來，我們去捉男生」、「東尼，快把我從女生手裡救出來」）；個人會向同一性別的其他同伴呼救或是伸出援手。如果要出賣某人，他／她們會從自己的群體裡捉出這個人，然後交給另外一個性別群體；例如艾西登小學（Ashron）三年級學生在一次激烈的追逐之後，藍恩突然從背後捉住比利，把他壓倒在地，然後藍恩大叫：「嘿，妳們女生快來捉他！」（1993: 69）

頌恩對孩童的觀察也許可以提醒我們對照成人的行為，因為我們也不斷地透過「劃清界限」的活動來標示性別藩籬，這些活動也許不是孩子氣的追逐遊戲，而是有關性別的笑話、服飾或講話形式等等。性別差異不只是存在而已，而是不斷發生的事情，而且是由人為因素所導致的，因此也可以透過人為的力量予以消弭、改變或是降低其重要性。

這種製造性別區分的遊戲還有其他的作用。在女生追逐男生，男生也追逐男生的情況下，他／她們的行動似乎是平等的，因此就某些層面來說，他／她們處於平等的地位——但是並非全面的平等。粗暴的追逐遊戲，則較常見於男生群體。男孩控制的運動場空間通常也比女孩大，也比較常見到男生侵入女生群體，打斷她們的活動。換句話說，男生群體比較常出現侵略行為，爭取優勢——即使在有限的範圍內，兒童也可以做到這一點。

在象徵的層面，男孩也會爭取優勢。他們把女孩視為污染

源，例如把群體中地位較低的男孩稱為「女生」，或是把他們排擠到女孩使用的空間旁邊；反之，女孩就不會用這種態度對待男孩子。女孩子經常被形容成會傳染一種無中生有、被稱之為「蝨子」的疾病，至於群體地位較低的女孩則可能會得到「蝨后」（cootie queens）的封號。在研究中的一所學校裡，就出現另外一種蝨子的版本，稱之為「女生垢」（girl stain）。這些事看起來也許微不足道，但是就像頌恩所說的：「將一個人視為傳染病的來源而對此人及其所有物敬而遠之，就是社會距離的有力表態，也宣示本身的優勢地位。」（1993: 75）

因此在男女生之間有一種不對稱的情況，反映在男生群與女生群本身內部的差異。有些男生常常打斷女生的遊戲，有些則不會；有些男生的地位較高，有些較低；有些女生則比其他女孩早「談戀愛」。到了四年級，帶有同性戀恐懼（homophobic）的攻擊行為在男生群體內開始變得常見——例如，稱其他男孩為「屁精」（“fag”）——多數人在還不了解這個字指涉的性意義之前，就已經知道這是一個表達敵意的字眼。在此同時，男孩之間也開始較少出現肢體接觸，因為他／她們開始學會害怕表達感情，或是被人懷疑流露情感。簡言之，這些孩子開始表現出性別範型的差異，以及性別與性的階層（gender and sexual hierarchies）區別，這些行為成人應該都不陌生。

頌恩這本書裡還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內容，像是談到成人在兒童之間做研究的情況，筆觸幽默又有獨到的見解。對我而言，這本書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告訴我們，這些美國小孩在學習性別時有能動性（agency）；他／她們對性別角色的認同不只是被動的「社會化」。當然，都向週遭成人世界學習各種不同的課程：可供認同的性別學習、性別展演的學習，以及有關仇恨的學習，這一點頗令人遺憾就是了。然而，他／她們是以自己的方式自發地學習，發現性別很有趣，有時很刺激；他／她們在以性別為基礎

的群體中進出，有時候畫清性別界線，有時候又跨越性別界線；在二元化的性別裡遊戲，完全不當一回事，甚至還違反了這種性別二分法。在孩子的世界裡，性別很重要，因為性別是重要的人類議題，他／她們得處理面對，而不是因為性別是一個固定的框架，讓他／她們淪為這個框架裡的玩偶。

案例二：男性氣概與礦場

十九世紀末，在南非殖民屯墾的荷蘭人和英國人開始開發世界最大的金礦，也開始剝削這個巨大的財富——白水嶺（Witwatersrand，又名Whitewater Ridge）金礦。白水嶺的礦藏無窮，但是礦質差，必須處理大量的礦石才能淘出黃金；此外，主要的礦藏都埋在德蘭士瓦省（Transvaal）高原的地底深處，因此礦坑必須挖得很深。於是一開始的瘋狂淘金潮，很快就變成有組織的工業活動，由大公司主導，動用的人力高達數十萬人。

由於全球市場的金價是固定的，因此公司的利潤全繫於壓低勞動成本，於是金礦業就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工，在地底深處既辛苦又危險的環境中工作；對殖民地的企業來說，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再明顯不過了，就是聘用原住民。因此，從南非各地乃至南非以外地區招募而來的黑人男性，便成了金礦業的主要勞動力——即使到現在也還是如此。

這群金礦勞工成了南非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族群。丹巴·穆迪（T. Dunbar Moodie）跟一連串的夥伴合作，長達二十餘年，記錄他們在金礦工作的經驗，寫成《淘金行》（*Going for Gold* 1994）一書。穆迪研究金礦公司的檔案與政府部門文件，進行參與性觀察研究，走訪黑人礦工居住的「城鎮」中的礦工、礦場幹部以及婦女；這個研究的關鍵時刻到臨，就是跟他一起做研究

的薇薇安·娜歌（Vivienne Ndatshe）到靠近東南沿海的龐多蘭省（Pondoland）訪問了四十名退休返鄉的礦工，披露這些礦工生活的各個層面，就此深刻地改變了流動勞工的圖像。

因為金礦的所有權都掌握在大規模企業主手上，他們的資金來自歐洲，因此很容易套用歐洲都市工業勞工的模型，把南非礦工視為「普羅階級」（proletarians）；但是實際情況卻不是那麼一回事。南非勞動人口的種族結構——白人管理，黑人提供勞力——不只降低了勞工成本，而且形成了一道藩籬，讓礦工得以保存自己的文化，同時還可以非正式的控制他們的工作。大部分的礦工都住在礦場附近的礦工寮，這是一個與外界隔絕的純男性空間，他們就在這裡建立自己的社會生活。

男人跟招募勞工的仲介公司簽約之後——合約通常為期四個月到兩年不等——必須跋涉數百公里到礦場報到；他們不會攜家帶眷，也不打算到都市定居，這不只是因為工資太低，不足以支付一個家庭在以現金交易經濟為主的城市中生活，更重要的原因是這些礦工大部分都來自像龐多蘭這樣的地區，屬於小農自耕農的農業型經濟，跟這種經濟型態有密切的聯繫，因此也打算回到這種經濟型態。

對大多數人來說，到礦場打工賺錢是為了貼補在鄉村的家計，或是希望累積一點資源，再回到農村成家立業，例如添購牲口或是準備結婚等等。對孟朋多族（Mpondo）的流動勞工來說（其他人也是這樣想），「男性氣概」（manhood）的理想典範就是建立自給自足的自耕農場，成為有智慧又受尊敬的一家之主；而礦場工作只是達到這個目標的一種手段而已。

在這種情況下，其性別實踐就跟歐洲傳統男主外／女主內（breadwinner/housewife）的夫妻互動有很大的差異。第一，這些在礦場工作的人都住在純男性的礦工寮，因此必須自己處理家務事；若有性需求，還得找新的性伴侶。有些人去找在鄰近城

鎮工作的女性，其他人則在礦工寮裡建立一種性與家務的夥伴關係，也就是所謂的「礦場婚姻」。這種關係多半發生在資深礦工與資淺礦工之間，資淺礦工負責做家務事，同時提供性服務，藉此換取資深礦工的禮物、指導、保護和金錢饋贈。這種習俗行之有年，大家都心照不宣。這種夥伴關係只是暫時性的，等時候到了，資淺礦工在礦工寮裡成了資深礦工，也會反過來找一個「礦場妻子」；而且這樣的關係只限於礦工寮內，絕對不會帶回家鄉。

至於在農村的家鄉，儘管很多男性都離家到礦場工作，但是鄉村農場的家計仍需維持正常運作，於是也就出現了一種特殊的調適，因為主持家計的一家之主很可能是女性，例如礦工留在家鄉的妻子。這時候，孟朋多族的年長男性對於男性氣概「Ubudoda」一詞的定義就不是指戰士具有的美德，而產生了其他的意涵。就像一位退休的礦工馬沙納（Msana）所說的：

「Ubudoda就是助人，如果有人的小孩沒有書或是註冊費之類的，若是他／她們的父親無能為力，你就去幫這些孩子一把；或者是有人去世，你去他家跟他家裡的人說說話；或者是有人很窮，家裡沒有牛，你帶自己的牛去幫他拉犁耕田；這就是Ubudoda，幫助別人的人。」〔穆迪寫道：〕我……問他，是否還有一種男性氣概是指在戰鬥中表現力量？馬沙納立刻答道：「沒有，那不是男人，這樣的人叫做兇手。」（1994: 38）

在這個文化背景下，男性氣概主要是指負擔及管理農場家計的能力，還有對社區的參與；既然女人也可以完成這些任務，孟朋多族裡幾乎所有年長一輩的男性也就自然而然地認為女性也可以有ubudoda。當然並不否認在父系社會（patriarchal society）中，

男性還是擁有最終的控制權，但強調的觀念是男女建立家園農場的夥伴關係，女性有能力也經常執行陽剛的工作，因此也參與在男子氣概中。

這些因為特定歷史情境所產生的性別配置隨時會改變。隨著二十世紀的推進，自耕農場的農業經濟型態逐漸凋零；實施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的政府推出重新分配屯墾區的計劃，導致原有社區分崩離析，也造成大量勞工流離失所。此外，金礦業也有所改變，礦工開始組織工會，管理階層捐棄舊有的父權式管理型態，以新的方式與勞工溝通（雖然新的型態持續助長「種族的」仇恨與猜忌）。到了一九七〇年代，舊有的薪資結構改變，礦工的收入開始增加，已經足以供應都會家庭或是在鄉村非農業家庭的家計，於是打破了農場與礦場的經濟共生。

在這些變遷的環境中，舊有的移居文化受到侵蝕，原本特有的性別範型也不例外。年輕一輩的孟朋多人對「男子氣概」的認定，不再是管理鄉村農場的能力，而是跟男性的生理特質劃上等號——這是女性無法分享的。「因此」，穆迪說，「以現在這一代的孟朋多人來說，男性與女性又回到二分的世界。」擁有男子氣概的女性也消失無蹤。

普羅化終究來臨，近似歐洲範型的性別意識形態（gender ideology）也隨之而來；年輕一輩的礦工比父執輩的礦工有組織、比較逞勇好鬥、獲得的酬勞也比較高，於是所謂的陽剛特質逐漸與粗暴、肢體主宰和侵略性等特質掛勾，這種陽剛特質的形態不需要女性的互惠夥伴關係，因此女性也逐漸回到家庭主婦的地位，完全仰賴男性的薪資過活。

當然，穆迪的研究不只這麼簡單，還包括其他複雜而且精闢的分析：如礦場的勞動過程、礦工寮裡的生活、暴力與反抗的片段等等。這本書和頌恩的《性別遊戲》一樣，都提出人類主動建構性別範型的證據，深具啟發意義；但是礦工的故事對於建構性

別的外在限制——經濟與政治力的衝擊——著墨更深，讓我們看到不同性別策略所導致的後果：富裕與貧窮、支配與依賴；更重要的是，穆迪的研究讓我們看到複雜而有力的歷史變遷，隨著時間更迭而讓性別配置改頭換面。

案例三：扭曲性別

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醫學界發現了一種可怕的新疾病，後來命名為「後天性免疫不全徵候群」(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簡稱「愛滋病」(AIDS)；不久之後，又發現這種疾病跟一種人體免疫不全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簡稱HIV)有關，這種病毒會破壞人體免疫系統，降低抵禦其他疾病的能力，等於間接殺人。

愛滋病疫情橫掃全球帶動了大規模的研究，從發現HIV病毒的生物研究，到社會科學研究實際造成HIV感染的作為。在醫學衛生研究中最常用的「行為研究」就是做問卷調查。儘管問卷調查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數據，但是終究只是有限的資訊，無法了解性接觸對性行為雙方的意義以及性行為在這些人生命中的位置。

對防治愛滋病的策略來說，了解性行為對個人的意義正是不可或缺的資訊，因為唯有發生性行為的個人願意保護自己，預防愛滋病的工作才可能會有成效。因此部分研究人員就採用比較敏感的開放式研究策略，其中最著名的成果就是蓋瑞·多塞特(Gary Dowsett)的《實踐慾望》(*Practicing Desire* 1996)。這份澳大利亞的研究採用傳統的社會學研究方法——口述歷史——為愛滋病蔓延年代的同性戀者勾勒出一幅生動感人的圖像。

多塞特的研究以二十名男性的訪談為基礎，這個數字看似不

大，但是好的生命歷史研究卻是出奇的複雜，足以提供大量的證據和理論線索，因此不能操之過急。多塞特的研究從第一個訪談到最後出版，耗時九年；二十位受訪者一一敘述他／她們的生活，鉅細靡遺地鋪陳他／她們的性關係與性實踐，討論他／她們生活的社群，他／她們的工作與工作場所，他／她們跟外在廣大世界的關係，以及他／她們跟愛滋病疫情的關聯等等。這本書提供的證據極為豐富，提出了關於性別的重要問題；由於材料太多，實在無法一一詳述，因此我只提出其中一位受訪者來討論。

休伊·布朗（Huey Brown）有個比較廣為人知的名字，叫做哈莉特（Harriet），受訪時年近四十，在一個都會型勞工階級社區中同性戀圈子裡是位人盡皆知的人物；這個社區名叫「諾藍嘉地」（Nullangardie），以穆迪的定義來說，諾藍嘉地幾代以來都是普羅階級。哈莉特的父親是卡車司機，母親是家庭主婦。他十四歲輟學，在當地一家超市擔任收銀員，隨後又做過許多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作，主要都是在咖啡店或是飯店，目前則是製作三明治。他沒有多少錢，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也沒有任何專業證照；但是哈莉特卻是卓越的愛滋病防治宣導人員，不但籌備並且募款來支持愛滋病防治相關的活動，同時也擔任臨時教師，宣導安全性行為，是社群中極具影響力的導師。

哈莉特從青春期的開始就涉及同性戀性行為，但並不是因為什麼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也不是因為接觸到「同性戀圈子」（在那個年代的諾藍嘉地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圈子存在），純粹只是因為跟其他男孩或成年男性發生短暫、純屬官能享樂的性接觸。多塞特指出，同性戀未必是與異性戀「相悖的」（opposite）一種概念；在諾藍嘉地的男孩與成年男性之間，有很多這樣的性接觸與性網絡，從來就沒有正式的名稱，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卻形成他／她們性特質（sexuality）的重要部分。

哈莉特熱衷性行為，性伴侶的人數眾多，也有熟練的性愛技

巧，在不同的性接觸中會採取不同的角色，也從不同的性對象得到多樣態的（有時候也有些怪異的）反應。誠如多塞特所說的，這樣的證據——而且絕對不僅限於哈莉特的個案——足以推翻任何定義男性的性行為有單一標準範型的說法。

哈莉特跟其他人一樣，希望擁有穩定的伴侶關係，也曾經有三段固定的關係。第一任伴侶非常善妒，會動手打他，而且打得很兇；第三任伴侶則是一位即將去動變性手術的準變性女人（transsexual woman），這對他是另一種傷害。第二任伴侶吉姆是哈莉特一生的摯愛，他／她們的關係維持了九年。「這有點像丈夫與妻子之間的關係，我照顧他，他照顧我。」吉姆在性行為中扮演一號（插入）的角色。「他是那種不願意讓別人的屁靠近他屁屁的異男。」吉姆在建築業工作，他／她們兩人住在一起，共同扶養吉姆的姪兒、姪女，而且一些吉姆的家人也接納他／她們的關係。然而，就像多塞特所說的，哈莉特不是傳統的妻子，那麼我們該如何定義吉姆呢？

聽起來像是一般的郊區家庭生活，只不過他的伴侶是動過隆乳手術、男扮女裝的男人，而且還有特殊癖好，喜歡偶而跟萍水相逢的伴侶在怪異的情況下發生肛交！……不管吉姆算是什麼，他肯定不能被稱為「男同志」；當哈莉特說：「他〔吉姆〕非常的異性戀！」他指的是性行為上的傳統男性，而不是像異性戀所定義的那種男性（1996: 94）。

然而，相處九年後，吉姆還是為了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離開哈莉特。這裡的性別是在實踐中的，而不是傳統的性別分類——現實情況總是一再脫離正統性別分類的常軌。

就某種程度來說，男扮女裝（drag queen）正是跳脫傳統的性別分類的驚世駭俗之舉。休伊從十八、九歲開始在男扮女裝的

圈子裡混，於是搖身一變成了哈莉特，就此展開「扮裝女郎」的表演生涯。澳大利亞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都有一種在地的男扮女裝餘興表演傳統，內容包括默劇、對嘴唱歌、脫口秀和脫衣舞等；哈莉特學會了扮裝妖女表演的技巧，打扮起來幾可亂真，到後來甚至還動了隆乳手術。此外，他還學會了同性戀娘娘腔的幽默風格以及表現自我的方式，這些都是當地傳統的一部分；現在，哈莉特就利用人們給他的名人光環和這些表演技巧替愛滋病防治工作籌款，然而，他發現新世代的口味有些轉變：年輕一代的同性戀者比較認同「同志」（gay）而不是「娘娘腔」（camp），因此他／她們比較喜歡陽剛的男性脫衣舞者，而不是舊式的男扮女扮裝秀（drag shows）。

飯店工作和扮裝表演的收入都不多，在工業衰退的經濟中，非技術性工人的經濟前景也不甚樂觀；到了年近三十，哈莉特嚐試了另外一種工作形態：從娼。他仍然做女裝打扮，顯然很多顧客都以為他是女人；有些人知道真相或是有所懷疑，但是對這些人來說，他的陰莖反而成了吸引人的部分。有時候哈莉特會接一些妓院介紹的工作，不過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街頭獨立作業。

溫蒂·查吉絲（Wendy Chapkis 1997）針對美國及荷蘭所做的研究顯示，性工作者的工作情況以及他／她們掌控工作的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別。哈莉特顯然是在這個光譜的一端，能夠完全掌握自己的工作情況：他不使用麻醉藥、只提供某些性服務，而且堅持安全性行為。他的性愛技巧高超，因此吸引了不少死忠的老顧客，甚至在他退休之後——不再阻街從娼也恢復男裝打扮後——這些老顧客還是會來找他。即使如此，街頭從娼還是相當危險，也必須付出一些代價；於是哈莉特學會了隨時注意顧客的手放在什麼地方，藉以保護自己。如此經過幾年，在被警方逮捕兩次之後，他才放棄了這份工作；然而，他的性名聲卻始終如影隨形，後來他去應徵當地愛滋病服務組織的家居服務工作人員時，

還因此被拒於門外。

哈莉特的故事（這裡只能概略陳述大略的故事概要）一再地讓我們質疑傳統的性別分類，不只是因為哈莉特跨越性別的界限而已。沒錯，哈莉特確實有創造性、巧妙而持續地跨越了性別界線：作為男扮女裝的表演藝術者、動隆乳手術、為人妻子、街頭賣淫、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然而，哈莉特卻是不折不扣的男人（多塞特在書中也認知到這一點，始終都用男性的人稱代名詞「他」來指涉哈莉特，而我也蕭規曹隨）。此外，哈莉特的伴侶、顧客、社會環境也都同樣面臨性別錯亂（gender perplexity）的問題。這個故事中的每一個成份似乎都超越了我們所熟悉的性別分類。

多塞特指出，性別分析的一般分類嚴重不足，無法理解這種情境中所發生的事情；他也批評性別理論充滿了「異性戀的性別歧視」，預設了異性戀關係的立場，無法深入了解非異性戀者。即使用了有性別領域的詞彙，在同性戀的情境中，這些詞彙的意涵也有所轉化，例如哈莉特就提到了「丈夫與妻子」。

因此，性慾與性實踐似乎成了瓦解性別分類的強酸溶劑：

但是哈莉特同時也教導我們，這些性別分類在面臨性本身時被解構了：有些人喜歡被完全做女裝打扮的跨性人插入性交；有些客戶最後完全不需要依賴女裝打扮來助興；官能享樂與感官刺激，性幻想與性偏執，才是性經濟中流通的貨幣，在這性經濟中，性化的身體與性別化的身體，非但不能決定是否發生性行為，反而是渴望成為進一步瓦解性別的助力。（Dowsett 1996: 117）

多塞特提出性別分析的侷限，也質疑性別認同的概念。很明

顯的，在哈莉特生命的大部分片斷中，性別都是存在的；但是同樣明顯的事實是：性別並不框限哈莉特（或其伴侶）的性實踐。多塞特（2003）在後來持續愛滋病流行的研究中，強烈地指稱性特質（sexuality）不能只簡化成性別分類，而必須從理解性特質下手。然而，哈莉特的故事卻顯示出性別與性特質之間持續不斷的交互影響。哈莉特的娼妓工作以諾藍嘉地這個社群中性別化的經濟為基礎，他的顧客——全部都是男性——就是在這樣的經濟型態中掙錢；同樣的，這些顧客的行為也是以陽剛文化為基礎，因為這樣的文化讓男性覺得自己理所當然地應該得到性滿足。

我們從這個研究得到的一個教訓是：不能把性別關係視為機械化的系統。人類的行為有創造性，而我們則是不斷地走入沒有人曾經佔領過的歷史空間；在此同時，我們又不是在真空裡無中生有，而是在我們自己與他人過去行動所創造出來的特定情境中行動。就像哈莉特根據性別秩序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即興演出複雜的性別表現，我們也是在過去的基礎上，邁向未來。

案例四：女人，戰爭與記憶

全世界最大的一次性別平等實驗，就是由蘇聯所完成的。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爆發革命，接著是激烈的內戰，最後布爾什維克政府成立，正式宣佈賦予婦女平等的權利；在那個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的婦女甚至還不准投票的年代，知名的女性主義者亞麗山卓·柯隆泰（Alexandra Kollontai）出任蘇聯第一任政府的社會福利部長，新政權大手筆投資女孩與婦女教育、婦女健康醫療服務以及幼兒托育設施；婦女參與工業生產及其他形式的科技就業，是所有資本主義的「西方國家」從未達到的高峰。蘇聯政權宣稱，它們已經達成男女平等的目標，在社會與公共生活的各個

層面也對女性全面開放。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末期，支持這些理想的政治體系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崩解，從前蘇聯分裂出來的不同國家，也出現了對性別的不同看法。艾琳娜·諾維可娃（Irina Novikova 2000: 119）發現，拉脫維亞試圖在後蘇聯時代努力重建新的國家認同，但是在這個的過程中，性別重建所訴諸的性別模型竟然古老得令人難以置信：「一開始是訴求『重返過去』，回到一九三九年這個國家遭到蘇聯吞併前就已經存在的家戶長式作風及威權模型，還有深藏在這個模型裡的父權傳統……在這個過程中，男人應該重整國家，女人／母親則應該深居在家庭／家園／國族／國家裡，扮演文化守門員的『臍帶』角色（umbilical role）^①。」

拉脫維亞的情況似乎也發生在大多數後蘇聯政權。這些國家都公然由男性主宰，讓女性邊緣化，將建國與強硬、具有侵略性的陽剛特質融合在一起——前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就是最好的例證。從表面上看來，這是令人震驚的歷史大逆轉——從性別平等的系統轉變成逞勇好鬥的父權制度。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劇烈的轉變呢？

足跨文學批評和歷史的諾維可娃，在她的文章〈蘇聯與後蘇聯的陽剛特質：女性記憶中的男性戰爭之後〉（Soviet and post-Soviet masculinities: after man's wars in women's memories）中提出了精闢的答案。這文章的性別文化分析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好範例，這種研究文類提出的問題不只是針對個人生活，也不僅限於特定的機構制度，而是關於性別的寬廣文化意涵以及這些意涵，框架了個人的經驗。

諾維可娃認為，在人們想要徹底排除蘇聯實驗慾望的助長下，促使各地區父權制度的抬頭。

一般相信，蘇聯官方的性別平等模型讓男人喪失男子氣概，變得陰柔化；大家都普遍相信男人喪失的歷史認同，必須在此刻重建。因此，對整個蘇聯烏托邦計劃宣告失敗的關鍵反應，就反映在性別動力上。這些處於後蘇聯時代、民風保守的民族國家，在重建時所提出的論述中，認為烏托邦計劃的基本錯誤就是讓男人有了陰柔特質，而女人有了陽剛特質，扭轉了「自然的」性別角色（2000: 119）。

這樣的反應在新政權尚未安定的情況下更是變本加厲；這些小國在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市場中都是窮困、依賴性強的經濟體，就連俄羅斯也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也遭到尊嚴與國力的嚴重崩潰，在短短十年間，從超級強權淪為災區。因此宣揚一種強悍而有競爭力的陽剛特質就被視為一種手段，以適應這個嶄新而充滿敵意，卻又無可迴避的環境。

講到這裡，整件事似乎簡單明瞭，實際上卻更加複雜。諾維可娃也指出，若是蘇聯體系真的像宣傳所說的那麼尊重性別平等，若是女人的地位真的和男人一樣權力平等，那麼男性特權也不會如此輕易地還魂。

在布爾什維克政權崛起的十年間，激進主義節節敗退，而且在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主政之下，極權體系逐漸鞏固。史達林政權不只是由一群無情之人所掌控的殘暴獨裁政權，而且還是擅長編織平等謊言的獨裁政權。表面上是「共產主義」這個冠冕堂皇的口號，骨子裡卻是極度不平等的體制——或許還比不上美國的資本主義那樣的不平等，但是不平等根深蒂固的程度絕對不遑多讓。

❶「臍帶」角色，象徵女人的角色是扮演母親、照顧家庭、文化的保護者、維護社會團結。

其中一部分就是性別不平等的結構。婦女在革命中爭取來的權利，在後來的幾十年間又全數繳回，例如墮胎權。女性在蘇聯國會中佔有的席次比例遠高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但是蘇聯國會並沒有任何權力。在握有實權的機構中（例如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女性仍是極少數；當然，女性在有酬的經濟活動中沒有缺席，但是她們還得做第二份工作——無酬的家務和照顧小孩的工作。

然而，諾維卡娃指出，婦女在蘇聯文化中有重要的象徵地位，也就是母親的地位，尤其是兒子的母親——這是早年俄羅斯歷史流傳下來的文化。雖然蘇聯政府花了很大的心力，排解婦女必須同時滿足工作生產與生兒育女兩種需求的衝突，但蘇聯政權也特別利用文化強調母性的重要。的確，就某種程度的象徵意義來說，「婦女／母親」就是俄羅斯的代名詞；這樣的母親送「兒子／士兵」去解放全世界。於是一種性別化的戰爭迷思應運而生，並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達到最高峰；直到一九八〇年代，蘇聯政府仍然以此說法，為派兵入侵阿富汗編織合理的藉口。

不過，俄羅斯婦女的實際經驗與蘇聯政府宣傳的女性角色相去甚遠。為了進一步分析這個議題，諾維卡娃從一個鮮少有人討論的文類著手：婦女的戰爭記憶，並且以兩位作者的作品為主題。囿於篇幅的關係，我必須略過愛蓮娜·芮茲薇史卡雅（Elena Rzhevskaya）——也就是《遙遠的喧囂》（*Distant Rumble*）一書的作者，她本身是蘇聯紅軍的情報官，親身參與了一九四五年尋找希特勒，生要見人、死要見屍的搜索行動——而把焦點集中在比較晚近的作者：絲薇拉娜·愛列希薇姬（Svetlana Alexievich）。

愛列希薇姬的《鋅男童》（*Zinc Boys*）是一部極富爭議的作品，主題是蘇聯政府在阿富汗打過的一場「不為人知的戰爭」。這本書的書名有個反諷的典故，一方面指涉蘇聯紅軍在戰爭中使

用的鋅製棺材，另一方面也反諷蘇聯的「鋼鐵人」意象，也就是在早期戰爭英雄論述中的士兵與工人。蘇聯政府口中的阿富汗戰爭，是為了和平與社會正義的聖戰，然而儘管蘇聯擁有優勢的軍事科技，仍然在戰場上損兵折將，傷亡慘重，最後甚至鎩羽而歸；最後，不但蘇聯軍隊完全撤離阿富汗，其所支持的社會主義政府——曾經試圖改革婦女地位——也徹底垮台。這場戰爭的勝利者是仇視女性的軍事政權塔利班陣線（Taliban movement），不過後來又被美軍領導的入侵部隊推翻，因此才引爆了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北部的新殖民戰爭。

愛列希薇姬訪問了在一九八〇年代參與這場戰爭的退役軍人，其中也包括在軍隊中擔任軍護的婦女；顯然，這場戰爭所造成的創痛不下於美軍在越南的慘敗，戰爭殘酷、可怕與不知為誰而戰的程度也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蘇聯政府在壓制民眾反戰聲浪的成效比美國成功，但是這只不過讓戰爭造成的創傷地下化而已。《鋅男童》一書再次揭開了這個傷疤，不但激怒了退役軍人，也激怒了沒有直接參與戰爭的人，因為他／她們都希望徹底遺忘這整件一團混亂的可怕歷史。

《鋅男童》試圖以多重自傳的形式呈現，愛列希薇姬以編輯／作者的身份，使用也同時質疑戰爭中母／子關係——這是俄羅斯文化熟悉的主題。作者的地位就如同母親，但是又不全然是母親，特別是在面對參戰的俄羅斯士兵表現出情緒創傷時，愛列希薇姬和她的讀者所面對的，並不是伸開雙臂表示歡迎與支持、國家的／母性的身體，而是另外一種身體記憶：男性的、死亡的、撕裂的、被凌虐的、堆積如山的、等待鋅棺的身體——鋅棺還供不應求。

戰敗的記憶、精神的創傷，還有在戰爭墳場上無名墳墓的強烈意象，在在都粉碎了過去在戰場上英勇男性士兵的傳統形象。然而，婦女在這場戰爭中的象徵地位也同樣不堪一擊。強悍女性

的代稱——亞馬遜女戰士^②——為了更大的正義而挺身作戰的女鬥士形象，都被婦女對戰爭的真實記憶破壞殆盡：她們在戰區受到的騷擾、羞辱和性剝削，而且還是來自她們這一方的男性。婦女的積極行動——也就是參與這場聖戰——最後只不過讓她們面對剝削軟弱無力，徹底瓦解了她們對婚姻愛情的浪漫夢想。

從戰場回來之後，婦女發現這些經驗與傳統文化中對女性的期望背道而馳，也不符合貞烈工人妻子的楷模；而處理這種衝突的唯一方式，就是讓這些記憶徹底消失。因此，愛列希薇姬的文字讓一些人感到憤怒，因為這等於是跟抹殺的記憶對抗。

至於從戰場上回來的男性則出現不同的結果，對他們來說，這場敗仗是一種集體性無能的經驗。蘇珊·傑佛茲（Susan Jeffords 1989）在她扣人心弦的研究中指出，美國在越南吃了敗仗之後，美國電影和小說花了很大的心力重建男性的性能力與權威，而最唾手可得的目標就是越南當地女性和性別平等的假象。諾維可娃也在前蘇聯發現相類似的情況：「女性一再受到耳提面命：化妝舞會結束了，過去的平等只是禮物，現在女戰士已經不能跨越正常的、生理加諸在她們生理性別上的限制。」（2000: 128）

諾維可娃主張，女性的記憶揭開了隱藏在蘇聯時代性別平等假面底下的性別動能（gender dynamics）——這有助於我們理解後蘇聯時代何以偏離性別平等的原則，特別是有助於我們了解為什麼通常是婦女支持這樣的轉變。因為經過這些創傷之後，她們什麼都不想要，「只想要遺忘過去積極活躍的權利」，很多婦女甚至堅決支持新父權結構與強而有力的男性形象。

藉由仔細回顧文化歷史，檢視在蘇聯時期表面上「性別平等」，而傳統的性別形象同時保存下來並且在轉變中，我們或多或少可以了解在後蘇聯生活中這種自相矛盾的性別範型。

案例五：由下而上的改變

由於性別研究往往得到的結論常都令人鬱悶不快，所以告訴讀者一個好消息應該還不錯。這個消息來自遙遠的印度鄉間，因此必須提供一些背景資料。

男人（或是說男人應該）負責生產、賺錢養家，而女人則負責消費的觀念，其實是相當晚近才出現的——雖然廣為流傳的洞穴人意象十分根深蒂固：男人出擊，獵捕長毛象；女人則在洞裡生火。在大多數的狩獵採集（hunter-gatherer）社會中，女性集體生產的食物比男性要多；即使在農耕社會中，婦女也是農業勞動力中穩定而不可或缺的部分，跟男性一起在田裡工作，或是耕種自己的特殊作物。在許多非洲社會中，婦女一直都是重要的商人。

然而，在殖民主義之下，這些配置遭到破壞，比方說利用原住民男性去採礦或耕種，而女性則淪為家庭幫傭。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殖民主義，到尾隨其後的全球化，北大西洋世界的工業都市所創造出來的「男主外／女主內」模型擴及全世界，成為現代最普遍的理想性別關係（儘管非常的不切實際）。在一九五〇和六〇年代的「未開發」世界，新興獨立的政府、西方援助機構與聯合國所設定的經濟發展與現代化計劃中，也採納了這個「養家男人／家庭主婦」的模型，而將所有的資源幾乎全都挹注在男性身上。

到了一九七〇年代，這種情況造成的龐大不公不義，在受援助國家與提供援助機構內，都遭到女性主義者的強烈抨擊。一個名為「發展中的婦女」（Women in Development）的運動出現，

② 譯註：the amazon，希臘神話中居住在黑海邊的女戰士，以驍勇善戰、驍悍神勇聞名。

要求所有的資源必須重新平均分配給女性，於是提供援助的機構也逐漸接受這個原則。但是，在後殖民社會中，男性仍然持續掌控國家機器、地方政府、金融銀行業、貿易與工業製造企業，更別說是土地了，資源要如何重新分配呢？因此應運而生的一個解決方法，就是「微型貸款」計劃（micro-credit）；在這個計劃下，婦女——無論是以個人名義或是集體合作——可以取得小額貸款，擴展她們既有的生產活動，或是創立新的小生意，希望藉此讓她們儘早自給自足。這些計劃中最著名的就是孟加拉的鄉村銀行（Grameen Bank），其創辦人穆罕莫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還因此獲頒二〇〇六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然而，這樣的方式並非毫無阻礙。在某些地方，男性主宰的勢力龐大，即使是指名要給婦女的資源，也會被男人挪用；就算這些資源真的到了婦女手上，這種新的情勢也遭到男性的強烈排斥；微型貸款計劃有時還會出現引發家庭暴力，這種令人不悅的副作用。由此看來，婦女經濟地位的改革似乎需要有男性參與計劃，才能改變地方性別的秩序，因此有人提出了更完整的「性別與發展」策略，就是將男人與性別關係也納入發展的過程中。但是這立刻在女性主義者之間引起爭議，她們認為性別政策成為以保護男人為主，現在好不容易才歸諸婦女的涓滴資源，很可能會回流到男人手上。（White 2000）

然而，在許多國家，最近出現了很多性別改革的倡議，也都有男性介入其中。這種情況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新書中，有生動的描述；這本書由印度的社會學家蕾蒂卡·喬普拉（Radhika Chopra 2007）負責編輯，她本身就是性別與家庭研究的專家。書中收錄的文章講述了各種運動的奮鬥過程，有支持性工作者權利、女童教育、失蹤人口的母親、同性戀權利、反對墮女嬰的胎等；其中一章是〈企業的婦女與支持的男人：東北部的微型貸款脈絡〉（Enterprising women, supportive men: micro credit networks in

the north-east)，探討如何在面對面的層次推動經濟策略。

這篇論文的作者蘇哈希·葛斯瓦米（Subhashim Goswami）是一位年輕的社會科學家，講述他跟著一位替非政府組織（非營利、非政府組織，簡稱NGO）做田野工作的人，進入梅哈拉雅（Meghalaya）山區的過程。這個推動經濟發展的非政府組織在印度東北部非常活躍。葛斯瓦米在鄰近的阿薩姆省（Assam）做研究的時候，就聽說了這位田野工作者普林司·唐克休（Prince Thangkhiew），他們兩人最後終於在一個鄉間小鎮碰面——其中歷經不少困難，因為普林司幾乎永遠都在鄉間工作。葛斯瓦米依照一般的研究程序，坐下來開始做訪談，但是過了一會兒之後，普林司說：「我無法像這樣坐在這裡、隔著一張桌子跟你說我的工作是一怎樣，你必須跟我一起到鄉下去，自己去看看；如果你要去的話，必須走好幾個鐘頭的路，說不定還是泥濘的小徑，還必須吃他／她們給你的東西，而且睡在地上。」（Goswami 2007:140）於是他們當天就出發，有時徒步，有時搭乘擁擠的地區公車，從一個村莊到另外一個村莊，經過了「美得令人窒息」，但是卻極度貧困的山區鄉下——卡西族人（Khasi）居住的地方。

普林司的正式工作是擔任這個非政府組織與當地自助團體之間的中介者，這些團體都接受該組織的小額撥款援助。這些錢可以協助當地民眾做各種增加收入的小生意，範圍包括開雜貨店、賣蔬菜食米、學校用品、養豬、栽種竹枝等。其用意在於創造一個可以自給自足的收入來源，又不至於讓這些窮人負擔沈重的貸款利息。

然而，普林司所做的卻遠遠超過資金管理。他非常投入社區組織工作，也很有技巧，花了五年的時間認識當地民眾，也打算永遠跟他／她們住在一起。在葛斯瓦米的筆下，他是一位精力旺盛，追逐一個由下而上、消弭貧窮夢想的人。他在這個計劃中合作的對象，絕大多數都是婦女。的確，「若說普林司在東卡西山

區（East-Khasi Hills）所創作的援助基礎是以婦女為中心、以婦女為導向，一點也不誇張」（Goswami 2007: 156）。

卡西族是母系社會，家族財產主要由最小的女兒繼承。但是這並不表示這是一個由女性統治的社會，年長男性通常控制鄉村議會——或稱為「多巴斯」（dorbars）——因此普林司也經常與男性溝通。不過，這確實意味著婦女是全面參與生產，在決策過程中也沒有缺席，所以才能建立自助的經濟小組。

普林司不但在技術程序中提供協助——例如安排簽約以取得援助金——同時也在事後保持聯繫，協助她們建立關係、提供策略、解決衝突、傳授技術等。普林司顯然廣受當地婦女的尊重，也與她們保持親和的關係；以葛斯瓦米的話來說，他與她們之間有強固的「玩笑關係」（joking relationship），他記得很多人的名字，當他在這個地區走動時，經常在廚房裡、公車上或市場，無拘無束地跟她們談天說地。普林司跟當地的孩童相處也很融洽，關心他／她們的健康與教育，同時也認為孩童是解決當地集體貧窮的長遠之道，這一點也沒錯。

就我所見，這個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並不是從一開始就以性別改革為職志，而是以社區發展與消弭貧窮為目標。但是，它們的工作卻有很大一部分跨越了在印度絕大多數地區都習以為常的性別藩籬，創造了一個跨越性別的聯盟，賦予婦女力量；如此的作為，不但需要普林司持續不斷的努力，也需要當地婦女的信任與冒險精神。或許，這個故事也隱含了當地男性某種程度的容忍與合作，也值得稱許。

還有其他知名的性別研究其實也應該包括在這一章裡，書中稍後還會提到更多的研究。不過我希望這五個案例，已經足以顯示性別動能的多元、複雜與力量。談到「性別」，我們所說的不只是簡單的差異或是固定的分類；而是關係、界線、實踐、認同

與形象，這些都是在社會過程中積極創造出來的。性別關係存在於特定的歷史情境，深刻且經常以矛盾的方式形塑個人的生活，而且隨著歷史的抗爭與變遷而逐漸改變。世界上的知識份子如何了解這過程，則將是下一章的主題。

性別理論家與性別理論

在多數的世界（一）：

蕾登·艾珍·卡蒂妮（Raden Ajeng Kartini）

一百多年前的爪哇，當時仍是荷屬東印度的一部分，有位出身統治階級穆斯林家庭的年輕女子下決心要當作家和老師，還在荷蘭登廣告徵筆友；這位年輕女子名叫卡蒂妮，而她找到的筆友則是史黛拉·齊韓德爾（Stella Zeehandelaar），是名社會民主黨人，替她跟當時歐洲的進步思潮牽上了線。卡蒂妮和兩位姐妹發展出改革爪哇社會與文化的計畫，尤其要提升婦女的地位。卡蒂妮強烈反對一夫多妻的體制，嚴詞抨擊婦女與世隔絕、缺乏教育的傳統，因此立志終身不嫁，發起行動綱領。她計劃創辦學校，教育社會菁英的女兒，背後的理念是貴族階級必須提供改革的模範；此外她還開始發表文章。

可是，由一介女子發起的這些行動，卻被視為有害家族的門風名譽。雖然她父親請了私塾來教卡蒂妮，但是卻不願意送她到荷蘭接受教師的養成訓練，而她計劃要創辦的學校也無法獲得政府部門的支持。最後，她的家人還是遵循傳統，替她安排了一樁美好姻緣，而她也屈從於壓力。這個婚姻殺了她：在生第一個孩子時因為生產引起併發症死亡，得年僅二十四歲。

卡蒂妮在寫給史黛拉的信中，披露了這個充滿希望與失望

的故事；這些信件在她死後被收集起來，經過審查刪節，於一九一一年出版，不久之後逐譯成英文，還取了帶有感性的書名：《爪哇公主書信集》（*Letter of a Javanese Princess*——另外一個措辭比較強硬、未經審查的版本，詳見Kartini 2005）。這些書信成了荷蘭殖民文學的經典，而蕾登·艾珍·卡蒂妮也成了印尼獨立運動中的女英雄。除了少數區域研究，特別是關於印尼的研究文獻之外，我從未看過以英文寫成的性別研究文獻引述她的作品。

卡蒂妮並不是從一開始就試圖要發展出某種「性別理論」——在那個時候並沒有很多人有這種念頭——但是她的作品卻直接觸及性別理論必須要探討的諸多問題：家庭機制、勞動的性別分工、婦女的意識型態、性別關係改變的策略；而且她在殖民社會的背景脈絡中，批判種族歧視，質疑世界中心與邊緣之間的關係，這些都是當代女性主義思潮中的關鍵議題。

如果我們只是抽象地談論「性別理論」，其背後的涵義是認為所有的理論講的都是同一件事情，也就是說，他／她們所討論的知識客體都是相同的——這種說法充其量只能說大約正確。思想是在不同的環境中，由不同背景和受過不同訓練的人所創造出來的；歷史丟給他／她們的題目大相逕庭，因此他／她們會以不同的方式來形塑自己的知識體系，理解其知識客體，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種知識社會學的基本原則，最早是由薇拉·柯蕾（Viola Klein）在她如今已被人遺忘的經典著作《女性人格：意識形態史》（*The Feminine Character: History of Ideology* 1946）一書中，應用在性別理論上；在後來的世代，女性主義的「立場認識論」（standpoint epistemology）又重新強調這一點。因此，要了解性別理論，就必須考量到創造出這些理論的知識份子，以及他／她們所面臨的不同情境。我會以歷史回顧的方式來探討這個問題，

主要的焦點會放在全球大都會，因為當前主導思想的模式就是從這裡源起的，但是我也會將知識的地緣政治放在心裡。我認為——如卡蒂妮與史黛拉——跨越不同地區與情境的溝通，仍然值得的。

在大都會（一）：

從克莉絲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到西蒙·波娃

就人文科學而言，在十九世紀的後五十年間，一種非關宗教、講求理性與懷疑論的文化逐漸形成其現代模樣，而全球大都會的性別理論正是這種文化的產物；不過，後來開始出現的性別理論卻是較古老的論述逐漸轉化的結果，而這種古老的論述具有宗教性，而且是道德取向，可以追溯到現代帝國主義之前的時代。

中古世紀的基督教從遠古地中海世界的聖賢繼承了一種厭惡女性的傳統，惡毒的程度令現代的讀者震驚。基督教知識份子的寫作之中，充滿了女性心智與身體皆不如男性的宣言，還有男人若屈從於女人的詭計會有危險（Blamires 1992）。然而，也有一種捍衛女性的反傳統；一四〇五年，這種反傳統以一個偉大的寓言呈現在世人眼前：法國的克莉絲婷·皮桑寫了《仕女城之書》（*The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克莉絲婷一點一點地駁斥了傳統上對女人的羞辱，還在文中塑造了一個寓言的「城市」，是女性的安全空間。她要求的不是社會或經濟的平等，而是平等的尊重。

在道德上捍衛女性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宗教改革時期以及帝國主義初期階段，尤其是在像桂格教派（Quakers）這類的團體中間，就極力捍衛婦女傳教的平等權利，也就是婦女行使宗教權威的權利。直到法國大革命的時代，也都還是如此；瑪麗·沃史東

克萊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據此寫出了《婦女權利之辯護》（*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1792），直接回應法國大革命提出的「人權」主張。美國早年爭取女性參政權的運動，絕大部分也屬於一種宗教運動；一八四八年，被視為女性主義濫觴的西尼加瀑布（Seneca Falls）會議，也是從「獨立宣言」中移植了訴諸道德的語言來傳達訊息。

然而，科學已經取代宗教，成為知識份子生活的主要架構，而十九世紀的科學也積極關注與性別相關的問題。演化論思潮的巨擘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一書中，使得遺傳與生物選擇成為知識界至高無上最重要的議題，達爾文後期的著作又特別關注性伴侶選擇和性作為繁殖形式在演化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時候的時空背景正是男女性別分工與男女象徵區分最極端的年代；在這樣的環境氛圍中，演化思想——「達爾文主義」而非達爾文本人——會為各種形式的社會差異提供生物理論的基礎，其中包括帝國擴張所建構的種族階層，也包括大都會中的性別區隔，實在不足為奇了。

早年的男性知識份子在形塑關於社會的科學和社會進步的理論時都會觸及性別議題。實證主義之父、影響力與達爾文不相上下的法國哲學家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在第一部「社會學論說」——即《實證體制體系》（*System of Positive Polity* 1851）——就特別注意婦女的社會功能：他認為只要婦女能夠謹守著屬於她們的領域，撫慰、照顧男人，就會成為未來烏托邦社會的重要基礎。不過他最出色的門徒，英國哲學家約翰·史都華·米爾（John Stuart Mill）卻在著名的論文〈雌伏〉（*The Subjection of Women* 1869）中，提出更基進的看法，為平等論發聲，認為導致不平等的基本原因並非男性的道德優勢，而是身體的力量。萊斯特·華德（Lester Ward）的《動力社會學》（*Dynamic Sociology* 1883）是美國社會學史上第一部重要的理論論述，他在書中對

「生殖力」(reproductive forces)有大篇幅的分析，同時也嚴厲批判「性社會不平等」(sexuo-social inequalities)——例如男孩與女孩的教育不均等。一八七九年，德國勞工領袖奧古斯特·貝伯爾(August Bebel)出版了《社會主義下的女性》(*Woman under Socialism*)一書，後來成為暢銷書。馬克斯的同儕佛萊德里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則寫過一篇長文〈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1884)，一度引發學術界激烈論辯家庭歷史、「母系體制」觀念以及社會主義者對於「女性問題」的關切，成為社會改革的議題。

男性為什麼會關心性別議題呢？基本上是因為新興的婦女運動將「婦女問題」搬上檯面，而提倡新社會科學的社會團體本身都積極參與婦女運動，因此婦女解放也就成為任何一個社會是否「進步」的測試指標。

這幾個世代的女性知識份子都面臨極為艱困的情況，不太可能自行創造出理論論述（別的暫且不說，當時婦女還被拒於絕大多數的大學門外），因此這一代的女性主義者，如英國的哈莉特·瑪汀諾(Harriet Martineau)、美國的蘇珊·安東尼(Susan B. Anthony)、澳大利亞的美班·歐絲坦賀姆(Maybanke Wolstenholme)等人，幾乎都沒有著作在討論「性別的理論」——不過，她們對父權體制的機制倒是提出深入的見解。她們的焦點比較集中在批評男性的偏見或是實際的問題上，例如成立組織爭取女性參政權、進行法律和婦女教育的改革。

女性開始撰述比較理論性的論述，都跟經濟議題息息相關，如歐莉佛·許芮娜(Olive Schreiner)的《婦女與勞動》(*Woman and Labour* 1911)；她分析了中產階級婦女的「寄生狀態」(parasitism)以及中產社會拒絕承認剝削婦女勞力的現象。在此同時，勞工運動中的婦女也開始質疑：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婦女是否有共有重疊的利益？亞麗山卓·柯隆泰的《婦女問題的社會

基礎》(*The Social Basis of the Woman Question* 1909)就強烈主張根本沒有所謂一般性的「婦女問題」，只有勞工階級婦女一致支持社會主義，才是邁向真正平等的唯一道路；不過，柯隆泰也主張在勞工運動中應該要有獨立的婦女組織，並且開啟了性自由與婚姻改革的論辯。

來自巴黎、倫敦、聖彼得堡和紐約的知識份子，就住在世界上不曾有過的最大一波帝國主義擴張的心臟地帶。探險家、侵略者、傳教士、好奇的旅客等等，都蒐集了有關非歐洲世界性別配置的大量資訊，他們多半認為這是原始人類社會的遺風。像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的起源〉這樣的文章，就證明了都會知識份子對於這些資訊確實充滿綺思幻想。早期的社會人類學也都充斥著這一類的論述。帝國主義的盛行更讓許多奇風異俗的性別意象廣為流傳：一夫多妻制、搶婚、納妾、亞馬遜女人、原始雜交等等；嚴肅的性別比較研究很晚才出現，不過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從帝國傳來的新聞就已經跟女性主義聯手，撼動單一性別秩序的信念。當時關於性別的論辯，就已經觸及我們在現代性別研究中可以看到的廣泛議題：權力（如「從屬地位」）、性（如「生物種系發生之動力」、「自由戀愛」）、勞動分工（如「寄生狀態」）。

但是，他們詮釋這些問題的取徑跟一百年後的今天還是有很大的差別。不論對中產階級或是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來說，男人和女人就是絕對的類別，而決定性別範型的主要因素是「進步」的動力，不管是逐漸的進步或是革命。從米爾到許芮娜，都一致認為這種道德上、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進步打破了古老習俗桎梏，將性別關係提升到更高、更理性的層次。但是認為「性別的理論」本身就是一種獨立知識的概念，在那個時代的思想中，根本就不存在。可是這樣的概念，很快就要出現了。

朝這個目標邁進的關鍵，則是新創立的深度心理學。維也

納的神經醫學專家西格蒙·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相信，他的病人有很多問題的是源自心理而非生理，因此他開始探索他／她們的情緒生活藉以尋找病因，同時也研發出一套詮釋的方法。他的病人在長期治療過程中的談話，提供了豐富的證據，證明中產階級家庭情緒內在的種種問題；這些資訊都記錄成令人震驚的病史，其中最有名的是「朵拉」（“Dora” 1905）和「狼人」（“Wolf Man” 1918）。這些記錄成了佛洛伊德闡述各種心理的理論基礎：例如無意識動機，如《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1900）；成長過程中的兒童性心理、戀母情結以及慾望和情緒依附的轉換，如《性學三論》（*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1905）；深度心理學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如《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1930）。

到了一九二〇年代，佛洛伊德學說已經擴及原本的科學界之外，甚至形成一股文化勢力；姑且不論佛洛伊德是對是錯，但是他顯然已經觸及了困擾現代西方社會的許多重要問題。佛洛伊德本身並未直接支持婦女運動，但是他所討論的問題卻深受當時女性主義的影響，這一點無庸置疑。他的第一位主要門生艾佛烈·阿德勒（Alfred Adler）與社會民主勞工運動有密切的關聯，同時也公開支持女性主義。他修正的心理分析學說，正是以批評陽剛特質為主軸。這些心理分析學派的先鋒，以及在一九二〇、三〇年代激烈辯論性特質（sexuality）、陰柔特質與陽剛特質的心理分析學者，都證實了成年人的性別區分並不是從生命初始就固定下來；相反的，成年人的性別範型是由生命充滿衝突的發展過程所建構出來的。這是有關性別觀念的一大轉折，因為十九世紀的思考——即使女性主義也不例外——或多或少都理所當然地把男人和女人視為固定特質。

邁向完整性別社會理論的第二步，很快就尾隨而至。瑪西德·瓦爾汀（Mathilde Vaerting）在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優勢性別》

（*The Dominant Sex*）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瓦爾汀是一名教育改革家，也是在德國大學裡首度獲任命為教授的兩位女性之一；不過她卻遭遇到極敵意的回應，並且在希特勒掌權之後被罷黜下台，此後就再也沒有在大學擔任過職務——難怪她會窮畢生之力鑽研權力社會學（sociology of power）。

《優勢性別》一書從社會學的立場批評男子陽剛與女性陰柔是有固定的個性特質。瓦爾汀的理論有兩個基礎：一個是從古埃及和斯巴達歷史的推論，這比較不牢靠；另外一個比較穩固的基礎則是性格隨環境改變的觀點。瓦爾汀主張，所謂的男子氣概與女性陰柔基本上只是反映一種權力關係，在女人掌權的社會中，男人就會表現出中產階級社會視為典型女性特質的性格。在闡述這種觀點的論述之中，瓦爾汀創造了第一個跨學門的性別理論；她的主張結合了心理學的範型與社會結構，同時把法律、性別分工與意識形態都納入性別主宰的領域；她甚至還提出驚人的預言，認為在女性主義之後，會出現男性解放運動。她的著作很快就譯成英文，並且在一九二〇年代成為爭議的焦點，不過在隨之而來的歐洲社會劇變中，她的著作就逐漸被人淡忘了。

差不多也在這個時候，社會人類學以新發展出來的田野調查的技巧「民族誌研究」（ethnography），為性別理論提供了較好的實證基礎。知名的民族誌研究學者——從波蘭的布羅尼斯洛·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到美國的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都特別關注性與性別的議題。馬林諾斯基利用民族誌研究獲得的資訊，對心理分析學說提出名噪一時的批判，指稱佛洛伊德所說的「戀母情結」並不是放諸四海皆準；而米德早年在薩摩亞（Samoa）的研究也進一步證實了性行為中的文化多樣性。後來，她廣為閱讀的《三個原始社會中的性與氣質》（*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 1935）一書中，以她在新幾內亞的田野調查中發現的資訊，跟瓦爾汀一樣，推翻了

生理性別（biological sex）與性別化性格（gendered character）之間有固定關係的觀念。民族誌研究學者，建構了相對性的性別意象，他／她們對於非西方社會中的性別配置，提出令人信服也頗具同理心的看法，這些非西方社會的性別配置儘管跟大都會中產階級生活南轅北轍，不過在自己的社會中的運作卻毫無問題。

對於性別相對性（relativity of gender）的認知，助長了「性別角色」（sex role）的概念在一九四〇、五〇年代廣為流行。性別角色只是很粗淺地應用一個概略性的觀念：人類社會行為反映出的是人們順服自己社會地位的文化規範。最具影響力的理論形式是由當時最有影響力的社會學理論家——哈佛大學教授塔考特·帕森思（Talcott Parsons）提出的（Parsons and Bales 1956）。帕森思最常被後人引用學說，把男性角色定義為「工具性」（instrumental），而女性角色則是「表達性」（expressive），以界定性別角色社會功能的差異。其他討論性別角色的學者，就直接將「工具性／表達性」之分用生理差異來解釋，假設角色常模只是呼應天生的性別差異；然而，帕森思卻把整個性別發展過程，視為社會體系需要完整與穩定所導致的結果。

在壓抑的一九五〇年代，社會適應理論會廣受歡迎，其實並不意外；不過性別角色理論同時也關注性別角色的轉變，尤其是在戰時更為顯著。米拉·克瑪洛夫斯基（Mirra Komarovsky）——在許多年後，她獲選為美國社會學學會會長，是第二位當選的女性會長——就有充分的理由將「文化衝突與性別角色」（Cultural contradictions and sex roles）予以理論化，這也是她在一九四六年發表的論文題目。男人的性別角色也可能改變，海倫·海克（Helen Hacker）具開創性的論文〈男性氣概的新負擔〉（The new burdens of masculinity 1957），第一次提出這個想法；她說，在消費資本主義和都會生活中，除了工具性之外，還得要兼有表達性，因此現在的男性也需要表現出人際關係的技巧，光做「硬

漢」已嫌不足。

有些性別角色的討論也帶有女性主義色彩，海克的論述也是一樣。不過在二十世紀中期，女性主義性別理論更新的主力，還屬法國的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她的《第二性》一書（1949）是所有女性主義教材中最出名的一個，借的心理分析、文學及其伴侶沙特（Jean-Paul Sartre）所研究出來的行動哲學，同時向性別分類與性別支配宣戰。波娃拒絕將陽剛特質與陰柔特質的兩極化視為理所當然，而是深入探索男性意識如何將女性建構成「他者」（other），同時探討女性因應這種處境與自我建構的各種途徑——並不是脫離性別之分（因為這不可能做到），而是在不同的生命計畫（life projects）中以不同的方式來理解性別。當然，這個時期的戰亂也刺激了這本書的誕生，波娃討論的主題和其他的性別角色研究多有重複，不過波娃卻從這些主題中看到不同的東西，因為她是從婦女從屬地位的政治批判著手的。

在這世紀中期，波娃的理論堪稱是非常例外。當時心理分析已經成為醫學界的保守勢力，所關心的是人們的正常化，而不是追求解放。性別角色理論的主流，也同樣採取保守的立場——尤其是應用在心理諮商、社會工作和學校時。雖然很多人崇拜西蒙·波娃的先進理論，但是在當時並沒有立刻引起很大的迴響。

在大都會（二）： 從婦女解放運動到酷兒理論（queer theory）

正因為二十世紀中期的文化氛圍，再加上一九六〇年代，年輕女性投身基進的社會運動，才賦予婦女解放運動一種爆炸性的特質。一九六〇年代末和一九七〇年代初，發生了一次特別迅速的動員，範圍涵蓋了大部分的先進資本主義世界。這個運動造就

了性別分類的取徑（categorical approach），強調婦女整體為一個受壓迫的團體或「性階級」（sex class）——這個理念正好與早年性別理論中的解構潮流背道而馳。美國女性主義更是全面反對心理分析學說。

這個獨特的婦女解放運動觀點，是以權力的分類理論（categorical theory）為基礎，於是從人類學不受重視的角落裡，找出「父權體制」這個詞彙，用來描述男性權力和女性受壓迫的體制。父權體制必須受到獨立自主的婦女運動衝撞，而且婦女解放的需求，必須動用革命的手段。這個觀點經由大量宣傳手冊和一系列的圖文並茂的書籍詳加闡述，從席拉·羅伯琛（Sheila Rowbotham）的《婦女解放與新政治》（*Women's Liberation and the New Politics* 1969），到羅賓·摩根（Robin Morgan）著名的選集《姐妹力量大》（*Sisterhood is Powerful* 1970）以及秀拉米絲·費爾史東（Shulamith Firestone）的《性的辨證》（*Dialectic of Sex* 1971）。連受到新女性主義影響的男人也以同樣的語言發聲，要求「男性解放」，呼籲男性支持婦女解放，而不是與之抗衡的聲音隨之而起（Swayer 1970）。

當時在美國這個基進運動，受到民權運動以及反對在越南的新殖民戰爭的反戰運動影響，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就是相信所有壓迫的體制都可以、也終將被推翻。這樣的觀點立刻受到第一波同志解放運動理論家的支持，紛紛在他／她們的行動中加入反抗性壓迫的議題，不但付諸街頭政治，也形諸文字，如丹尼斯·歐特曼（Dennis Altman）的《同性戀：壓迫與解放》（*Homosexual: Oppression and Liberation* 1972）和蓋·霍昆翰（Guy Hocquenghem）的《同性戀情慾》（*Homosexual Desire* 1972）。

然而，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後期，一種只專注性別的觀點，在美國和英國異軍突起；這種觀點就是尖銳地區隔性別抗爭與其他抗爭，或是把女性受到壓迫視為一切社會不平等的根源。這種

觀點在美國神學家瑪麗·戴利（Mary Daly）的《婦科／生態學》（*Gyn/Ecology* 1978）一書中，表現得最為戲劇化。戴利試圖創造一種概念性、象徵性的新語言，藉以抒發女性的意識及女性對男人的憤怒，而其最終目的則是要創造出一種獨特的女性文化。於是，早期婦女運動的社會基進派就逐漸被視為另類、不純的女性主義變種。

然而，因為女性主義的脈動是如此的強而有力，也因此創造出一系列的理論。一種以勞動分工為主的分類理論，強調婦女在家庭中受到的經濟剝削，就是法國的克莉絲婷·戴爾菲（Christine Delphy 1970）在著名的論文〈主要敵人〉（*The main enemy*）中的主要論點。如何將婦女家務勞動理論化，以及資本家或是丈夫是婦女勞動的主要受益者所引發的論辯，貫穿一九七〇年代。（Malos 1980）

眾所周知的「性別角色」概念，也變得基進起來。這個概念現在被視為打壓女性的社會控制。在美國，心理學家珊卓·班姆（Sandra Bem 1974）帶動一股改革的熱潮試圖重新定義與衡量「雌雄同體」的概念，做為性別角色改革的目標。於是有關「男性角色」，以及男人如何打破這個角色，或是至少稍稍修正這個角色的論辯，從美國興起，然後蔓延到好幾個其他的國家（Peck and Sawyer 1974）。

其他的女性主義者利用結構主義的技巧——這是當時人文科學界最有影響力的知識運動。在一篇名為〈交易女人：論性的「政治經濟學」〉（*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長文中，葛兒·魯賓（Gayle Rubin 1975）整合了女性主義與人類學，建構出一個精緻的「性／性別體系」理論，堪稱在瓦爾汀之後，企圖心最大的性別理論；但是，這個理論也不是獨一無二。早在一九六六年，茱麗葉·米秋（Juliet Mitchell）發表一篇名為〈婦女：最長久的革命〉（*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 的論文，就已經勾勒出女性從屬地位的結構；一九七四年，米秋在《心理分析與女性主義》(*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一書中，提出一個複雜的理論，解析長久以來在階級社會和父權體制下的生殖問題。

米秋的书以及在美国出版之南西·雀朵洛(Nancy Chodorow 1978)的著作，都一反英語世界中女性主義者對於心理分析學說冷淡的態度，顯示佛洛伊德解釋人類接受壓迫的社會關係的概念，又再度受到認同。在法國，拒絕心理分析學說的現象沒有那麼明顯，在婦女解放運動興起時，還有一些婦女採用拉岡的心理分析學說，其關鍵目標是找出一個人類現實層次，是能跳脫一般語言和意識中陽具中心結構。茱莉亞·克麗絲提娃(Julia Kristeva)的《詩的語言革命》(*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1974)和路思·伊利加瑞(Luce Irigaray)的論文〈此性非一〉(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1977)或許是這個潮流中影響最深遠的兩部作品。

至於凱洛·吉利根(Carol Gilligan)的《不同的聲音》(*In a Different Voice* 1982)，則是心理分析與發展心理學的女性主義簡易版，在英語世界中廣受矚目，成為暢銷書。這本書是在「聲音」的層次上，回歸分類理論。一般來說，這本書被視為男女確有不同道德觀的證據，也鼓吹接受溫和版的女性主義，做為國家和企業界的組織改革。

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富裕國家中的新女性主義已經建立了強大的文化勢力，而且也出現在政府與大學的組織中。她們得到一些資源可以籌辦計劃，例如提供受虐婦女庇護所、婦女健康中心、平等就業方案、激發女學生學習動機；這些計劃很快就在工黨或社會民主黨主政的國家立足生根，如北歐、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德國（在地方政府的層級）。這引起了尖銳的爭議，因為

婦女解放運動視國家為父權體制的一部分。於是這些女性主義政府官員的工作對知識界提出了新的問題：如何去理解女性主義者自己也在其中的組織？如何去理解這些計劃所處理的政策問題？

於是，新的理論旁系和研究應運而生。一些理論家重新審視國家體制，把國家視為性別化而且極度複雜的機構，內部是可能會發生變化的（詳見第七章）；一些研究機構和監督單位也紛紛成立，例如挪威的「性別平等中心」（*Likestillingssenteret*, Center for Gender Equality）；女性主義或受到女性主義啟發的政策研究，也漸漸形成一種文類。以教育這個領域為例，著名的政策研究從澳大利亞全國學校委員會（Schools Commission）贊助的調查報告《女生，學校與社會》（*Girls, School and Society* 1975）首開先河，到瑪德琳·阿諾特（Madeleine Arnot）及其同僚在英國合作完成的精緻研究《結束性別鴻溝》（*Closing the Gender Gap* 1999），不一而足。

在大都會裡的大學，女性主義或受到女性主義啟發的研究在一九七〇和八〇年代都大量成長，幾乎人文和社會科學每個領域都是如此；而在自然科學界，這一類研究增加的幅度則較小。舉例來說，在社會學原本處於邊陲地帶、完全不受重視的性與性別研究（sex and gender studies），突然成了整個學科中最活躍的研究領域。女性主義的歷史編纂學更成了一門顯學，一方面因為大量充斥偏見的父權歷史都需要一一改正，另一方面也是認知到性別在歷史知識中是個重要的分類。（Scott 1986）女性主義的科學研究也是如火如荼，過去被視為足以佐證男性優勢的領域也都有了新的發現。（Harding 1986）

專門刊登有關性別角色、性別、女性研究，最後還包括男性研究的期刊，呈現倍數成長，有些還成為聲譽卓著的學術刊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一九七五年創刊的美國女性主義刊物《符號》（*Sign*）。到了一九九〇、二〇〇〇年代，女性研究演變成了

「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涵括了女同志、男同志與變性人等議題，也開始有人爭議，改變成性別研究是否會失去其政治批判的力道，不過在爭議聲中，這個學門仍然持續發展。比方說，在二〇〇〇年代，瑞典政府創辦了好幾個新的性別研究講座，贊助成立跨大學的「性別卓越中心」(Centre of Gender Excellency)計劃，刺激這個領域的研究。

就某種程度來說，這是女性主義令人咋舌的成就；在大學裡的父權體制獨白幾乎是立即阻斷了，女性主義思潮從此奠定了新的社會基礎。然而，婦女解放運動的積極份子對於這成功的早期階段則抱持不信任的態度，她們擔心學術界的女性主義會喪失其政治迫切性，脫離草根運動，把勞工婦女遠遠拋在身後。

結果，這些積極份子擔心的事情都一一實現了。在英語世界的大都會中，絕大部分的性別理論都愈趨抽象、冥想與分析，或是完全沈溺於文化顛覆。以下的例子就是評量這個轉變的指標：當三名英國女性主義者完成了概念文獻的調查，寫成《性別理論化》(*Theorizing Gender*, Alsop, Fitzsimons and Lennon 2002)一書，書中幾乎完全沒有提到女童教育、家庭暴力、婦女健康、性別主流化、經濟發展或任何其他女性主義者想方設法要解決的政策問題——甚至連索引中都找不到「國家」這個條目。她們所寫的那種理論完全跟這些問題脫節，但是卻討論了很多跟性向、個人認同、象徵主義與差異息息相關的問題。

這種理論化的參考重點是哲學家的智識成長，研究的問題與性別無關；其中最顯著的當屬法國的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與賈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女性主義應用傅柯的論述研究、主體化、微型政治、身體規訓，都相當普遍；至於德希達的影響則比較間接，但是卻可能更深遠，因為他所主張的語言意義無限傳佈與解構技巧，被視為質疑所有概念及所有認同穩定性的基礎——其中當然也包括女性主義思想所繫的性別分

類。

年輕的美國哲學家茱蒂絲·巴特樂就是以此為主題，寫成《性別麻煩》（*Gender Trouble* 1990）一書，在一九九〇年代成為學術界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主義文本；就連在學術界之外也廣受歡迎，即便到現在，仍然是廣泛論辯的主題（Lloyd 2007）。巴特樂指稱，性別分類沒有固定的基礎，因此女性主義策略也沒有；性別是展演出來的，認同必須藉由行動才能存在，而不只是表達某種已經存在的現實。在巴特樂的筆下，性別基進主義並不是圍繞認同的動員（如認同自己為「女人」），而是顛覆認同、打破性別二元化、取代性別常模的行動。

這本書在都會廣受歡迎，不只是因為後結構主義的流行，而且還符合一種新的政治需求。一九八〇年代，「新左派」已經分崩離析，婦女解放也不再是團結一致的運動，反而因為性取向、種族、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等不同議題而產生嚴重分裂。對外而言，女性主義遭遇到更頑強的反抗，右派宗教強力動員，反對墮胎權與性自由；在政治上也引起更大的反彈，使得美國憲法的平權法修正案暫告中止，也讓雷根、柴契爾和柯爾政府取得執政權。至於在一九八〇年代選出中間偏左政府的國家，包括法國和澳大利亞，也受到新自由市場意識型態的影響，導致早年對女性主義開放的政策受到擠壓。

不過在性別改革方面，仍然持續有所收穫，其中最耀眼的成就是在北歐國家，在政黨政治中婦女大量出現。舉例來說，在一九九一年，挪威三個主要政黨的領袖都是女性，其中包括總理葛蘿·哈林·布朗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不過，在主流政治中，同性戀恐懼症又公然出現——尤其在愛滋病猖獗的年代。在一九九〇與二〇〇〇年代，勢力最強大的國家政權在中間政府、強硬派新自由主義和激進民族主義之間擺盪不定，這意味著在政府部門，即使是溫和的官方女性主義，能夠發揮的空間也

有限，但是在聯合國和歐盟之類的機制中仍然持續存在。

這一連串事件令人不得不重新檢視女性主義與性別理論。其中一個運動就是由北美的黑人女性主義者主導，她們聲稱不分黑白地使用「婦女」一詞，掩蓋了種族歧視的事實。對某些美國的黑人女性主義者來說——其中也包括貝爾·胡克（bell hook 1984）——這樣的論述回歸早年婦女解放運動中無所不包的基進主義，重新檢討階級、種族與性別抗爭的整合新難題。但是主要的影響是認同政治與一種立場論的勢力在女性主義中抬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派翠西亞·希爾·柯琳絲（Patricia Hill Collins）的《黑人女性主義思潮》（*Black Feminist Thought* 1991）。這形成了女性主義的多重分身，分別代表每一個特定團體的婦女，特別是那些處在大都會社會邊緣：如黑人女性主義、拉丁美洲女性主義、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等。新的研究文獻和見證記述陸續問世——即使在富裕國家也不例外——例如，勞德·托瑞斯（Lourdes Torres 1991）就指出，在美國有愈來愈多的拉丁美洲作品，特別是自傳這種新文類。有些艱難的重新思考也應運而生。白人女性主義者主要把家庭視為婦女受到壓迫的場所——如卡蒂妮即為一例。但是在都會種族主義的脈絡中，家庭（尤其是大家庭）往往是黑人婦女和新移民社群中婦女的重要資產。

然而，影響最深遠的卻是那些重新檢討女性主義基礎分類的理論。女性主義社會學家，特別是在美國，探索性別秩序的微型基礎，仔細理解在日常生活互動中性別分類是如何被完成的。一篇名為〈做性別〉（*Doing Gender*）的論文（West and Zimmerman 1987）就明確地採用這取徑，形成廣泛的影響。女性主義哲學家則重新省思身體與性別分類之間的關係，有些甚至回過頭去強調男女身體上無法跨越的差異鴻溝，將性別視為身體的具體呈現，而「性」與「性別」之間所謂的差距，也在這個經驗中消弭於無形。（Grosz 1994）

文化與哲學論述也格外有影響力。它們強調所有認同分類的脆弱，原則上將性別視為流動性而非固定式的。新興一波女同志與男同志思潮（也就是後來眾所周知的酷兒理論），將這種看法視為理所當然，強烈抨擊文化束縛——他／她們替這種束縛命名為「異性戀常規」（heteronormativity）——將人們強推至性別二元論的固定認同。這樣的理論受到新型態的政治與文化行動主義的推波助瀾，尤其是在年輕世代，他／她們蔑視所有的傳統分類，玩著性別意義基進的遊戲，將眼中看到的一切都予以「酷兒化」，連女同志與男同志行動主義的老舊形式都受到騷擾（雷諾斯〔Reynolds 2002〕對於這一點有極盡諷刺又鞭辟入裡的觀察）。巴特樂的《性別麻煩》也成了這整個文化運動的中心象徵。

更不可缺少而重要的研究仍然持續進行，尤其是在社會科學領域，還超越了女性研究原始的企圖。女性主義的組織理論出現了，如美國的瓊安·艾克（Joan Acker）、加拿大的佩達·唐可利（Peta Tancred），開始分析階層體系與企業中的性別體制（Mills and Tancred 1992）。性別角色理論的枯竭，結果導致「男性解放」討論的擱淺；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結合了同志理論與女性主義的性別分析之後，男子氣概的研究才展開。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有關男子氣概的社會建構研究在富裕國家呈倍數成長，多重陽剛特質及其關係的理論也逐一浮現（Connell 1995）；陽剛特質的研究迅即國際化，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差不多與此同時，都會的理論家開始擔心該如何以全球規模來理解性別的難題。婦女解放運動創造了父權理論，這種理論以比較精緻形式出現，不但有歷史深度，也廣及世界各地（Reiter 1977）；稍後瑪麗亞·米斯（Maria Mies）所寫的《全球規模的父權與積累》（*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1986）以及史派克·彼得森（Spike Peterson）的《全球政治經濟的批判重寫》

(*Critical Rewriting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則又把焦點轉到性別化的殖民主義與全球資本主義，而性別在其中也是動態的改變，而非靜態的存在。至於國際關係中的女性主義分析，如辛西亞·恩羅伊 (Cynthia Enloe) 的《香蕉、海灘與基地》(*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1990) 就是探討國家與國際貿易關係中的性別層面。而性別關係、種族與現代民族主義之間的交互作用，也在妮拉·尤瓦－戴維絲 (Nira Yuval-Davis) 所寫的《性別與國家》(*Gender and Nation* 1997) 中成為重要的主題；這本書所造成的衝擊也持續遞增，因為「全球化」(globalization) 已經成為政治與大眾意識中的中心議題。

在多數人的世界 (一)：從「婦女十年」以降

在一九八〇年代，或許部分可以歸因於「聯合國婦女十年」(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for Women, 1975-85) 運動，導致都會女性主義者對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婦女及女性主義突然大感興趣，相關的研討會數量倍增，系列書籍也一一問世；美國婦女解放運動經典選集《姐妹力量大》的編者羅賓·摩根，再接再厲又推出了續集《全球姐妹力量大》(*Sisterhood is Global* 1984)。

幾年後，旅居美國的印度學者常德拉·塔帕德·莫罕迪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發表了〈在西方人眼中〉(*Under Western eyes*) 一文，針對這些文獻提出了精闢的批判；她指出，這些文獻中的主要趨勢是將「第三世界婦女」同化成單一類別的受害者，代表性別壓迫的極限：

基本上，第三世界婦女平均壽命較短，因為她們的女性性別 (即性方面的箝制)，又身處第三世界 (即無知、貧窮、

未受教育、受傳統束縛、必須操持家務、凡事以家庭為依歸、受到迫害等等)……相反的，西方婦女可以(隱性的)自我表現，受過教育、現代化、可以控制自己的身體與性向、有充份自主做決定的自由。(Mohanty 1991: 56)

都會女性主義者也重蹈白種男性民族誌研究學者經常犯的錯誤。誠如戴安·貝爾(Diane Bell)在《夢想女兒》(*Daughters of the Dreaming* 1983)中所指出的，澳大利亞中部沙漠的原住民社會之所以一直被描繪成以男性為中心，就是因為民族誌研究學者搜集資料時遺漏了原住民婦女；若是從原住民婦女觀點出發，就會對她們擁有的傳統權威與勢力有迥然不同的看法。可是婦女的地位卻隨著殖民而急遽惡化。

莫罕迪的論文收錄在《第三世界婦女與女性主義政治》(*The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ed. Mohanty, Russo and Torres 1991)書中。這本選集的影響相當大，一方面是因為記錄了全球婦女政治的多樣性，另一方面也是另外一種理論的陳述。莫罕迪在這本選集的長序〈奮鬥抗爭圖〉(*Cartographies of Struggle*)，以及後來收錄在《無國界的女性主義》(*Feminism Without Borders* 2003)書中的其他文章，闡釋一種從帝國主義歷史經驗出發的性別取徑。性別與性別再製是密切地與種族建構以及國際資本主義的動力交織的。莫罕迪同意解構主義的看法，認同「婦女」這個分類沒有預設且放諸四海皆準的定義，但是卻是因不同的理由：她認為正是因為真實存在的主宰勢力不斷地區分人類。資本主義利用在地性別意識形態，將「婦女的工作」融入製造利潤的策略。這樣的取徑讓莫罕迪可以更進一步強調要彼此團結一致，共同奮鬥抗爭，可以結合貧窮與被邊緣化的族群一起跨越差異。

另外一位比莫罕迪更為人所知、也更接近都會解構主義的論

述，是同樣旅居海外的印度女性主義學者嘉雅翠·查克拉華蒂·施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1988, 1999）的著作。施碧娃克對女性主義的論述遍及各種不同文類，非三言兩語可以概述。她從不認為自己在創造「性別理論」；的確，她反倒像是在指出創造性別理論的侷限。她最著名的文章〈庶民能發聲嗎？〉

（Can the subaltern speak?）根植於創立「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印度歷史學者的作品，可是卻拆解了他／她們重新發現庶民意識的計劃。她最著名的概念「策略性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源自解構主義對認同分類的批判，可是又看出這些分類在實際執行上確有其功能。施碧娃克在提出這個概念的文章中，表現出傳統女性主義的行動，指出由男性建構的詮釋體系中缺乏女性的參與。

施碧娃克是後殖民研究中最出名的人物，她的論述值得國際關注，但是卻處處自我設限。我認為她的著作是具有教育性，而非闡述特定的立場；她希望讀者自己去想，去學習解構主義的方法，同時也能夠扣緊政治。她呼籲各界要關注處於貧窮與極度邊緣地位的婦女，但是也強調知識份子開始替受宰制團體代言發聲的危險。她跟莫罕迪一樣，都認為全球資本主義連結了各種不同的受宰制團體，但是卻不容易看出施碧娃克著作的風格如何能夠激發出政治策略來因應這個問題。

施碧娃克嫻熟精湛的解構技巧，又引發了一個始終難以解決的問題——處於全球邊緣位置（或原生地）與都會概念之間的緊張關係。來自貝南（Benin）的哲學家保蘭·胡通基（Paulin Hountondji）對這個議題有深入的探討；胡通基（1997）在重要的論文〈重新以非洲為中心〉（Recentring Africa）當中，談到了全球邊緣地帶知識生產的特徵：「外向性」（extraversion）。在殖民主義之下的科學勞力全球分工，到了後殖民世界仍然陰魂不散；在這樣的分工下，知識的資料蒐集與實際運用或許可能出現在邊

緣地帶，但是「理論化」(theorizing) 這個關鍵步驟卻永遠都只在都會發生。根據外向性的邏輯，邊緣地帶的知識份子自然會向外看，往都會區尋求他／她們概念、方法、工具、訓練與認知的來源。

於是就出現了兩極化：一邊是現代性、科學與發展；另外一邊則是傳統知識。光是斷言純潔未受腐化的本土世界觀可以取代西方思想，並不能克服這個問題。胡通基與其他哲學家早就已經指出，試圖從在地民風傳統中形塑本土哲學，最後只是複製出殖民者對本土社會的觀點，反而坐實了本土意識可以遭到邊緣地帶掌權者的操縱——實際上也確是如此。解套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內生知識與全球流通的知識體系之間，建立一個批評驗證 (critical validation) 的新關係，而這二者都是可以受批評的。

胡通基所說的，全球邊緣地帶的科學外向性問題，在性別分析中更是嚴重。探討性別問題的研究與論辯，大部分都取材於來自都會的性別理論，再試圖結合在地的資料或經驗。舉例來說，在一九八四年，中國政府實施經濟改革的初期，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 (All-China Federation of Women) 舉辦了一場為期一週的「婦女理論研究」論壇，當時的知識結構就是如此：女性研究的觀點來自美國，再加上在地婦女情況的統計數字，其結果就是一場「以中國方式做女性研究」的議程——其重點在於婦女與新經濟政治之間的關係。(Shen 1987)

既然談到了莫罕迪和施碧娃克，我就舉個印度的例子好了。蘇西·塔魯 (Susie Tharu) 及德嘉史娃妮·妮蘭賈娜 (Tejaswini Niranjana) 在《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 發表了一篇名為〈當代性別理論的問題〉(Problems for a contemporary theory of gender 1996) 的文章，討論婦女在印度右翼政治中的角色、避孕產品製造商如何使用女性自主的修辭，以及某個村落中的婦女禁慾運動；兩名作者在這幾個案例中所看到的理論問題，正是女性主義

與普世人文主義議題共謀的結果，也是都會的後現代女性主義所提出公式化的說法。印度女性主義已經跟社群主義、階級、區域、鄉村／都會和其他各種形式的差異搏鬥了幾十年，實在很難將這種理論問題視為印度女性主義的中心議題。（Menon 1999）

外向性的問題以及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也讓很多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研究者關切。在一九七〇年代，當性別研究才剛剛在後殖民的非洲啟蒙時，確實有人試圖從非洲的角度來研究，不過觀點與研究方法仍然來自大都會（Arnfred 2003）；最近更出現了一種論點，爭辯性別這個觀念本身是否適用於非洲。其中最主要的例子是跟奈及利亞的約魯巴文化有關：奧耶隆克·奧耶吾米（Oyèrónké Oyèwùmí）所寫的《婦女的發明：以非洲角度理解西方性別論述》（*The Invention of Women: Making an African Sense of Western Gender Discourses* 1997）。奧耶吾米主張，西方性別概念是以身體為基礎將人類一分為二，但是在殖民入侵前的歐耶－約魯巴（Oye-Yoruba）社會卻不是這麼一回事；當地語言本身沒有性別區分，而且社會中也沒有跟西方分類裡「婦女」這個類別相對應的社會分類。她說，奧耶社會中的主要組織原則是年齡輩份，也就是說，權威是以年齡為基礎，而與生理上的性別無關；西方的性別分類是殖民主義強加在當地人民的外來入侵者。奧耶吾米提出了相當多的細節，證明西方教會、殖民政府以及像鐵路這些新興工業所造成的衝擊，在當地製造出殖民版的西方性別關係。當代的女性主義及其性別理論，也持續這樣的文化帝國主義。

可是，其他學者卻在殖民前的約魯巴文化中看到了性別範型。彼碧·巴克蕾－尤蘇芙（Bibi Bakare-Yusuf）就找到一些帶有仇視女性的約魯巴俗諺，還有其他的文化佐證，都指出當地社會確有性別化的權力範型。她認為奧耶吾米只看到語言的表面形式特性，而忽略了語言如何銘刻在社會實踐，以及經驗是如何具體呈現，因此才誤判了情勢。比方說，講究年齡輩份的語言，就可

能掩飾許多婦女遭到邊緣化或是年輕人遭到虐待的事實。殖民主義無疑改變了性別範型，但是這樣的改變是植基於約魯巴文化中原本就已經存在的性別區分。巴克蕾－尤蘇芙對於本土型與都會型知識體系之間的關係，也抱持不同的立場。她主張，試圖重建一個完全封閉的本土文化體系，並將一切都視為外來入侵者而予以拒絕，是錯誤的做法，因為非洲文化始終都是多元複雜的，而且對於他者與改變也都採取開放的態度。在當代非洲，確實存在複雜的性別體系，也造成嚴重的後果，其中包括：經濟不平等的範型、性別化的暴力與性特質，這些都形塑了愛滋病蔓延的危機（Ampofo, Beoku-Betts, Najmbi and Osirim 2004）。

至於在拉丁美洲，性別作為結構原則的重要性始終不曾受到質疑，因為當地關於「男性氣概」（*machismo*）的論辯早在婦女運動出現之前就已經行之有年。墨西哥社會學家德蕾絲塔·芭比莉（Teresita de Barbieri）就是試圖提出系統化記述的一位女性主義者。芭比莉在一篇名為〈論性別分類：理論—方法論的簡介〉（On the category of gender: a theoretical-methodological introduction）的文章中，提供了一個性別的關係模型，以社會控制婦女生殖權力為中心思想，但是其中涉及的層面極廣：「習俗、符號、代表、價值與集體規範」。她強調，雖然在拉丁美洲，婦女是母親而男人為一家之主的形象是性別定義的核心，但是性別卻不是簡單的二分；性別體系中除了男性／女性之外，還有男性／男性，女性／女性的關係——比方說，婦女之間牽涉到家庭勞務分工的不平等——還有性別區分中的生命週期，性別分類中的利益衝突，例如男性支持女性主義的要求等。芭比莉以巴西的黑人女性主義思想為基礎，同時也強調在階層多重的社會中，性別關係與種族關係、階級區分之間的關係是糾葛複雜的。

芭比莉並不是提出一個已經完成的理論；她說得很明白，性別分析是一個開放的領域，永遠都有新的發展與論辯。當然，在

拉丁美洲，還有很多其他的觀點，其中有些特別關注性別如何隨著結構調整，以及隨著當代全球化而改變。芭比莉主張，性別研究必須納入男性，而這也確實成為拉丁美洲的性別研究中一個突出的特色；大多數研究的焦點集中在智利與墨西哥，但是在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現在也都已經有豐富的研究與論辯，探索男子漢的認同、男人之間的階級與種族差異、父親角色的變化、工作與性特質等等。（Gutmann and Vicos Vigoya 2005）

這些研究都假設一個結構完整、完全融合的性別秩序——芭比莉可以毫不猶豫地談論「性別體系」（gender systems）——儘管其他的社會結構使其變得複雜、而且彼此交織。不過，當焦點集中到全球邊緣的社會時，又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在殖民、去殖民和主宰全球的經濟、文化壓力的過程中，本土的性別秩序會如何裂解？例如，梅·高索伯（Mai Ghoussoub 2000）就談到了在當代阿拉伯世界中，針對男性地位與認同所引發的一場文化大風暴——不是一個穩定的體系，而是「一場混亂的追求，為現代男性特質尋找定義」。

印度人類學者薇伊娜·達絲（Veena Das 1995）提出一個在社會悲劇脈絡中產生的問題。在離開印度時，英國殖民政權將這個國家一分為二；隨著一九四七年的分裂，產生了穆斯林、印度教徒與錫克教徒的大遷徙，以及大量的社群暴力。為了污蔑敵對社群，婦女成為強暴、綁架與謀殺的目標——男人藉著女人的身體彼此打殺。看到婦女被捲進如此的歷史悲劇中，達絲發現，在任一特定女性身上所發生的事，都毫無邏輯可言，不論她能逃開或是受苦，似乎都是隨機的運氣；所謂的社會秩序已經完全崩解。社會分析談到這樣的情況，也會遇到極限瓶頸。

在這一個章節，我並沒有替全球都會以外的性別理論做歷史記錄——只是指出一些曾經有些人提出過的重要議題，藉以說明南半球也有豐富的思想。我們看到有多樣觀點，也有很多與都會

性別理論互動的不同方式，性別議題有多重角度的看法，承認事實真相不只一個，但很少有人只想就這樣到此為止。

事實需要的總是更多。誠如拉丁美洲思想家特別強調的，全球邊緣的社會總是一再受到經濟與軍事中心的衝擊而改變位置。我們並不是住在一個馬賽克拼湊出來的世界，每一個文化都彼此分隔；可是我們也不像流行的全球化理論所說的那樣，只是同化而已。我們需要跨越國界來彼此對話，而在性別分析中更擺明了必須如此。

澳大利亞社會學家琪拉·布貝克（Chilla Bulbeck）在《西方女性主義新導向：後殖民世界中的婦女多元化》（*Re-orienting Western Feminisms: Women's Diversity in a Post-colonial World* 1998）一書詳述了這個問題，認為超越歐洲中心主義所牽涉到的問題，在都會女性主義思潮中仍然十分普遍。適當地因應這種全球的多樣性，不只是把「反種族主義」加入現有的議題而已；這個議題還有更深刻的層面，牽涉到獲得知識的途徑和採取行動的方法。這整件事關係到學習「像別人看我一樣的看到自己」，學習真誠地尊重別人的經驗，學習結盟合作的模式。布貝克稱之為「世界旅遊者的角度」（world-traveller perspective）；對全球最貧窮的十分之九的人來說，環遊世界只得在腦子裡想像才能成行，這也不失為一個好的意象，正可以說明我們現在所需要的那種性別理論。

性差異與性別化的身體

在一般思考邏輯中，性別的核心就是男女之間的差異。整個大眾心理學界都在跟我們說，男人和女人在思考、情緒與能力等各方面都是天生相反的；這一類書籍中最暢銷的一本賣了三千萬冊，還翻譯成四十種不同的語言，跟我們保證男人和女人就像來自不同星球的生物一樣。至於這一類的其他書籍，還有暢銷雜誌中刊登的無數篇文章，都一再地告訴我們，男人和女人以不同的方式溝通，男孩和女孩用不同的方式學習，荷爾蒙促使男性好戰，或是「大腦性別」(brain sex) 宰制了我們的生活等等。從科學的角度來說，這些說法大部分都是胡說八道，很多研究證據可以提出反駁。美國心理學家珍妮特·海德 (Janet Hyde 2005) 是研究性別差異的權威，她就指出大眾心理學中男女天生差異的教條不僅戕害兒童教育、女性就業權，甚至所有成年人的感情關係。顯然，我們需要更好的方式來思考差異與身體，而性別研究的發展已經提出一些必要的工具。

生殖差異

女人的身體和男人的身體為什麼會有差異？人類跟很多其他物種（包括動植物）一樣，都屬於有性生殖 (sexual reproduction)

系統——這種生殖系統是由兩個個體的基因資訊結合產生下一代，而不只是複製單一個體的基因資訊。有性生殖本身也是演化的結果，大約在四億年前才出現；在此之前，也有生命形態存在，它們以其他方式繁殖——現在有許多物種仍然以這些方式繁殖；另外還有一些物種（例如蘭花和草等）可以同時採取有性與無性（asexual）生殖。生物學家對於性別演化的成因曾有過爭議，因為這種奇特的生殖方式有其演化上的劣勢，最後可能是因為可以加速物種變異，或是防止有害突變累積才演化出有性生殖。

有性生殖未必需要異性異體，舉例來說，像蚯蚓就是雌雄同體（hermaphrodite），每一個體都能製造精子與卵子，因此每一條蚯蚓都能執行雄性與雌性的功能。至於其他物種的個體都只能製造精子或是卵子，而不能二者兼備；這些物種的身體或多或少都具有「二態性」（dimorphic），也就是說，每一物種都會有兩種形態，人類就屬於這一類的物種。

基因資訊以密碼形式儲藏在DNA的染色體上，這是動植物細胞核內的微型結構；在有性生殖的受精過程中，彼此結合的基因資訊有一半來自雌性的卵細胞核，另外一半則來自雄性的精細胞核。人類的細胞有四十六對染色體，以成對的形式出現，其中一對染色體——即性染色體——會影響人體男性或女性性徵的發展；女性的這對染色體上有兩個X染色體，而男性則有一個X染色體和一個Y染色體。在這對染色體的基因資訊以及正常的環境影響之下，男性和女性的身體分別發展出特殊的器官——子宮、睪丸、乳房——以及生理上的部分差異，如血液循環中的荷爾蒙平衡、女性的月經等等。

以哺乳類動物來說，雌性動物不但會排卵，還有子宮可以保護胚胎（除了像鴨嘴獸這種產卵的單孔目動物之外），然後會從特殊器官（以人類來說，就是乳房）分泌乳汁來哺育新生兒。有些哺乳類動物的雄性（不是所有的物種都會），還會有特別龐大的身

軀或額外的裝備，例如雄鹿的大角。相較於其他哺乳類動物，人類的兩性生殖系統有很大的差別，但是外形差異卻不算太大，至少男人的頭上就沒有長角。

就某些方面來說，人類的身體不完全屬於「二態性」。首先，有相當多人的身體介於兩性之間，難以分類，例如女性少了一個X染色體，男性多了一個X染色體，其他異常或矛盾的荷爾蒙型態，甚至內外生殖器都還會出現林林總總、令人訝異的非標準形態。這些特殊的性類別一直讓性學專家百思不解，而且他／她們的行為與性類別之間也沒有簡單的對應關係。根據生物學家安·法絲托－史特琳（Anne Fausto-Sterling 2000: 51）的估計，這種介於兩性之間的族群總共約佔新生人口的1.7%：數字雖小但是卻具有意義。凱薩琳·哈伯（Catherine Harper）編輯的《雙性人》（*Intersex*, 2007）一書中，收錄了許多這樣的生命故事，也措辭強烈地抨擊急著以手術的方式來「矯正」這些孩子身上變異的做法。

第二，男女兩性的外在差異會隨著生命歷程改變。在幼年期，兩性的身體幾乎沒有差別，兩歲男孩和兩歲女孩之間只有很小的差異，即使最明顯差異的外生殖器——陰莖、陰核、陰囊、陰唇——其發展的起始點也在胚胎的同一個位置。到了晚年，男女兩性的身體在很多方面又愈來愈相似，兩性的荷爾蒙平衡就是一個例子。

第三，即使在成年期的初期，男女兩性的整體外在特徵也有很多重疊的部分，身高就是最簡單的例子。以平均身高來說，整體成年男性比成年女性略高一些，但是跟平均差異相比，男女兩個群體內部的​​身高差異很大；以個人來說，有很多女人比男人高。但是由於社會習俗使得我們通常都不會注意到這個生理上的事實，因為在男女配對時，他／她們選擇的伴侶多半都會符合「期待」的高度差異。

大腦則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例子，也是近年來引起很多性別差異爭論的領域。男女之間的大腦解剖構造與功能有些許差別，例如在處理語言時使用大腦特定部位的傾向，但是這種差別很小，而且尚未有可靠的認定，絕對不像一般人喜歡說的「大腦性別」那麼言之鑿鑿。事實上，在大腦的解剖結構與功能中，有很多區域都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即使存有性別差異，這些差異也可能是不同行為所造成的，而不是導致這些行為的原因。如今的大腦研究在「大腦可塑性」這方面著墨甚深，也就是大腦拋棄舊的神經連結而形成新連結的能力，換言之，就是學習與改變。神經科學家萊絲莉·羅吉絲（Lesley Rogers 2000: 34）就指出，「大腦不是簡單的選擇要做女性或是男性，在大腦功能的任何層面，我們都可以找出男女之間重疊的部分。」這也是人類行為的另一個重要關鍵，稍後還會討論。

對差異的矛盾解釋

男女之間生殖系統的差異是個無庸置疑的事實，但是其重要性卻仍有爭議。性別研究針對這個問題的切入角度有極大的分歧，有些將身體視為某種機器，製造出性別差異；有些則將身體視為某種畫布，由文化塗上性別的形象；有些則試圖將機器與畫布合而為一。但是我認為沒有任何一種是理解這個問題的理想途徑。

很多關於性別議題的討論都有一個預設立場，認為生殖差異會直接反映在男女兩性之間其他的整體差異之上：例如體能與速度（男人比女人強壯，速度也比較快）、實際技能（男人擅長機械性的技能，女人則善於處理細膩而麻煩的工作）、性慾（男人的性衝動比較強烈）、休閒嗜好（男人熱愛運動，女人喜歡閒

聊)、個性(男人好鬥,女人溫柔)、智能(男人尚理性,女人直覺強)等等。一般人都普遍相信,這種性別差異甚大,而且是「天生自然」的。

這種天生的差異成為性別的社會範型的基礎,由此以各種形式呈現。其中之一就是認為男性之所以在社會中居於主導地位,是因為男人體內的睪固酮濃度較高,因此在爭取較高職位的工作時,佔有荷爾蒙的「侵略優勢」(aggression advantage),所以社會需要父權結構——就如史蒂芬·高柏格(Steven Goldberg)在《為何由男人統治》(*Why Men Rule* 1993)一書中所主張的——才能保護女性免於失敗!另外一種比較複雜的論述,則是由發明「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這個名詞的美國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Wilson)所提出來的;還有一群後進將他/她們的研究命名為「演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廣義來說,這些論述從繁殖策略推論社會性別;理論家根據看似達爾文主義的立場,推斷人類忠於親人的感情、母親對孩子的付出、丈夫的出軌行為、女人的羞怯天性、男人對色情的興趣、男性之間的情誼,以及範圍相當驚人的其他種種性別範型,不一而足。大衛·傑瑞(David Geary)在《男人、女人》(*Male, Female* 1998)一書中,對「演化心理學」的論述有詳盡的說明。傑瑞的目的是結合有關性差異的心理學研究與達爾文的「性擇」(sexual selection)概念(即有性生殖中交配對象的選擇),並且視為一種演化機制。他爬梳當前有關人類性差異卷帙浩繁的研究文獻(詳見下文),針對每一種性差異的主題提出可能與其相關的性擇過程,換言之,就是人類如何選擇、贏得並且控制交配對象的過程。

這種把身體視為機器模型,製造性別差異,主要是由男性倡議,而且經常用來替現存的性別秩序辯護,藉以駁斥女性主義或是女性主義提出來的「性別角色」(gender roles)概念。然而,也有女性主義論述把身體視為性別差異的直接來源;如一九八〇年

代的美國女性主義者，就經常把男性好侵略而女性愛和平視為一種天性，像「男性暴力」和「男性性慾」這樣的名詞在當時就很流行，或多或少都影射行為與身體差異之間的關聯，有些積極人士甚至還直指陰莖是男性權力的來源（Segal 1994對拆解這個觀點有詳盡說明）。

天生差異的概念在很多陣線上都遭到挫敗。舉例來說，社會生物學對於人類親族關係的解釋，是從基因的觀點去做的預測，結果與人類學家實地記錄的親族體系完全不相符，因此這種說法不堪一擊（Sahlins 1997），因為社會邏輯與基因邏輯似乎是互不相干的兩個系統。另外，有關荷爾蒙「侵略優勢」造成性別階層的說法，也在發現高濃度睪固酮是社會支配優勢的結果而不只是成因之後，冰消瓦解（Kemper 1990）。「演化心理學」的論述植基於不實際的個人主義，完全排除體制化的性別配置。比方說，傑瑞（1998）在討論到男性之間的暴力程度高於女性時，他只看到男性為爭取生殖資源而對抗男性的競爭，卻沒有看到軍事機制、叛亂暴動、黑道組織或是對於男子漢的文化定義——更別說還有足球運動了。

而更驚人的問題是：儘管社會生物學和演化心理學一再訴諸「科學」、演化論與達爾文主義，但是所有的論述幾乎全屬臆測，沒有任何一個心理特徵上的性別差異，真的顯示出是演化機制的結果。

顯然，身體會受到社會過程的影響。我們的身體發展和運作的方式會受到食物分配、性風俗、戰爭、工作、運動、都市化、教育和醫療的影響，這還只是其中最明顯的幾項而已。所有的影響都是被性別結構決定的，因此我們不能認為社會性別配置只是隨著身體特徵之後而來的，其實是先行於身體，甚至形塑身體發展和生活的條件。誠如西莉亞·蘿勃茲（Celia Roberts 2000）指出，這是種生理與社會相互生成的。

迥異於視身體為機器的概念，則是將身體視為畫布，經由文化繪製出女性特質與男性特質的形象。第二波女性主義非常關切女性身體如何呈現與形塑。婦女解放運動的第一波示威活動之中，有一場示威就是反對一九六八年在太平洋城舉辦的「美國小姐」選美比賽（雖然近乎全世界的媒體都有一種迷思，認定在當年的示威活動中發生焚燒胸罩的舉動，但是實際上卻沒有這回事，而是將那些胸罩與其他束縛內衣丟進一個「自由垃圾桶」裡）。至於在學術圈，性別形象（gender imagery）的研究也是女性研究的一大成果。一些歷史研究，如露易絲·班納（Lois Banner）的《美國美女》（*American Beauty* 1983），就追蹤變化多端但是卻強而有力的符號系統，看看女性身體在這個系統裡是定義為優雅、美麗而引人遐思，或者是落伍而醜陋。至於男性的身體形象則是比較晚近才受到審視，其中一個不錯的例子就是近藤多琳（Dorinne Kondo 1999）研究日本的高級西服製造商如何利用穿著這種特定品牌西服的白領菁英走來走去，塑造並具體呈現出一種屬於日本的美感。

有關電影、電視、攝影和其他視覺藝術中女性身體的分析，更是高度精緻，也成為藝術評論主流的一部分。《現代男孩現代女孩》（*Modern Boy Modern Girl*）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Menzies 1998），這個展覽追蹤在日本歷史早期，現代藝術與性別變革的交流。一九二〇年代，東京的公共空間出現了一種新的個人主義與「mobo」和「moga」（即現代男孩與現代女孩）的新形象。

近年來有關身體的文化研究，受到法國歷史學家米歇爾·傅柯的影響，多半集中在語言與論述（discourse）；傅柯在許多知名的研究中——最完整的論述應該是《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 1977）——說明了現代知識體系如何將人分門別類，而這些類別又如何與規範、控制身體的社會規訓技術經緯交錯，而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就是運用這些技術的專業（如醫學、心理學

和犯罪學等)，則形成傅柯所說的「權力／知識」。(在法文中，這兩個字 *pouvoir-savoir* 是押韻的。) 傅柯最為人詬病的，就是從未將性別理論化——雖然他講的東西實際上都和陽剛化制度下的男人有關——然而，很多後結構主義的女性主義學者，如福瑞哲 (Fraser 1989)，沿用他的取徑，發展出一套性別理論，把性別化的身體視為規訓實踐的產物。這種規訓的成效是以肉體展現的，因為身體是「溫馴可以教化的」(docile)，在社會規訓的狂風驟雨下，連生理也不得不低頭。

田野調查則顯示這樣的「規訓」是如何進行的。民族誌學者艾倫·克萊恩 (Allen Klein 1993) 研究洛杉磯地區從事健美運動的健身房，發現了一整套男性的次文化，完全受制於運動、節食與藥物的強力主宰；男人的身體經年累月地受到這樣的宰制，個個都雕塑成健美比賽中最理想的男性形態。

這是一個極端的案例，但是比較溫和的身體規訓卻是無所不在，由一些具有權勢的機構，如運動、教育或醫療單位，著手進行。大衛·寇克 (David Kirk 1993) 和米尼克·范艾森 (Mincke van Essen 2000) 分別在澳大利亞與荷蘭研究公立學校體系引進「體能訓練」課程，如何形成男生與女生鍛鍊身體的差異；現代體育和競賽運動往往緊密交錯，現在終於有了一份記錄，詳實記載了運動制度中性別化的特質，不得不令人佩服。南希·佘寶格 (Nancy Theberge 1991) 的研究更明白指出，男女之間不同的運動領域以及體育教學和建構運動的規訓實踐如何相互為用，製造出性別化的身體。邁可·梅斯納 (Michael Messner 2007) 則在長時間的研究計劃中發現，美國運動領域中的性別刻板印象與不平等是如何的普遍盛行。

即使社會規訓未能製造出性別化的身體，手術刀一定可以達成這個目的。矽膠隆乳的醜聞讓世人了解在美國實施這種手術的規模有多大，因為在這個國家，大胸脯始終是性感的象徵。或

許有人會覺得整型美容這個產業似乎違反了兩性具備天生差異的意識形態，但是戴安娜·杜爾（Diana Dull）和甘蒂絲·韋斯特（Candace West）針對整型外科醫師及其客戶所做的研究，卻提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答案（1991）：現在女人整型視為自然，但是男人整型卻不是。唯一的例外是陰莖整型手術，現在陰莖加長術也算得上是一門大生意了，這一點從網路上數以百萬計的垃圾郵件就可以證明。

視身體為畫布的取徑雖然成果豐碩，但是也遇到了瓶頸。這種取徑太強調「意符」（signifier），以至於「意旨」（signified）幾乎完全消失；以性別研究來說，這困難就很嚴重了，因為符號結構之所以成為性別結構而不是其他結構的原因，就在於符號最終都會指向男女的生殖差異。

這倒不是說所有的性別關係都是為了生兒育女，其實差得遠哩！就連最異性戀的性行為也未必會懷孕；即使同性戀關係也有性別區分。羅絲瑪麗·普琳歌（Rosemary Pringle 1992: 91）就指出，「不管你／妳跟男人或女人上床都持續是重要的關係！」性別關係不只是身體之間一對一的關係，而是隨著身體進入關係之中的整個秩序，然後賦予身體性別意義。後結構主義的理論承認有這樣的秩序，但是過份誇大身體的柔順性（docility）。身體或許參與了規訓的體制，但是並非因為身體是柔順的，而是因為身體主動參與規訓。身體會追求歡愉、追求經驗、追求改變；在當代有關性虐待（somasochism，簡稱SM）的性次文化中研究，可以找到許多這一類令人訝異的例子。薇拉莉·史蒂兒（Valerie Steele）在《戀物癖》（*Fetish* 1996）一書就舉了很多例子，證明就是有人喜歡緊身馬甲、鐵鍊、穿洞、火烙、繩子綑綁，或是其他林林總總像刑具般束縛得令人痛苦的塑膠或皮製衣物——完全是自願的，而且樂在其中。同樣的情況當然也出現在整個時裝體系，只不過沒有這麼極端就是了。沒有人強迫年輕女子穿上細跟

高跟鞋，因為只要穿個幾分鐘就會痛的不得了，多穿幾年，還會造成嚴重的傷害，但是她們卻樂此不疲。

身體也會反抗，也會製造麻煩；我在《男人與男孩》（*The Men and the Boys*）一書中就舉了一些研究個案（Connell 2000）。其中一個是年輕男性，他原本的所作所為都在表現男子氣概——玩樂、酗酒、搞女人、嗑藥等等——但是卻突然停止這些行為，因為身體的復原力嘎然而止，而他也病入膏肓。另一個也是男性，原本缺乏運動的身體出現異狀，後來演變成性的差異，出現了同性戀認同。派屈克·懷特（Patrick White）精彩的小說創作《雙身情事》（*The Twyborn Affair* 1979）也探討了這個議題，不過這是個虛構的故事；這本小說講的是艾迪／優多夏（Eddie/Eudoxia）的故事，他／她的身體無法好好安頓在任何一個性別的位置——不論是丈夫、妻子、士兵、牧人，乃至於最後的妓院老鴇。

身體也有勞動，這是身體被配置與消費的具體實踐，而性別意義則在具體化的過程中出現。這個觀點在一些男性研究的個案中——尤其是像營建、鋼鐵這些工業中的男性從業人員——得到強而有力的佐證；在這個背景之下，工業勞動之男性特質的定義涵括了沉重、危險與困難等因素。一份針對美國營造業所做的民族誌研究報告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男人將自己放在「一種傷害的方式」（Paap 2006）。身體是以很多方式被消費的：磨損、受傷、有時候還會喪命；就像麥克·唐納森（Mike Donaldson 1991）所說的，「男性氣概的具體位置——即身體——遭到毀滅，也可以是獲得、表現和永久保存社會化男性氣概的一種方式。」唐納森的觀點運用在戰爭中以肢解屍體來表現男性氣概的恐怖情境，格外有說服力。

無論在象徵層面或是規訓意義上，我們都不能只把身體視為社會過程的受體，而是社會過程中主動參與的主體。身體透過

本身的能力、發展與需求，經由自身反抗力的磨擦，藉著歡愉和技能指引方向，主動參與社會過程；身體必須視為社會能動性（agency）的一部分，共同產生並且形塑社會行為的過程。然而，在前文中提到生物決定論所遭遇到的難題仍然存在，如果我們將性別化的身體同時視為一種機器與一塊畫布，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嗎？

一九七〇年代有一群女性主義理論家就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她們嚴格區分「性」與「性別」的差異：性是一種生理事實，是區分人類這種動物的雄性與雌性的差異；性別則是一種社會事實，是區分男性角色與女性角色，男人個性與女人個性之間的差異。

當時，對很多人來說，這種雙元論場模型（two-realms model）是觀念上的一大突破，說明了何以生物性不能當做女性從屬合理化的藉口。生物性差異所造成的侷限只限於生物論場，另外還有一個社會的（或是「文化的」、「角色的」）廣大論場，是一個自由的論場，在這裡的個人或社會都可以選擇他／她們想要的性別範型。因此艾莉諾·麥克比（Eleanor Maccoby）和凱蘿·杰可琳（Carol Jacklin）在她們影響深遠的調查研究《性差異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Sex Difference* 1975）一書的結論中說道：

我們建議社會在其社會化實踐中選擇讓性差異趨於極小化，而非極大化；舉例來說，社會可以傾力於調和男性的侵略性，而不是訓練女人服從男性的侵略性；也可以傾力於鼓勵男性參與養兒育女的工作，而不是澆他們冷水。

當時，珊卓·班姆（Sandra Bem 1974）與其他心理學家所提倡的「雙性特質」（androgyny）概念，是定義另類性別範型的一種嘗試，也廣為接受；這個新的性別是陽剛特質與陰柔特質的混

合體，提供個人與社會在男女兩性之外的另外一個選擇。此後，量化研究的心理學家就不斷增加性別角色的複雜性。比方說，詹姆斯·瑪哈里克（James Mahalik）及其同儕就設計了一份大型的「陽剛特質常態符合程度」問卷，經過統計上的因子分析之後，竟然發現了至少十一種的面向，分別代表不同的陽剛特質，同時存在美國的男女大學生中間（2003）。然而，安德魯·史邁樂（Andrew Smiler 2004）在追溯陽剛特質量表歷史的精湛研究中卻沮喪地指出，這些努力對於主流心理學都毫無影響，它仍然繼續以簡單的二分法來處理「性」事。

一九七〇年代，北美地區的婦女解放運動達到巔峰，這種性／性別雙元論場模型似乎為變革帶來樂觀，甚至光明的前景；過去因為別無選擇，所以形成了壓迫性的性別配置，如今有了新的選擇，這種性別配置自然可以揚棄。以當時的用語來說，也就是扭轉對性別角色的期望，性別角色的社會化將接踵而至。

所有改革的章程都根據這個原則建構，其中有媒體改革（改變性別角色模範）、教育改革（改變傳遞給男生和女生的性別期望），還有新型態的心理治療（幫助個人改變新的角色）。澳大利亞學校委員會（Australian Schools Commission）的調查報告《女生，學校與社會》（*Girls, Schools and Societies* 1975）就是一個著名的案例，堪稱一連串改革的先鋒。這份報告指出女學生受到社會刻板印象箝制而自我設限的種種情況，建議教育當局採取行動，打破教育的性別藩籬，放寬女生的職業選擇範圍；這份報告出爐之後，接踵而來的就是一連串的改革計劃，鼓勵女學生選修數學、科學或技術類的科目。

然而，這種雙元論場模型很快就面臨困境。羅絲瑪麗·普琳歌（1992）在一篇嚴謹的評論中指出，把性別視為文化選擇的差異（即「性別角色」）的觀念無法解釋何以差異的一方（即男性），總是比另外一方受到更多的重視。性別與身體分離的論述和女性

主義愈來愈強調身體的發展趨勢產生衝突，這些趨勢關注的焦點包括男性暴力行為與異性戀性行為，此二者的目標皆是女性的身體，而非女性的角色。

此外，影響力與日俱增的法國女性主義理論家也強調身體是社會權力的受體，情緒與符號論的來源。有些英語系國家的女性主義思想家受到這個學派的影響，如伊莉莎白·葛蘿茲（Elizabeth Grosz 1994），就堅持身體與心靈並不是始終分離的，因此我們的肉體本身就足以解釋我們的主體性。

若是性與性別這兩個論場（realm）不能完全區隔，是不是可以加在一起呢？以常理判斷，最可能的妥協方案莫過於提出「性別差異同時衍生自生物性（biology）與社會常模」的看法。

社會心理學在討論到性別議題時，大部分都是以這種加總的概念為基礎，不過仍然廣泛使用「性別角色」這個名詞——這個名詞本身就是生物學詞彙和戲劇用語的結合。同樣的，溫和派的社會生物學家（如 Degler 1990）也同意，即使在他／她們深信不疑的生物差異之中，也有一部分是受到社會的影響，例如男孩天生的侵略性在社會上就很容易傾注於足球、戰爭或是激烈的行銷工作上頭。

然而，這種加總的概念也有其難處，因為這兩個分析的層面不易相容，在這樣的討論中，幾乎總是認定生物現實比社會現實更真確，因此生物性解釋也比較有力，而且生物性分類也是固定不變的。隨便舉個例子來說，前文引述麥克比與杰可琳的那段話接下來說：「在生物性的框架中，各種社會制度都行得通。」麥克比與杰可琳主張社會選擇，希望有所變革，但是在她們的分析中孰輕孰重，不言自明：生物性決定一切，人類只有在生物性的「框架」內才可以選擇其性別配置。

性別角色理論和性差異研究始終受限於生物性的二分法，最後功虧一簣，而令人訝異的是，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葛蘿茲所提

出來的「身體的女性主義」(corporeal feminism)；葛羅茲堅決反對心靈／身體的二分法。在她的分析結尾，身體非常明確地指明是男是女——這倒是有點讓人吃驚了，因為她最著名的一本書就叫做《無常的身體》(*Volatile Bodies*)——因此她提出的身體主體就一定是特定的性別：非男即女。

另外一個難題則是這兩個層面的差異範型不需要吻合。如同我們先前討論到的，人體只有在少數情況下屬於二元形態；而在另外一方面，人類行為更是少見二元形態區分——即使是跟有性生殖息息相關的領域也不例外。舉例來說，儘管很少男人照顧嬰幼兒，但是在任何一個特定時間內，大部分女人也都不是在做這個工作，這是不爭的事實。

在當前的社會生活中，則有一整套性別差異的光譜。美國社會學家茱蒂絲·羅勃(Judith Lorber)在《打破它吧！》(*Breaking the Bowls* 2005)一書中指出，對任何一個人來說，性別都可以包括：性分類(sex category)、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性別化的人格(gendered personality)、日常互動中的性別過程(gender processes)、性別信仰(gender beliefs)、性別表現(gender display)。而這些元素大多又有不同的分類，因此可以使用的性別位置就數以百計，甚至是數以千計，遠遠超過「二」形態性！

誠如加總理論所說的，有時候社會過程確實會刻意強調身體差異，我第一個想到的例子就是魔術胸罩；但是在其他時候，社會過程對於身體差異卻是加以扭曲、駁斥、複雜化、簡化或是修正。就像頌恩的研究所顯示的(詳見第二章)，一所小學裡的生活中，在平常的日子裡，一天之內就會輪流出現好幾種不同形式。

我們不可能繼續維持這種性別差異的雙元論場模型，也無法維持視身體為機器或畫布的模型。現在，我們必須更仔細地探究差異本身的證據了！

差異的事實：「性相似」的研究

在大眾心理學的領域裡，身體差異與社會影響通常都是靠特徵二元論（character dichotomy）的概念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女人應該有一套自己的特徵，而男人又有另外一套。女人應該富有愛心、意志不堅、多嘴長舌、情緒化、直覺強、有高度的性忠誠；而男人則應該是富有侵略性、意志堅定、沈默寡言、理智懂事、具分析能力、性行為浮濫等等。從十九世紀以降，這種概念就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西方社會甚至以女人智力比男人低、判斷力比男人差為由，剝奪女性就讀大學與投票的權力。

如今，女人已經唸了大學，也擁有投票權，但是這種特徵二元論的信念仍然牢不可破。這種信念有時候對女性有利：例如有人認為在管理階層和政府部門應該多一些婦女名額，因為她們專有的特徵，像是同理心或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技巧等，有助於她們執行這些工作（事實上，研究顯示位居高階管理職的婦女行為與高階男性無異）。不過較常見的情況是對男性有利：例如很多人相信女人不能勝任最高階的管理職位，因為她們缺乏侵略性與分析能力；也有很多人辯稱男人的掠奪行為或是自私的性行為，只不過是天性使然，不是可以改變的。

對特徵二元論的深信不疑，也就成了性別實驗研究第一個探討的主題。從一八九〇年代以降，各世代的心理學家都嘗試以各種測驗或量表來測量不同的特徵，然後比較男女兩性的實驗結果有何不同；這樣的研究長久以來一直被稱為「性差異」研究（有時候也稱為「性別差異」），研究成果浩繁，是心理學界研究數量最多的主題之一。另外在社會學與政治學的研究文獻中，也有大量的文獻探討各個領域中的集體性別差異，如態度與意見、投票行為、暴力行為等等。

洛莎琳·羅森伯格（Rosalind Rosenberg）的歷史研究《兩個

分離世界之外》(*Beyond Separate Spheres* 1982) 一書，對於這種研究的起源有詳盡而精彩的說明。第一代的心理學研究學者發現，男人和女人的心智能力差不多一樣——這個結果與主流的維多利亞思潮相互牴觸——不過有趣的是，在心智測驗研究領域中不分男女幾乎都很快就接受這種「無差異」的發現；的確，在二十世紀的前五十年間，心理學家在研發標準化的基本能力與智力測驗（即所謂的智商測驗）時，都納入這個「無差異」的發現，設計特定的計分測驗選項，使得男性和女性有相當的平均分數。稍後，在這個領域中試圖找出性差異的研究，也都無功而返（Halpern and LaMay 2000）。現在，大家普遍認同，以一般智力而言，並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存在。

而更有趣的事實是，這是整個性別差異研究中慣例性的發現。麥克比與杰可琳書中列舉了一個又一個的表格，在「發現差異」一欄中最常見的數值就是「無」；一個又一個的研究，一項又一項的特徵，比較男女之間或是男孩與女孩之間的研究，始終沒有找到明顯的差異。麥克比和杰可琳在結論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列出一連串「沒有證據的性差異信仰」（1975: 349）。他們蒐集到的證據顯示，傳統上堅信不移的說法，比方說：女孩比男孩善於交際、女孩比男孩容易受人左右、女孩的自尊心比較低、女孩擅長背誦而男孩擅長高階認知理解、男孩分析能力比女孩強、女孩易受遺傳影響而男孩易受環境影響、女孩缺乏成就動機、女孩屬於聽覺型而男孩屬於視覺型等等，這些全都不是真的；這些信念都只是一種迷思而已。

麥克比和杰可琳並不是唯一有這種結論的人。比方說休·費維德（Hugh Fairweather 1976）在仔細檢驗有關認知技能之性別差異的研究之後，得到的結論是：性別差異太微不足道，而且無法確定，因此根本不值一哂；而我在一九八〇年代回顧這些文獻報告時發現，儘管這些研究以找尋差異為出發點，但很明顯的：

從將近八十年的研究中，心理學家研究了無數的男女，主要的發現其實是男女心理存在大量的相似性；明確的差異極少，而且只侷限在某些特定的主題。男女在各種特徵上分佈的情況有大量的重疊，在這些情境下，平均差異通常都很小，即使是差異性相當一致的特徵也不例外。要不是作者與讀者的文化偏見，我們可能從很早以前把這種研究稱之為「性相似」(sex similarity)研究了。(Connell 1987:170)

因此，當我發現人類竟然一面倒地不相信這樣的結論，也就更耐人尋味了。反倒人們接受智力測驗研究領域中的男女相似成了例外。大眾心理學完全擁抱性別差異的概念；至於在學術圈，不同世代的研究學者也無視於他／她們自己學科所提出來的證據，還是無休無止地尋找心理學上的性別差異，並且著書立說。

生活中實際發現的主要範型，與普遍相信應該發現什麼樣的範型之間，有一條鴻溝，因此辛西亞·艾普絲坦 (Cynthia Epstein) 以二元思潮與性別現實為主題，寫了一本令人擊節讚賞的著作，書名就叫做《騙人的區別》(Deceptive Distinctions 1988)。二十年後，當她在擔任美國社會學學會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會長時，艾普絲坦 (2007) 仍然必須大力駁斥所謂的「主流敘事」(master narrative)，因為主流論述仍然相信「男女天生不同，有不同的智力、生理能力和情緒特徵」。

為什麼大家拒絕接受男女的相似性呢？我相信絕大部分的原因在於文化背景。在西方文化中，二元的性別符號根深蒂固，所以研究人員只要一想到性與性別，就只「看」到差異，當然也就不足為奇了。在我們平常的研究設計中，性別相似性 (gender similarity) 並不是一個肯定的陳述，只不過是缺乏可以證實的差異而已 (這是名符其實的「虛無假設」)。艾普絲坦提出例證，說

明期刊編輯不喜歡刊登虛無的研究結果，因此性別相似性的確切證據可能遠比已經出版的文獻所披露的還要更多。大自然厭惡真空狀態，研究學者也是一樣，只要修正研究方式，或許永遠都可以找到真正的差異，於是大家就不斷地尋找、不斷地尋找……如此一來，就出現一種瘋狂。

然而，這些證據真如表面上看起來如此可靠嗎？有人批評傳統的心理測驗太過膚淺，不足以測量出深層的性別範型，而男女之間真正的性格差異或許就隱藏在測不出來的個性底層——比方說，在無意識裡（就像容格二分法〔Jungian dichotomy〕所說的「深層男性特質」與「深層女性特質」）——這可能是真的。當然，大部分的量化心理測驗通常都只是透過自我陳述的方式，測量人類行為中最顯而易見的層面；但是，倘若「深層」差異不顯現在日常生活的層面，而且也不曾顯現在範圍甚廣的各種人類行為中——這正是量化研究所能說明的部分——那麼我們不禁懷疑：這樣的深層差異真的有那麼重要嗎？

第二個問題是，「無差異」的發現並不是一成不變。麥克比和杰可琳也指出，根據他們的大量證據顯示，有一小部分的特質確實存有性別差異：如語言能力、視覺空間能力、數學能力和侵略性等等（另外還有一些其他特質，由於證據不足，因此他們暫時存疑）；結果正是這些發現，而不是「無差異」的發現，成了教科書的內容，後繼的研究學者也才因此特別強調這些發現並且據以論辯。

第三個問題則牽涉到研究方法。麥克比和杰可琳提供了數量龐大的資料，但是大部分的資料來源是數百個小型研究的案例，而這些研究使用的樣本都有缺失，或許個別研究中發現「無差異」的數字只是反映了研究方法上的弱點，若是能夠結合許多研究的結果，強化研究方法，說不定整個情況也會改觀。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性別差異研究引進了一種新的統計方

法，也就是所謂的「後設分析」(meta-analysis)，使得這個問題出現一線曙光。這種研究程序必須仰賴大量針對同一議題所做的個別研究：舉例來說，有很多研究都試圖測量男女在侵略性、智力或自尊心等方面的性別差異。在後設分析中，每一個研究（而不是每一個人）都視為一筆資料，然後把所有的個別研究視為一個整體，進行統計分析。

當然，在此之前，必須先用一個共同的量表呈現出所有個別研究的結果，除非所有的研究都使用完全一致的測量程序（在實際操作中，這樣的情況很少見），否則研究結果就會出問題。所以，真正的解決之道就是根據原始研究中個別數據的變異性，歸納出一個共同的量表。

性別差異後設分析常用的程序如下：先計算出個別研究中男性與女性平均分數的差數（不管原來使用什麼樣的測驗方法），然後再利用同一研究中根據相同測驗方法所得到的個人分數整體變異，以分數的形式改寫這個數值（技術上來說，就是以平均值的差數除以平均組內的標準離差）；這個方法類似我們所熟悉的心理學評量上用來「標準化」數值的方式。這個標準化的性別差異稱之為「d」值，也就是個別研究用來做後設分析的數值。很不幸的，在傳統上，「d」值大於零時，表示男性的平均分數高；小於零時，表示女性的平均分數高。

在後設分析中，所有個別研究的「d」值視為一筆整體資料，先計算出平均「d」值，通常稱之為該組研究的「效應規模」(effect size)，然後再檢查「d」值是否一致——由於研究群組高度集中，也許只會出現一個效應規模——如若不然，這些研究還可以進一步分組，然後用統計方式檢查「調節」變數(“moderator” variables)的影響。舉例來說，研究人員可以檢查新舊研究之間的效應規模是否有差異（這表示性別差異的規模會隨時間改變），或是檢查不同年齡組的研究是否有差異等等。

後設分析所造成的第一波衝擊，是強化了性別差異存在的信念，同時更強調性別差異的重要，這正是愛麗絲·伊格莉（Alice Eagly）在《社會行為中的性差異》（*Sex Difference in Social Behavior* 1987）所說的重點。即使在同一組的個別研究大部分都並未顯示明顯的差異，但是後設分析卻可能從這一整組研究中發現不等於零的效應規模。以下的例子正是效應規模不等於零的報告：有關自尊心的216個研究中發現，效應規模為+.21（Kling, Hyde, showers and Buswell 1999）；有關道德選擇中「關懷導向」的160個研究，效應規模為-.28（Jaffee and Hyde 2000）；在學習型態中「意義導向」的22個研究，效應規模為0（Severiens and ten Dam 1998）；侵略性的83個研究中，效應規模為+.48（Hyde 1984）。

然而問題是：這些效應規模有什麼意義？也許效應顯然不等於零，表示這絕對不是純屬偶然的結果，但是其數值仍然很小，小到不足以證明什麼。後設分析在這裡就有其侷限；傳統上，0.20的效應規模稱之為「小」，0.50為「中等」，唯有大於0.80才能稱之為「大」，但是要如何來詮釋這個傳統，卻起了爭辯。伊格莉（1987）聲稱，就算效應規模很小，也還是有實際上的重要性；但是其他的後設分析學者卻不以為然。克莉絲婷·克林（Kristen Kling）及其同僚（1999）試圖以不同的方式來處理這個問題，他／她們以自己發現的性別差異效應規模跟有關自尊心之其他類型研究所得到的效應規模做比較，結論是「跟其他在實驗室中已經顯示出有重要結論之研究的效應規模相比，自尊心的性別差異很小」。

隨著後設分析的數量增加，又有人開始質疑性別差異的規模與範疇。一九七〇年代，麥克比和杰可琳認為「語言能力」是一種具有性別差異的特質（女性較強），應該是可以確定的事；但是海德與麥金莉（Hyde and McKinley 1997）以後設分析的方式評估在七〇年代以後的研究，結果發現效應規模趨近於零；另一個

始終被認為有性別差異存在的特質是數學能力（男性較強），後來也有研究證實其效應規模很小；在254個相關研究中，效應規模只有+.15。

二〇〇五年，珍妮特·海德發表後設分析的后設調查，將心理學這個領域裡所有後設分析的研究發現結合在一起，涵括了四十六篇已經發表的性別差異後設分析研究，分析了五千多篇研究報告，測試的人數高達約七百萬人，研究的範圍遍及認知變數、溝通社交與個性變數、心理健康、運動能力和其他各類的變數；而她的研究發現，一言以蔽之就是：

結果非常驚人，因為有30%的效應規模都在趨近於零的範圍內，而另外有48%則是屬於極小的範圍；也就是說，有78%的性別差異都是極小或趨近於零。（Hyde 2005:582, 586）

海德非常主動積極地將這篇論文命名為〈性別相似性的假設〉（The gender similarity hypothesis），不過嚴格說起來，我倒不認為這只是一個假設而已，而是全面徹底地推翻了男女之間的特徵二元論。男女群體之間廣泛的心理相似性有豐富的證據做為佐證，可視為所有人文科學中最確認穩固的概論之一。

海德的評論也注意到在某些特質，確實出現了一貫的平均性別差異，其中包括體能表現（例如，投擲物品）；性行為的部分面向，但非全部；還有侵略性的部分層面。

在新的後設分析研究中，特別有趣的一點是：每當有明顯的心理性別差異出現時，這些差異多半都有特殊環境因素的個案，而非通則。例如，侵略性的研究通常都會出現性別差異——不過是在肢體侵略性，而非語言侵略性，而且也不是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是如此。貝登考克和米勒（Bettencourt and Miller 1996）在有關

侵略性的實驗研究中發現，全面性的「d」值為+.22，但是這個效應規模端視是否有人挑釁而定：在無人挑釁的情況下，男性確實表現出比女性稍高一點的侵略性（平均效應規模為+.33）；但是在有人挑釁的情況下，男性和女性的反應則趨於一致（平均效應規模為+.17）。海德也引用了一個以打斷他人談話傾向為主題的性別差異後設分析研究，發現依各種情況不同，例如打斷談話的類型、一起談話的人數多寡、他／她們彼此是陌生人或朋友等等，效應規模會因此有所改變。她說：「我們在這裡又再次看到，根據情境不同，顯然性別差異可以製造出來、予以消弭或是反轉。」（Hyde 2005:589）

後設分析顯示，以「班姆性別角色量表」（Bem Sex Role Inventory）這種衡量男性／女性特質的測驗方式所呈現的性別差異，也會隨時間而改變。端吉（Twenge 1997）以美國大學生為樣本所做的研究發現，從一九七〇年代到一九九〇年代這二十年間，男人和女人在這些量表上的反應愈來愈接近，這倒不是像很多人所擔心的，是因為男人愈來愈女性化——兩組樣本在陰柔特質量表上的變化都不大——而是因為在二十年間，女人在陽剛特質量表上呈現的指數有大幅成長（男人的成長幅度不大）。

後設分析並沒有真的為性別差異研究帶來什麼革命性的變化，因為蒐集資料的基本方法仍然一樣，但是肯定澄清了這些研究倒底在說些什麼：這些研究證實了早期研究的結論，也就是心理學所測量的眾多人格特質與特徵上，極端鮮明的性別差異很少，男女之間廣泛的相似性才是主要的範型。此外，後設分析也更明確地指出某些特定情境中經常會出現的性別差異，像是非常特殊的技能（例如特定的科學學門）、特定的社會環境（例如遭到挑釁）、特定的時空背景（例如一九九〇年代的美國大學）、評量特質的特定方式等等，都會影響到在研究中出現的性別差異程度。

於是我們逐漸釐清：心理上的性別差異與相似並不是物種生命中固定且恆久不變的常數，而是人類面對複雜而變化多端的社會環境產生主動反應所造成的多變產物。有了後設分析的協助，心理學界開始導正方向，逐漸理解在社會學中慢慢浮現出來的性別。

這樣的概念可以推論到什麼程度呢？我們經常發現，現代心理科學研究主要都是以美國大學普通心理學課程中，白人中產階級學生的行為做為研究基礎——這並不完全是代表全體人類的有效樣本。

由於性別配置裡文化和歷史變項有太多不容否認的證據（詳見第二章及第五章），我們絕對不能簡單地假設在當代美國所記錄下來的心理範型可以放諸四海皆準。然而，這一點——也就是性別差異會在不同情境之間轉換——也慢慢從後設分析研究中浮現出來。性別相似研究現在包括了愈來愈多大規模的研究，雖然仍以西方國家人口為樣本，但是取樣的方式比較可靠；另外也有愈來愈多針對世界上其他地區所做的研究。我認為前文所提出的結論，至少為理解性別心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社會體現與生殖場域

現在，既然性別相似的研究已經徹底推翻了特徵二元論的概念，因此我們必須拒絕所有的性別模型，因為這些模型都假設身體差異製造特徵差異，然後造成社會性別差異。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性別中身體與社會的關係呢？

身體具有能動性，而且身體是社會建構出來的；生物分析與社會分析不能一刀兩斷，但是任何一個也不能簡化成另外一個。在「差異」這個框架之下，這些結論本身都有矛盾，因此我們必

須走向另外一個框架。

全世界七十億人口的身體還有許多、許多的差異：有老有少，有的病弱有的健康，有的飽足有的挨餓；體能上也有健全能力與身心障礙的差別；有人的皮膚永遠都沾著泥土，有人的皮膚卻用昂貴的乳液滋潤；有人的雙手龜裂，有人卻是修指護甲、光潔無瑕；每一個人的身體在一生中都會有起伏高低的曲線變化，也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改變；有些身體會遭到意外、在生產過程受到創傷，或者是因為暴力、飢餓、疾病或手術而必須重新整頓才能繼續下去；有些身體卻過不了這重重難關。

可是，這些多樣繁複的身體並不是無意義的隨機組合，而是經由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s）——也就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彼此相互關聯。

身體不但是社會實踐的受體（objects），同時也是參與在社會實踐中的能動者（agents）——同樣的身體在同一時間內兩者兼具。身體介入的社會實踐形成了社會結構與個人生命軌跡的變化，而這個結構與變化又提供了新的實踐環境，讓相同的身體繼續介入應付。這其中有個循環不息的圈圈，連結身體過程與社會結構；事實上，這樣的循環不只一個，而是許許多多個循環在不同的時間出現，也隨著時間改變，最後總結成一個歷史過程，社會就在這個過程中體現，而身體也在這裡這個過程中被捲入歷史之中。

我把這樣的過程稱之「社會體現」（social embodiment）；而從身體的角度來說，也可以稱之為「身體反身的實踐」（body-reflective practice）——也就是在人類社會行為中身體同時為受體與能動者。

身體有個無法簡化的真實，也就是身體在捲入歷史的過程中，始終都是身體，從未停止過；換言之，身體並沒有轉化成符號或是論述中的位置（雖然論述一直會提到身體），身體的物質

性仍然很重要。我們還是會生育、還是會死亡，如果你刺我們一刀，難道我們不會流血嗎？

社會體現牽涉到個人行為，也牽涉到群體、機構或是不同機構組成的複雜群體。以身體反身實踐塑造運動明星的陽剛特質典範為例，就像我在《男人與男孩》（Connell 2000）一書中提到鐵人衝浪比賽冠軍史蒂夫（Steve）的生活，這位運動明星的身體實踐，包括每天由教練指導的例行訓練，而且這些訓練都是由體育和運動醫療專業人士負責規劃指導，其中包括了運動本身，這是由數百萬美元市值的企業組織所組成的實踐；還有透過其他企業組織（商業媒體、廣告商）參與的公關及管理財務實踐。一位重要的運動明星跟其他媒體人物一樣，到最後都會變成個人企業體，必須雇用律師、會計師、行銷專員和一整批公關人員替他／她打點一切。美國社會學家邁可·梅斯納（2007）以運動中的性別為題，做了一份內容廣泛、影響深遠的研究，他的研究顯示這其中牽涉極為精密複雜的社會過程；然而，如同我們在史蒂夫的個案中所看到的，所有的機構活動與專業工作，不但最後都回溯到個人身體的表現，而且也是以此為基礎。

性別就是社會體現的特別形式。性別關係造成特定的社會結構，指涉特有的身體特質，而性別實踐則在二者之間形成一個循環。

性別的獨特性質（與社會體現的其他範型相比），在於涉及人類生殖的身體結構與生理過程；性別涉入一長串的人類社會實踐——包括撫養小孩、生育、性行為等——這些行為都必須調度人類身體的能力去孕育、生產、泌乳、給予或接受性愛歡愉等。我們必須先體認社會過程與身體過程之間是如何的緊密配合，才能開始了解性別。我們一生下來就有血有肉，而且一生下來就在一個社會秩序之中。

這些身體能力以及體現這些能力的實踐行為，建構成一個場

域 (arena)，也就是一個具體位置，讓一些具有社會性的事情在這個場域裡發生；這些發生的事情當中，包括「女人」和「男人」這種文化類別的誕生（當然還有在特定社會中標示出來的其他性別類別），我稱之為社會生活中的生殖場域 (reproductive arena)。我在這一章開始的時候提到，人類是一種有性生殖的物種，這個事實也因此成為性別分析的中心。

然而，我卻強烈地區別「生殖場域」的概念與「生物基礎」的傳統觀念，因為後者指的是一種自動製造社會效應的天然機制。有性生殖並不會形成性別實踐，甚至連提供性別實踐的範本都沒有；在很多領域中都出現強烈性別化的行為，但是這些領域卻跟有性生殖一點邏輯關係都沒有。（足球、鞋子設計、期貨市場、女同性戀性行為、韓德爾清唱劇、主教任命……）人類或許是眾多有性生物物種中的一員，但是唯有人類這個物種，才會製造出複雜而且會隨著歷史改變的社會結構，讓生殖能力在這個結構中部署和轉變。事實上，性別是人類這個物種，最獨特、也最驚人的一件事。

關於性別，我們首先要認知的一點——雖然成人經常在刺激的性別政治之中忘了這一點——就是生殖場域跟小孩子有非常密切的關聯。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性行為都會導致懷孕，事實上，絕大部分的性行為（就連異性戀的性行為也不例外）都不會也不打算懷孕生子；可是小孩子因此誕生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且這些孩子必須要有人養育教導，長大之後再為人父母，這個事實對任何一個想要長遠延續的社會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一件事。要如何組織撫養幼兒，正是性別範疇 (domain) 最重要的部分。

生殖場域不是固定的，可能在社會過程中重新形塑；事實上，生殖場域也確實在社會抗爭的過程不斷地重新形塑。舉例來說，在有效避孕和引進小家庭制的社會中，婦女身體的生殖力就有不同的意義，跟婦女命中註定一輩子生兒育女的社會完全不

一樣——在那樣的社會中，婦女的形象可能是打赤腳、挺個大肚子、永遠困在廚房裡。

在性別過程中，生殖場域永遠都只是指涉的一個點，從未涵括所有與性別相關的事物。我們同時需要另外一個我稱之為「性別範疇」(gender domain)的概念，指的是社會生活中與生殖場域做社會聯結的整個領域，不論是人與人之間或是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都是在這個領域中靠這樣的社會聯結建構出來，因此也可以理解成性別關係。

根據這樣的定義，這種性別範疇的範圍與形式不但會因不同的社會而有所差異，也會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產生變化；甚至還可能因為刻意的行為而有所改變。某些組織就試圖提出一些「去性別化」(de-gendering)的策略，相信他們會因此變得更有效率或是更公平，而某些女性主義都也將此視為可以通用的改革策略 (Connell 2006, Lorber 2005)。目前最流行的嘗試就是在富裕國家中讓更多的男人加入幼兒教育的行列，只不過到目前為止成效不彰（在比較貧窮的國家本來就有較多的男性擔任小學教師）。

有一些比較小的例子，有助於說明性別範疇中的社會體現究竟是什麼意思。利用性別的最殘酷手法之一，就是透過性騷擾——這是一種權力的行使，直接導向目標的身體。梅莉迪絲·紐曼 (Meredith Newman) 及其同僚 (2003) 提出一份調查報告，從美國政府雇員身上蒐集資料，結果顯示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婦女說她們曾經在工作上受過性騷擾，而男性則只有百分之六；而且不同政府部門之間的差異很小。

一份針對澳大利亞男性健康所做的調查研究 (Connell et al. 1999) 顯示，最強烈的性別差異竟然出現在鄉村居民的眼睛上。受到穿透性眼球傷害的病患，有百分之八十八是男性，這不是因為男人的眼球表面比女人脆弱，而是因為鄉村婦女絕少有機會接觸到敲擊金屬或是拉直圍籬鐵絲的工作，而這些工作正是這種眼

球傷害的主要原因。性別分工是理解這些影響的關鍵，但是承受這些影響的卻是身體。

米莉安·葛露克斯曼（Miriam Glucksmann 1990）對英國在兩次大戰之間的電機與食品加工業所做的歷史研究顯示，這些工業的新工廠大規模地實施性別隔離制度（gender segregation）；並不是工人的身體或是製造巧克力餅乾的技術需要隔離男女，但是女人與男人的身體卻是涇渭分明地區隔開來，因為在工作場所若是不區隔男女工人，等於是打破了現存的婦女社會依附，以及這些工人在家庭中照顧幼兒與家務勞動的性別分工。

一種導致人類免疫缺陷的致命病毒藉著人體接觸傳遍全世界，而且通常都經由性別化的路徑。波妮瑪·曼恩與彼得·艾格頓（Purnima Mane & Peter Aggleton 2001）調查在這個過程中男性所扮演的角色，結果在發現不同地區形塑男性實踐行動的因素，一個是當地的性別秩序——在婦女對性的控制能力最薄弱的地區，疾病傳染的風險最高——另外一個則是對男子氣概的普遍定義，比方說願意接受風險、透過性的多方嘗試來證明男性雄風的觀念等等。同樣的，性別實踐的結果仍然由身體來承擔，不論男女都無法倖免。

身體在社會體現的過程中也會發生變化，在最近歷史上一些廣泛的變化是我們都耳熟能詳的：新生兒的數目、平均壽命、平均身高與體重增加（因為營養和幼兒醫療照顧都有改善），還有疾病的類型也出現變化（例如小兒麻痺減少，肺結核一度減少，現在又捲土重來）。身體變化有一部分是建構在性別界線上，人口指數本身就顯示出這種情況。在富裕的工業國家，女性目前的平均壽命現在已經明顯超過男性；根據二〇〇五年的統計，女性平均壽命是八十六歲，而男性只有七十九歲。但是在巴基斯坦，女性是六十五歲，男性則是六十四歲；在烏干達，女性是五十歲，男性是四十九歲。

社會體現的概念牽涉到實踐的長期循環，讓我們看到性別問題中一個矛盾的層面。許多性別過程所牽涉到的身體過程與能力本身都沒有性別分化，實際上，這些都是男女共有的才能。比方說，在工業經濟中的工作所要求的能力，幾乎都沒有性別差異，除非是因為不同訓練所造成的差別，或是將懷孕視為一種能力障礙，抑或是工具設備有性別化的設計；大部分的生產過程都需要大批男性與女性工作人員在精密的工作流程中相互合作。不過諷刺的是，男女合作的勞動反而成了性別差異形象循環流傳的途徑。超級盃美式足球賽、最新超級名模與好萊塢猛男的臉龐、化妝品與啤酒的廣告等等，這些形象能夠數以億萬計地在全球流傳，都只是因為有彼此共同勞動的男女，製造了電視機、生產紙張印製報紙，同時讓媒體企業持續運作。

認識社會體現也提供一個新的視野，重新審視身體與性別變化之間的關係。無論是社會學、性別角色理論、自由派女性主義或是主張天生差異的大眾意識形態，都把身體差異視為一種保守的力量，牽制了歷史變遷，限制了社會過程的成就。但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身體既然是社會實踐的能動者，自然也就參與了社會世界的建構，也就帶入社會現實存在的過程。身體的需求、身體的慾望與身體的能力都在歷史中運作。社會世界不是簡單的複製，而是由實踐所建構的。

性別是這種在歷史過程中建構的關係體系，因此永遠不可能是固定不變，也不可能完全複製。所以，最重要的問題不是「性別能不能改變？」，而是「性別朝哪個方向改變？」任何一種情況都可能引發好幾種不同的反應。

社會實踐可能導致性別秩序走向不一樣的方向，創造身體與社會結構之間不同的關係。麥克比和杰可琳在前述引文中所表達出來的自由派女性主義思想，認為社會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性別秩序，以社會學的觀點來說，這似乎太過天真；因為社會中有彼

此衝突的利益關係，不可能「選擇」其中任何一個性別。然而麥克比和杰可琳提到性別關係中有許多不同的歷史可能性，這一點倒是沒有錯；當前社會將來會往什麼方向前進，確實有許多不同的可能，我在第五章和第八章會再討論到這個議題。

性別關係

性別範型：結構與變革

在第二章討論到的研究計畫中，包括了兩個關於組織的研究——貝蕾·頌恩的美國小學研究和丹巴·穆迪的南非礦場研究——這兩個組織對於性別都各有一套固定的配置：招募什麼樣的人來做什麼工作（例如所有的礦工都是男性）、什麼樣的社會區隔可以獲得認可（例如在遊戲場上創造「對立的雙方」）、如何實踐情感關係（例如「礦場妻子」）以及這些機構如何與其他的機構（例如礦工的家人）產生互動。

這種性別配置的範型可以稱之為一個機構的性別體制（gender regime）。針對各類組織所做的廣泛研究，已經勾勒出不同機構裡的性別體制——學校、辦公室、工廠、軍隊、警察機關、運動俱樂部等等——顯然，性別體制是組織生活中非常普遍的特徵，而且這個性別體制也會產生變化。我舉自己所做的研究為例（Connell 2007），研究的主題是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省各公家機構中的性別範型；在所有的機構內，都可以找到定義明確的性別範型：大部分的管理階層都是男性、大部分的技術工作人員都是男性、大部分的文書工作人員都是女性、大部分的人力服務工作也都由女性擔任。不過在此同時，性別範型也在改變。相當普遍的變化包括：男性化的工業職缺被自動化的機器取代、定義

明確的「秘書」工作逐漸消失、「工作機會平等」的原則廣為接受等等。我們訪談的一名中年男性總結他自己的經驗說：

我想我們現在稍微開明了一點。我覺得這證明了任何男人可以做的工作，幾乎女人也都可以做，而且再也沒有什麼男性優勢產業這回事——或許只有營造業還是吧。不過我覺得現在從機構的角度，甚至從工作場所的角度來說，都可以接受女性〔專業員工〕，她們可以進來，而且跟男人相比毫不遜色。

然而，在基層的工作場合，研究中的每一個機構都還存有實質的性別區分；因此，要如何理解這兩個問題——結構與變革——正是這一章的主題。

頌恩一走進海濱小學（Oceanside Elementary School）就發現學校裡的老師大部分都是女性，但是她一點也不訝異，因為這是美國小學裡最常見的性別配置。同樣的，穆迪在調查白水嶺金礦時，也不會因為發現所有的礦工都是男性而大吃一驚，因為這是南非礦場——甚至全世界的礦場——最平常的性別配置。

這些特定組織裡的性別體制，只是更大的性別範型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這些範型經過時間的考驗，也會保留下來。我將這種較大的性別範型稱之為社會的性別秩序。個別機構內的性別體制通常反映出整體的性別秩序，但是也可能脫離這性別秩序；變革通常從社會的某一層面開始，然後才慢慢地滲入其他層面。

當我們看到一整套的性別配置——無論是某個機構內的性別體制或是整個社會的性別秩序——基本上，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套關係，也就是個人、群體與組織彼此連結與區隔的方式。「性別關係」是第四章討論到的，從生殖場域衍生出來並且圍繞著生殖場域的一種關係。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注意到：並不是所有的性別關係都是男女各據一方的直接互動，而可能是間接的，例如透過市場或是電視、網際網路這些科技產品做為媒介。男人之間或是女人之間的關係也可能是一種性別關係，例如男性之間陽剛特質的層級之別。

性別關係始終在日常生活中建構出來的，而且也一再重建。如果我們沒讓性別關係出現，性別也就不會存在；這個觀點是俗民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強力倡議的——這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學派，關注的重點是我們對日常行為預設的前提。甘蒂絲·韋斯特（Candace West）和唐·齊默門（Don Zimmerman）在著名的論文〈做性別〉（1987）中，分析性別是在日常行為互動中建構的。人們參與範圍廣泛的各種日常行為——從交談、家務工作到互動風格與經濟行為等——本身就要為他們預設是男或是女的「性類屬」（sex category）負責；而據此所產生的行為本身就是性別，並不是性別的產物。

我們建構自己的性別，但是卻不是完全自由，也不能隨心所欲，因為我們所處的性別秩序，對於我們的性別實踐具有極為強大的形塑力量；這也是韋斯特和齊默門所說，我們要為自己性別化行為「負責」的涵義。社會理論試圖以結構（structure）的概念，來說明關係中強而有力的既定範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若只是隨機安排，那就沒多大意義了；這些關係中的範型若是倏忽即逝，那麼也同樣無足輕重；在社會關係中唯有廣泛持久的範型，才是社會理論所說的「結構」。

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裡的性別配置就建構了社會結構。舉例來說，若是宗教、政治和言談實踐都賦予男性較高的權威，地位也高於女性，那麼在性別關係中就出現一種父權結構；又如，假設部落中的男性都固定跟彼此的姐妹通婚，那麼我們談的就是一種交換的親屬結構。

關係的結構並不能機械式地決定個人和群體如何行動，因為這種看法是社會決定論的謬誤，與生物決定論同樣不值一哂。但是關係的結構，確實會決定行動可能導致的結果。比方說，在極度父權結構的性別秩序中，婦女可能會失去受教育的機會，甚至喪失自由，而男性則可能會被迫切斷與子女之間的情感聯繫；又如，在當代澳大利亞的性別秩序中，休伊·布朗（詳見第二章）只有某些可能性，而不能有其他的可能，而他所接受的可能性——例如男扮女裝、賣淫或是家庭伴侶關係——又對他的後半生產生極重要的影響。

就這一點來說，社會結構限制了行動的實踐；然而，結構並不是存在於抽象世界，這抽象世界也不是先行於日常生活。社會結構是經由人類長時間的行為所產生，是在歷史中形塑建構出來的產物。性別關係也是因為我們持續參與才會出現持續存在，就是凱若·海格曼－懷特（Carol Hagemann-White 1987）所謂的「性別化的行為模式」。因此，結構與變革並不是彼此對立，而是我們社會生活中同一種動力的一部分。

性別的四個面向

英國女性主義先驅茱麗葉·米契爾（Juliet Mitchell）在一九七一年出版《女人的財產》（*Woman's Estate*）一書時聲稱，女性不只受到一種結構的壓迫，而是四種結構：生產、生殖、社會化與性。

為什麼要這樣區分呢？很多關於性別的討論都沒有這樣的區分。舉例來說，美國女性主義律師凱薩琳·麥克金能（Catharine MacKinnon 1989）在研擬其國家理論時，就把「性別科層」（gender hierarchy）視為一個同質性的整體。人類學家葛兒·魯賓（1975）

在其影響深遠的「性／性別體系」模型中，也把整個領域視為單一的系統。然而，我們若是仔細檢驗這些理論，就不難發現每一個理論都以某種特定的關係為前提（對麥克金能而言是支配關係〔domination〕；對魯賓而言是親屬關係〔kinship〕）；如果我們要把權力關係與親屬關係一起放在一個較完整的性別領域來討論，那麼至少需要一個雙面向的模型。

我們還有一個實際的理由，需要認知到性別關係有多重面向。我們經常體驗到不對稱的性別關係，彷彿我們的生活有一部分是根據某種性別邏輯在運作，而另一部分又是不同的邏輯；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公領域，而不只是個人生活，性別體系的複雜性就更明顯了。

舉例來說，現代自由國家把男人和女人都定義成公民，換言之，就是男女都是一樣的；然而，支配的性別符碼卻定義男人和女人是相對立的。此外，對於家務分工的傳統觀念也將女性定義為家庭主婦和照顧孩子的人；於是，當婦女進入公領域時——也就是試圖行使她們的公民權——就面臨一場硬仗，必須先爭取別人認同她們的權利。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她們可能變成所謂的「榮譽男性」（honorary men），表現得比最強悍的男人還要更強悍，像英國首相余契爾夫人或美國國務卿康德薇茲·萊斯（Condoleezza Rice），但是大部分的從政婦女，像美國的希拉蕊·柯林頓或澳大利亞副總理茱莉亞·吉拉德（Julia Gillard）仍然需要一段奮鬥來爭取認可；至於巴基斯坦的班娜芝·布托（Benazir Bhutto）甚至因為過度自以為是而慘遭謀害。

因此我認為，將性別關係視為內部極度複雜的問題，也就是牽涉到多重面向的問題，是勢所難免的。但是我們要如何辨識、理解其中涉及的結構呢？

我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想到七種多重層次或是多重面向的性別模型，這些都是不同的社會科學家在處理這問題時所發展出

來的模型，而且實際上還不只這七種，這一點也無庸置疑。簡言之，這個問題沒有任何一個單一的解決之道：這塊蛋糕可以有不同的切法。

米契爾原來的模型以不同的實踐來區分各種結構——工作、育嬰、性——但是同時又與其他社會功能交錯，如「生殖」與「社會化」。後者的研究模型試圖指出不同的社會動力、不平等的形式或改變的過程，然後再找出他們內部的邏輯。因此希維雅·華比（Sylvia Walby）在《理論化父權》（*Theorizing Patriarchy* 1990）一書中，將當代父權制度分成六種結構：有酬工作、家庭生產、文化、性、暴力與國家。與麥克金能作品中對於父權的闡述相比，華比的模型已經有長足的進展，但是採取的模型仍然是分析性別關係中的不平等，如果我們要將民主的性別關係也予以理論化，就需要另外一種規劃。

我在下文中所提出的模型，將性別分為四個面向，討論現代工業化、後工業化與全球化社會中，性別關係的四個主要結構。至於這樣的模型是否適用於其他時代，則是一個可以公開討論的議題——畢竟性別結構本身會隨歷史演進改變，是一個合情合理的假設。在這個章節中，我會討論到這些面向的意義，然後提出一些研究案例佐證。

權力關係：直接的、論述的、殖民的

權力作為性別面向來說，是婦女解放運動對「父權」概念理解的中心，這個概念把男性視為支配的「性階級」（sex class），把強暴分析成男性權力強加在女性身上，同時批判媒體賦予女性被動、渺小而愚蠢的形象。丈夫有權支配妻子或是父親有權支配女兒，這些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仍然是廣為接受的觀念；這樣的觀念有時甚至改頭換面，以比較溫和的形象出現，例如父親是「一家

之主」的觀念。性別化的權力分析無所不在，可以從暴力虐待的統計數字中看出一些端倪。舉例來說，二〇〇一年英國犯罪調查（British Crime Survey）——一個分析個人對於犯罪行為體驗的大型研究，問卷的設計十分嚴謹——就發現百分之二十一英國女性在她們一生中的某個時間曾經遭到非性暴力的威脅恐嚇，相形之下，只有百分之十的男性有這樣的經驗；至於在性暴力方面，有百分之二十四的女性曾經遭遇性暴力，男性則只有百分之五。（Walby and Allen 2004）

婦女解放運動認知到，所謂的父權並不只是婦女受到個別男性的直接控制，而且還透過無關個人的國家體制來實現其權力。最典型的範例就是麥克金能（1983）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討論到的強暴案法庭審理程序，這無關任何法官的個人偏見，只是在法院審理強暴起訴案的法定程序中，實際上「受到審判的」不是被告而是原告，因為受害婦女的性行為歷史、婚姻狀態、乃至於提出告訴的動機等等，都會在審訊過程中受到嚴格的拷問。

此後曾經有許多司法改革的嘗試，但是事實證明社會成見和法律程序對於性侵害案件的內建歧視已經根深蒂固，難以消弭；直到現在，提出性侵害告訴，對於受害婦女來說仍然是受創的經驗。對於婦女身體有壓迫性控制權的性別秩序，絕對是危險的。例如，二〇〇七年在沙烏地阿拉伯，有一名女子遭到一群男人輪暴攻擊的案件，後來演變成一場醜聞，因為攻擊婦女的男人受到輕判，而她反而因為與沒有親屬關係的男子獨處而判刑入獄，還受到鞭答；當她對於加害男子受到輕判不服上訴時，她的處分甚至還加倍。（後來在國際壓力之下，沙烏地阿拉伯政府赦免她的罪行。）

另外一個重要的例子，官僚的科層體系就是直接權力關係體制化的例子。澳大利亞社會學家克萊兒·波頓（Clare Burton）——她同時也擔任公職，出任公平就業機會委員——就曾經提到

政府部門人員選用與晉升過程中出現「男性偏見的總動員」，她所指的是一種無關個人而是屬於全面普遍的傾向。在男性主導的組織機構中，會偏好對男性比較有利的選才條件和過程。既然男性確實在世界上掌握大多數的大型組織機構（詳見第一章），這就成了影響深遠的過程，形成性別不平等；其中當然也包括了軍隊——那是一個專門強調暴力的科層體系。當今世界上掌握武力手段者，實為男人，而非女人。

在同志解放的文獻中，權力也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如丹尼斯·歐特曼的《同性戀：壓迫與解放》（*Homosexual: Oppression and Liberation* 1972）；書中討論的是施加在特定男性群體的權力：視同性戀為犯罪行為、警察騷擾、經濟歧視和暴力等。同志解放理論家把同志受到的壓迫，和女同志及婦女普遍受到的壓迫等同看待，這個論點為男性之間的性別化權力關係分析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替從屬的（subordinate）與霸權的（hegemonic）陽剛特質做了區隔，這對當前男性與陽剛特質的研究來說，十分重要（Connell and Messerschmidt 2005）。

法國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米歇·傅柯（1977）提出另外一個研究權力的途徑，也很受歡迎。傅柯質疑社會並沒有一個集中統一的權力中心；反之，他認為權力分佈的範圍很廣，而且以親近而具有擴散性的方式傳佈，尤其是透過我們說話以及將人分門別類的方式，以論述的形式運作。這種方式以「規訓」的姿態直接衝擊到人的身體、人的認同，建構人們接受的主體地位。這種方式不但有壓迫性，而且還有生產性：會衍生出生活的形式。

這種後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讓很多女性主義者與同志理論家感到醉心不已，他／她們認為這種方法可以理解性別權力中精緻的紋理及其生產性，而且也是經由這種方法衍生出權力的認同與實踐。舉例來說，時裝與美容的論述將婦女定位成消費者，讓她們臣服於各種羞辱的測試，檢驗她們是否受人喜愛，將獨斷的

規則強加在她們身上，也造成了許多婦女的不快樂、不健康，甚至在食物過剩的國家裡造成婦女餓死（像是節食失控演變成厭食症）。然而，並沒有任何男人拿著槍，強迫婦女做這些事情，就像貝蕾·頌恩的民族誌研究所顯示的「唇膏」，女孩子或年輕婦女走進時裝與美容的世界，都是因為她們想要接觸這個世界，因為這會帶給她們歡樂。接受這樣的主體位置，變成人見人愛的異性戀女性，不但是她們自由的抉擇，同時也強烈地受到控制。

然而，這些概念卻沒法完全掌握過去五百年來席捲全球的權力運作，那就是全球帝國的產生，帝國勢力入侵原住民的土地——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與英國的海上勢力，俄羅斯與美國的陸上勢力——以及後殖民世界中，經濟與軍事強權的主宰。

瓦倫坦·馬丁比（Valentine Mudimbe 1994: 140）提到剛果時說：「新勢力要建構自我時，就不得不建構一個新的社會。」原住民社會不是遭到瓦解，就成了勞動力的供應源頭；原住民的性別秩序受到農耕經濟、傳教士、人口遷移和其他過程的影響，也隨之改變。殖民勢力——絕大多數是來自大都會的男性——不但霸佔土地，也攫取女性的身體，於是一種混雜的性別／種族的階層成了殖民社會的核心特色；即使到了當代世界，也依然持續不墜。

權力會受到競逐（contested），就連法西斯的獨裁政權也不能達到全然的支配。性別化的權力並不比其他種類的權力更徹底或絕對，壓迫性的法律條文自然會引發要求改革的挑戰——例如女性主義最著名的運動就是「爭取投票權」運動。深居於「紅樓」的成員（就像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裡的一樣）——也就是家庭中的女性成員，也會弱化或是操弄家庭的父權。澳大利亞教育家布朗溫·戴維絲（Bronwyn Davies）的著名研究則顯示，論述的權力也會受到抵制或轉化；她在《玻璃碎片》（*Shards of Glass*

1993)一書中就指出，課堂上的老師可以協助兒童和青少年獲得性別論述的主導權；年輕人可以學習理解他／她們如何受到論述的定位及規範，可以學習如何在認同之間轉換以及操縱於其中。

殖民勢力始終受到抵制，而婦女也在殖民解放運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世界上的每個角落，都可以看到當代婦女運動的蹤跡，而且不同國家的運動逐漸彼此聯結（Moghadam 2005）。因此，除了權力不平等的觀念之外，我們也需要平權的觀念，也就是性別民主的觀念。

生產、消費與性別化的累積

「性別分工」是社會科學認知的第一個性別結構，至今仍然是人類學和經濟學討論性別議題的中心。在很多社會中、很多情況下，某些工作必須由男性執行，某些由女性執行；因此，在澳大利亞中部沙漠的原住民部落中，獵殺袋鼠的工作由男性負責，而採集根莖植物和種子主要都由女性來做；在當代的歐洲與北美洲，電腦軟體設計工程多半由男人負責，但是輸入資料的人大多為女性。

有史以來，像這樣的分工在各個文化中都司空見慣，甚至放諸四海皆準；然而，性別分工儘管極為普遍，但是在不同文化或是不同的歷史時間點，分工的情況卻未必全然相同。同樣的工作在某種歷史脈絡中也許屬於「女性工作」，但是在另一種情況下卻可能屬於「男性工作」。農業勞動——犁地、耕種——就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另外一個比較現代的例子也很突出，就是秘書工作。書記員原本是男性的工作——就像美國小說家赫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在《書記員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 1853）中所描述的情況；但是隨著打字機的問世和辦公室工作範圍擴大，愈來愈

愈多的書記工作改由女性來負責，事實上，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就像羅絲瑪麗·普琳歌（Rosemary Pringle）在《秘書談》（*Secretaries Talk* 1989）一書中所說的，這種工作已經變成「女性工作」的原型。然而，在發明了個人電腦和文書處理程式之後，「秘書」已經逐漸從職業分類中消失了；書記工作又再一次交由男性來做，並且跟其他工作混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工作形態。比方說，現代企業裡的經理主管每天要看、要寫的電子郵件就高達六十、八十，甚至上百封。

幾百年前，在全球大都會中出現的工商業社會，職業的性別區分還不是性別分工的全貌；我們必須將整個社會的分工（total social division of labour）納入考量（Glucksmann 2000）。還有一個更大的區分，即「工作」（即有酬勞動和市場生產的領域）與「家務」（也就是無酬勞動的領域）；在文化上，整個經濟領域都定位成男人的世界（儘管女人也身處其中），而家庭生活則定義為女人的世界（儘管男人也在其中）。

挪威社會學家歐伊斯坦·郝特勒（Øystein Horler 2005）聲稱，這種區分是現代西方性別秩序結構的基礎，有別於其他非西方、非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性別秩序。他的重點不只是說，我們對於「陽剛特質」和「陰柔特質」的概念與這種區分緊密相連，同樣重要的是，在這兩個領域中支配工作的社會關係是不一樣的。在經濟領域裡，工作是為了金錢，勞動是一種買賣，而勞動的產品則在市場上銷售，以利潤為導向；而在家庭裡，工作是為了愛或是相互的責任，勞動的產品是禮物，以交換禮物的邏輯為導向。郝特勒說，從這種結構差異導致男人與女人迥然不同的經驗，也造成我們對於男女天生本質不同的概念。

這不盡然是「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區別——雖然其他人都說這是性別體系的經濟核心。家庭「消費」，就跟工廠「生產」一樣，都需要工作；家庭主婦不是每天躺在沙發上吃巧克力消磨

時間，整理家務和照顧小孩都是很辛苦的工作——儘管現在已經有吸塵器和微波爐。可是，家務工作與職業工作卻是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係中完成，而就像郝特勒精確的觀察，其結果也造成不同的文化意義。

勞動分工本身只是在一個更大範型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在工業經濟中，各種重要產品、各種重要服務都具體呈現出男女一起分擔工作，然而，男人和女人在經濟過程中的定位卻截然不同。

這裡看到的是一個性別化的累積過程（gendered accumulation process）。德國理論家瑪麗亞·米斯（Maria Mies 1986）就明白地勾勒出這個問題；她認為全球化經濟發展是透過一個雙軌過程進行：殖民化與「主婦化」（housewifization）；在殖民世界中的婦女原本可以完全參與當地非資本主義經濟，但是卻逐漸被迫接受「家庭主婦」範型：與社會隔離、倚賴男性掙錢過活。二十年過後，這個情況看起來更加複雜，有愈來愈多人認知婦女有酬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卻將她們視為「彈性的」廉價勞力來源。潘蜜拉·歐笛（Pamela Odih）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性別與工作》（*Gender and Work in Capitalist Economies* 2007）指出，現在全球製造業的利潤全都繫於婦女勞動力之上，她們都在一條未經整合的（也就是跨越各個地區的）全球生產線上。

全球經濟的累積都是透過大企業和全球市場來組織，而這些機構中的性別體制，使得人們把原本是男女共同合作生產的產品以性別的方式來應用，例如公司分配企業收入的方式——透過薪資結構或紅利分配等——就傾向於對男性比較有利，尤其是中產階級的男性；企業送到市場上銷售的產品，也都造成性別化的影響與使用方式，從化妝品到汽車到電腦乃至於機關槍，不一而足。

這個性別化的累積過程有許多影響，不只是侷限於狹義的「經濟」。舉例來說，因為職業有性別分工——如工程與機械行

業中以男性佔多數，而與藝術相關或是與人群接觸的服務業則是女性佔多數——所以替這些行業培育人才的教育系統中，就會有這樣的性別區分；因此在高中或技術學院裡，註冊選修「工程研究」或「電腦科學」這一類課程的學生絕大多數是男孩，而選修「美術」或「觀光」之類課程的主要都是女孩。瑪德琳·阿諾特、米麗安·戴維（Miriam David）與葛比·維娜（Gaby Weiner）針對英國教育體系中的性別關係所做的詳盡研究就顯示，儘管歷史變遷已經縮短了學校中的「性別鴻溝」，但是研究領域的差異卻仍然存在。（1999）

情感關係

一百年前，佛洛伊德的作品就已經明白指出情感依附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佛洛伊德借用神經醫學的概念，但是主要是從他自己的個案研究中揣摩出人類的情感能量——無論正面或負面——是如何在無意識的狀況下依附到其他人的形象；他最著名的「戀母情結」（oedipus complex）分析，也是其人格發展理論的中心，就說明了這種依附或全神貫注的心理狀態（cathexes）的範型有多重要。（相關專有名詞更明確嚴謹的定義，請參閱《心理分析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Laplanche and Pontalis 1973）。

雖然佛洛伊德認為他的心理學是舉世皆然，但是他其實只是將在特定的社會機構內的關係範型予以理論化而已，這個機構就是大都會裡的中產階級家庭；因此他的作品開啟了一扇大門，可以進一步調查情感關係、依附與承諾（commitment）的社會結構。

情感承諾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負面；對於承諾的對象可能是善意，也可能是惡意。例如，對女人的偏見（厭惡女性，misogyny）、對同性戀者偏見（同性戀恐懼症，homophobia），絕

對是一種情感關係。正如佛洛伊德所強調的，情感承諾通常都是愛恨並存的。

情感依附的主要場域就是性特質（sexuality）。人類學與歷史學研究都已經說得很清楚，性關係不能只是簡單的生物性反射作用，其中還涉及文化形成的身體關係（Caplan 1987）。性關係也有明確的社會結構。多塞特（Dowsett 2003）在研究愛滋病毒蔓延的關係時說得很對，性不能簡化成性別，但是性卻通常以性別做為組織的基礎。全球霸權範型就認定異性才會相吸，因此明確區分跨異性的關係（異性戀）與同一性別的關係（同性戀）。事實上，這樣的區分非常重要，甚至常常用來定義不同種類的人（「同性戀者」、「異性戀者」），而某些生物學家則致力於尋找「同性戀基因」來解釋這種差異。（奇怪的是，從來就沒有人去尋找「異性戀基因」。）

然而，跨文化的研究卻顯示，很多社會的性關係都沒有這樣的性別區分，或是以不同的方式來區分。在古典時期的希臘，性與情感承諾的霸權範型就包括男性之間，或是年長男性與青年男子之間極為強烈的關係；比較晚近的例子，則是巴布亞新幾內亞一個名為「桑比亞」（Sambia）的社群，吉爾伯·賀德特（Gilbert Herdt）在著名的民族誌研究《長笛衛士》（*Guardians of the Flutes* 1981）中指出，這個社群將同性之間的性行為視為一種儀式，所有男性在生命的特定階段都會發生這種行為；從西方觀點來看，所有的桑比亞男人在某個年紀都是同性戀者，到了另外一個年紀又全都轉變成異性戀者——這種說法當然是荒謬絕倫。其實在桑比亞人看來，他們只是不過是遵循某種男性特質的正常發展而已。

在當代大都會的社會中，所有的家庭都希望能夠建立在浪漫愛情的基礎之上，也就是說，兩人之間強烈的個人依附。這樣的理想也就成了電視肥皂劇和好萊塢濫情劇的基礎，而其重要性也

一再經由研究證實，有些研究對象還是那種我們認為一定會質疑這種理想的人，其中包括桃樂絲·賀蘭（Dorothy Holland）與瑪格麗特·艾森哈特（Margaret Eisenhart）的民族誌研究《在浪漫中受教育》（*Educated in Romance* 1990）一書中訪問的美國大學生。由於這種理想經由宗教、廣告和其他文化壓力傳佈到全世界，於是就跟其他組成新家庭的方式產生衝突，尤其是那些經由安排、代表兩個親族結盟的婚姻；這樣的衝突也就成了世代之間緊張關係的主要來源，有時還會引起暴力行為。

家庭中其他主要的情感聯繫，還有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這也可能是一種極度性別化的關係。在全球霸權範型中，照顧幼兒或是跟幼兒產生情感依附都是女人的事，尤其是母親；至於賺錢養家的父親，則一般認為在情感上比較疏離。然而，隨著「新好父親」的理想男人愈來愈普遍，這樣的範型也同樣受到挑戰（詳見第六章）。多賀太（Taga Futoshi）針對當代日本父親論述所做的研究顯示，這樣的情感難題有多難解；無論是扮演怎麼樣的父親，其結果都是造成衝突，產生一種罪惡感（Taga 2007）。

在工作場所也有情感關係。艾爾利·荷西夏德（Arlie Hochschild）的經典之作《情緒管理探索》（*The Managed Heart* 1983），就分析了美國經濟中的情感勞動；對很多工作來說，跟顧客建立特殊情感關係是工作成功與否的核心，這些工作通常都是典型的性別化工作。荷西夏德引用的主要例子有兩個：空服員（做這份工作的人所受的訓練就是創造同理心，營造輕鬆氣氛）以及電話催帳人員（做這份工作的人必須表現出強悍的個性，營造令人害怕的氣氛）。荷西夏德認為，隨著服務業的擴張，這一類的情感勞動會愈來愈普遍。若果如此，以商業化的感情與性別刻板印象為基礎的疏離關係，在現代生活中也會愈來愈重要。

敵對的情感關係並不僅限於象徵性的恫嚇——如荷西夏德書中催帳人員的行為——還可能出現真實的壓迫行為。例如，史蒂

芬·湯森（Stephen Tomsen 1998）研究在澳大利亞因為同性戀恐懼症引發的殺人案件，發現了兩種主要的行為模式：一種是年輕男性在公共場所的集體攻擊，他們尋找性別偏差的人做為懲罰的對象，這樣的過程有賴群體中的相互唆使鼓吹；另外一種是個人在私底下的殺人行動，有些殺人案是因同性戀者的性挑逗所引發的暴力反應（也可能是兇手本身情慾的暴力反應），因為他們認為這種挑逗行為是質疑他們的男性氣概；但是無論是哪一種行為模式，殺人的手段都殘忍至極。

符號、文化、論述

所有的社會實踐都涉及對於這個世界的詮釋，以後結構主義學者的角度來說，沒有任何與人有關的事物可以「自外於」論述，因此社會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一個意義的世界。同時，在這些意義裡，也都可以看到創造這些意義的社會過程所殘存的痕跡。文化系統保留了特定的社會利益，從歷史上某種特定的生活方式衍生出來。

這一點也適用於性別意義。只要我們提到「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事實上就是啟動一個龐大的意義系統，其中涵括了各種可能的意涵、暗示、弦外之音和隱喻，這些都是在我們文化史上不斷累積而成的意義；這些字的「意義」，遠比男女兩性在生理上的分類要豐富。舉例來說，瑪麗蓮·史崔珊（Marilyn Strathern 1978）研究的巴布亞新幾內亞高地族群說「我們的部落是男性部落」，他們並不是說他們的部落裡全都是男人；同樣地，美式足球教練對著輸球的隊員大吼大叫，痛罵他們是「一群娘兒們」時，當然也不是說這些球員就突然具備懷孕的能力。他們所說的都是別有意涵的話，而且在不同的情境中，這些話都有相當的重要性。

過去這二十年間，在性別研究中最活躍的領域或許算是性別的文化重現（representations），性別的論述重建、性別化的態度、價值體系及其相關問題研究等等。這些在開發中國家都不算是核心議題，因為權力與實質利益才是人們比較優先處理的問題；話雖如此，即便在這些國家中，正如蘇帕娜·芭絲卡蘭（Suparna Bhaskaran）在《印度製造》（*Made in India* 2004）一書所指出的，這些議題仍有相當關聯性；這本書對選美活動、芭比娃娃式的女性特質國際化、同性戀歧視、印度媒體的性別形象等議題，都有非常生動的討論。

最著名的性別符號結構模型，是從法國心理分析學家賈克·拉岡（Jacques Lacan）的理論衍生出來的。根據拉岡的分析，陽具是一種主宰支配的符號，基於這樣的分析，一種把語言視為「陽具中心」（phallogocentric）系統的詮釋也應運而生；在這個系統裡權威的地位，也就是享有特權的主體，始終都是陽性。在語言系統中原本具有不確定性的意義運作，因為陽具崇拜的指涉而被定型；文化本身也成了「父系法則」（law of the father）的具體實踐。若果如此，要跟這個父權系統的意義相抗衡，唯一的方法就是擺脫已知的語言形式；因此如像薩維葉·高第耶（Xavière Gauthier）這樣的女性主義思想家，就對女性寫作特別感興趣，認為這是顛覆文化法則的對立實踐。

克利斯·維登（Chris Weedon 1987）質疑，女性主義理論怎麼能借用如此命定論的心理學，根本沒有空間讓對立思想存在，只能逃逸？後結構主義提供了很多擺脫舊形式的策略，另外酷兒理論對於「異性戀常模」（heteronormativity）的批判——從某個角度來說，拉岡一直是這方面的大理論家——也引領出文化斷裂的策略。在當前的酷兒書寫與政治中，強烈頌揚性認同與自我呈現（self-presentations）的多樣性，也樂於擾亂我們熟悉的性別分類（如 Bauer, Hoenes and Woltersdorff 2007）。

在符號性別關係中，語言——不論是口述或書寫形式——雖然是分析最多的領域，但並不是唯一的領域；性別符號主義會在各種其他領域運作，如服飾、化妝、姿態、攝影與電影，乃至於在比較不具人格的文化形式中也會出現，如建築環境。

羅莎·琳達·費高索（Rosa Linda Fregoso）的《銅幕》（*The Bronze Screen* 1993）一書，就詳述了性別在電影裡的文化動能有哪些複雜的層面。她以女性墨西哥裔美國人／男性墨西哥裔美國人（Chicana/Chicano）製片家出品的電影為例，他們的電影遠離以白人為中心的好萊塢核心，內容多半是描述美國西南部的一個墨西哥社區。費高索發現，男性墨裔美國人製作的電影並未貶抑劇中的女性角色，但是也沒有在論述中賦予她們積極的角色，直到有女性製片人出現，才開始從女性的立場探討世代差異、語言、宗教和人際關係，並且表現出墨裔美國婦女社會地位與策略中的一些緊張與曖昧。

社會抗爭中始終都涉及性別符號。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中的複雜政治關係，就充分顯示這一點，因為不同符號模型的陽剛特質，全都捲入其中。種族隔離政策的一大勁敵就是工會運動，這個運動的男性特質是建構在「勞工」模型之上。另外一個比較曖昧的角色，則是祖魯族印卡加民族主義運動（Zulu-nationalist Inkatha movement），這個運動以「戰士」的形象來動員男性，但是卻支持保守的社會秩序。而在軍事抗爭之後，這些為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游擊隊效力的「年輕獅子」們，失去了他們在社會上所受到的尊重，經常淪為無業遊民，甚至涉入暴力犯罪。（Waerjen 2004, Xaba 2001）

性別的符號表現會隨著時間改變，對性別平等的態度亦然。烏立琪·莫華德（Ulrich Mohwald 2002）研究了在德國和日本蒐集到的資料，經過詳盡冗長的分析之後，發現這兩個國家對於性別平等的態度都有改變，但是改變的過程卻各有不同。日本原來

並沒有「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型，但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這個模型卻建構成中產階級的理想家庭；到了二次大戰後，日本婦女一方面爭取法律上的平等，不過在另一方面，也替這種核心家庭模型背書。在婦女解放運動之後，另一波的意見轉變則是婦女的事業發展與家務分工的觀念也愈來愈受到重視。像這樣的觀念改變，遍及日本所有的世代；然而，德國最近對於傳統性別觀念的改變，卻出現了世代分裂的情況——主要是年輕一代的觀念改變而已。

交錯與交織

前文討論的四個面向只是思考的工具，並不是彼此分離的機制。雖然性別分工與符號表現是兩碼子事，但是沒有任何分工可以自外於符號類別而長時間維持下去。博吉特·葡芙－艾芬吉（Birgit Pfau-Effinger 1998）針對歐洲勞動市場的性別配置，做了詳盡的跨國分析，她的立論基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性別模型強化了性別分工（以及性別秩序中的其他層面）。同樣的，強暴案審理中所展現的權力範型，也跟婦女情慾的刻板印象密不可分；母親／孩子和父親／孩子的情感關係，則與家務分工和更廣泛的經濟息息相關；還有其他的例子不勝枚舉。在現實生活的脈絡中，性別的各個不同層面始終都彼此交錯，相互影響。

而且，性別結構還會更進一步與其他的社會結構交錯。費高索對於女性墨西哥裔美國人／男性墨西哥裔美國人電影中的性別分析，若不是放在美國社會族群不平等的社會脈絡中，就完全失去了意義；同樣的，荷西夏德分析性別化的情緒勞動，還有普琳歌分析秘書工作，都是以階級結構為前提，在這個結構中，不同群組的工作必須仰賴資本家的企業維生，必須付出某種形式的勞

力，換取他／她們的薪水。

最近的社會家提出「交織理論」(intersectionality)來強調這一點。這個名字取得真不幸，因為這個名詞意味著社會結構是僵化的配置，可以用某種幾何圖形來思考。好吧，確實也有人說「社會階層」(social stratification)，這也是另一個空間比喻。但是好的交織理論分析會從結構相互在條件限制下的影響出發——也就是改變彼此的方式——以及這樣在條件限制下的相互影響如何造成實際的社會情況。

舉例來說，種族就有很大的部分是經由性別關係塑造出來的。大家庭的觀念是很多種族的修辭中心：如老一輩的英國人常說「親戚朋友」(kith and kin)；南非祖魯族的民族主義語言中，就有「帶著戰士種出生的兄弟」這樣的說法。吉兒·薇克絲(Jill Vickers 1994)就發現，由男性主導的種族政治其實非常強調婦女的生殖能力。

不同的不平等結構會彼此形塑，這觀念是海倫·米柯夏(Helen Meekosha 2006)提出來分析的核心論點。她認為，儘管性別理論強調性別與種族和階級的交織，但是卻完全忽視了障礙的議題；米柯夏發現，障礙也是社會關係中的一環——圍繞著身體缺陷的社會關係在某些情況下會將缺陷轉為不利的障礙，在其他情況則又不會。既然性別基本上就是社會體現(詳如第四章)，性別就一定會跟構成障礙的社會關係產生互動。米柯夏特別檢視了在澳大利亞這樣的殖民屯墾社會中，性別與障礙之間互動的方式，並且發現到殖民過程中如何將障礙的狀況加諸在倖存的原住民身上，以及身體優劣的觀念如何在人種意識型態中落地生根。然而，「人種」(race)或種族(ethnicity)都是需要性別的觀念——因此也導致了人口、養育、母職、男性威脅和防禦的政治；反之，性別對礙障經驗的衝擊卻是：

性別可能強化障礙的形象——對女人而言，是強化的被動與無力感；對男人來說，則是被迫的依賴所產生的腐化陽剛特質。而且，在缺乏教育、就業機會、生活配置與個人關係的本質，再加上受害與受虐經驗等方面，這樣的形象導致真實的後果。（Meekosha 2006: 170）

因此，我們必須將性別視為可以獨立存在的結構，必須避免將性別與其他分類混為一談，或是將性別視為其他現實所產生的結果（以前經常認為性別受階級影響，現在則經常認為是受論述影響）。但是，如果要對人類生活有充分了解，我們也必須記得：性別關係永遠都是在脈絡中運作，永遠都跟社會生活的其他動能產生互動。

性別作為歷史

「天生差異」的意識形態之所以根深蒂固，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受到傳統上認為性別永遠不會改變的想法：像是亞當挖土，夏娃織布；男人必須工作，女人必須流淚；男孩終究是男孩等說法。要認真地分析性別，首先就必須認知事實真相與這些傳統信念正好相反：所有關於性別的一切都具有歷史性。

什麼叫「歷史性」？以地球上的生命歷史來說，人類的歷史代表一種新的改變過程；在過去這十萬年間，社會動能取代了有機演化，成了地球生物圈內演化改變的主軸機制。

人類祖先的一些生理特徵當然是這些改變的前提，例如人類的手、腦和說話器官具備開放性構造（open architecture）——此處借用電腦用語——因此才有可能運用在極廣大的範圍；人類的身體有手掌、手臂，但是卻不像貓爪那麼銳利，不像袋熊可以挖

土，不像海豹一樣游得那麼快，不像猴子那麼靈活，也不像熊那麼有力。這些事情，人類都只能勉強做到某種程度，不過人類卻懂得製造工具把這些事情做到非常完美；從這一點看來，我們都是賽伯格（cyborgs）。不過，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可能還是其他的人類。我們不僅創造社會關係，還教導新一代；隨著時間不斷累積的效果，社會關係讓任何個體的能力以驚人的規模不斷倍增，這種情況幾乎隨處可見。

從最廣的角度來看，性別代表有性生殖系統因為社會行動而發生的變化；人類集體能力透過社會關係的組織運作，產生了全新的可能。在這條水平線之上，是性別的歷史：也就是製造出我們生活中實際性別秩序的各種事件歷程。美國歷史學家瓊恩·史考特（Joan Scott）在她影響甚遠的文章中明確闡述書寫這段歷史的工作，不過她很謙虛地將這篇文章命名為〈性別：一個歷史分析的有用分類〉（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1986）。

我們可以找出這個過程的起點嗎？從十九世紀開始，對於性別、原始母權體制（primitive matriarchy）或原生父權體制（primordial patriarchy）的「起源」就已經出現無休無止的猜測。然而，就像法國女性主義學者克莉絲婷·戴爾菲（1984）所指出的，有關起源的故事大部分都不是歷史，而是創造迷思，只是用來合理化當前的一些政治觀。不過，自從她發表這個觀點之後，考古學家已經開始結合性別的社會分析，累積一些成果，就某方面來說，他／她們提供了第一個認真以證據為基礎的答案，試圖解答這個起源之謎。

珍·巴爾姆（Jane Balme）與珊卓·鮑德勒（Sandra Bowdler）以其他史前歷史學者的作品為本，在〈鏟子與挖棍：性別起源及其在新大陸殖民之應用〉（Spear and digging stick: the origin of gender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colonization of new continents 2006）一文中

回顧了這些證據。簡述她們複雜的論辯：捕獵大型動物做為肉類來源，搜集植物和小型動物做為主食，似乎是大部分已知的捕獵——採集社會中典型的性別分工；但是這樣的分工並不是依據生物能力，因為男女兩性都有能力執行這兩種工作，因此性別分工是一種社會配置，需要動用複雜的溝通系統（想必是語言）、延續團體中分享食物的社會實踐，還有性別的文化意涵，也就是將男女定義為兩個不同的團體，並據以分配不同的任務。不論在考古記錄、考古營地或是出土文物及岩石壁畫中，有關固定捕獵與分享食物、社會符號、性別符號認知等證據，都出現在相同的階段；在解剖學上被視為現代人（*homo sapiens*）的人種在非洲、歐亞大陸和澳大利亞分枝散葉，大致也是這個時間——在距今約五萬到四萬年前。

她們的假設是：由於人類族群擴散到無法預知的新環境，通常食物供應稀少，再加上長距離捕獵與在地採集的系統化結合，為了適應環境所以出現了性別分工。這是一種適應——一種社會適應而非基因上的適應——這樣的假設非常可能就是問題的答案。如果這個假設正確的話，那就表示在上述討論的四種面向中，有兩種——性別分工與性別符號——已經在最早的性別秩序形成過程裡出現了。有趣的是，這個假設並沒有牽涉到權力關係（即母權體制或父權體制）。

無論我們對性別的起源提出什麼樣的論述，未來的歷史都不會涵括在創始之初的那一刻，而是牽涉到一個開放式的社會過程，這樣的過程必須經由耐心耙梳所有的歷史記錄——考古遺跡、文字記載、口述傳統等等——才能窮究其複雜性。

過去幾十年間，這一類的歷史研究成果相當豐碩，是女性研究中的一個主要的支派，也出版了許多精闢的著作，如里奧諾·大衛杜夫（Leonore Davidoff）和凱瑟琳·霍爾（Catherine Hall）合寫的《家庭財富》（*Family Fortune* 1987），就是描述工業革命

期間英國中產階級家庭的性別社會史。至於比較大型的研究，則有帕芙拉·米勒（Pavla Miller 1998）的《西方父權的轉變：1500-1900》（*Transformations of Patriarchy in the West, 1500-1900*），追蹤性別關係範型的長期變化：從早期現代歐洲以家庭為基礎的「父權主義」，乃至於工業資本主義、私有家庭和官僚國家中父權勢力的重新組合。

認知性別底層的歷史特徵在學術上及政治上有重要的影響：如果某種結構可以存在，也就表示這種結構可以消失。性別的歷史很可能會結束。

有幾種情況都可能導致性別關係不再是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條件。性別關係可能因為內部解體而弱化，因此某一範疇內的性別範型就不再強化其他範疇內的性別範型：比方說，象徵性的性別區分或許仍然存在，但是已經達到權力的平等；或是人類不再需要隸屬於某個性別群組也能建立性關聯。又或者有其他歷史動力凌駕性別關係，這正是馬克思主義學者亞麗山卓·柯隆泰（1977）所預期的情況，她就認為普羅階級和社會主義革命可以終結婦女的受壓迫地位；至於在我們當代的情況，資本市場的全面勝利與完全的個人化，就經常被視為達到性別平等之途。

最後，性別關係也可能因為刻意的去性別化（de-gendering）而消失，也就是讓性別結構的力量趨近於零。這種去性別化的邏輯常見於就業機會平等或反歧視改革，如日本改革派人士就常以「無性別」的情況做為改革的目標。並不是全世界所有的女性主義者都認同這種去性別化的方式，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理論家都認為完全的去性別化社會有可能存在；但是無性別社會仍然是一個有用的觀念，可以做為我們思考改變的基準點。

改變的過程

有關性別配置為什麼會改變的討論，大多都集中在性別秩序的外在壓力：例如新科技、都市生活、大眾傳播、世俗主義或者就只是「現代化」而已。

沒錯，這些社會動力確實造成性別關係的變化，然而性別關係本身也有一種內在的改變傾向，而且有些「外在的」壓力本身從一開始已經性別化了（例如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我認為我們必須將性別視為一種永遠都處於動態的體系——將性別視為歷史的觀念就隱含了這樣的意涵——在這一節，我將討論其中三種動態力量。

不穩定性

後結構主義理論主張，性別分類具備天生的不穩定性，就已經指出了性別關係內部有一種趨向改變的傾向；舉例來說，茱蒂絲·巴特樂的《性別麻煩》（1990），以及嘉雅翠·查克拉華蒂·施碧娃克（1988）的女性主義理論，都是以「女人」這個性別分類的不確定性與競逐特質為主題。性別認同是由論述造成的，而論述中的意義並不固定；如果我們接受德希達在《論書寫學》（*Of Grammatology* 1967）一書中的分析——這是後現代主義哲學的創派經典——那麼所有論述中的意義都無法以任何方式固定。

而且，在論述認同與這些認同所指涉的身體之間也沒有固定的關聯。意符可以在意義與歡愉的遊戲之中自由浮動，這是眾所認知的「後現代」生活特性，這當然也就表示，我們對於性別認同可以恣意把玩、隨意接受與放棄、任意拆解再重新組合。

這種概論化的不穩定性觀念有幾個難題。就定義上來說，這可能是真的；但是如此一來，這個觀念就沒什麼意思了。如果

可以用實證的方式來檢驗，那麼我們很難避免一個事實，也就是說，在某些歷史情境中，性別認同與性別關係的改變很緩慢，而在其他歷史情境中的改變卻非常劇烈；希維雅·華比在《性別轉變》（*Gender Transformations* 1997）一書中就指出，在都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重整的各個「回合」。此外，這種概論化的不穩定性也不能解釋為什麼有些人想要改變性別配置，而其他人卻安於現狀。對性別政治而言，這才是最核心、最重要的問題；而這又牽涉到另外一個議題，也就是在不平等社會中如何區分不同群體之間的實質利益。

最後，性別分類中這種概論化的不穩定性觀念，似乎是從全球都會中產生的，或許在當代世界中某些新自由主義的富裕國家內，掌握了社會生活某些重要的東西；但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這樣的觀念或許就風馬牛不相及了。比方說，在上一個世代的某些阿拉伯國家和伊朗，性別界線似乎就是鐵板一塊，絲毫不能動彈；就連施碧娃克在思考要如何理解印度大陸的政治時，也得訴諸「策略性的本質論」（strategic essentialism）觀念。

矛盾

將性別視為一種社會結構，又帶出了另外一種改變。結構會產生危機趨勢（crisis tendency），換言之，就是一種內部矛盾或趨勢，逐漸削弱現有的範型，進而促使結構本身的改變。這種研究社會變遷的方法是從德國批評理論——尤其是爵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 1976）的學說——以及為批評理論添加性別層面的女性主義批評（Johnson 1994）中衍生出來的。

從結構來分析讓我們看到兩種不同的時代：一種是促使改變的壓力受到很好的控制或是壓力逐漸累積，另外一種則是危機趨勢突然爆發，形成真正的危機，導致迅速的變化。此外，結構的

分析也讓我們可以檢驗不同群體在受到壓力的結構中處於什麼樣的位置，以及他們如何共組這個結構，藉以分辨出那些是可以被動員來支持或反對改變的利益。

在這一章稍早討論到性別關係的四種結構，每一種結構都可以找出自己的危機趨勢。因為篇幅的關係，我在這裡只討論其中一個，就是性別分工；但是這樣的取徑在本書其他篇幅的討論中，也可以見其身影。

性別分工一直都處於巨變之中。在二十世紀的後五十年間，全世界都出現婦女勞動力加入市場經濟的現象；二〇〇七年，婦女的全球勞動參與率是52.5%（相較於男性的78.8%）。在富裕國家，出現的是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的高度成長，即婦女從無酬勞動遷移到有酬勞動，尤其在服務業；至於在開發中國家，這種變化則是大規模的婦女勞動力投入都市、以市場為導向的農業或是某些形式的工業。

這裡的潛在矛盾是：男女社會勞動力的付出大約相等，但是社會勞動力所生產的成品卻有性別化的分配方式。這些性別化的分配方式包括男女整體收入的不平等、男性通常擁有較好的工作環境與事業前景（儘管未必如此）、父權體制的財產繼承以及組織化的控制等等。

改變這樣的結構對婦女有整體的利益，因此在工會、在社區組織、在與稅務和利益相關的壓力團體之中，都會看到婦女運動的身影。然而性別化的累積過程中所造成的紛擾，再加上與階級關係的彼此糾葛，形成複雜的情況。在經濟上享有特權的婦女（通常也是在政治上最有影響力的女性）跟男人一樣，可能因拒絕經濟變革而獲利，因為這些變革會直搗性別不平等的核心，可能會動搖她們賴以獲利的企業體系。所以我們不會看到有錢的女人站在第一線搖旗吶喊，支持美墨邊境加工出口廠（maquiladora）、服裝工廠或速食經銷店的員工罷工。

危機趨勢的規模可能很小，也可能很大；在第六章將舉一些個人生活中的例子。這四種結構都有危機趨勢，但是各自有不同的趨勢；正如希維雅·華比（1997）所強調的，它們不會以相同的步調發展，也不會在同一時間成熟。在歷史變遷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出現不均等發展的情況，因此性別秩序沒有一致性，性別政治又如此的複雜動盪，也就不足為奇了。

殖民主義

矛盾分析在多少有連貫性的結構，以及清楚易懂的性別秩序中最能發揮其功力，我們可以明白指出有什麼內部危機趨勢從中產生。但是如果性別秩序遭到徹底破壞，世界上可以一目了然的東西全都蕩然無存了呢？這正是我們稍早提過，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勢力入侵後所發生的現實情況。

而且這還不是發生過後又一切恢復正常的事情；帝國的持續存在、全球都會的動能、後殖民的間接勢力取代直接殖民勢力、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主宰之下的新結構等——這些全都繼續掌握並且重塑邊陲世界的社會。喬治·巴藍迪爾（George Balandier 1995）對非洲中部的改變有鞭辟入裡的分析，他就挑明了說：後殖民社會是處在危機中的社會。

在帝國主義重新形塑的性別中，「交織理論」似乎發揮到了極致。但是帝國主義本身也是極度性別化，從男性勢力（士兵、軍人、行政管理人員、教士）展開帝國侵略的那一刻開始，到他們以種族階級、屯墾勞力與家務體制來安定殖民社會，誠如艾希斯·南地（Ashis Nandy 1983）所指出的，都是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建立一種新的陽剛特質。歷史學者曾經追查在殖民邊界地帶的性別化體制是如何形成的；比方說，勞勃·莫瑞爾（Robert Morrell）的《從男孩到紳士》（*From Boys to Gentlemen* 2001a）就記

錄了在南非納塔爾（Natal）英國殖民地的菁英男孩學校如何建立一套系統，藉以製造出一種男性特質形式，培養統治下屬人口的能力；以及他們如何建立性別化體系的網絡，如義工團、在地協會等，並且透過這些體制來遂行統治的目的。

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也同樣地重塑在地的性別秩序，而且全球化本身也是極度性別化的過程（詳見第七章）。近來關於母職的研究，挖掘出很多相關的證據，我且舉一個中美洲的例子好了。在一九九〇年，尼加拉瓜選出薇奧蕾塔·查莫洛（Violeta Chamorro）領導的右翼政府之後，推出了一套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其中包括削減公部門、國家機構私營化、刪減公共事業支出等。茱麗·卡波斯（Julie Cupples）在馬塔加帕（Matagalpa）鎮上訪問單親媽媽的結果顯示，這些政策變革導致單親媽媽入不敷出，喪失尊嚴；可是馬塔加帕的婦女積極因應，想出一些臨時的賺錢活動，而隨著這種非正式的經濟愈來愈暢旺，這些婦女開始有了工作，雖然還不是很穩定，但是已經讓她們比男人更有自信——不過她們通常都得減少或是完全放棄自己的家務事，才能做到。為了照顧孩子，迫使這些婦女要增加家庭收入。隨著時間過去，卡波斯說，有酬工作日漸穩固，已經成了這些婦女認同的一部分，於是賺錢養家也成了母職的一部分，而不再是與母職對立排斥的事情。而在鄰近的薩爾瓦多，在美國支持的右翼政府與軍事反抗運動妥協之後，也出現了類似的新自由主義協議。艾琳娜·卡蘿塔·席爾貝（Irina Carlota Silber）的民族誌研究發現，當地的婦女必須面對高度的性別化暴力，同時還要在暴力之後收拾殘局，勉強討生活。

這種過程的結果不是固定的性別秩序，而是重新裝配過的領域，讓新的改變過程和新的社會抗爭可以在這裡滋長。在後種族隔離的南非，性別關係的重塑就充分表現出這種情況：對立競爭的父權體制與發生在男女中的性別改造運動始終競相爭逐

(Morrell 2001b)。

要理解全球規模的性別變革，這還只是第一步而已；在接下來的兩章，我還會回過頭來討論這個議題。這是當今性別研究中最活躍，也是最艱困的領域。

個人生活中的性別

對多數人來說，身為「男人」或「女人」基本上只是個人經驗的問題，這個經驗牽涉到我們的成長過程、家庭生活與性關係的安排、在日常生活中自我表現的方式，以及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在這一章，我將探討此一個人私密領域所引發的一些議題，同時反思該如何理解這些問題。

性別化的成長：

性別角色的社會化、心理分析與體現的學習

「性別角色」理論提供了主要框架，對於人類如何學習性別有相當簡明易懂的說明。從嬰兒一出生開始，就被指認為男生或女生，然後分別穿上藍色或粉紅色的衣服。穿上藍色衣服的寶寶，父母對他們行為的期望也跟穿粉紅色衣服的寶寶不一樣——他們比較粗野、頑皮，比較會惹麻煩，精力也比較旺盛——而隨著寶寶年齡漸長，到了一定的時間，父母會給他們買玩具槍、足球、工程組合等等；反之，對於穿著粉紅色衣服的寶寶，則期望她們比較被動、順從，也比較漂亮，等她們長大一點，就讓她們穿上有滾邊流蘇的衣服，給她們洋娃娃、化妝包，告訴她們要注意外表、要有禮貌、要與人和諧共處。

等到時機成熟，我們就會教那些以前穿著藍色衣服的寶寶開車，解數學方程式，教他們在市場上爭得一席之地，養家活口，同時教他們如何追求以前穿著粉紅色衣服的寶寶。至於以前穿著粉紅色衣服的寶寶，我們則教她們烹飪、處理人際關係、別人怎麼說就怎麼做，同時教她們打扮自己，吸引以前穿著藍色衣服的寶寶。

這個概念比較正式的說法就是：性別角色是經由「社會化」學習得來的。各種「社會化媒介」(agencies of socialization)——其犖犖大者如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大眾媒體等——控制著成長中的孩子，透過大量的小規模互動，將社會「常模」(norms)或是對於男女行為的期望，分別灌輸給男孩和女孩。這個過程可能是讓孩子模仿他／她們景仰的「角色典範」，例如父親可能就是男孩子的模仿的典範；但也可能是一點一滴地灌輸到孩子的腦子裡。順從社會常模，就會得到獎賞或「正面准許」(positive sanction)：如母親的微笑、朋友的認可、學校裡的好成績、在約會遊戲中獲致成功、找到好工作等等；反之，不順從或是違反社會常模，就會有「負面懲罰」，從父母師長的皺眉叱責，乃至於挨打或送進牢房。

在這種獎懲並行的強化作用之下，大多數的孩子都會在成長過程中學會所謂符合性別的適當行為，最後就自動自發地做出這種行為，並且認定他／她們自己應該是什麼樣的人。事實上，他／她們甚至會發展出社會上認為適合男人或是女人的人格特徵，將社會常模予以「內化」；等到他／她們完全社會化之後，他／她們又會給予違反常模的行為負面懲罰，進一步把這個常模傳遞給下一代。因此，這個性別角色系統似乎有一個內建的穩定機制，然後隨著時間自行複製。當然，這個過程中仍有可能出錯，例如在沒有父親的家庭，男孩子缺乏角色典範，就可能導致青少年犯罪。

這種如何學習性別的理論固然有其可取之處，但是也有嚴重的問題；事實上，這個問題已經嚴重到足以讓我們揚棄「社會化」理論。

首先，這個社會化理論太單一僵固。原則上，世界的每一種文化都有不同的性別角色社會化的理論，因為不同的文化會有不同的社會常模，有時候小學教科書裡就是以這種方式來處理這個議題。然而，這個世界並不是由涇渭分明的文化拼貼而成，文化會經由征服、殖民、移民與當代的全球化產生衝擊、裂解與重組。在種族多元的現代社會，例如，以夫妻關係為例，華裔美國人、非裔美國人和英裔美國人都有不同的傳統；土耳其移民與土生土長的德國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更牽涉到資源分配不均與尊重程度的不同，經常是以暴力手段來施行。性別角色社會化理論的謬誤，在於主宰的文化就成了常模。而且，性別關係也可能透過我們在第五章討論到的矛盾與動力產生多重範型；而陽剛特質與陰柔特質總是因有多重範型讓學習的情況變得更複雜。

其次，社會化理論認為學習性別（learning gender）是學習擁有特質（traits），也就是那些會產生行為常模的性格常模。基本上，性別角色理論只是在第四章討論過的性別差異模型的另外一種版本，但是我們在第四章評論的研究已經顯示，男性與女性（或男孩與女孩）之間的主要特質差異，幾乎難以偵測；即使用心理學家的量表找出一些男女之間的平均差異，但是跟同性之間的差異比較起來，仍然是微不足道。顯然，性別化的成長不可能只是內化角色常模而已。

第三，社會化理論把學習性別的個人塑造成完全被動的角色，而社會化的媒介則採取主動。但是我們觀察性別學習的實際情況，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以貝蕾·頌恩的美國小學研究為例（見第二章），男女學生並不是什麼事都不做，等著人家灌輸性別常模；反之，他／她們一直都採取主動，對於成人賦予的性

別區分，他／她們有時候接受，有時候不接受。他／她們在遊戲場上建立自己的性別區分，然後再予以打破；他／她們會嘗試有性別化的自我表現（例如年紀較大的女孩子會塗唇膏），也會嘗試跨越性別的表現（例如女孩子喜歡運動或是舉止變得粗野）。對於性別這回事，他／她們有時候會埋怨，有時候會開玩笑，有時候會有幻想或是質疑。類似的能量與活動，也出現在其他有關性別學習的研究中，例如馬丁·馬克·安蓋爾（Máirtín Mac an Ghaill）在《製造男人》（*The Making of Men* 1994）一書中所描述的英國高中生。

社會化理論似乎忽略了性別學習中很明顯的歡愉成份，也就是年輕人接受性別符號（如性感服飾）和建構性別關係（如青少年約會）的熱情；同時也沒有深入探討許多年輕人對於性別定義的霸權所做的反抗：例如厭惡運動的男孩、想成為太空人的女孩、認為自己是同性戀的青少年等等。此外，這個理論似乎也忽略了建構認同以及在性別秩序中找到該有的行為模型的困難，尤其是性別秩序總是充滿了權力、暴力和異化了的性。

我要舉兩個以年輕人為對象的研究為例。蘇·莉絲（Sue Lees）令人不安的研究《失敗》（*Losing Out* 1986），對象是十五、六歲的英國少女。研究發現這些女孩在跟具有仇視女性文化背景的男孩交往時，為了維護她們的性聲譽（sexual reputation），就陷入了幾乎令人難以忍受的兩難局面。有個女孩就說：「這真是個惡性循環。如果妳不喜歡他們，他們就說妳是裝模作樣的賤女人；如果妳跟他們混得很熟，後來他們又會說妳是蕩婦淫娃。」安·佛格森（Ann Ferguson）在《壞男孩》（*Bad Boys* 1986）中的研究，則是以加州小學裡被送進「懲戒室」的男學生為對象，結果發現那些「高風險」孩童，絕大部分是非裔的美國男孩。佛格森訪問了父母、學童，還有學校人員，其中包括一段非常精彩的訪問，對象是一位曾經因為鞭打小孩被捕的母親瑪莉安娜

(Mariana)。這個研究顯示，在權力遭到剝奪又被貼上種族標籤的情況下，非裔男孩早在小學階段，就以違規犯紀與拒絕學習成為建構他們男子氣概的一種手段；同時也顯示為人父母者有多麼為難，因為他／她們非常清楚這些非裔男孩長大之後會面臨什麼樣的壓力與風險。

社會化理論的第四個問題是：只看到單向的學習——只有學習性別角色的常模。在這樣的框架之下，我們很難理解為什麼在年輕人生命中經常發生方向轉變的情況，這種轉變卻看似毫無源由。有時候，個人發展的危機是以性別實踐的驟變來呈現，這種改變可能是從依附母親轉變到親近父親、攻擊行為的程度改變、突然暴增的性行為次數、拒絕與同性或異性往來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年輕人不只是無法「內化」他／她們父母輩的性別範型，反而會斷然拒絕，批判父母的政治或做人的不當，進而追求一種全然不同的東西。

我花費很多時間探討性別角色社會化理論的缺點，原因有二：一是這種理論至今仍然是最流行的性別學習觀點，因此也是取代第四章裡討論到的身體－機器，性別本質論最流行的觀點；其次是指出這種理論缺陷的研究，其實也指出了理解性別組成更好的方法。

人類發展的矛盾性格，其實從心理分析的角度更容易理解，只不過心理分析目前在社會科學界已經沒有什麼影響力。佛洛伊德的個案研究——其中以「朵拉」(Dora)、「小漢斯」(Little Hans)和「狼人」(Wolf Man)最著名——特別強調衝突與矛盾；佛洛伊德發現，一個人在無意識與意識的不同層面，經常是同時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心理分析已經發展了一個世紀，當前的不同學派也依然四分五裂，但是不論是哪一個學派，這樣精闢的觀察幾乎都被認為是重要的。

在佛洛伊德的解釋中，性別發展是以戀母情結為中心；這是

童年中期出現的情緒危機，孩童當時以母親和父親為焦點的性慾望受到壓抑。這樣的危機形成一種無意識的動機範型，男孩女孩各有不同，而且這範型還持續影響他／她們的心智發展，在正常的情況下，會引導他／她們在成年之後受到異性吸引。因此，心理分析學說提出了一套解釋，說明傳統的性別範型是如何輕而易舉地代代相傳，形塑成年男女的慾望；不過這個作用必須經由情緒矛盾與危機才能達成，而這些矛盾與危機還得仰賴其他途徑來解決，所以才會出現非常模的性別發展。

心理分析理論始終都充滿爭議，而且心理分析運動也有強烈的傾向會形成對開山祖師爺的狂熱崇拜（佛洛伊德、容格、阿德勒、拉岡都自立門派，另外還有一些較小的門派，創派的是祖師奶奶，如克萊恩），也讓人很難認真看待這整件事情。然而，這個理論也有一些強而有力的洞察，比方說人格發展的矛盾、身體慾望的重要性、無意識動機等等。如果我們將心理分析視為敲門磚，打開這個由其他角度難以看穿的人格發展議題，那麼心理分析就可以算是性別分析的一個重要的工具了。

要完整說明我們究竟是如何學習性別，首先必須有兩個體認：一是人的發展是充滿矛盾，一是學習性別的個人是主動參與而非被動接受的事實。人在性別化的社會中長大，無可避免地會遭遇並且主動參與性別關係；就某種程度來說，這樣的參與是缺乏組織的，因為他／她們的生活範型尚未固定，所以就像頌恩書中所描述的，孩童在「性別遊戲」中出現一種無政府狀態，在不同的性別範型中自由進出。這種無政府狀態在他們未來的生命中仍然可能出現，如果他們試圖忘卻不學（unlearn）或是重新學習（re-learn）性別範型，那麼他們所經歷的可能更可怕——不只是性別遊戲，而是性別暈眩。

本書第四章提到，我們必須承認身體在社會化的世界中具有能動性，主動的學習者以身體實踐來體現。就某種程度上來說，

性別學習所帶來的歡愉就是一種身體上的快樂，這愉悅不但展現在身體表象，也出現在身體的展演上。身體的變化——如初經、第一次射精、男孩變聲成了「破鑼嗓子」和女孩胸部開始發育——經常是性別發展中的重要階段，除非得到這個社會的性別符號系統賦予定義，否則其意涵是曖昧不明。

由於性別實踐涉及身體，但又不是由生物性來決定，因此經由學習而來的性別實踐可能對身體造成傷害。舉例來說，在比較富裕的國家如美國及澳大利亞，年輕男性經常在公路上展現他們剛剛學到還稚嫩青澀的男性氣概，其結果就是車禍意外死亡的人數是年輕女性的四倍，真令人驚愕。很多青少年和年輕女性喜歡節食減肥，希望能維持她們吸引異性的魅力，其結果就是有一部分的女性罹患了威脅到她們生命的厭食症。在比較貧窮的國家，情況不太一樣，但是風險也同樣很高。比方說，巴勒斯坦人面對以色列佔領所發動的起義運動（intifada），有絕大多數的直接反抗活動都是由非常年輕的男性甚至未成年的男孩來執行；就像茱莉·佩提（Julie Petecet）在其讀來令人膽顫心驚的民族誌研究中所說的，被以色列軍警毆打或逮捕，成了巴勒斯坦青年邁向男性氣概的某種成年儀式，當然其中有不少人因此喪命。

體現的學習者（embodied learner）也會碰到機構內的性別體制。社會化理論強調家庭、學校、媒體在孩童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一點並沒有錯，但是卻沒有談到這些機構的內部複雜性充滿了矛盾，有很多彼此衝突的模型與訊息。在學校裡，老師提供孩童很多不同的男性陽剛特質或女性陰柔特質的範型，這些都是老師們個人生活多元化的經驗；孩童也可能從成人身上，學習一些性別政治。舉例來說，澳大利亞男童學會用「poofers」（「屁精」）來彼此侮辱；而他們的長輩則因對待男女孩的不同方式，在性別議題上又進一步彼此分化。即使在雙親家庭中，對於該如何扶養男孩或女孩，也都還有爭議的空間。

而且，相同的經驗也可能會有不同的詮釋方法，這讓情況益形複雜。舉例來說，在家庭暴力環境中長大的男孩，從小看著父親毆打母親，很可能會把對女性施暴列入他所認定的男性特質，很多人也確實如此；但是，這樣的男孩也可能因為恐懼而產生反抗心理，或者因為同情母親，而在他自己的生命發展出與女性完全不同的關係。好些年前，卡洛·海格曼－懷特（1992）回顧德國經驗，發現親密關係中的暴力與社會上整體的性別階層有深厚的關聯。她指出，雖然跟犯行者一起工作很難，而且改變的主要動力是來自婦女，但是預防性別暴力的宣傳工作一定要加入成年與青年男性團體的行動；這樣的論點，現在已經廣為人接受了。蕾蒂卡·喬普拉的《再造陽剛特質》（*Reframing Masculinities* 2007）一書也指出這樣的邏輯，目前也在印度實施——本書第二章曾經引述過她書中的一個案例。

所以，機構本身並不會機械化地決定年輕人的性別學習模型，但是卻形塑了年輕人行為所造成的後果——他們會冒什麼險、有什麼樣的認知、涉入什麼樣的人際網路、付出什麼樣的代價等等。舉例來說，佛格森的研究顯示，若某個男孩採納抗爭範型的陽剛特質，可能會被學校體系指明挑出來處置；而在另外一方面，菁英學校內有一些比較常見的陽剛特質範型，雖然同樣是強調同儕競爭，但是卻透過學校提供的管道來競爭。

兒童與青少年之間性別範型的多樣性，在橫跨不同社會族群的研究中格外明顯。史蒂芬·佛洛西（Stephen Frosh）、安·費尼克絲（Ann Phoenix）和羅伯·派特曼（Rob Pattman）針對分佈在倫敦各區的十二所中學內，十一歲到十四歲的男學生做了研究，提出一份鞭辟入裡的報告《年輕陽剛特質》（*Young Masculinities* 2002）；報告中指出，在倫敦男孩眼中的陽剛特質，族群地位是顯著的因素——非裔或加勒比海裔的男生被視為陽剛特質較高，而亞裔男孩則較低——而且他們跟學校的關係也是充滿矛盾，因

為較好的學業表現一方面是他們想要的，但是同時又被認為是女性化的表現。最重要的是，這份研究報告顯示，男孩生活中的多樣性與男性特質的「經典論述」（canonical narratives）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所謂的經典論述就是一種霸權範型（如崇拜身體強悍、運動技能、異性戀等），所有的男孩都承認這樣的範型，但是大部分的男孩都無法完全符合；相反的，他們的青春期中充斥著跟性別的霸權定義協商交涉的痕跡，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或許會批判某些陽剛特質的版本太強悍，或是拒絕其他特質因為太陰柔。

當孩童與青少年在性別化的社會中爭取立足之地時，絕大部分都沒有內化某種特定性別的行為（我在第四章已經提到，強烈性別化的行為極為罕見）；更重要的是，孩童在學習性別關係如何運作，以及如何遊走在其中。

年輕人學習性別其實是學習性別能力（gender competence）。他們學著如何與性別秩序溝通，如何接受某種性別認同，產生某種性別表現——也就是韋斯特與齊默門（1987）著名的文章所說的，如何「做性別」；此外，年輕人也學習如何讓自己遠離特定的性別認同，或是如何對自己的性別表現一笑置之。大部分的男孩或女孩都無法達到完美的性別理想——英俊、美麗、技能、成就或受到肯定；不過大多數人都學習如何適應。

把主動學習視為一種自我參與，朝著特定方向發展，有助於我們了解性別學習。學習性別的人不只是被動地吸收他們所學習的東西，而是參與其中，讓他們的生命朝著特定的方向發展。前文提到性別學習的歡愉，就是一種創造與行動的歡愉。性別學習在任何一刻都可能發生，年輕人在日常生活中隨時都可能遭遇性別關係，並且試著解決他們所遭遇的情況，這就是在學習性別；這個過程通常不是在計劃中的，也不一定明確地標示著性別——在生命早期，可能認為是「我喜歡的運動」、「跟父母吵架」、「我

適合的工作」等等，到了後來就變成「為人父母」、「保住工作」等。溫蒂·陸德瑞（Wendy Luttrell）以美國成人教育課程裡非裔與白人勞動階級女性為對象，回顧了她們的生命歲月，寫成《學校的智能與為母的智慧》（*Schoolsmart and Motherwise* 1997）一書，對於這個一輩子的過程有非常動人的描述。

從這個角度看來，性別學習顯然有固定的形態。從這個學習過程一開始，我們所學到的東西就可能跟其他學習聯結在一起；孩童學習實踐的範型，然後在他／她們的生活中創造這種範型——也就是個人生活中性別實踐的組態（configurations），我們稱之為「陰柔特質」或「陽剛特質」。

性別組態（gender configurations）是一種行為的範型，不是靜態的（這也是某些心理學家無法以白紙黑字的標準化量表，來測量陽剛特質或陰柔特質的原因）。置身於某種情境，隨著情況向前進，這樣的過程並不只是發生在學習的某一層面，也發生在生命整體這個更大規模的層面。借用哲學家尚保羅·沙特的話來說，陽剛特質和陰柔特質都是一種「投射」（projects），是從現在投射到未來的一種生命過程的範型，把過去不存在的新情境和新事件帶進未來。西蒙·波娃的《第二性》（1949）有很長的篇幅，就是在討論歐洲社會與歷史中婦女另類生活的投射。

若是我們把性別學習視為性別投射（gender projects）的創造過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學習者的能動性與性別結構之間的棘手複雜。個人生活中發展出來的性別範型是一連串在現有性別秩序中遭遇的限制與可能性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學習者可以即席發揮、可以抄襲或創新，發展出一套特別的策略，來處理性別關係存在的情境——換言之，就是學會如何以特有的方式「做性別」。隨著時間更迭，這些特有的策略就會明確定型——尤其是成功的策略——具體地形成陽剛特質或陰柔特質的特定範型。

現有的性別秩序結構，意謂著某些策略比其他策略更容易產

生結果；所以在性別投射中可能有重疊的部分，也就是說，個人生活有某種程度的社會標準化。我們或許可以把這些共同的部分，稱之為性別形成中的共同軌跡（trajectories），也就是研究人員在生命史和民族誌研究中所找到的「陽剛特質」或「陰柔特質」範型。

性別投射並不是單一面向，也不是平順無礙，甚至可能會付出沈重的代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奈及利亞小說家奇努亞·阿契貝（Chinua Achebe）在他著名的小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Things Fall Apart* 1958）中的男主角，他有向上提昇的生命投射，表現出典型的男性特質，贏得村莊及地區內所有民眾的尊重；他是成功的農人、丈夫與父親，但是卻因此必須要放棄他其實深深愛著卻又誤入歧途的妻子，這種緊張的關係到後來開始崩解，到了故事結尾，隨著西方傳教士與殖民勢力的到來，最後釀成了災難。

在心理學界，人格發展中的性別矛盾，最經典的例子就是佛洛伊德指出在童年中期產生的「戀母情結」。在以男童為重心的主流心理分析觀點中，幼兒對母親的主動慾望終究會遭遇父親權力（還有背後的社會道德準則）的全面禁阻，因而導致的心理危機就會讓這個慾望轉入地下化——更嚴格地說，應該是創造了一個壓抑的體系，從中又形成了成年之後的人格。不過，佛洛伊德始終無法將這個模型套用在女孩身上。

在堪稱正常的案例中，戀母情結危機終究可以化解，孩子也就跨進心理發展的另外一個新里程；如若不然，這個孩子可能就得去看心理醫生了。即使我們不認同佛洛伊德對戀母情結的特定觀點，還是可以採納這個更宏觀的論述。生命史和性別投射的生命史並不是一段完全契合的發展，而是牽涉到好幾個不同的時刻（moment），其中有不同的性別介入，採用不同的性別策略，也有不同的解決之道來化解性別議題。

我且用自己的研究來做例子吧。這是針對澳大利亞「綠色」運動中一小群男性所做的研究（Connell 1995: ch. 5），他們大部分都在傳統性別分工的家庭中長大，在童年和青春期開始接受霸權的男性特質；不過在這個衝突時刻之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否定的時刻，他們開始因為各種不同原因（包括家庭衝突），疏離這種霸權陽剛特質。那時，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反體制文化或是綠色運動中接觸到女性主義，不得不正面面對性別議題：這是他們跟霸權陽剛特質分離的時刻。在我們訪問他們的時候，有些人還留在這個階段，但是有些人已經繼續走到抗爭時刻，著手進行改造男性特質的政治計劃，並且投身性別平等運動。

我不相信在性別形成的過程中有一套標準化的階段——儘管自佛洛伊德以降，有些心理學家確實有這種想法。我們已經知道性別秩序的多樣性，因此學習性別的方式也不太可能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規則，若有最接近普世皆然的準則，或許是質的改變這事實。任何個人或團體在其特殊歷史背景中發展出來的特定性別投射，都可能會有轉捩點或是在發展過程中有不同的時刻。

許多性別研究都已經證實了陽剛特質與陰柔特質的多樣性，這也表示性別形成過程中會有不同的軌跡。階級不平等、種族多元化、區域差異、出生地或是移民等等因素，都會造成不一樣的童年經驗；更何況，重大的社會變遷也可能改變親子之間的關係。

蘇聯瓦解，再加上一九九〇年代新資本主義成形，都直接影響到近代世界史上最劇烈的經濟衰退。傑可伯·雷吉（Jokab Rigi 2003）的民族誌研究，對於哈薩克的情況有令人心碎的描述。哈薩克跟其他後蘇聯時期的共和國一樣，少數家族掌握了大部分的公共資產，而絕大多數人則陷入貧困與不安，這就破壞了親子之間的關係，因為大部分的父母仍然承襲蘇聯時代的教育價值與工作倫理，而年輕人早在蘇聯後期就已經朝西方消費主義邁進，認

為舊有的策略已經不可行，在這個夢想幻滅、只有臨時工可做、動不動就起家庭爭執的環境中，年輕人為自己刻畫出新的路徑，而且通常都是極度性別化的路徑。年輕男性投入犯罪或是保全工作（或者二者兼有），而年輕女性則去賣淫或是其他可以用性來交易的工作——性的大量商品化與婦女權益的崩潰，正是著名的「民主轉型期」（transition to democracy）一大特色。在此同時，有錢的父母可以為子女買到消費商品和教育，替他們在新經濟中找到一份好工作。

一份英國的研究也顯示出這種軌跡的多樣性。吉莉安·杜恩（Gillian Dunne）在《女同志的生活型態》（*Lesbian Lifestyles* 1997）一書中訪談的對象，有些是傳統女性特質的「學徒」，有些從小就是野丫頭；有些在傳統性別分工的家庭中長大，有些則生長在平等主義的家庭。杜恩特別強調這些女孩的能動性如何反映出她們的經驗，但是她同時也注意到性別秩序的複雜難解。當她們成長到青春期中——也就是所謂「戀愛」和「約會」文化主宰的時期——很多女孩子發現她們在性別關係裡原本佔據的中間地帶突然從腳底下消失；其中一個女孩康妮回憶道：

整個情況都變了，她們突然變成不一樣的人。我心想，其他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沒有發生在我身上？……老實說，我完全不知所措；她們彷彿都學會了某種密碼，而我卻沒有。她們都知道在迪斯可舞廳該如何舉手投足，而我卻像釘在牆上一樣，動也不敢動；他們從哪裡學會這些東西？我完全一無所知。那是某種社交行為的模式，大家都跟著做，唯獨我不知所措——天哪！……那些畫得五顏六色的眼睛和臉頰，還有少女服飾這些東西，還有她們的行為舉止，像孔雀一樣，基本上就是吸引別人的注意力。

多樣性（diversity）並不同混亂。孩童也面臨同樣的情況，也跟成人群體會有重疊。孩童學會的一個關鍵能力，就是知道什麼才是成人世界中佔優勢地位的陽剛特質與陰柔特質。無論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在主導性別秩序，孩子們就會在其陰影下成長。

我們很難跟從小一起長大的性別習慣完全劃清界限；同志解放運動人士就是在這種認知之下，提出了同性戀男性的「自我壓抑」概念。朵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在她著名的小說《金色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 1962）中，就描繪了同樣的困境，只不過是異性戀的版本；她筆下的女主角安娜與莫莉都嚐試過著「自由女性」的獨立生活，同時遵循英國左派政治的原則，然而她們卻發現自己在情感上仍然需要男性，這種對於異性關係的需求不斷破壞她們的自主性（autonomy）。至於她們的政治經驗，乃至於經濟獨立，都無法滿足這樣的需求。

然而，性別秩序確實會改變，因此新的個人軌跡與新的學習途徑也應運而生。在婦女解放運動之後長大的年輕女性，有她們自己的困境，如工作、婚姻、兒女等；在琪拉·布貝克的三代研究《活出女性主義》（*Living Feminism* 1997）一書中，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困境，但是她們不會面臨朵麗絲·萊辛那一代婦女的兩難局面。

在某些地方，性別平等的信念已經遍及年輕一代的男性。祖爾納和佛爾茲（Zulehner and Volz 1998）在德國所做的全國男性調查顯示，五十歲以下的男性遠比五十歲以上的男性，更支持性別平等的家庭生活模型而拒絕「傳統的」常模；但是這種情況並不是舉世皆然。林克·史托普（Lineke Stobbe 2005）研究阿根廷工廠工人之間的性別談話，結果發現不分男女，都一致接受共同的意識型態，也就是尊崇男性主導一切，負責養家，要有男子氣概，對女人要勇敢殷勤；而女性——雖然同樣在工廠裡工作——則仍然負責照顧兒女，而且被認為比較軟弱、容易受到傷害。我

們若是想了解形成性別發展途徑背後的力量，必須從個人生活的範疇邁向更廣的領域——這正是第七章的主題。

性別認同

體認個人生活中的性別存在，最常見的方式或許就是透過「性別認同」的觀念。「認同」(identity)一詞在哲學與文學已經有很久遠的歷史，而且在定義上也經過一番奇怪的轉變。這個名詞最早是屬於哲學與宗教的詞彙，表示「一致性」(unity)；到了十九世紀，「identity」一詞已經完全融入英文，不但用在哲學和數學領域，也用在文學中，其定義通常還是指「相同」(sameness)的意義，不過有時候也用來指涉個人的存在或是強調「我是何許人」(who I am)相對於「我非何許人」(who I am not)的概念。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末，對於歐洲語系的人來說，「我是何許人」愈來愈成問題，因為封建社會秩序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不安的資本主義、巨大的新興城市、龐大的勞工移民和紛擾的勞動階級。在此同時，全球帝國主義也讓歐洲和北美國家直接面對截然不同的文化衝擊，因此迫不及待地提出人類異同的問題。

西方中產階級文化——也就是主宰現今世界的文化——其背後就隱藏了一個強而有力的意識形態，認為人類有天生的差異。這種差異不只存於外形和個性，同時也反映在社會階級、種族和性別的層級上。然而，這個信念從一開始成形就受到質疑，像甘地這樣的反殖民主義知識份子就以「所有人類都有相同的靈魂」為基礎，反駁任何人擁有先天或是後天的優勢地位。

佛洛伊德及其弟子所提出的基進派心理學，也從另外一個角度質疑這種固定差異的信念，而心理分析學派的精闢見解，

為二十世紀有關「認同」一詞最具影響力的陳述奠定了基礎。艾瑞克·艾瑞克遜（Erik Erikson）在其著名的《童年與社會》（*Childhood and Society* 1950）一書中，就認為現代有關個人、社會與政治的種種問題，都肇因於無法達成認同，「因此，在我們這個年代研究認同，就如同在佛洛伊德的那個年代研究性一樣，都是一種策略」（Erikson 1950: 242）。可是，佛洛伊德強調心智上潛意識力量（即「本我」[id] 與「超我」[superego]）所造成的衝突，而艾瑞克遜則強調意識的力量（即「自我」[ego]）。自我是與外在世界交涉的一種心智力量，也是個人自我意識之所在。而對艾瑞克遜來說，「認同」一詞就代表著一種心理機制的一貫協調，而自我就是靠著這個機制來處理妨礙到這個機制運作的壓力，一邊是潛意識的機制，另外一邊則是外在世界。原則上，只要個人能夠征服心理發展過程中所遭遇到的考驗與試煉，那麼「我是何許人」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艾瑞克遜認為，這個問題在青春期的格外重要。

把這樣的觀念應用在性別研究上的關鍵人物，是美國精神病學家羅伯特·史托勒（Robert Stoller 1968），但是他從兩個方向進一步修正了這個概念。首先，史托勒認為「核心性別認同」（core gender identity）是成人的人格基礎，而且應該在很早期就已經形成，而不是在青春期的；其次，史托勒的認同概念已經獲得不一樣的參照架構：艾瑞克遜所指的是整體的自我整合，而史托勒的概念則比較明確，他認為談到「性別認同」只是針對個人的一個面向——即個人參與性別關係與性實踐的情況。

對史托勒來說，這樣的焦點雖然較狹隘，但是並沒有關係，因為他認為整體的人格整合從前也只關注身為男人或女人的議題。然而，從其他人格和社會過程的角度來看，只探討性別還是有問題。單獨討論「種族認同」、「世代認同」或是「階級認同」，固然仍有其意義，但是如果我們要討論這些社會關係「持續地綿

密編織」(Bottomley 1992)——現在這種「交織理論」的討論已很普遍了——我們則必須要注意這些其他形式的認同，才能了解性別認同。因此，史托勒所建構的「認同」概念，導引出後來認為「認同」有天生多元性而非單一性的概念。

以性別二元論為基礎的認同模型在一九七〇年代比較容易被人接受，因為美國的女性主義研究都強調小孩在扶養過程中的性別差異；有關這個觀念，最有影響力的論述是蘭西·雀朵洛的《母職的再生產》(*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1978)。雀朵洛的論述把性別的勞力分工與男女幼年期心理發展途徑串連在一起：按照性別分工，照顧嬰幼兒的工作完全交由婦女來負責，因此導致男孩與女孩在幼年期的不同情緒情境。女孩由相同性別的母親扶養長大，自我界線比較模糊，長大後會有比較強烈的動機想扶養小孩；至於男孩，則因為性別區分的驅使，會跟照顧他們的母親有所區隔，因此在心理發展初期比較容易出現不連續或中斷，在建構性別認同時會遭遇比較多的困難，到了成年期也有比較強烈的自我界線。

儘管大家都已經接受男人也可以「扮演母親」的事實(Risman 1986)，但是在當代西方社會，仍然少有男人實際上肩負起照顧嬰幼兒的責任，究其原因可能是經濟因素大於心理因素。在北歐國家開始實施嬰幼兒的父親也能請有薪育嬰假的政策之後，就成功地改革了這種情況(Holter 2003)；而且，除了雀朵洛(1994)之外，也有愈來愈多的人發現，成人的人格中並沒有二元化的性別範型，這當然也是我們在第四章討論過的「性別相似」研究所獲致的主要結論。

最近有關男性特質的研究發現性別分類的變異，也已經是司空見慣。相對於一九七〇年代討論的「單一男性角色」，現在則比較常見以複雜型態討論多重的陽剛特質。各個文化為男性建構的性別也相當多樣化，隨手比較拉丁美洲、中東、非洲南部地

區和東南亞對於男性特質的描述，就可見一斑（Gutmann 2001, Ghossoub and Sinclair-Webb 2000, Morrell 2001）；也有相當多的證據顯示，即使在同一社會，乃至於同一機構、同儕團體甚或工作場所之中，也有多種不同的陽剛特質，其中最驚人的例子就是道格拉斯·傅雷（Douglas Foley 1990）在美國德州鄉村小鎮一所中學所做的民族誌研究，在這個案例中，性別、階級與種族的交互作用，建構出許多版本的陽剛特質：有強勢主導的白人集團叫「jocks」、有反權威的墨西哥裔集團叫「vatos」、還有一群人則被傅雷以諷刺的口吻稱之為「沈默的大多數」。

總之，現在的潮流是討論多重性別認同和性認同。舉例來說，有些心理學家已經承認「同性戀認同」（homosexual identity）是現代社會中眾多可能的性認同之一，並且描繪出獲致「同性戀認同」的階段（Troiden 1989）。然而，從「認同」的概念到「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或「性認同」（sexual identity）的概念，還有一個重要的立場轉變；在性別分類看似愈來愈複雜的時代，認同的概念也逐漸被用來指稱個人的主張，表示他們是什麼人或是什麼東西，與其他人不一樣。

這樣的發展與「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概念的興起有關（特別是在美國）。個人宣稱自己認同什麼（如黑人、女性、女同志等等）就成了那個社會運動的一份子。「酷兒」政治（queer politics）則又更進一步，酷兒主義的行動派人士以強調多樣性直接挑戰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社群；例如，在白人主導的女同志社群中強調黑人女同志的存在。這種認同的概念走到極致，就成了確認自己與眾不同的方式。

儘管有很多社會運動都以認同為基礎，但是經過進一步的檢驗證明，這些認同並不如我們所想的那麼確實而有充分的根據。艾恩·尼爾森（Arne Nilsson 1998）針對瑞典城市戈特堡（Göteborg）的同性戀史做過深入精緻的研究，並且指出同性

戀存在的三種方式：「還好」(so) 通常指有一點娘娘腔、「真男人」(real men) 通常指勞工階級的年輕人、「花俏」(fjollor) 則是指打扮花俏、舉止誇張的同性戀者。這是三種認同嗎？或許是吧。但是尼爾森也同時在研究中指出，同性戀生活範型是如何與工業海濱城市的結構密不可分；在這裡，形塑性傾向的種種外在條件包括：擁擠狹隘的居住空間、嚴格的性別分工、公共空間裡的高密度男性、不受尊重的勞工階級在街頭討生活、經由航行貿易與其他城市互聯、某些類型的警察、許多貧窮的年輕男性也許會進入同性戀關係一陣子然後又退出。

當這些外在條件改變時，同性戀實踐的特有形式也跟著改變。一九五〇年代，瑞典社會逐漸走向富裕，勞工階級開始移居到郊區，福利國家制度慢慢成形，而且對於年輕人受到的引誘也感到道德上的恐慌；隨著性行為本身的隱密性增加，異性戀與同性戀族群之間的文化差異愈來愈分明。因此，性與社會實踐的組態——可以輕易地解讀成「認同」——會因為歷史上的社會環境無常而產生變化，而且對很多參與實踐的人來說，這只不過是他們一輩子性生命史裡的一小部分而已。

像尼爾森這樣的研究，替解構主義的理論概念賦予了真實生命的關聯性。在美國格外有影響力的解構主義性別理論，曾經質疑過所有認同分類的穩定性，並且特別注意語言的詭譎，因為像「女人」或「同志」這樣的分類，經常透過語言創造出一種穩固持久、本質不變的印象。其實，分析性別的實際操演，根本就不需要用到認同的概念。

既然「認同」這個概念有這麼多問題，這個概念還有什麼價值嗎？當然，這個名詞遭到大量濫用，在很多情況下，都是指自我、名聲或社會立場的同義詞，只不過聽起來比較花俏而已。

有些情況下，用「認同」這個字來指稱性別或性實踐的組態反而有誤導之嫌。同志解放運動中一位才氣洋溢的理論家，蓋·

霍昆翰(1972)，就主張異性戀情慾在原則上是一種未完全發展、不成形、也不具人格的浮動慾望，缺乏個人的單一性；而同性戀情慾則是沒有受到「戀母情結化」(oedipalized)的影響，這「戀母情結化」是受到父權社會秩序所控制的。因此，從某個角度來說，同性戀正好是認同的相反，也就是無法融入單一的性慾望與性實踐。

很多異性戀情慾也沒有受到「戀母情結化」；異性戀情慾也經常是乖僻、無常、不受拘束，而且跟異性戀秩序裡建構固定地位與受限認同的社會權威相互抵觸。誠如琳·席格爾(Lynne Segal)在《異性戀性愛》(*Straight Sex* 1994)一書中所說的：「性關係也許是所有社會關係中最擾人也最麻煩的一種，正是因為性關係——尤其是異性戀性關係——經常威脅而非確認性別的兩極化。」舉例來說，異性戀男人正是在性關係中最容易感受到依賴、不確定、被動——簡單的說，就是感受到與女性相同的經驗。

對艾瑞克遜來說，每個人都毫無疑問的希望擁有單一的認同，他覺得這是在成長過程中必須達成的一個目標；其他討論「認同」的人，也大多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認同。然而，我們是否真的希望擁有認同呢？有些認同其實令人不敢苟同——至少這些認同為其他人所帶來的後果都令人作嘔——種族歧視的光頭族與菸草公司的總裁，就是我能想到的其中兩個。

自我人格融入統一的整體，就是拒絕了內在的多元與開放，也等於是拒絕改變。性別關係的主要改革過程中，可能需要解構自我，經歷一場性別迷惑暈眩。我在澳大利亞「綠色」運動中的一群男性身上，就看到他們在試圖改變傳統陽剛特質時，經歷過這樣的經驗；美國社會家芭芭拉·麗絲曼(Barbara Risman 1996)也在美國的「公平家庭」(fair family)(例如性別平等家庭)裡發現類似的經驗。但是這樣的經驗會到什麼程度呢？我現在要舉一個性別研究中公認的極端範例，希望藉此拋磚引玉，讓

大家重新思索「認同」這個問題。

第三性、跨性別、變性

不同的社會承認不同的性別分類，這個事實成為一個最強而有力的證據，證實社會過程在性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是一個耳熟能詳的反證，駁斥生物本質論。世界上不只有男女兩性，可能還有第三性（third genders）、或是兩者之間的各種變異，讓人類可以擁有的性別分類倍增。

這個問題吸引了很多性別研究的學者，有很多民族誌研究的文獻都在探討像「勃大琪」（berdache）這樣的分類；「勃大琪」是北美西南部原住民文化中的「雙靈人」（Williams 1986），有男性的身體，但是社會地位比較接近女人而非男人，而且擁有強大的精神力量。傳統的爪哇社會替「幫雞」（banci）保留了一部分空間，他們有男性的身體，卻做女裝打扮，而且通常都跟異性戀男人發生性關係。至於在巴西，則有一群生理上為男性的人，也跟男人發生性關係，不過在他們的性文化中卻嚴格區分插入者與接受者；擔任插入角色者仍然維持其男性特質，但是被插入者則不再是男人，不過卻又不能自認是完全的女人（Parker 1991）。

這些群體彼此間都有差異，而「第三性」的概念是否適用於他們身上，則仍有爭議；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這些行為都很容易改變。以北美洲為例，西班牙殖民者認為這些是違反宗教教義的恐怖行為，還以相當殘暴的手段消除這種原住民的風俗習慣；而在當代的印尼，「幫雞」社群則跟新興性類別的男「同志」之間有明顯區隔，因為後者是出現在比較富裕的社會脈絡中，而且跟北美的同志文化有密切關聯（Oetomo 1996）；至於在巴西，也出現了互惠性行為的「同志」模型——在這種同志範型中，性伴侶

雙方都同時是插入者與接受者，而且雙方都自認為是完全的男人。

丹尼斯·歐特曼在他對當代性行為的重要調查《全球「性」》（*Global Sex* 2001）一書中指出：這樣的改變不只是「西方的」性行為取代了「傳統的」性行為那麼簡單。任何文化都有不同的性風俗與性別體制，本身就是多元而彼此有所區隔的；全球化牽涉到二者之間極為龐大繁複的交流互動，其結果就是在文化分裂與經濟不平等的情況下，形成一個性實踐與分類的光譜。

這種情況在泰國最為明顯。根據彼得·傑克森（Peter Jackson 1997）的研究，泰國文化在傳統上男性的性／性別分類原本是「phuchai」（男人，主要是異性戀者）和「kathoei」（女性化或男扮女裝的男人，屬於接受型的同性戀者）。在國際同志文化的衝擊之下，這些分類並未消失，反而有了更多的分類，區分得更精細：「bai」（雙性戀者）、「gay-king」（同性戀者，但是偏好插入）、「gay-queen」（通常比較女性化，偏好接受插入）和「gay-queing」（可以是男性化或女性化，也可以插入或接受）。

源自於西歐的都會型性別秩序，在當代全球化的過程之中，主要還是性別二元化的模型。這兩種性別大部分都被認定為異性戀，不過西方文化在處理男男之間或女女之間的性行為時，也仍然維持這種性別的二分法；「女同志」與「男同志」都是定義明確的分類，但是「雙性戀者」則是一個不穩定的分類，也沒有明確的社會意義。

即便是這樣的性別秩序也很複雜。根據文化史學家湯瑪斯·拉克爾（Thomas Laqueur 1990）的研究，在西元十八世紀之前，歐洲文化對於男女身體並沒有一套天生相對的二元模型，而是傾向於將女性視為一種不完美的男性。即使在二元論的性別符號中，還是有很多機會可以突破藩籬，這種機會可能是在嘉年華式的節慶中，也可能是以極嚴肅的態度面對。瑪嬌蕊·嘉波（Marjorie

Garber) 在她著名的研究《穿衣的利益》(*Vested Interests* 1992) 之中, 就指出範圍大到驚人的變裝實踐, 遍及劇場、電影、性產業、宗教、音樂、偵探小說、電視……等, 從好萊塢老牌女星瑪琳·黛德莉 (Marlene Dietrich) 戴高禮帽, 到英國歌手喬治男孩 (Boy George) 的裝扮, 不一而足。事實上, 這些數量之多, 讓嘉波將扮裝視為當代文化焦慮的一種主要的表現。

在這個光譜中靠近狂歡的那一端, 幾乎就等同是娛樂和輕鬆, 這也難怪嘉波舉出來的例子大都來自小說和演藝界。不過對性別理論來說, 光譜中嚴肅的那一端才是真正的難題所在, 或許也是機會所在。那些真正在生活中跨越性別界線的人、那些不是像蜻蜓點水似地沾了就跑的人, 才是讓西方文化中的性別分析家感到好奇又迷惑的對象——就如同民族誌研究者對「第三性」感到好奇與不解。

早期在性／性別的科學研究中, 這樣的人曾經被視為某種有趣的怪物, 出現在研究專書中。理查·范克瑞佛－艾賓 (Richard von Krafft-Ebing) 那本受人蔑視的《性精神病理》(*Psychopathia Sexualis* 1886), 不但替醫事法和性學研究奠定基礎, 同時也是檯面下的暢銷書, 因為書中蒐錄了很多駭人聽聞的「精神雌雄同體」病例。友善親切的海佛洛克·艾里斯 (Havelock Ellis) 在他的《性心理學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1928) 書中, 有一百頁的篇幅在探討「男扮女裝癖」(Eonism)——這個名詞的典故是一名法國貴族迪昂騎士 (the Chevalier d'Eon), 他在不同的時間, 有時以男人現身, 有時又扮成女人——也因此獲得了徹底研究性別倒錯的名聲。就連偉大的西格蒙·佛洛伊德也不例外, 他在討論史威伯醫生 (Dr. Schreber) 的病例時, 也仔細檢驗了他對性別變換的看法, 當做心理分析的一部分。

即使在心理分析與性別研究的社會科學都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變性人 (transsexual)——到了一九五〇年代, 這些人被冠

上了這個稱呼——在精神科醫生與社會學家的眼中，仍然是某種自然的實驗，揭露性別體系的機制。在美國有位變性的女人，用艾格妮絲（Agnes）這個假名現身，成了小型研究的主角，橫跨三個不同的學術領域。

有關「變性癖」如何成為一種醫學現象、醫生扮演什麼樣的曖昧角色，以及醫學專業涉及其中的種種爭議，都可以在一些簡明易懂的作品中看到（King 1981, Califia 2003）；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蘇珊·史崔克（Susan Stryker）和史蒂芬·惠特爾（Stephen Whittle）令人敬佩的《跨性別研究讀本》（*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2006）書中，找到許多關鍵文件。因此，我在這裡只討論三個看似跟理解性別秩序最相關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跨性別的生活是否真的像許多研究者所說的，是一種自然的實驗，可以披露性別如何運作的事實？韋斯特與齊默門說，艾格妮絲的例子「讓原本遭到文化遮掩的性別成就重見天日」，她們說得對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就某種程度來說，艾格妮絲確實仔細觀察了她身邊婦女的性別實踐，並且還實地仿效。當然，就算你沒有變性，也可以做這樣的研究；人類學者和青少年就一直都在做同樣的事。如果要研究一個人的性別位置，會對他／她在日常生活互動中受到的認可造成什麼程度的影響，那麼跨性別的生活確實可以誇張地表現出這樣的過程，因為這個認同很可能是有問題，而且需要解決的。

但是答案更可能是否定的，因為韋斯特與齊默門說的是「成就」。在他們的分析中，性別是經過「做」才操演出來的，讓其他人可以將這個人分配到一定的性別分類。但是艾格妮絲的困境，重點在於她已經是個女人——她自認是女人，有相對應的興趣、情慾和外貌，也期望被認為是女人。在艾格妮絲的生活中，身為女人是個不爭的事實，只不過她是一個有些嚴重問題的年輕

女人，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她有陰莖，所以她才會去找醫生，要求動手術去除。在她小時候，確實也曾經因為她身體的社會分類為男性，而被視為是個男孩；這個矛盾讓她難以容忍，所以才驅使她開始尋求身體上的改變。（而她也確實做到了，在經歷青春期的時候，找到非法的雌激素來源。）

如果跨性別的生活真的突顯出性別秩序的基礎中，有什麼獨一無二的事實，或許就是性別過程可能引起的矛盾動力。

這又立刻牽涉到我要問的第二個問題：性別的「流動性」（fluidity）。自從性別展演理論（performative theory）興起之後，很多人開始對性別的變換、過渡、變異以及違反常模深感興趣。如果常模的性別是經由展演出來的，那麼只要改變展演行動，應該就可以創造出非常模的性別。因此就出現了很多跨性別位置的展現，試圖將男性特質與女性特質混在一起，甚或直接引爆性別體系；也因此文化研究中，才會突然對各式各樣的身體改造感到目眩神迷。變性的男女經過嚴苛的身體變化，改變了他們原本的性別配置，不正是性別流動性最令人詫異的可能證據嗎？

同樣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從某個層面來說是肯定的，但是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說，卻又是否定的。變性的經驗與實踐，還有圍繞其外的專業與公眾論辯，確實是性別秩序中一個複雜的焦點。醫學研究人員花了很多時間，試圖區分變裝癖、假變性慾、真變性慾、同性戀、女性化男人、男性化女人，以及這些類別底下的次分類，但是卻從未創造出一個穩定的分類方法。一位見多識廣（但是卻反對轉變）的精神科醫師說過，在這個領域，甚至連性別位置的光譜都沒有，而是一團「岩漿」，像是火山核心那團熔化的岩漿（Chiland 2003）。

但是換個角度來看，齊蘭（Chiland）自己談到那些變性的「案例」，正是最明顯的證據，證明性別不但缺乏流動性、不穩定性，也缺乏——沒錯——就是不妥協性（intransigence）。在變

性男女所寫的自傳，還有他們在生命歷史訪談中所表現出來的一個最令人吃驚的特色，就是一再宣示，而且口氣很強硬，他們一直都是像這個樣子。在社會科學界針對性別轉換過程所做過的最好的研究，莫過於亨利·魯賓（Henry Rubin）的《自製男人》（*Self-Made Men* 2003），書中也很明確地指出，用這一章稍早前引介的詞彙來說，「性別投射」經過一段時間是前後一致的——不論從傳統社會體現的角度來說，這個投射有多麼的「謬誤」。因此才會出現像凱薩琳·康明絲（Katherine Cummings）的自傳《凱薩琳日記》（*Katherine's Diary* 1992）中所說的那種困在錯誤身體裡的感覺。

在變性後的曲折迂迴生活中，真的改變的是處理的態度與方法，處理這個棘手的難題、這個不可能的體現。經歷性別轉換的男女，如果非常幸運的話，會得到極大的支持，如若不然，他們就會面臨遭到排斥、失業、家人反對，還有性關係中的重大困難等等。很多年輕的變性女子不得不靠跳脫衣舞或賣淫這樣性工作來養活自己。哈莉特（詳見第二章）發現，她有一些異性戀的男性老主顧，看到變性的女人就會興奮，但這並不表示這些人會尊重她們。羅伯塔·柏金斯（Roberta Perkins）在她開風氣之先的著作中，替雪梨地區的變性女人發聲，其中包括一位名叫娜歐蜜（Naomi）脫衣舞者，她說：

我覺得男人通常有一定程度的厭惡女人，所以女人才會被強暴、毆打；而脫衣舞者在舞台上則提供一個發洩這種厭惡情緒的管道，因為觀眾可以盡情地用污穢不堪的字眼辱罵她們。而在男人眼裡，變性人比女人還更低級，看看有多少男人性攻擊變性人就可以知道（1983:73）。

這又引出了第三個問題：政治。變性經驗在性別政治中的重要

性，過去曾經有鮮明的對立看法，有些評論家看到性別保守主義，有些則看到性別革命。

在當代人權討論之中，有個非常奇特的發展，現在將「變性人」視為一個去性別化（de-gendered）的群體。在這個論述中，「變性人」（現在已經不再區分男人或女人）在新的縮寫「LGBTTI」裡，成了一個「T」，同被列為「性弱勢族群」（sexual minorities），必須要保護他—她—它們的權利；這個縮寫代表的少數族群包括：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性戀者（gay）、雙性戀者（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gender）、變性人（transsexual）、雌雄同體的雙性人（intersexual）。很多大學的性別研究課程加入了討論這些群組的學分，在一些論及歧視的政策宣言中也針對這些人做了一些宣示，完全無視於這份名單是否有一貫的邏輯。

特別是在美國，甚至開始使用「跨性人社群」，彷彿已經成立了一個穩定的群組，可以遵循熟悉的認同政治模型，或是被視為酷兒或拒絕性別的典範；這就幾乎像是在全球都會中心，努力創造出一個第三性的類別。我希望參與這個英勇計劃的人能夠發現或是創造出可以生存的空間，那麼保留「跨性別」這個詞彙或許對這個計劃以及在其周圍形成的群體會有所幫助。

但是這畢竟跟轉換（transition）過程有所差異，而「變性人」一詞正是為此發明出來的。薇薇安·娜邁絲特（Vivienne Namaste）在《看不見的生活》（*Invisible Lives* 2000）就對跨性別論述提出質疑，鼓吹大家關注變性男女的真實經驗、主體性與掙扎——因為這些事情都被酷兒理論和政府機構「抹滅」了。娜邁絲特在加拿大的研究顯示，對轉換性別的人來說，就連取得基本的健康照護與社會服務都可能困難重重。

再回到原來的問題。性別轉換確實跟人類生命中可能發生的革命有深厚的關聯（雖然沒有人會以這樣的轉換做為政治姿態，也不應該如此）。身為一個變性的女人和全心投入的女性主義者，

二者並不相悖，完全一致。讀者或許已經發現，我在文中一直用形容詞「變性的」，而不是名詞（除了引述別人的看法之外），因為我的基本看法認為這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社會群體或一種人。但是性別轉換只有在個人生活中經歷過嚴重的矛盾之後才會發生，這種矛盾可能會令人難以忍受（在這種情況下的人自殺率很高），光是維持下去就要消耗掉很多的能量，而且誠如娜邁絲特所說的，還可能遭到體制或運動的拒絕接受，使得情況更加艱困。在某個地方未來可能發生的與現實之間似有所關連，只是我們還沒有找到這關連罷了。

大規模的性別

有關性別的討論，大部分都集中在個人層面，如個人認同、母職與扶養幼兒、家庭生活、性，以及這些層面的病理分析，如偏見、家庭暴力與強暴等等。但是性別討論不應該僅止於此，箇中原因我們都已經很清楚：要了解個人關係，就必須將機構、經濟、意識型態和政府一併考慮進去。我在第五章勾勒出分析性別關係結構的研究取徑，這一章也要用同樣的研究取向，把性別放在更大規模的架構中分析，那就是放在企業、政府與全球社會中加以分析。

性別化的企業

企業是現代社會中居於主導地位的經濟組織形態，同時也是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關鍵機構。根據稅務資料統計，在二〇〇五年，全美國有五百七十萬家企業，其中大部分的規模都很小，但有兩千多家企業各自擁有二十五億美元以上的資產。規模最大的企業，員工動輒以數十萬計，例如豐田汽車（Toyota）在二〇〇七年就有二十九萬九千名員工；而利潤（有時候是損失）則高達百億美元，例如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Exxon Mobil）在二〇〇七年的利潤就有三百九十五億美元；而這些公司每年繳納的

稅賦甚至比某些小國的全國生產總額還要多。

企業始終是性別化的機構，有性別化的歷史。在早期的現代歐洲，商人的「公司」清一色都是由男性組成；當公司的所有權開始分割，甚至本身也成為一種商品時，就出現了股份公司的形態，到了十七、八世紀，第一個股票交易所問世，社會上仍然把這些股份公司視為男人的機構。資本的現代形態之所以誕生，是歷史過程的一部分，創造了一個純男性化的公共領域，其中包括了逐漸萌芽的自由國家和新聞媒體這一類的輿論機構。

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好久，都沒有人質疑。到了十九世紀，富裕國家的中產階級婦女開始要求進入大學與專業領域的權利，但是並沒有要求進入商業管理領域的相同權利。直到一九七〇年代，自由派與學院派的女性主義開始質疑組織理論，企業中的性別範型本身才成為討論的焦點。美國學者羅莎貝絲·肯特（Rosabeth Kanter）的作品，記錄了這種改變的關鍵；她所寫的《公司男女》（*Men and Women in the Corporation*）在一九七七年問世，書中強烈批評組織研究中缺乏性別意識，同時指出性別議題確實是茲事體大——儘管有極少數的女性確實已經躋身企業的高階主管。

在接下來的三十年間，針對企業生活的社會研究數量漸增，在全球都會中也逐漸出現一種「性別化組織」（gendered organization）的理論。有些研究已經在前文中提到過：如荷西夏德（1983）研究航空公司與催帳公司裡的「情緒勞動」，普琳歌（1989）研究秘書工作等。有些最好的研究都是以大規模產業中的體力勞動世界為對象；社會學家米莉安·葛露克斯曼（Miriam Glucksmann）的《生產線上的女性》（*Women on the Line* 1982）一書就對英國的工廠生活有精湛的研究。她在一家汽車零件組裝工廠，花了七個月的時間，以參與觀察的方法進行研究，成了這本書的基礎；在書中對於企業階級制度、生產線上的日常生活及其

與家庭生活之間的關係，都有詳實的描述。在這家工廠裡，有非常嚴格的性別分工：婦女只能從事例行的低薪工作，升遷管道受阻；而男人做比較輕鬆的工作，反而可以領兩倍的薪水：「顯而易見的，想要得到一份待遇較優渥的工作，唯一條件就是身為男性。」女人對男人不抱任何希望，在每天與男性上司的衝突中，總是彼此相互扶持；然而，她們的貧困、疲憊、家庭負擔和勞工階級生活的性別隔離，讓有效率的組織變成一個不可能的想望。

性別區分在企業化的農業中，也是同樣的強烈；這種企業化的農業目前正在改變全球的農村生活。海蒂·婷絲嫚（Heidi Tinsman 2000）在智利做過一個動人的口述歷史研究，描述在皮諾契（Pinochet）獨裁統治下成立，以出口為導向的水果產業；這個產業裡的公司大規模地招募婦女勞工，但是其結果卻完全不如預期。原來，這些婦女在掌控了收入、有能力外出購物與採購決定權之後，改變了她們與丈夫之間的權力平衡；而且，公司老板創造出來的性別隔離工作小組，反而讓原本在家庭中受到孤立的婦女多了一個去處，也在婦女之間形成了新的關係。從這兩方面來說，這個過程都削弱了獨裁政權塑造出來的官方母性意識型態。

性別階級不只是「傳統」而已，有很多情況是刻意引進，並且強力捍衛這種制度；辛西亞·寇克本（Cynthia Cockburn）針對印刷業勞工階級所做的經典研究《兄弟》（*Brothers* 1983），就充分顯示這種情況。另外，大衛·柯林森（David Collinson）、大衛·奈茲（David Knights）、瑪格莉特·柯林森（Margaret Collinson）合作的《經營歧視》（*Managing to Discriminate* 1990），也是探討相同的議題，不過他／她們的對象是保險業的白領階級。舉例來說，有位經理反對一名女性員工的升遷，（可能是對的）理由是：顧客——通常也是男性——可能會不高興。

類似這樣的研究，成了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出現的性別化組織

理論持續茁壯發展的基礎，其中犖犖大者包括美國的瓊安·艾克、加拿大的佩達·唐可利、澳大利亞的克萊兒·波頓，還有英國的學者如柯林森夫婦、傑夫·賀恩（Jeff Hearn）等——他／她們的作品都收錄在米爾斯（Mills）與唐可利（Tancred）合編的《性別化組織分析》（*Gendering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1992）。這個理論的關鍵，就是指出性別歧視並非在原則上性別中立的官僚體制中意外出現的結果，以為只要改變一些態度就可以矯正；性別是企業生活中的結構性特色，與社會各界的性別關係彼此聯結，這些形塑了企業中的職掌定義、對「功績」的理解與升遷、管理技巧、市場行銷，以及更多相關的種種。

有了這些開始之後，職場上的性別分析日趨精緻，也愈來愈注意不經意性別化的程度，以及在組織中個人互動層面的動態性別特色（Martin 2006）。最經典的案例，就是席維雅·潔拉蒂（Sylvia Geherardi）與芭芭拉·波吉歐（Barbara Poggio）針對義大利企業所做的研究（2001）。在這裡婦女已經抵達管理階層，但是在此同時，卻發生了調適與妥協之「舞」，而性別秩序似乎緊緊地包圍住她們。

在美國，現在有相當多的女性晉身中級管理階層，也產生永無休止的爭辯，討論阻礙女性躋身最高階管理階層的「玻璃天花板」議題。一九九一年，美國國會成立了由二十一名成員組成的「玻璃天花板委員會」，專門調查兩性就業平等的問題，結果發現：在美國的大企業之中，97%的資深經理人是白人，95-97%是男性；在一千大企業之中，只有兩位執行長是女性，也就是說，百分之一的大企業中，只有五分之一是由女性當家，但是在報告中卻被視為是略有進展的象徵。

「玻璃天花板委員會」把這種情況歸因於阻擋女性進入高階職位的一連串「障礙」，包括：教育背景不適當或不足、部分握有實權的男性對女性有偏見、女性的生涯規劃偏離主要的升遷管

道、政府對反歧視法案的執行不力、對於這個問題的資訊不足、曝光率不高、中級管理階層的白人男性擔心喪失優勢。顯然，高級管理階層缺乏女性和少數族裔男性的原因，就如同社會學家所說的，與企業組織更廣泛的特性，和職場上根深蒂固的分工模式有密不可分的關聯。委員會引述一家零售公司執行長的話，評論美國企業中的普遍文化（1995: 34）：

老派的公司都由穿著四十六吋褲腰的白人男性當家，他們有一些純屬男性的不當儀式，對企業來說造成負面功能。男人藉著打獵、釣魚或討論運動彼此結交，這對企業來說是毫不相干的；有太多所謂的「策略計畫」都是在酒吧關門後拍板定案——這種男性之間稱兄道弟的儀式，跟企業經營都毫無關係。

要如何改變這種情況呢？委員會的建議是：改變態度！委員會試圖說服這些資本家：多元組成的管理團隊《有利於企業》（*Good for Business*）——這正是他們書面報告的正式名稱——換句話說，他們必須藉著利潤誘因，勸誘企業主大規模改造管理階層；然而他們似乎忘了，從資本主義興起之初，利潤誘因早就已經全力運作，而其結果就是造成經營團隊裡有97%是白人，而95-97%是男性。後來，美國政府就對這個問題不感興趣了。

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讓我們相信，其他工業化國家的情況會有所不同，但是有時候每個國家對這情形的反應卻相當不一致。挪威現在立法通過，要求所有企業的董事會至少要有40%的席次必須是女性，並且為企業界設定了其他性別改革的目標。其效果仍有待觀察。

管理階層的男性特質確實也會隨著時間改變。英國歷史學家邁可·羅波（Michael Roper 1994）在精彩的《男性特質與

一九四五年以來在英國組織中的男性》(*Masculinity and the British Organization Man since 1945*)一書中，追蹤了英國製造業管理階層的歷代變化。老一輩的經理人都有實地參與生產過程的經驗，對於公司及產品品質有密切的認同感，對工人有一種家父長式的關心；隨著金融資本在英國經濟中的勢力愈來愈龐大，有一批新的核心幹部經理人登上舞台。他們同樣也是男性，但是多半著眼於會計財務，對技術和產品的興趣不大，也不太關心工人。於是一種比較一般的、也比較無情的管理階層男性特質接管了英國企業。

資本主義是個動盪不安的經濟體系：市場擴張崩盤、產業起起落落、企業為了追求利潤不斷重組等等。在這些變化之中，最重要的一個就是跨國企業的興起；在本章稍後，我還會討論到這個問題。現在，我只要談談從全球都會富裕國家的管理結構中所衍生出來的跨國管理模式；相形之下，羅波所勾勒出來的那種改變，似乎是小巫見大巫。惡名昭彰的安隆企業(Enron Corporation)就是最好的例子，這家德州的油管公司後來變成龐大的「新經濟」能源交易商，到了二〇〇一年突然垮台，留下一堆爛攤子。安隆具體呈現出那種企圖心旺盛、以利潤為中心的管理典範，只要能夠斂集利潤與紅利，可以毫不顧念勞工和企業倫理(Fox 2003)。彼得·列文(Peter Levin 2001)針對金融交易所做的研究，也顯示出類似的陽剛特質，只不過在金融界會依照工作步調的波動，以不同的方式呈現。

羅莎貝絲·肯特在一九七〇年代研究企業中的女性時，發現她們所受的社會壓力傾向於強化傳統女性的陰柔特質；到了一九九〇年代，茱蒂·魏思曼(Judy Wajcman 1999)針對以全球為導向的高科技公司，研究這些公司裡的男女經理人，結果發現女性承受了沈重的壓力，要求她們像男人一樣：長時間工作、在辦公室戰爭中奮戰、對下屬施加壓力、以利潤為重心。為了能夠

在這個新世界裡生存，女性經理人必須重組她們的家庭生活，讓她們也能卸下照顧幼兒、烹煮三餐、整理家務的責任。過去普遍相信，女性進入管理階層可以為職場帶來比較溫柔、和善與人性化的風格，但是魏思曼的研究駁斥了這種信念，難怪她的書名叫做《像男人一樣做管理》（*Managing Like a Man*）。

從性別正義的角度來看高級管理階層，景況非常黯淡；再看看那些大資本家，景況還是同樣黯淡。麥克·唐納森（Mike Donaldson）與史考特·波因亨（Scott Poynting）在《統治階級男性》（*Ruling Class Men* 2007）一書中，從各種資料來源蒐集不同的訊息，拼湊出企業富豪的社交生活與文化，看起來不甚美好。這些男人在物質生活中享有特權，但是社交生活卻貧乏孤立；在他們的家庭關係中，女性大多只有裝飾和生育子嗣的作用；而且那些接管家族財富的年輕人還得刻意表現出「強悍」態度。

而在低階的情況又如何呢？那些實際為企業付出勞力的人會怎麼樣？他們的情況無疑會比較變化多端，因為企業本來就是由社會上多元背景出身的人共同組成的。溫妮菲·波斯特（Winifred Poster 2002）針對職場性別的民族誌相關研究所作的全球回顧，對這個問題有精彩的評論，不只強調企業利用性別分工與刻板印象做為控制的手段，同時也指出性別組成的各種不同情況。種族階級、性化現象（sexualization）、階級區分等，都在職場男性特質與女性特質的塑造過程中軋了一角——與第五章討論過的交織理論所預期的結果不謀而合。

在這場與企業勢力的戰爭中，代表勞工權益的機制是什麼？工會嗎？我們在工會中也同樣發現了父權組織。工會運動本來就是源自於以男性為主的產業，雖然婦女工會組織也曾經出現過幾段著名的插曲，如一八八八年在倫敦發生的「賣火柴的女孩大罷工」，但是工會成員主要還是以男性為主，工會領導人更是壓倒性地以男性居多。蘇珊·法蘭茲薇（Suzanne Franzway）的《性政

治與貪婪機構》(*Sexual Politics and Greedy Institutions* 2000)一書，詳實記錄了女性在工會運動中難以發聲的困境——即使在澳大利亞這種工會制度與女性主義勢力同等強大的國家也不例外。工會男性具體呈現出一種古老、好鬥的勞工階級男性特質，他們的抗拒始終是問題所在。然而，隨著經濟型態改變，女性在工會成員的比例也不斷增加，澳大利亞貿易工會委員會(Australian Council of Trade Union)——工會的最高組織——最近的兩任主席都是女性。

性別化的國家

世界上大部分的總統、總理或首相、內閣部長、將軍和高階文官都是男性。婦女雖然獲得法律地位和投票權（比男人遲了很久）——可是在世界上部分地區，卻仍然沒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因此，國家之所以會被視為父權機制，其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在一九七〇和八〇年代，在都會中的女性主義者多次試圖建構父權國家理論，主要的論點可以總結成以下六點：

- 國家是性別權力關係中更大結構的核心。哲學和政治學的傳統國家理論沒有提到性別，因為這個領域裡只有男性，所以看不到任何「差異」，自然也就看不到性別。然而，儘管只有男性，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強而有力的性別效應——亦即，女性完全被排除！
- 國家有標示清晰的內部性別體制。國家有明顯的性別分工：男性集中的部門如軍事、政治、基礎建設、經濟；女性則集中在社會福利、衛生與教育。國家的權力中樞，最高決策單位，幾乎是清一色的陽剛男性，因此與男性

- 的利益相比，女性的利益則由比較邊緣化的機構所代表。
- 國家制定出與性別議題有關的政策。由於這些政策都會付諸實行，因此國家等於是從更廣泛的層面，規範了社會中的性別關係。這絕非國家施政的次要層面，反而牽涉到許多的政策面，從住房政策到教育，乃至於司法正義和軍事，都可以看到。
 - 國家施政不只規範現有的性別關係，這些行動也有助於建構性別關係，形成性別認同。最重要的一個例子就是在十九世紀末，壓迫性法案和受到國家支持的醫療體系，在創造「同性戀」這個性別分類中所扮演的角色。「丈夫」與「妻子」的類別，也有一部分是國家行動所建構出來的，這些行動包括從婚姻法到稅務政策等大大小小的機制。
 - 因為有了這些行動和能力，國家乃成為性別政治的關鍵目標，針對性別議題所發動的政治動員大多以此為焦點，因為壓力團體和群眾運動都希望透過國家機制來達成他／她們訴求的目標。的確，十九世紀自由國家的興起是劃時代變革，那時的性別政治的形式開始以群眾政治來展現。
 - 既然性別關係會出現危機趨勢和結構變化，而國家是性別化權力的中心，本身也就會出現危機與變化。衝擊到國家的危機趨勢包括：與男性暴力有關之正當性問題、性別分工所引發的緊張關係（如婦女的「平等機會」和「玻璃天花板」）等。

這些結論來自為數甚多的政治與官僚體系研究，分析論證都相當紮實也貼近現實情況。但是這些結論仍然有其侷限，尤其是現在當我們的眼光放到了全球都會以外的世界，就更容易看得出

來了。

首先，國家只是社會權力中心的其中一個而已。傳統上對於國家的定義是：在特定領域中壟斷合法使用武力的機構。但是這個定義忽略了丈夫對妻子的家庭暴力，這種甚為普遍的社會實踐過去是完全合法的，直到最近才開始受到廣泛的爭議。

我們可以把丈夫視為一種「權力」嗎？傳統政治分析並不承認「丈夫政黨」，可是在父權體系的性別秩序中，丈夫可以享受妻子提供的性與家務勞動服務，這是整個社會予以體制化的利益，也是國家機制不斷配合的一種權力。溫蒂·賀薇（Wendy Hollway 1994）在研究坦尚尼亞公職人員聘雇情況時，就提出了這一點；當時，坦尚尼亞政府明文規定政府機關用人，男女機會平等——就像現在大多數國家一樣——但是這項政策在與丈夫的利益衝突時，就形同虛設。舉例來說，女性公職人員必須得到丈夫的許可，才有受訓的機會，「沒有附上丈夫同意書的申請，就視同〔官方〕撤回許可」。

另一種權力則以保全公司（security companies）的形式出現。據說在美國，私人雇用的保全人員比政府的警力還要多；美國佔領伊拉克期間所使用的軍力，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來自「保全承包商」，有兩萬到三萬名傭兵受雇於像黑水全球公司（Blackwater Worldwide）這樣的企業。愈來愈多的有錢人——就連在富裕國家也是如此——住在加裝大門的社區，也就是有圍牆保護，還有保全人員巡邏守衛的集體住宅，其目的在防止窮人、黑人和沒有門禁卡的人進入社區。

這些私人保全系統也都已經性別化：由男性控制、大多數雇用男性，而在裝設大門的社區裡，被關在圍牆內的都是女性。由於私人保全系統的合法性在於保護財產而不是公民權，所以到現在都還沒有受到要求男女機會平等的政治壓力，不像政府部門受到婦女要求平等待遇的影響。由此可見，性別化的國家就在一個

遠比表面上看起來還要更複雜的角力場中運作。

在政治學的討論中，「性別」往往成了「婦女」的代名詞，但是在分析國家的時候，我們絕對必須納入男人和陽剛特質，尤其是像國家這麼龐大複雜的組織，更要區別陽剛特質中的霸權與從屬之分，這一點很重要（Messerschmidt 1993）。女性主義理論明確指出的國家陽剛化，原則上是指國家機構與霸權陽剛特質之間的關係。

這個原則稍微有助於我們理解後殖民國家的陽剛化。在世界的某些地區，如中非和西非，去殖民化之後留下來的國家結構缺乏法理基礎，而且通常是不合理的分割地理與文化地景，結果就是讓這些國家飽受衝突所苦，而衝突經常轉變成軍事政變或是內戰。於是，殖民時期極度陽剛化的軍隊提供了後殖民國家的菁英核心，特別是在這個地區裡最富裕的國家：奈及利亞。至於在阿爾及利亞、辛巴威（Zimbabwe）、古巴這些國家，則是由游擊隊領袖取得後殖民國家的控制權，建立獨裁政權。即便是仍然由文人政府掌控的國家，例如印度，為了維繫新的共和體制，驅動經濟發展，也會以霸權的陽剛特質來治國，特別強調權威與理性算計，壓抑情緒，所以才能推翻地方社群與傳統。——至少我是這樣解讀艾希斯·南地（1987）批評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

土耳其是伊斯蘭世界中的第一個共和國，也是格外重要的典範。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穆斯塔法·凱末爾（Mustafa Kemal）將軍在危機重重之中取得權力，驅逐霸佔他們領土的勢力，後來演變成獨立戰爭；他領導一批現代化的菁英，建立世俗化的政權，解放婦女也在他的主要政見之中，因此婦女在土耳其的地位遠比在其他阿拉伯國家要高。話雖如此，在這個共和國內，陽剛化的軍隊仍然佔有支配優勢。誠如辛克萊－韋伯（Sinclair-Webb 2000）在一個非常有趣的民族誌研究中所說，在土耳其服兵役是成為男人的重大儀式，與國家認同息息相關；可是軍隊也是緊張

關係的所在：職業軍人，特別是軍官，總是認為那些徵召入伍的阿兵哥不成材。換言之，軍隊不承認已經由社會形塑成形的陽剛特質，反而企圖用新的模型重新塑造年輕人。然而，這種動機卻遇到了難關——有一部分是因為遭遇庫德族的反抗，有一部分是因為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的興起，還有一部分是因為年輕人之間的文化變遷。

國家不只是權威與武力的機制，同時也是表達社會利益和伸張權利的場所。在十九世紀的歐洲，民主運動的目標是「男性參政權」，而且跟家庭收入和勞工男性為一家之主的觀念緊密結合。國家保障公民權利提供一個脈絡，因此到了二十世紀末，才會有都會的另類男子氣概出現；其中，同性戀陽剛特質就是最好的例證。同樣有趣的例子則是德國在一九七三年引進的公民替代役制度，這個青年徵召入伍服兵役的替代方案，等於是認可另外一種非暴力形式的男子氣概。現在，有比較多的年輕男子選擇替代役方案，而不是入伍服役。

同樣的，我們也必須體認到婦女與國家之間的複雜關係。茱莉亞·歐康納（Julia O'Connor）、安·歐若芙（Ann Orloff）、席拉·雪佛（Sheila Shaver）在《國家、市場、家庭》（*States, Markets, Families* 1999）一書中，調查了四個工業化國家中的性別與福利政策。她們確認表面上看似性別中立的政策，實際上卻有性別效應。舉例來說，退休俸系統讓工作不曾間斷的人得以享受較好的退休生活（大多數恰好是男性），至於做了很多家務事但是卻沒有領薪水的人來說，退休後的生活堪虞（大多數是女性）。顯然，婦女運動雖然是福利政策論辯中的一股勢力，其影響力還是很不平均。不同領域的國家政策，也有不同的性別範型。例如美國對婦女收入的保障相對較少，但是對婦女「身體權」（body rights）的法律支援就相對比較完整。

與性別相關的國家政策，大多都牽涉到控制婦女的身體，這

些都很難改變。馬拉·胡圖（Mala Htun）研究阿根廷、巴西與智利的性別政治，結果發現：儘管在獨裁政權和民主轉型之間，婦女權利也是起起伏伏，但是不管在什麼情況下，墮胎權都沒有改善。因此，談到北歐某些女性主義者提出的「對女性友善國家」理論，就頗耐人尋味了。波喬斯特與席姆（Borchorst and Siim 2002）在評論這個理論時，發現這個理論與可以和對國家失望悲觀的女性主義脫鉤；由下而上的女性主義運動，結合了由上而下的立法授權性別平等，二者合體，創造了照顧婦女權益的政體，政治的確非常重要。

在世界上的其他政府體制中，也發現了女性主義的身影。在澳大利亞，性別政治是一種重要的形式，而執掌性別平等業務的官員則有一個很可愛的名稱，叫做「女性官僚」（femocrats）——海絲特·艾森斯坦（Hester Eisenstein）在《興風作浪》（*Inside Agitators* 1996）一書中，對她們的故事有生動的描述。她本人也曾經有一段時間在政府部門擔任女性官僚，發現這些官員在教育、就業權和其他政策領域的確有影響力，但是隨著新右派與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她們的影響力也日漸削弱。

同樣的，菲洛米娜·歐克克－伊荷吉莉卡（Philomina Okeke-Ihejirika）和蘇珊·法蘭絲契特（Susan Franceschet）合作的比較研究，也指出「國家女性主義」成功的特定條件（2002）。以智利而言，在對抗皮諾契獨裁政權的抗爭中，女性的地位十分突出，而且在民主的轉型階段，女性主義者也可以進入國家的領袖高層。可是在奈及利亞，雖然婦女也投入爭取獨立的抗爭，而且女性主義團體的立場也很堅定，但是在獨立後的政體內，卻沒有女性主義思想立足的餘地，反而推動一些立場軟弱的婦女組織，由實際統治者的太太來領導——這裡是借用美國「第一夫人」的概念——討論溫和的福利政治以及保守的婦女地位觀點。

在奈及利亞，反殖民運動、民族主義運動或是革命運動都經

常動員婦女，爭取她們的支持；中國的革命就是最好的例子。毛澤東喊出來的口號：「婦女撐起半邊天」，就是他們攻擊封建思想和法律的策略之一，因為這些封建餘毒強化了女性的次等地位（Stacey 1983）。然而，建立後殖民或後革命政體往往也意味著建立新版的父權體制。婦女進入了勞動市場，但是卻沒有一視同仁地進入政治領導圈。瑪麗亞·米斯（1986）就嘲諷這些後殖民政體如何成為新的父權體制象徵，塑造革命建國英雄的偶像崇拜——包括毛澤東在內。二〇〇八年，尼泊爾成立新的共和政府，但是看到海報上執政黨的族系譜——從馬克斯經過史達林再到毛澤東，一脈相傳的男性臉譜——卻不覺令人毛骨悚然；其中當然也沒有女人。

在某些國家，更是擺明了將女性排除在外。自從葉門統一之後，就被形容成全世界最壓迫婦女的國家，不過沙烏地阿拉伯也緊追在後就是了。主宰這個地區的伊斯蘭教瓦哈比教派（Wahhabi）反對女性擁有主權的立場絕不寬貸，就如同基督教世界中的天主教會反對女性擔任神父一樣。納耶拉·托希迪（Nayereh Tohidi 1991）對什葉派伊朗國內女性主義政治的描述，就指出女性主張己見的態度，常被視為他們的宗教與文化受到西方污染而墮落腐化的象徵。大多數後殖民國家都仰賴跨國企業，因此也在由男性主導的經濟環境中運作，新加坡就是一個例子，這個國家是依賴型資本主義發展的驚人成功範例，卻也在後殖民政府中塑造了最磐固堅實的父權體制。

然而潮流並不完全是一條單向道，在伊斯蘭教社會中也有婦女運動的歷史，而且在某些國家——如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印尼——女性甚至還成為出色的政治領袖。印度的後殖民國家就提供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讓婦女運動得以發展茁壯；更值得注意的是，大英帝國在印度半島上瓦解之後，後續成立的五個國家當中，有三個都曾經出現女性總理，第四個則差一點就選上，其中

還包括全世界第一位民選的女性國家領導人：一九六〇年當選的斯里蘭卡總理。另外一個差一點當選國家領袖的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在我寫作本書時仍然遭到軟禁，都是因為控制緬甸的軍方男性太怕她所致。

至於在過去一度是帝國核心，現在則成為全球經濟金融中心的國家，女性主義運動在法律和憲政制度上都打了好幾場漂亮的勝仗；當然也有敗績，例如在一九七〇年代試圖將性別平等納入美國憲法的努力。不過整體而言，男女之間形式上的權利平等已經確定，包括投票權、財產權、訴訟權、平等就業機會等等。國家父權體制的舊有形式，也就是官僚階級制度中暗藏的陽剛特質權威，在女性主義的一再挑戰之下，也變得不堪一擊。

但是國家也在改變，似乎讓女性的權力愈來愈小（Yeatman 1990）。在新的「改革」旗幟之下，許多國家經營的事業走向私有化，讓僅存的公眾服務運作也愈來愈像民營企業。納斯特·賈西亞·甘克里尼（Néstor García Canclini）就發現，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之下，形塑日常生活的主要決定「都是不易到達、也難以辨識的地方」進行的。（1993:13）。

女性在公領域現身的機會增加，正好平衡了公領域本身縮減的情況，或是像瑞秋·賽門-庫瑪（Rachel Simon-Kumar 2004）所說的，國家與市場界線模糊，二者正逐漸融為一體的趨勢。新自由主義的關鍵政策——市場鬆綁、降低稅賦與政府服務、資源轉移給私人企業等——都是將權力重新轉移到由男人主導的機構；而不論是都會型國家或是邊緣型國家，都逐漸與全球資本主義世界整合。因此，我們必須轉而討論性別在最大的規模中，也就是全球社會的規模中，是如何運作的。

全球社會中的性別

在這一節，我要討論莎拉·蕾克里芙（Sarah Radcliffe）、妮娜·蘿莉（Nina Laurie）和勞勃特·安多利納（Robert Andolina）共同提出來，而且非常巧妙命名的「性別的跨國化」（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gender）。這是近來論辯的主要議題，不過女性主義從很早之前就已經開始關注全球議題。早在二十世紀初，爪哇的卡蒂妮就可以仰賴遠從荷蘭這個殖民勢力國家的婦女伸出的援手（詳見第三章）；整個二十世紀，幾乎都有國際性的婦女組織存在，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立的「國際和平自由婦女聯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到現在都還在運作；而且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經有國際論壇在爭論我們現在稱之為「性別議題」的問題（Lenz, Szypulski and Molsich 1996: 10-12）

然而，當代論辯的形貌改頭換面，則是因為專門為了討論性別不平等與婦女權益而設置的跨政府論壇的誕生。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間的「聯合國婦女十年」（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for Women, 1975-85）造成的變化相當驚人；在「聯合國婦女十年」及其之後的這段時間，一連串高分貝的會議創造了可以公開討論這些重要問題的國際論壇，同時提出與婦女權益息息相關的政策議題。我相信這反映出當前性別關係中一個重要的事實：在性別秩序裡有些重要的特性，不是可以從在地的角度去理解的，必須放在全球的架構上來分析。

現在討論「全球化」——即全球層次的社會組織——已經變得稀鬆平常，儘管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解仍嫌不足（Connell 2007）。因此，把性別視為一種全球社會的結構，也不算扯得太遠。我們就不必像早期父權理論那樣，假設各地的性別都是一樣；的確，以目前的情況來看，全球性別只是鬆散地聯結在一

起，而且其相對應的關係也不平均。這就是本章稍早提到，波斯特（2002）在評論全球職場性別時所勾勒出來的景況；因此，我們只需要假設其中確實有某種聯結存在，而且是正在成形，這樣就可以了。

所有我們在第五章提過的性別關係結構，都有跨國化的情況。男女之間的經濟關係無法避免跨國化，因為在這個時代，國家經濟有很大一部分掌握在外國人手裡，產業界也有很大一部分仰賴對外貿易，主要投資決策都是由跨國企業決定；性別政治也勢必受到影響，因為全球競爭都是透過國家重組與公共服務私人化在進行，陽剛特質化的軍事、非正規軍事和警察機構也都要經過國際統合協調；情感關係和性事受到移民、人口政策、國際旅遊等因素的衝擊，更不用說在這個愛滋病蔓延流行的時代，性別中的國際層面幾乎不可能避免（Mane and Aggleton 2001）；連性別符號也會受到跨國化的影響，因為陽剛特質或陰柔特質的特定形象，會隨著全球媒體大規模的流通（如流行服飾、「名人」、職業運動員等），不同文化的性別意識形態也因為移民和通婚彼此交織融合。建構全球性別秩序的聯結似乎有兩種基本形式：區域性別秩序之間的互動，以及創造性別關係的新場域。

性別秩序之間的互動

帝國侵略、新殖民主義以及現行的權力、投資與傳播的全球系統，讓不同的社會有了彼此接觸的機會，而這些社會中的性別秩序也就因此有了接觸。

誠如我在本書中一再強調的，這通常是充滿暴力而且造成分裂的過程。帝國主義當然也攻擊不符合殖民者樣板的在地性別配置：舉例來說，傳教士就企圖根絕北美印地安人男扮女裝的第三性「勃大琪」傳統，也曾經在玻里尼西亞扼止在他們眼中屬於

濫交的女性性行為。在夏威夷，販售給成千上萬遊客的慕慕裝（muu-muu），其實根本就不是原住民的傳統服飾，而是男性的宗教當權者為了遮掩女性身體所留下來的遺緒。在地的性別配置也深受為了創造利潤的商業活動所影響，進而重新形塑：如奴隸制度、土地沒收、屯墾等。在當今世界，全球各地陽剛特質暴力的機構都與軍火交易有密切關聯，在二〇〇六年，軍火貿易額至少高達四百五十六億美元（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08）。

經由這種手段重塑的性別實踐就形成了新的範型，也可以說是全球性別秩序的第一個層次。這些性別秩序都有特定性與在地性，在它們身上留有創造全球社會力量的印記。我在這裡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娜蒂亞·金（Nadia Kim）針對在美國的韓國移民研究。長久以來，韓國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以家庭為基礎的性別關係一直都有固定的父權模型，但是隨著南韓的快速工業發展和全球大眾媒體帶來的衝擊——尤其是美國的性別關係形象——這樣的傳統受到很大的壓力；而移民到其他國家，更進一步侵蝕了這種儒家模型。在研究中接受訪談的婦女都希望自己有活躍的經濟生活，更多的性別平等，也希望她們生命中的男性能夠表現出友善而非權威，而且還要分擔家務；在她們心目中，美國男人似乎代表現代的男子氣概，比韓國男人好，可是其中不免有些糾葛：年輕一點的婦女特別會抨擊駐紮在韓國的美軍以及美國士兵的行為，而且還批評美國男人的濫交。

另外一篇則是梅·高索伯（2000）的論文，討論阿拉伯國家媒體中展現的陽剛特質——特別是埃及——文中就披露了比較緊張的情勢。她以兩個奇怪的插曲做為開場白：一是謠傳以色列人發明了一種口香糖，會讓阿拉伯男人性無能；另外一個則是以伊斯蘭為名，特別強調性愛的中古世紀求愛手冊突然大受歡迎

迎，其中一本英譯本就是赫赫有名的《香水花園》（*The Perfumed Garden*）。高索伯認為這兩個插曲代表後殖民時代的中東對於男子氣概的深層文化失調。其歷史脈絡則是與以色列和美國相比，阿拉伯國家相對遲緩的經濟現代化、政治紛擾和武力弱勢；阿拉伯語系社會中，婦女的經濟與社會地位提昇，讓仍然深植於傳統性別意識型態的阿拉伯男人的男性認同，陷入了兩難的困境。舊的性愛手冊強調女人在性行為的主動積極，大眾文化也描寫一些有權有勢的女人，就像賣座電影《台拉維夫任務》（*Mission to Tel Aviv*）裡的女主角面對以色列人毫無懼色，還扭轉局勢一樣。高索伯說，有很多跡象顯示這是「尋找現代男子氣概定義的混亂旅程」。

性別秩序的互動也不完全是單行道。我先前已經提到艾希斯·南地的研究，指出大英帝國不但改變了英國人的陽剛特質，連印度人也受到影響。另外還有一份規模較小但是卻很有意思的歷史文獻資料，討論「帝國拓荒者與獵人」如何成為陽剛特質的典範（MacKenzie 1987）。不過可以想見，都會型性別秩序施加在全球邊陲國家的壓力一定比反過來的壓力強，這一點無庸置疑，而我們也不應該認為這只是單純的性別「現代化」。從上述的兩個例子，再加上性別與帝國主義這方面範圍更廣泛的歷史文獻（Midgley 1998），在在都顯示出這個過程中的紛擾不安，有時候甚至是嚴重的緊張衝突。

性別關係的新場域

帝國主義與全球化創造了全球規模的機構，這些機構都有其內部的性別體制，而且每一個性別體制都有各自的性別動能——利益、性別政治、改變過程。因此，這些橫跨全球的機構也為性別的形成與性別的動能提供了一個新的場域。這些機構之中，最

重要的似乎是跨國企業、國際政府、國際媒體、全球市場。以下我會一一評論。

跨國企業 在全球市場上運作的企業現在是地球上最大的企業組織，而且如我們所見，他們的職場通常都有非常明確而複雜的性別分工，還有非常強烈的陽剛特質的管理文化。

在跨國企業的新脈絡中，管理階層的陽剛特質會有什麼樣的改變，已經成為近年來論辯與研究的主題。夏綠蒂·胡珀（Charlotte Hooper 2000）在研究一份商業報紙的形象時，發現一些改變的證據，從強悍的父權模型轉為強調團隊合作與高科技。另外一份針對澳大利亞企業女性所做的小型集體訪問（Connell and Wood 2005）當然也支持強調高科技的說法，但是在其他方面，只有一些模稜兩可的證據支持新的範型。這份研究還會繼續下去。

一份針對北歐國家金融公司的國際併購所做的研究，顯示出迫在眉睫的危機。北歐國家已經是地球上性別秩序最平等的地方，但是簡恩·緹納利（Janne Tienari）及其同僚（2005）在訪問這些被併購的公司高層主管時，卻發現一個驚人的現象——資深經理人幾乎清一色都是男性，而且基本上他們都不想聽到什麼性別平等的問題。他們覺得管理天生就是男人的工作，是「根據核心家庭以及男人掙錢養家的模型所建構出來的」。研究人員認為，跨國企業的情況強化了包山包海的管理階層的陽剛特質，建構出好鬥、機動、以工作為導向的特色——推翻北歐國家對於性別平等的社會論述。如果她／他們所言屬實，那麼在更廣大世界中跨國企業的性別關係看來前景堪憂。

國際政府 二十世紀政治史上最顯著的特色，就是有愈來愈多本身沒有領土基礎的機構，卻連結許多以領土為基礎的主權

國家，而且還蓬勃發展；這些機構包括國際勞工組織（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聯合國（the United Nation）及轄下眾多機構如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等。而地位同等重要的歐盟（European Union）則是比較傳統的政治形式：一種地區性的關稅聯盟，不過其中有一部分也逐漸演化成聯邦國家。至於其他區域組織，如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等，則仍然非常鬆散。

這些機構全部都性別化，也有其性別效應，而他們的性別體制大多都沿襲創造這些機構的國家。辛西亞·恩羅伊（1990）針對外交世界的研究顯示，這些機構都是外交的產物，主要的員工和負責管理的人自然也都是男性；可是在恩羅伊的書出版之後，女性也慢慢走入國際外交的世界，美國迄今已經出了兩位女國務卿瑪德蓮·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和康德蕾茲·萊斯。多羅塔·吉瑞茲（Dorota Gierycz 1999）在記錄聯合國轄下機構的性別不平等時，發現這些機構都有員工聘雇規則，藉以保證區域的多元性，所以其中也有性別多樣化的成分；而政府間的論壇也都強調與會者在形式上的平等地位。

我曾經參加過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UN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的一次會議，親眼目睹這個聯合國大會下的常設委員會是如何的行禮如儀。外交官員——大部分是穿著西裝的男士——一個接著一個站起來慷慨陳詞，宣稱他們的政府如何有決心要達到男女之間的平等。

此外，聯合國組織也採用了在北歐國家與澳大利亞試行過的「女性官僚」，並且成立內部機構來追求這樣的目標；其中最重要的是聯合國秘書處的「婦女權益促進司」（Divis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這是秘書處轄下的一個司處。現在發展援助機構都有與婦女相關的計畫，許多協同的非政府組織也做同樣的事。如今，已經有一個與性別平等相關的國際政策機制，而且至少還有一個廣為人知的政策文件，即《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國際媒體 多國媒體企業以非常龐大的規模傳銷電影、錄影帶、音樂和新聞，也有一些比較分散不集中的媒體（郵政、電報、電話、傳真、網際網路、網站）及其支援產業；這些媒體內部都包含性別配置，傳佈性別意義。比較新型態的媒體及其應用，如以網路為基礎的市場行銷，也快速成長，遍及全世界。

有些評論家認為這是性別變革的新戰線，尤其是網路，提供了無窮的機會，可以大玩性別意義的遊戲、重新創造自我、替自己選取新的身份等等；而像「支持厭食症」之類的網站，更是為罹患厭食症的女孩提供了一個替代日常關係的場域，也為另類體現提供了文化脈絡。

然而，這對性別關係帶來多少進步變革，則仍有爭議。網際網路充斥著色情的垃圾郵件，鼓吹極端的反動性別觀——女人被視為男性慾望與消費的物品，而男人則寄望以增大陰莖尺寸來提高自己的男性雄風。以名人文化為主要內容的國際大眾媒體，為女人提供了一個像漫畫一樣的異性戀常規，而運動節目則是從不間斷地把強調競爭與肌肉的陽剛特質。相形之下，像《酷男的異想世界》（*Queer Eye for the Straight Guy*）這樣的節目，只能稍稍偏離主流正軌，力道似乎微不足道。

電子媒體也沒有提供一個文化融合的場域。在網際網路上，英文仍是強力主宰的語言，而且大部分的文化消費也都集中在北美地區；美國市場形塑了國際新聞。不過，這裡同樣也有反抗勢力：規模龐大的印度電影工業吸引了愈來愈多的國際觀眾；也有

像半島電視台（al-Jazeera）這樣的媒體出現；中國政府（還有其他政府亦然）則試圖控制網際網路等。

全球市場 區分市場本身以及在市場中運作的個別企業，這一點很重要。國際市場——資金、商品、服務和勞動市場——都愈來愈「深入」在地經濟；這些市場通常都有嚴格的性別結構，而且現在（拜新自由主義在政治上的勝利所賜）幾乎沒有什麼規範。市場的性別化特徵成為一種社會機制，在近來的研究中逐漸浮現，在商品、能源、股票和期票交易等領域中，流露一種侵略性強、厭惡女性的文化。

我要以一段訪談記錄為例，說明這種情況。受訪者是一名澳大利亞金融公司的領導經理人，當時澳大利亞的經濟對國際資金流動「敞開大門」，而在這個環境中，她是少數真的從事金融交易工作的女性。喬伊絲（Joyce）對「交易室裡那種非常硬漢作風的文化」仍然記憶猶新——午餐的時間很長，喝很多酒，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侵略性的行為「只是場上的基本要求，是可以接受的行為，而且不只是可以接受而已，甚至期望會有這樣的行為」：

在交易室裡，哦，充斥著逞英雄的硬漢作風，是一種老千騙局型的環境，你也知道嘛，他們就是〔會說〕自己的地位有多高——就是吹牛、泡女人，那些事情。但是這些都會被原諒，因為他們賺很多錢……這會吸引某種類型的，〔喬伊絲在這種環境中如何生存呢？〕我負責期貨交易，現在期貨不吸引人了，可是〔當時〕卻是市場上最有魅力、最性感的商品，期貨交易很精密，沒有人真的了解妳在做些什麼……所以他們可能以為我是一隻綠樹蛙，但是我知道我在賺錢。所以從某種程度來說，績效表現的標

準很簡單，就是如你所願。但是整個文化非常、非常惡質……你碰到的就是那麼一群人，你也知道：他們會貼裸女海報之類的東西，還有對妳的穿著打扮、妳所做的事情指指點點。

她口中所勾勒的景象跟美國的交易員研究相去不遠（Levin 2001）。不過還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證實這是一種國際現象，但是從初期指標看來，新自由主義下的市場關係擴散，看起來不像是性別平等的典範。

在這四個場域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出一個全球性別秩序的輪廓；其中的聯結並不完美，也幾乎沒有同質性，但是這個性別次序的存在本身就有其重要性，而且在我們生活中的比重，無疑也會愈來愈重。

我在第一章提出一些統計數字，顯示全球規模的性別不平等及其毒害，但是量化指標仍然相當粗糙，幾乎沒有超過男女之別的最基本分類，但是這畢竟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情況。如果我們要寫一張明信片，向來自另外一個銀河系的生物描述二十一世紀初人類的性別正義情況，我們會怎麼說呢？

在地球這個星球上，非常有錢又有權的人，大部分都是男人；他們彼此競爭，爭取更多的財富與權力，並且動員包括男女在內的勞動力去追求這個目標。這個星球上也有很多暴力，大部分是男性引起的，而且很多都來自軍事、警察和監獄體系，這些體系幾乎清一色都是男性。婦女的平均收入大約只比男性平均收入的一半多一點點，但是在最貧窮的國家，則比一半還少一些。婦女除了愈來愈多成為有酬的勞動力之外，還得擔任這個世界上絕大部分的照護工作與無酬家務，還要負責絕大部分養育幼兒的工作。陽剛特質與陰柔特質通常就是圍繞著這些情況建構出來

的，而這個星球上的居民也無異議地接受了。若是有人違反這些廣為接受的性別特質範型就會受苦，甚至因此遇害。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家庭裡都是由男人當家，只有極少數地方是由女人作主；不過實際上，往往是經由溝通協商，才能把家務關係趨近平等。在宗教界、科學界和藝術界，大多數的權威人士是男人；在這些領域中，女人只分配到特定而通常受到侷限的角色。然而，在過去這兩個世代，全世界婦女接受教育的情況日漸提昇，在某些富裕國家，年輕女性的教育水準甚至已經超越男性；在這些國家中，婦女的平均健康情況與預期壽命都比男人要好。以全球情況而言，兩性之間權力與利益的平衡還差得很遠，但是比起前幾個世代，已經改善很多。

嗯，這張明信片還挺長的。但是，或許這給我們一個基礎，好好想想將我們帶到這裡的政治過程，而且還可能帶我們到更遠的地方呢！

性別政治

個人政治

一九九七年，與我相伴長達二十九年的潘·班藤（Pam Benton）死於乳癌。乳癌幾乎是女性專屬的疾病，但是治療乳癌的專科醫生大部分都是男性——澳大利亞的醫學專家多半都是男性——很自然的，他們跟這個專業裡的其他男人一樣，都有一些共同的互動態度與風格。

一開始治療時，潘經由介紹去找雪梨一位著名的腫瘤科醫生。腫瘤科是治療癌症的專科，特別是利用化療或是有毒性的藥物來對抗癌症。這位先生開宗明義就表達他的看法，他說若是女人能夠善用乳房原本的功能，就不會有這麼多麻煩。潘為之震怒，就再也不去找他了。

研究證據顯示——這位腫瘤科醫生顯然知之甚詳——年輕時就生小孩並且哺育母乳的女性，罹患乳癌的比例較低；這可以說是一個無關個人的客觀事實。（儘管是客觀事實，不過我們還是很好奇：為什麼研究人員會對這個特定問題感興趣，而不去研究環境中導致癌症發生的化學物質呢？）這位腫瘤科醫生可能是無心的假設，認為女人的「功能」就是生小孩，使得這個研究發現變成對性別的一種侮辱。對他來說，若是女人選擇不同的生活型態，那麼一切都是自食其果。

我講這段往事的用意並不是攻擊醫生，因為另外一位替潘治療的資深醫師就堪稱是視病如親的楷模；我的目的是在強調性別政治是與我們的生活多麼貼近，而且無法逃避。

有些關於權力與不平等的問題都是瑣碎俗事，像是誰來洗碗、誰倒垃圾、誰來擬購物單等等；有些問題就可能是生死交關，像是如何生小孩或是治療癌症之類的。潘積極參與婦女運動長達二十年，我們之間經歷過洗碗和其他的政治爭議，她當然看出癌症治療中的性別政治，而且不願意再度受到貶抑。

潘在例行篩檢時第一次發現腫瘤就已經是晚期，必須進行乳房切除術，也就是動手術切除整個乳房。這個手術很可怕（雖然手術本身沒有生命危險），因為會在原來乳房的位置留下一條長長的疤痕。從手術中復原之後，潘聯絡了乳房切除病患的支援服務，結果她們提供的服務主要是：安裝義乳，而且是量身打造，可以完全取代原來的乳房；還有其他女人來提供化妝和服飾諮詢，以便讓病患能夠展現出正常而有魅力的女性外在；提供家居諮詢，告訴妳如何回歸正常的家庭生活，如何克服丈夫對殘缺身體的反感，如何處理孩子們對於母親要離開人世的焦慮等。

這也是一種政治。這是讓婦女回歸異性戀女性特質的政治，是否認所謂的「正常」已經被撕裂的政治，同時也是要女性為其他人情緒需求負責的政治——至少也回復女性為男人提供正常服務的政治。

但是這個政治在情感的最底層運作，除非你／妳已經對性別議題瞭若指掌，否則幾乎是難以察覺。很多女人為家庭奉獻一生，而且一輩子堅持到底；意識到要擁有一副傲人或者至少還算體面的身體，是澳大利亞文化中建構女性特質的重要成份，即使女人剛動過重大手術而驚魂未定，或是發現自己罹患絕症而惶惶不安，都無法反抗這種刻板印象，特別是由其他女人以照護的形式呈現的刻板印象。

性別政治幾乎永遠都包括較大的社會關係以及比較貼近的個人層面，這也是很多女人和男人對性別改變感到害怕的原因之一。迫在眉睫的改變不但顛覆了無關個人的文化與體制配置，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顛覆了個人所珍視的形象、對人際關係的假設與日常行為的社會體現與習慣。

對我來說，潘的經驗就非常貼近。可是性別的個人政治卻到處都可以看到，因此我要舉幾個發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例子。其中一個發生在中美洲的哥斯大黎加，是蘇珊·曼儂（Susan Mannon 2006）講述的故事。哥斯大黎加是香蕉與咖啡的出口國，受到價格波動的影響甚劇；一九八〇年代的中美洲債務危機，使得這個國家發生了新自由主義的重組，很多男性失業。曼儂在一個都會區訪問了幾對中產階級夫妻，並且特別提出一對名叫西莉亞與安東尼歐的夫妻，他／她們就一起經歷過這些事件。

他／她們的家庭原本是以男主外／女主內為基礎，但是這個基礎並不穩固，因為安東尼歐是在政府部門任職的非技術性勞工；這種傳統的性別分工並沒有強加在西莉亞的身上，她本身也主動參與並創造了家庭角色的劃分。經濟需求促成性別變革；在通貨膨脹的影響之下，西莉亞跟其他已婚婦女一樣，回到金錢經濟。一開始，她將家裡的一個房間租出去——實際上等於是將她的家務商品化。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明確的男主外／女主內區分開始模糊，因為西莉亞的勞務擴張了——而非安東尼歐，因為他並沒有在家裡幫忙家務，只不過在周遭社會的父權常態支持之下，他仍然掌握了家中的權威，西莉亞也沒有利用她新得到的經濟力量去跟他討價還價。對她來說，太過嚴重的挑戰可能會干擾到男人的社會地位，而她也實際上在保護這樣的傳統。耐心與愛情終於勝出。

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是印度的一省，當地的愛滋病感染率相當高。這是在二〇〇〇年代初期發現的事，隨後就採取了

各種公共衛生補強措施；其中一個是在當地性工作者發起了有活動力的組織計畫，叫做「轉變計畫」（Project Parivartan），參與者多半來自勞工階級、低下階級的婦女，她們都是社會的邊緣人，性別不平等已經根深蒂固，而性工作本身更是早被污名化。因此，權力差距非常懸殊，這也反映在性交易上，因為通常是享有特權的男性顧客決定要不要使用保險套。

一份計畫報告書（George and Blankenship 2007）中提到，參與「轉變計畫」的人為了保護自己不受感染而堅持使用保險套的經驗。其中一個案例是，當客人在街上挑選了性工作者，並且先付了錢之後，她將他帶到出租的房間，到了那裡之後，他拒絕使用保險套，接著兩人為了錢的事情發生爭執，最後那名客人「威脅要大聲嚷嚷，把鄰居都吵醒，讓房東蒙羞」。這樣的威脅非常有效，因為這等於是揭發那個女人是性工作者的事實，破壞了她賴以維生的配置。就連用不用保險套這麼基本的改變，都可以引發激烈的抗爭。

我們在第二章談到了蘇聯與後蘇聯時期的俄羅斯對性別認知的改變。安娜·譚綺娜（Anna Temkina 2008）為聖彼得堡的中產階級婦女撰寫生命史，進一步探索這個故事；在她們的故事中，可以找到不同的性「腳本」。在蘇聯時期長大的婦女，她們的生命都受到婚姻的安排，通常讓她們在故事中處於被動的地位，將自己形容成男性慾望的目標——完全合乎蘇維埃的性別意識型態。簡單地說，譚綺娜發現，她們的性生活都受到他人及周遭環境的宰制。

可是，年輕婦女的故事大部分都不是這個樣子；她們在一九九〇年代的紛擾不安中長大成人，生活在新資本主義體制之下。這些婦女形容自己享有性生活中的動能，比較傾向於強調追求自己的歡愉，或是利用性來賺取利益，例如跟男人打交道討價還價。但是她們仍然受到箝制。由於有限的蘇維埃婦女解放遭

到挫敗，一種新的傳統性別意識型態逐漸浮出柙面，建構出新的公共父權制。話雖如此，二〇〇〇年代的婦女在性、避孕與關係等各個層面，還是可以有比較覺醒的抉擇，也比較傾向於認為她們身為女性的生命是一種計畫，而非宿命。

婦女解放運動喊出來的口號：「個人即政治」，實在是很有道理，到現在仍是如此。我們生活中最親密的關係與抉擇，其實都牽涉到性別政治。其中的抗爭不因為社會上的大動作而受到影響；因為牽涉到的問題太雜、改變的代價也可能太高，有時候甚至讓人覺得乾脆就算了吧。可是在這種私密層次的政治之上，永遠都有更公共層次的政治，那就不能隨便放棄了。

公共政治：運動與體制

過去常常以為政治運動是直接表達一種潛在的利益或群體認同，因此政治運動只是代表某個階級、性別或國家。如果不是這樣，那麼這些運動也應該如此——而且實際上也是如此——以為只要解決一點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的小問題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認知到政治過程牽涉到的複雜性，也知道語言和符號不只是反映，同時也建構認同、協助創造運動。然而，以為利益只是純粹經由論述建構的假設，或反之以為論述只是純粹受到利益的建構，兩者都同樣錯得離譜；這等於是讓社會生活的某一個面向凌駕其他所有面向之上。性別政治運動確實遵循社會區分與利益的大綱，在權力關係、經濟關係、情感關係和論述中都有明確的定義。整體而言，要求改變父權性別秩序的運動都是從婦女或是邊緣化的男性族群中發動的；整體而言，捍衛父權體制的多半是男人或相對享有特權的婦女。

歷史上最重要的性別政治運動就是女性主義。我在本書稍早

已經討論太多的女性主義，所以這裡我就不再贅言；但是我必須說：並不是所有的婦女運動都是女性主義運動。拉卡·雷（Raka Ray 1999）在研究印度的婦女政府時，提出了一個典型的範例。長期在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執政的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成立了一個婦女組織，名為「PBGMS」（Paschim Banga Ganatantrik Mahila Samiti），其主要功能是執行由男性主宰的黨中央所發佈下來的官方路線——該路線堅持勞工階級的男女之間必須團結，完全沒有強調婦女專屬的利益；結果在該地區的婦女雖然努力促進婦女經濟與推展婦女教育，但是卻完全避開任何影射到直接挑戰男性的議題，比方說，將家庭暴力變成一個公共議題——儘管這是全印度女性主義者都關注的問題。

當然，這也不是印度特有的現象。舉例來說，在戰後日本，婦女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婦女獲得投票權，在一九五〇和六〇年代是重要的票倉。可是誠如田中和子（Kazuko Tanaka 1977）的研究指出，男性政黨成立婦女附屬團體，納編了這個票倉，另外還有以國家為基礎的大型婦女組織，聯合起來變成一個大規模的婦女組織；但是這些組織都跟父權制的政治體系綁在一起。等到婦女解放運動到來，就代表跟過去的絕裂。與歐美的情況一樣，要求婦女組織的自治成了重要的里程碑——此後，現代性別政治於焉成形。

在美國幾乎同一時間出現的同性戀解放運動，結合了個人與結構的層面，也同樣牽涉到組織自治；公開的示威活動製造了類似的歡樂感和共同意識；但是不論是男同志或女同志的運動，都還牽涉到另外一個面向，即「出櫃」（coming out）過程。對自己、自己的家人、朋友、工作夥伴承認自己是同性戀，可能是一件艱鉅的工作，過程往往延宕費時，而且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重新調適與安排。而個人的出櫃過程與支持，更促成了建立共同社群，文化中的認同與政經生活中的現身（presence）等集體性過程。

同志政治中還多了一層複雜性，因為性別區分剛好在其中。女同性戀者與男同性戀者，不屬於相同的社會情況，甚至也不屬於相同的政治情況——在很多國家雖然立法將男性之間的同性戀行為視為犯罪，但是卻完全忽略了女人；有些男同志運動的基進人士也是一樣。同志解放運動基本上是男人的運動，雖然開啟這個運動的象徵行動——一九六九年在紐約石牆酒吧（Stonewall）發生的反警察暴動——是由變性和易裝偏好的性工作者所主導的。在同性戀政治中，女同志的代表性引發的緊張關係一直持續存在。

同志解放運動出現十年之後，男同性戀政治受到愛滋病蔓延的影響開始轉型：一方面要重新建構與醫生、國家之間的全套關係；另一方面，對同性戀有恐懼症的宗教領袖、政治人物與媒體煽動出一種對疾病感染、污染與不潔充滿惡意的符號政治學（symbolic politics），這個問題也必須解決；而且這兩個問題都必須在疾病、死別與恐懼的環境中解決。都會中的同志社群非但熬過了這個可怕的危機，同時還演化出新的因應方式與社區教育方法，創立了愛滋病支援團體和「安全性行為」的策略（Kippax, Connell, Dowsett and Crawford 1993）；至於在貧窮國家，與男性發生性行為的男性——愛滋病研究與運動人士發想出一個彆扭的縮寫名詞叫做「MSM」（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用以涵括許多不同的情境與認同——不但缺乏經濟資源，甚至還要面對有同性戀恐懼症的政府。在非洲，這個問題格外嚴重，因為當地愛滋病感染與疫情成了政府最大的負擔；隨便舉兩個例子來說，像塞內加爾與辛巴威政府就把這個負擔歸咎於同性戀男人，並且予以迫害——結果反而阻礙了愛滋病防治工作。

儘管有一些恐同的運動，但是愛滋病運動人士面臨的主要障礙並不是運動，而是一種體制化的結構，利用既有的權力追求性別政治——這也是女性主義面臨的主要反對勢力。

當然，也有一些運動是擺明了反對女性主義，例如在美國曾經出現一個名字取得很好聽的運動，叫做「想做女人的女人」（Women Who Want to be Women）；還有仍然存在加拿大的「真女人」（REAL Women）等；另外，在很多國家還有一些爭取「父親權利」的小團體，也對女性主義極不友善，指稱離婚法庭歧視男人；不過反女性主義運動中最成功的運動，莫過於反墮胎運動，這個運動通常吸引很多強硬派的教會人士，恐嚇提供墮胎的醫療診所，最後還透過美國政府，控制了很多國際性的援助計畫。

然而，即使能夠做到這一點，也得仰賴受到右派控制的美國國家機器。國際間壓抑婦女生殖權的最大勢力，始終都是天主教會。誠如馬拉·胡圖（2003）的研究明確指出，由於教會勢力的堅持不肯妥協，導致上個世代在拉丁美洲各國的墮胎權改革運動功虧一簣。（而完全能夠預期的結果，正是有錢的婦女可以得到安全的墮胎，而貧窮婦女則沒有）。

整體而言，捍衛父權制度的性別秩序，並不全然需要男人之間的社會運動；只要透過前面幾章提過的一些父權機構正常運作，如國家、企業、媒體、宗教科層組織等，即可以達成這個目的。其中當然有政治目的：世界上大多數的大眾媒體都始終反對女性主義，有些媒體特別嚴重（如梅鐸的媒體帝國）；不過這樣的政治目的幾乎不需要明確說出來，只要透過日常運作就已然足矣。

以本來就是父權機構的軍隊為例，法蘭克·巴瑞特（Frank Barrett 1996）曾經針對海軍軍官訓練中的性別範型做過一次有趣的研究，他發現一種壓抑但是有效的性別體制——強調競爭、強壯的體能、服從性與菁英團隊意識——這種體制製造出定義狹隘的霸權陽剛特質（hegemonic masculinity），因此在女性依據「平等機會」原則加入美國海軍之後，這樣的性別體制就對女性受訓

學員形成嚴重的問題。這樣的訓練體制將個人的價值感與強調暴力的組織需求結合在一起，藉以達成訓練的目標。前文曾經討論過的辛克萊－韋伯（2000）在土耳其軍隊所做的研究，露絲·西佛特（Ruth Seifert 1993）在德國軍隊所做的研究，還有在其他國家的研究中，也都發現類似的範型。

並非所有的男人都支持捍衛父權體制。辛克萊－韋伯的研究顯示，在實施義務役的地方，甚至有反對軍事訓練的抵抗。在上個世代中，最有意思的一種性別政治型態，要算是異性戀男人之間出現的性別平等運動（在美國就是所謂的「支持女性主義」的男人）；這一類的運動大部分的規模都很小，成效也侷限在區域性。蒂娜·施德莉絲（Tina Sideris 2005）在研究中描述了出現在南非的一個這類型的運動；自從南非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之後，就有公開的性別平等原則，但是與長期存在而且通常帶有暴力性質的在地父權制度，處於一種緊張關係。施德莉絲在南非靠近莫三比克邊界的恩克馬茲（Nkomazi）鄉間地區，訪問了一群男人，他們嚐試在生活中實施比較尊重女性與性別平等的方式。這些男人都是已婚，有小孩，而且能夠重新協調家庭中的勞務性別分工，採行非暴力的手段；不過他們卻覺得難以改變身為一家之主的陽剛特質涵義——在這個性別體制中，權力面向似乎最難改變。

那是一種非正式的運動；至於在其他地方，男人之間的性別平等政治，則是比較有組織的運動。比方說，我曾經看過由印度的四個非政府組織共同製作出版的一本《教員手冊》（*Trainer's Manual*），是專為男人與男孩的轉變課程所準備的教材；這份精心設計的資料包括許多專題單元，如平等、性別本身、性、暴力與促進技巧等，內容非常實用，顯然是從對男性與女性實施宣導的經驗中，有組織萃取出來的經驗談；我在其他國家（包括我自己的國家）看過一些針對男孩和年輕男性設計的教育課程內容，

都和這份手冊所涵蓋的內容相去不遠。

最後，我應該提醒一下，就是在那些並不是明確地以性別或性為基礎的社會運動中，也會發生性別政治的問題；妮娜·蘿莉（2005）以一九九九年到二〇〇〇年之間在玻利維亞的科查班巴（Cochabamba）所發生的「水源戰爭」（water wars）為例，就點明了這一點。在這場知名的抗爭之間，在地的運動竟然戰勝了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政府與國際性企業聯手，企圖將水源供應私有化的政策；這個運動的領導人立刻成了名揚國際的英雄人物。而蘿莉則注意到這個抗爭的過程中，無論在使用的語言或是主體性上，都充斥著陽剛特質風格之間的對抗——新自由主義的現代化人士、邊緣化的在地工程師、原住民或拉丁民族與印地安原住民混血的組織工作者——結果卻出人意表的擊敗了跨國企業主管。如果回溯歷史，再早一點同樣的情況也曾經一再發生：在殖民解放運動中、在工會運動中、在種族認同運動中，都一再歌頌英雄的男性特質，卻坐視婦女的邊緣化。

利害關係：父權紅利、性別傷害與性別好處

性別到底有什麼政治可言？在婦女解放運動的基礎教材《性政治》（*Sexual Politics* 1972:23）一書中，凱特·米莉（Kate Millett）對「政治」的定義是「一種權力結構關係，某一群人藉以控制另一群人的安排」。不過她的主張會如此遭人非議的原因，是因為她把這個定義應用在男女之間的關係。

權力只是性別不平等的一種形式而已，這一點在本書的分析中愈來愈清晰。不平等存在的範圍甚廣：從收入、財富到社會榮譽和文化權威；不平等造就了利益衝突（無論這樣的利益有沒有明說），因為不平等而受益的一方，會為了既得利益維護這種不

平等，而受害的一方則為了爭取自己沒有得到的利益，而要求終止這種不平等。

性別不平等（gender inequalities）的表現方式，通常都是女性相對於男性的資源匱乏，例如我在第一章引用的數據，顯示全球婦女的平均所得只有男性的56%；儘管這種以資訊數據呈現性別不平等的方式，有助於建立性別改革的正當性，但是卻陷入了舊有的窠臼：以相對於男性的關係來定義女性。我們應該把這個算式倒過來，看看男性擁有的過剩資源有多少，因此，同樣的數據就有不同的呈現方式，顯示全球男性的平均收入是女性的179%。

這種多出來的盈餘，我稱之為父權紅利（patriarchal dividend）：即男性整體藉由維繫不平等性別秩序所獲得的利益。金錢上的利益並不是唯一的利益，其他還包括：權威、尊重、服務、安全、房舍供給、進入體制權力的門路、控制自我生活的權力等等。當然，整體性別平等的情況有所改善，這種父權紅利就會相對減少。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這種父權紅利是由全體男性共同受惠；有些人獲得的利益比別人多，有些人比別人少，還有一些人甚至完全沒有分配到這種紅利，端視他們在社會秩序中的位階而定。在先進的資本主義中，男性富商就可以從性別化的財富累積過程中獲取大筆紅利。以全球規模來看，這種紅利幾乎可以是天文數字——以二〇〇七年全球最富有的三個人為例：比爾·蓋茲（Bill Gates）有五百六十億美元；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有五百二十億美元；卡洛斯·史林姆·荷盧（Carlos Slim Helú）有四百九十億美元——反之，失業的勞工階級男性卻完全沒有任何經濟上的父權紅利。特定族群的男性可能乾脆被排除在獲得部分的父權紅利之外，因此在世界上大多數的地方，男同性戀者就無法獲得一般男性（即擁有霸權陽剛特質的那些男人）的權威或尊重；雖然他們或許可能享受到一般男性的經濟優勢，這

情況經常在富有國家出現。

有些女人也可以瓜分一些父權紅利——通常是因為嫁給有錢的男人——這些女人可以從性別化的累積過程中獲得紅利，即靠著其他婦女低薪或是無酬的勞力所產生的利潤生活。

想想在富有國家，甚至中等收入的國家，有多少婦女能從在她們家中幫忙家務的婦女身上直接獲利；而這些為人幫傭的婦女經常都來自弱勢的族群，例如在美國的黑人婦女或是拉丁美洲婦女。其實，世界上已經演化出一種家務勞動的多方國際交易，例如：現今有大量的菲律賓婦女在東亞和南亞的中產階級家庭裡幫傭，還有從東歐的摩達維亞（Moldava）赴土耳其幫傭的婦女（Chang and Ling 2000, Keough 2006）。這種家務勞動的轉移，讓許多中產階級的婦女可以往專業或商場事業發展，而不需要對中產階級的男性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增加分擔家務。

父權紅利是當前性別政治中最主要的利害關係，其規模之大使得父權體制成了一個值得維護的制度。一九七〇年代有一小群鼓吹性別角色改革的人試圖說服男性：婦女解放對男人也有好處——他們指出霸權陽剛特質必須付出代價，這話一點也沒有錯。但是同樣這些改革派人士卻完全低估了父權紅利，忽略了有多少男人可以從現行的性別配置中在權力、經濟優勢、同儕尊重、取得性的機會等各方面獲得利益，因此她們也就忽略了大部分男人要維護——甚至必要時要捍衛——現行性別配置可以得到的利益。

主張現行的性別配置應該改變，等於是宣稱這個配置的弊大於利。性別傷害（harm of gender）是這個不平等體系中第一個也是最首要的弊端，因為在這個體系中，成年女性和年輕女孩都遭到剝削、不受重視，而且容易淪為受虐與攻擊的目標；為數仍然眾多的家庭暴力、強暴、兒童性侵害（性侵受害者主要是女童，但是並非全然如此）等案件，就是可以輕易辨識的權力與弱點標

示。在官方的論述中，這樣的「問題」是少數男人失控所導致的行動；但是若非社會秩序在經濟、文化與情感層面有許多其他機制的交互作用，維繫著這樣的暴力與凌虐，這些問題也不會以這樣的規模出現。

性別傷害也會以特定的範型出現在性別秩序之中，因為社會集體資源賦予性別秩序一些影響世界的權力。舉個最顯著的例子，當前霸權陽剛特質儘管擁有父權紅利，但是卻充滿危險，因為這種特質為人與人之間的暴力提供了文化上的合理解釋，一旦牽涉到國家或企業層次，就會衍生出武器競賽、濫採礦源和砍伐森林、惡質的勞工關係，以及從汽車運輸到基因改造工程等各式的濫用科技。這對男人本身也有傷害，因此當陽剛特質改革者指出，男人如果不打仗就會比較安全，如果沒有競爭壓力就會比較健康，如果改善他們與婦女和小孩的關係就會活得比較好，他／她們的立論基礎其實是非常穩固的。

如果性別在這些方面是有害的，那麼在其他方面卻是歡樂、創作的泉源，也創造出其他我們非常重視的東西。性別組成了我們的性關係，是個人歡愉與成長的源頭；性別也組成了我們與孩子之間的關係，是文化歡愉與成長的源頭。性別與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豐富文化也密不可分，從日本能劇[●]到雷鬼、嘻哈流行音樂都不例外；我們很難想像莎士比亞戲劇、荷馬史詩《伊里亞德》（*Homer's Iliad*）、喬依思的《尤里西斯》（*Joyce's Ulysses*）、古波斯詩人魯米（Rumi）的詩、梵文史詩《羅摩衍那》（*Ramayana*），甚或瑞典導演伯格曼（Bergman）的電影等，如果沒有了性別，會是什麼模樣。性別關係中的愉悅、緊張與複雜性，正是文化創作最豐沛的源頭。

● 譯註：能劇是日本結合舞蹈、戲劇、音樂與詩歌的古典式舞台表演，傳統的能劇不論呈現之角色為男或女，全都由男性演員擔綱演出。不過現代能劇已有少數女性演員登台演出，其中有很多都是知名能劇演員的女兒。

近來，酷兒政治中最引人矚目的特色，就是轉換傳統軸線，重新發掘性別實踐的能量。從一九九〇年的美國直接行動團體「酷兒國度」(Queer Nation)開始，許多創意都以各種不同的形式釋放出來，性別展示、情色創新、另類體現、性別語言遊戲中的歡愉，都是非常明顯的例證。

這樣的歡愉和技能在其他空間也可以找到。比方說，在貝蕾·頌恩的小學研究（詳見第二章）中，孩童無疑是非常愉悅地在學習實踐性別；我在第六章定義的終身性別計畫，也不是一件悲傷痛苦的事，因為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個複雜而又令人心滿意足的成就。性別計畫失去完整性的時刻，處在性別迷惑中的時刻，都可能是令人極為苦惱不安的經驗。

所以我要指出，性別政治中的利害關係除了性別傷害之外，也應該包括性別價值 (value of gender)。性別政治不但可能形塑歡樂，也可能分配資源，進而打造更有創意的文化。

性別政治的本質與目的

正因為性別政治有這麼多可能的發展，所以「性別政治」不能只是理解成某個利益團體針對不平等的抗爭；從最廣泛的角度來說，性別政治事關歷史上掌握性別秩序的走向，代表著經由某種特定方式無休止地重新創造性別關係的抗爭。

這樣的定義不但包括個人生活中親密的政治，也涵蓋了大規模的體制政治。我們稱之為「陽剛特質」和「陰柔特質」的實踐，其組態形成都有政治的層面，也是一種社會抗爭。提昇意識、正規教育和心理治療，都是屬於良性的形式；學校與家庭訓誡、正面衝突的警政治安維護、監獄等，都算是利用權力試圖改造人格——而且經常在勞工階級和少數族裔男孩和年輕男性之間，引發

抗議陽剛特質的活動——因此就沒有那麼良性，卻同樣地充滿了政治意涵。至於鎖定孩童與年輕族群為目標的廣告和娛樂圈，則是屬於操控的形式。

雖然曾有過所謂的無政府的社會，而性別政治也在許多其他的領域中發生，但是國家（包含本國與國際）仍是當代世界中性別政治最重要的焦點；即使在這個新自由主義世代，高舉市場旗幟，許多公有體制都已經民營化，國家仍然是經濟中最重要的引導機制，而且在生活中的其他領域也具備了強而有力的帶頭能力，如婦女生育權就是一個例證。國家有權力對於團體、運動、體制和個人給予認可或否定，國家威權甚至可以為個人在性別秩序中的位置做權威的認定——我個人的認定就記載在新南威爾斯省政府發給的出生證明之上——同時也可以訂定規則來改變或是避免改變這個認定。

因此，國家不只是性別政治中最重要的體制內玩家，同時也握有性別政治中最多的籌碼。各種社會運動不斷試圖影響國家的行動，甚至攫取部分的國家權力，藉以導引性別秩序往它們想要的方向走。婦女運動不論以壓力團體的姿態出現，或是以聯合政府中的一份子來說，都曾經發揮過重要的影響力，在某些時候同志平權團體亦然；例如在澳大利亞，當工黨政府在二〇〇七年取代了保守的聯合政府時，就允諾改革歧視女同志與男同志伴侶的法律與法規——比方說稅務法、健康與社會保險法等——結果發現政府竟然有一百多條歧視的措施。

當我們想到在爭取性別平等時異性戀男人的參與，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國家的重要性。在這一方面，北歐國家堪稱是最進步的地區，這一點無庸置疑。歐伊斯坦·霍爾特（Øystein Holter）在《男人行不行？男人與性別平等——北歐經驗》（*Can Men Do It? Men and Gender Equality—The Nordic Experience* 2003）一書中，對此有詳細的描述。不過短短幾個世代之前，北歐國家還

是非常保守的社會，極度陽剛特質化的產業主宰大部分的經濟活動——捕魚、划木、採礦——結果形成了明確的性別分工。但是性別關係會變；現在的北歐國家，不論是公共領域的婦女代表、男性參與撫育幼兒和其他措施方向，都領先全世界。而國家在這樣的改變之中，扮演關鍵的角色，比方說提供經濟上的支援給予參與照顧年幼兒童的父親。霍爾特指出，如果周遭環境允許，而且公共政策也有所改變的話，男人確實也會跟著改變。

性別改革運動奮戰的對象，通常都相當明確——歧視的法律、性別暴力、社會壓迫等。但是他們為何而戰？最終目標又是什麼？長期來說，他們又想將社會導引到什麼方向？

前一節討論的不平等與性別傷害，在這裡就有重大的區分。許多女性主義者認為性別具有天生的不平等；實際上，他／她們將父權紅利視為性別秩序的核心，而性別傷害則在任何性別體系中都無可避免。那麼從邏輯上推論，他／她們認為性別政治的目標就是全面廢除性別；就如同我在第五章所說的，這代表性別關係中可以想見的「歷史終結」，性別關係在生殖場域周邊的影響力也將降低為零。

美國女性主義者茱蒂絲·羅勃在《打破它吧！——去性別化與女性主義的變遷》（2005）一書中，對於這個觀點有格外清晰的陳述。羅勃承認，性別無論跟其他社會結構如何的糾纏不清，「仍然具備組織化、社會化與歧視的龐大力量」，因此她認為只有兩種可能的反應：個人的反抗行動，或是去性別化的策略。她主張在家庭、職場與政治圈的全面去性別化；主張在任何發現性別的地方都全面廢除性別；主張以「無性別的世界」做為最終目標。

然而，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儘管在許多實際的情況下，去性別化不失為一個好的策略（例如受到反歧視法影響的情況），但是以此做為終極目標卻太悲觀了；因為這個目標等於認定整個人

類關係的場域都無法民主化，所以必須予以廢除。

在我看來，真正取代去性別化的策略，是性別民主（gender democracy）；這個策略尋求性別秩序的平等，而不是減縮為零。從觀念上來看，這種看法假設性別本身並沒有不平等的意涵，而世界上的性別秩序有明顯不同層次的不平等，就是支持這個假設的最佳例證。

這樣的民主是創造更公正社會的可能途徑，這一點，從很多社會抗爭確實曾經改變性別秩序，往平等的方向邁進，就可以獲得證實。剛剛提過的北歐國家公共政策領域，就是一個大規模的例證；個人親密關係的政治後來演變成芭芭拉·麗絲曼（1998）筆下的美國「平等家庭」，則是另外一個例子；普林司·唐克休在梅哈拉雅山區一手催生的村落層次經濟改革（詳見第二章），則是第三個例證。

相較於全面廢除性別，性別民主的邏輯還有幾點值得推薦。用這樣的策略比較容易保存我在前一節所說的性別好處（gender good）——許多的歡愉、豐富的文化、認同，還有其他衍生自性別秩序而受到大家重視的各種實踐；這並不代表要將生殖場域從社會結構與體制中獨立出來，而是以社會的方式，平等而且包容地重組受孕、生產、育嬰和撫養小孩的過程；同時也可以結合性別改革的邏輯，與生活中其他領域的民主抗爭之理想和實踐。我認為沒有任何一種性別改革的策略，可以輕而易舉地一蹴可及——就這一點來說，這個領域的每一個人都舉雙手贊同——但是這些策略看起來比較具有優勢。

全球規模的性別政治

一如當代性別分析，我在本書中也一再強調橫跨全世界各種

情況的多樣性，以及性別議題的全球規模。在第七章，針對全球性別秩序的分析，指出民主化抗爭的兩個跨國領域：全球機構以及不同性別秩序之間的互動。

全球機構中的民主化，在概念上非常直接，但是在實踐上有點困難；其過程與國家或地區層次的組織民主化是一樣的。以實際的狀況來說，這意味著：維持跨國企業中的平等就業機會、終止國際媒體仇視女性或是恐懼同性戀的表現、讓男女在國際論壇中都有同等的代表、創造大眾文化領域中的反歧視常模。

一股全球性的改變動能其實已經存在。在國際性的會議中，已經出現女性主義運動（Stienstra 2000）；這個成果有一部分是經由官方的外交代表團，不過絕大部分都要歸功於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簡稱NGOs）的不斷努力——現在非政府組織也是聯合國活動中獲得認可的一個參與類別——他們與某些國際組織的婦女單位或部門互動，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也透過聯合國婦女權益促進司來協調統合這些活動。此外，在國際間也有一些男女同志的運動，尤其是在人權機構以及聯合國全球防治愛滋病計畫（UN Global Programme on AIDS）。

這些社會動力已經將一些性別關係的議題置於外交或國際組織的議程。早在一九四六年，聯合國就已經成立了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一九四八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第二條，也明文禁止以性別、種族和宗教等為理由的歧視，隨後又有一些關於婦女權益的特定條約，最高峰則是一九七九年通過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在國際組織中爭取男性支持性別平等，人權議題遠比「男性運動」重要的多——有了這些支持才能創造出婦女團體運作的空間。

這些壓力所形成的最重要結果，則是發展議題。從一九四〇

年代到一九六〇年代之間，成立了一個全球性的援助開發機構（這是受到冷戰政治的驅使，也受到冷戰政治的扭曲），從很早開始就已經認同改善女童與婦女的識字率、技能和知識，是邁向開發與「現代化」的關鍵（特別在那個年代，現代化是全球一致接受的目標）；於是在世界上的大多數地區，龐大的社會資源投入女童的基礎教育，以及鄉村和勞工階級婦女的成人識字班。長此以往，這樣的努力延續了性別平等的邏輯，進一步推展到中等及高等教育，直到現在都還相當活躍。二〇〇〇年通過的聯合國千禧年發展計畫（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的目標之一，就是提昇性別平等，增加婦女的自主權；而更明確的指標，則是在二〇一五年之前，徹底消弭教育領域所有層次的性別不平等。

除了教育議題之外，還有一個經濟援助議題，經由改善人力資本的概念，與教育議題連結；透過世界銀行（World Bank）這樣的機構，以及富國與窮國政府之間的雙邊援助，贊助資金，提供「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所需的基礎建設、機器、肥料、種子和其他經濟成長方法。不久之後，女性主義者就發現，不但掌控這些援助計畫的都是男人，而且大部分的利益也都歸男人所有，女人的生活反倒時常遭到擾亂。因此應運而生的則是「開發中的女人」（Women in Development）議題，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對這些援助機構施加壓力，將部分資金導向受援助國家中的婦女，並且正式承認現行開發策略對婦女造成的後果。

到了一九九〇年代，這個議題發生了重大的論戰。有些人主張，把焦點單獨放在女性身上是無效的，如果要達成性別平等，男性也要成為改變的因子；於是他／她們提出了「性別與發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策略取代「開發中的女人」。不過也有人認為，在這個全球開發議題上，女性只有在這個部分已經實際上鞏固了權力，如果引進男性，可能會強化父權體制，而不是挑戰父權體制。（White 2000, Chant and Gutmann 2002）

其他領域也發生了類似的論辯，因為「性別主流」(gender mainstream)的觀念遍及歐盟與聯合國，所以研究男性在性別平等過程中扮演的特定角色，就變得非常重要。一九九五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婦女大會(Beijing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只是非常概略地提到了這個問題；直到一九九〇年代末和二〇〇〇年代初，聯合國論壇才開始正視這個問題。而最後的高潮，則是婦女地位委員會在二〇〇四年的會議中，通過了一份政策文件《男人與男童在達成性別平等中的角色》(*The role of men and boys in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這是有關這個問題第一份全面的國際性條約(Connell 2005)；我們將在未來十年內觀察是否有成效。

現在已經很清楚，相較於整體問題的規模，在全球推動性別民主化的力量仍嫌薄弱，對於跨國企業和全球市場的影響力仍然太小，即使這些跨國企業的總公司遵守反歧視的法律，也無法阻止它們在全球勞動力上實施明顯的性別分工；跨國企業全球蒐尋廉價勞力的特性，導致它們及其地區供應商剝削在產業界處於弱勢地位的許多女性勞工。在工會組織受到打壓，或是政府為了吸引國際資金而成立的自由貿易區或特別發展區，這種情況格外嚴重(Marchand and Runyan 2000)。

即使在聯合國體系中，也缺乏推動改革的統合力量。世界婦女大會是宣示全球性別改革議題的關鍵，但是與會各國代表團中，有些來自保守的天主教政府，有些來自保守的穆斯林政府，都積極反對性別平等；因此在這些會議中都可以看到針對如墮胎、避孕或女同性戀等議題產生激烈衝突。一九九五年，在北京舉行的會議中，甚至連「性別」的觀念都受到攻擊，因為右派勢力認為這個名詞是女性主義的代號(Benden and Goetz 1998)。這個大會現在已經停辦，絕大部分原因就是因為這些衝突。

這些分裂之中，有些是來自全球性別政治的第二個面向：即不同性別秩序之間的關係。這就牽涉到比較觀念性的複雜問題。

從世界不同地區衍生出來的性別政治分歧問題，在一九八〇年代已經有廣泛討論；於是相對於全球都會的女性主義，「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的概念也應運而生。儘管男女平等可以視為現代化的一種指標，但是同時也可以視為文化帝國主義的象徵；強調婦女自治的都會女性主義形式引起部分婦女的反彈，因為那些仍然在對抗種族歧視、殖民或後殖民主宰的婦女，不願意異化社群內的男性。（Bulbeck 1988, Mohanty 1991）

在這個面向中，即使是民主議程的概念化都很困難。性別秩序之間的交互作用是來自歷史上的全球主宰系統，也就是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民主議程必須對抗從這個系統中衍生出來的不平等，即全球的「北方」與全球的「南方」之間的不平等[●]。有些婦女就是根據這一點，強烈地反對男女區隔的政治組織。

然而這就衍生出一個非常棘手的困境。殖民體系與全球化的世界經濟當然都是由男性運作，但是各地的反殖民抗爭也幾乎全都由男性領導；後殖民政權通常都是父權體制，有時候還極度仇視女性或恐懼同性戀。在後殖民政權中，在地的男性菁英經常成為都會企業剝削婦女勞力的共犯，如果沒有這種合作模式，跨國企業也不可能像現在這樣運作。在菲律賓和泰國這樣的國家，在地的男性菁英在國際色情交易中都扮演樞紐的角色；軍火走私也同樣是由控制在地軍事勢力與政府的男性，以及在都會中經營軍火製造企業的男性共謀而成的網路。

全球結構與在地性別秩序之間的交互作用，當然也引起變革，但是過程卻沒有那麼簡單。蘇妮亞·曼特綺諾（Sonia Montecino 2001）在研究智利的社會分化時，就提出了「緊張關

● 譯註：國際關係中所謂的「南北衝突」（North-South Conflict），係指幾乎都位於北半球的工業化富裕國家（如八大工業國），與大半位於南半球的落後開發中國家之間的爭執與糾紛（中國、印度與墨西哥雖然位在北半球，但是卻屬於「南方」國家）。

係中的認同」(identities under tension) 觀念；例如婦女對於母職的認同與投入仍然非常強烈（通常還帶有一點宗教的色彩），但是在這個以出口為導向的新經濟體內，有酬工作也成為中產階級婦女的認同基礎，這完全破壞了舊有的性別象徵意義。丹尼斯·阿特曼對於「性」也有類似的觀察：全球資本主義的交互作用已經製造出全新範圍的認同、關係範型、性社群（sexual communities）與政治過程；它們既不屬於在地文化，也不屬於都會文化，但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又兩者皆是——講得更精確一點，它們應該是屬於一種逐漸成形的全球社會秩序。

政治的形式也有很多種。在聯合國體系的女性主義往往受限於官僚制度和外交過程；而瓦倫婷·莫哈丹（Valentine Moghadam）在《全球化婦女》（*Globalizing Women* 2005）一書中所描述的跨國女性主義團體，則通常反對官僚制度，而是以非正式的網絡做為運作的基礎，但是這些團體之間在結構與任務上又各有不同：有些只針對經貿政策，有些專注於團結合作，有些則以對抗暴力和社會不平等為職志。

然而，另外一個比較複雜的則屬於認識論的層次。全球各地不同的政治運動，都牽涉到對性別議題的不同理解。我在第三章採納布貝克的論點，認為從某個角度來說，這些都不能拿來相提並論，我們無法認定其中一些論調比其他觀點更接近事實。然而，在性別政治的脈絡之中，在解決認識論的矛盾之前，我們卻不能停止，必須找到一個實際的方式繼續走下去。

或多或少，這就是在人權政治中所發生的事情。含糊模稜的一般性宣言，諸如《世界人權宣言》、《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等，都有不同的解讀方式，所幸彼此重疊的部分還足以讓許多實際的措施獲得實施——每一個措施都經過多方協商，而且經常還有衝突發生。

至於在世界不同地方，許多由下而上的女性主義運動在全球

化的努力之中，也遭遇相同的情況；儘管對於概念甚或目標都缺乏完全一致的協議，但是也可以找到彼此重疊的部分，足以採取實際的行動。瑪妮莎·德賽（Manisha Desai）在一篇名為〈跨國團結〉（Transnational solidarity）的論文中，就發現在婦女反抗新自由主義重建的運動中，有幾個共同的主題：堅持工作權、爭取更好的生活品質、愛惜自然等。收錄這篇論文的《婦女行動主義與全球化》（*Women's Activism and Globalization*, Naples and Desai 2002）一書，也同時收錄了好幾篇論文，都提供了許多婦女運動跨越國界藩籬的例子；然而，這些論文也顯示出一個廣泛的問題：其中的聯結通常都是南北關係，也就是開發中國家的團體與都會團體或機構的合作。話雖如此，「南南關係」（South-South relations）也逐漸成形，呈現出新的樣貌；二〇〇一年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Port Alegre）舉辦的第一屆「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即為一例。在性別政治中，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拉丁美洲的女性主義研究學者攜手合作，針對全南美大陸的婦女處境，提出了完整的統計數據，也為性別平等的成就程度設立了精確的指標。（Valdés and Gomáriz 1995, Valdés 2001）

最後，我要提出自己的想法——這是我對多層次意義的貢獻。在全球性別秩序中，民主行動的標準一定必須是民主永恆不變的真諦——即邁向參與、權力與尊重的平等。在全球的空間裡，同樣的標準也必須同時適用於任何性別秩序裡的關係，以及不同性別秩序之間的關係。雖然矛盾難以避免——世界婦女大會中所發生的衝突足以證明這一點，移居的國內勞工可以證明這一點，性交易證明了這一點，在恐同症陰影下的同性戀男人身處的困境也可以證明這一點——但是，進步的運動不能因為民主實踐上的困難就退出這些場域，因為反民主勢力肯定不會退縮。

誠如女性主義指出，若是沒有經過徹底的改頭換面，沒有人能夠邁向全球化。按照在全球性別政治中不斷改變的性別動力，

有關性別的知識必須一再自我檢討。倘若有如此強烈的學習意願，我相信性別理論與研究可望在建構更民主的世界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參考書目

- Achebe, Chinua. 1958. *Things Fall Apart*. London: Heinemann.
- Adler, Alfred. [1927] 1992. *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 trans. C. Brett. Oxford: Oneworld.
- Alsop, Rachel, Annette Fitzsimons and Kathleen Lennon. 2002. *Theorizing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 Altman, Dennis. 1972. *Homosexual: Oppression and Liberation*. Sydney: Angus & Robertson. 2001. *Global Sex*.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mpofo, Akosua Adomako, Josephine Beoku-Betts, Wairimu Ngaruiya Njambi and Mary Osirim. 2004.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in English-speaking sub-Saharan Africa: a review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Gender & Society* 18: 685–714.
- Arnfred, Signe. 2003. 'African gender research: a view from the North', *CODESRIA Bulletin*, 2003 no. 1: 6–9.
- Arnot, Madeleine, Miriam David and Gaby Weiner. 1999. *Closing the Gender Gap: Postwar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 Bakare-Yusuf, Bibi. 2003. '“Yorubas don't do gender”: a critical review of Oyeronke Oyewumi's *The Invention of Women: Making an African Sense of Western Gender Discourses*'. *African Identities* 1: 121–43.
- Balandier, Georges. [1955] 1970. *The Sociology of Black Africa: Social Dynamics in Central Africa*. London: André Deutsch.
- Balme, Jane and Sandra Bowdler. 2006. 'Spear and digging stick: the origin of gende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colonization of new continents', *Journal of Social Archaeology* 6, 3: 379–401.
- Banner, Lois W. 1983. *American Beau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arbieri, Teresita de. 1992. 'Sobre la categoría género. Una introducción teóricometodológica' ['On the category of gender: a theoretical-methodological introduction'], *Revista Interamericana de Sociología* 6: 147–78.
- Barrett, Frank J. 1996. 'Gender strategies of women naval officers', in *Women'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stitute: Conference on Women in Uniformed Services*. Washington, DC.
- Bauer, Robin, Josch Hoenes and Volker Woltersdorff, eds. 2007. *Unbesch-*

- reiblich Männlich: Heteronormativitätskritische Perspektiven*. Hamburg: Mönnerschwarm.
- Beauvoir, Simone de. [1949] 1972. *The Second Sex*. Harmondsworth: Penguin.
- Bebel, August. [1879] 1971. *Women under Socialism [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Bell, Diane. 1983. *Daughters of the Dreaming*. Melbourne: McPhee Gribble, Allen & Unwin.
- Bem, Sandra L. 1974. 'The measurement of psychological androgyn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2: 155–62.
- Benden, Sally, and Anne-Marie Goetz. 1998. 'Who needs [sex] when you can have [gender]? Conflicting discourses on gender at Beijing', in *Feminist Visions of Development: Gender, Analysis and Policy*, ed. C. Jackson and R. Pearson. London: Routledge.
- Bettencourt, B. Ann, and Norman Miller. 1996. 'Gender differences in aggression as a function of provocation: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9: 422–7.
- Bhaskaran, Suparna. 2004. *Made in India: Decolonizations, Queer Sexualities, Trans/national Projec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Blamires, Alcuin, ed. 1992. *Woman Defamed and Woman Defended: An Anthology of Medieval Tex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Borchorst, Anette, and Birte Siim. 2002. 'The women-friendly welfare states revisited', *NORA* 10: 90–8.
- Bottomley, Gillian. 1992. *From Another Place: Mig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lbeck, Chilla. 1988. *One World Women's Movement*. London: Pluto Press.
1997. *Living Feminism: The Impact of the Women's Movement on Three Generations of Australian Wom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Re-orienting Western Feminisms: Women's Diversity in a Postcolonial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rton, Clare. 1987. 'Merit and gender: organisations and the mobilisation of masculine bias', *Australi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2: 424–35.
-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Calif a, Patrick. 2003. *Sex Changes: The Politics of Transgenderism*. San Francisco: Cleis Press.
- Caplan, Pat, ed. 1987.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Sexuality*. London: Tavistock.
- Chang, Kimberly A., and L. H. M. Ling. 2000. 'Globalization and its intimate

- other: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pp. 27–43 in Marianne H. Marchand and Anne Sisson Runyan, eds., *Gender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London: Routledge.
- Chant, Sylvia, and Matthew C. Gutmann. 2002. '“Men-streaming” gender? Questions for gender and development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2: 269–82.
- Chapkis, Wendy. 1997. *Live Sex Acts: Women Performing Erotic Labor*. New York: Routledge.
- Chiland, Colette. 2003. *Transsexualism: Illusion and Reality*. London: Continuum.
- Chodorow, Nancy. 1978.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Femininities, Masculinities, Sexualities: Freud and Beyond*. Lexington,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Chopra, Radhika, ed. 2007. *Reframing Masculinities: Narrating the Supportive Practices of Men*.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Private.
- Cockburn, Cynthia. 1983. *Brothers: Male Dominanc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London: Pluto Press.
- Collinson, David, David Knights and Margaret Collinson. 1990. *Managing to Discriminate*. London: Routledge.
- Comte, Auguste. [1851–4] 1875–7. *System of Positive Polity, or, Treatise on Sociology*. London: Longman, Green.
- Connell, Raewyn. 1987. *Gender and Power: Society, the Person and Sexu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1995. *Masculinities*. Cambridge: Polity.
2000. *The Men and the Boys*. Cambridge: Polity.
2005. 'Change among the gatekeepers: men, masculinities, and gender equality in the global arena', *Signs* 30: 1801–25.
2006. 'Glass ceilings or gendered institutions? Mapping the gender regimes of public sector worksit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6: 837–49.
2007. *Southern Theory: The Global Dynamics of Knowledge i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Polity.
- Connell, R., and James W. Messerschmidt. 2005.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Gender and Society* 19: 829–59.
- Connell, R., T. Schofield, L. Walker et al. 1999. *Men's Health: A Research Agenda and Background Report*. Canberra: Commonwealth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d Care.
- Connell, R., and Julian Wood. 2005. 'Globalization and business masculinities', *Men and Masculinities* 7: 347–64.

- Cummings, Katherine. 1992. *Katherine's Diary: The Story of a Transsexual*. Melbourne: Heinemann.
- Cupples, Julie. 2005. 'Love and money in an age of neoliberalism: gender, work, and single motherhood in postrevolutionary Nicaragu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7: 305–22.
- Daly, Mary. 1978. *Gyn/Ecology: The Metaethics of Radical Feminism*. Boston: Beacon Press.
- Darwin, Charles. [1859] 1928. *The Origin of Species*. London: Dent.
- Das, Veena. 1995. *Critical Events: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Contemporary Ind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vidoff, Leonore, and Catherine Hall. 1987. *Family Fortunes: Men &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1850*. London: Hutchinson.
- Davies, Bronwyn. 1993. *Shards of Glass: Children Reading and Writing beyond Gendered Identities*. Sydney: Allen & Unwin.
- Degler, Carl N. 1990. 'Darwinians confront gender: or, there is more to it than history', pp. 33–45 in D. L. Rhode, e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Sexual Differ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elphy, Christine. 1970. 'The main enemy'. Translated in *Close to Home: 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 London: Hutchinson.
1984. *Close to Home: 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s Oppression*. London: Hutchinson.
- Derrida, Jacques. [1967] 1976.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Donaldson, Mike. 1991. *Time of our Lives: Labour and Love in the Working Class*. Sydney: Allen & Unwin.
- Donaldson, Mike, and Scott Poynting. 2007. *Ruling Class Men: Money, Sex, Power*. Bern: Peter Lang.
- Dowsett, Gary W. 1996. *Practicing Desire: Homosexual Sex in the Era of AID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Some considerations on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the context of AIDS', *Reproductive Health Matters* 11: 21–9.
- Dull, Diana, and Candace West. 1991. 'Accounting for cosmetic surgery: the accomplishment of gender', *Social Problems* 38: 54–70.
- Dunne, Gillian A. 1997. *Lesbian Lifestyles: Women's Work and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Basingstoke: Macmillan.
- Eagly, Alice H. 1987. *Sex Differences in Social Behavior: A Social-Role Interpretation*. Hillside, NJ: Lawrence Erlbaum.
- Eisenstein, Hester. 1996. *Inside Agitators: Australian Femocrats and the State*. Sydney: Allen & Unwin.

- Ellis, Havelock. 1928.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vol. VII: *Eonism and other Supplementary Studies*. Philadelphia: F. A. Davis.
- Engels, Friedrich. [1884] 1970.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pp. 191–334 in *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Enloe, Cynthia. 1990.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pstein, Cynthia Fuchs. 1988. *Deceptive Distinctions: Sex, Gender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Great divides: the cultural, cognitive, and social bases of the global subordination of wom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2: 1–22.
- Erikson, Erik H. 1950. *Childhood and Society*. London: Imago.
- Essen, Mineke van. 2000. 'Gender in beweging: over pedagogiek en sekse in de Lichamelijke Opvoeding van de Twintigste EEUW,' *Tijdschrift voor Gender-studies* 3: 25–35.
- Fairweather, Hugh. 1976. 'Sex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 *Cognition* 4: 231–80.
- Fausto-Sterling, Anne. 2000. *Sexing the Body: Gender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Ferguson, Ann Arnett. 2000. *Bad Boys: Public Schools in the Making of Black Masculinit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Firestone, Shulamith. 1971. *The Dialectic of Sex*. London: Paladin.
- Foley, Douglas. 1990. *Learning Capitalist Culture: Deep in the Heart of Teja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Foucault, Michel.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 Fox, Loren. 2003. *Enron: The Rise and Fall*. Hoboken: Wiley.
- Franzway, Suzanne. 2000. *Sexual Politics and Greedy Institutions*. Sydney: Pluto Press.
- Fraser, Nancy. 1989.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an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Fregoso, Rosa Linda. 1993. *The Bronze Screen: Chicana and Chicano Film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Freud, Sigmund. [1900] 1953.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n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vols. IV–V. London: Hogarth.
- [1905] 1953.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in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vol. VII. London: Hogarth.
- [1911] 1958. 'Psycho-analytic notes on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 of paranoia (dementia paranoides),' in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 vol. XII. London: Hogarth.
- [1930] 1961.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n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vol. XXI. London: Hogarth.
- Frosh, Stephen, Ann Phoenix and Rob Pattman. 2002. *Young Masculinities: Understanding Boy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Basingstoke: Palgrave.
- Garber, Marjorie. 1992. *Vested Interests: Cross-Dressing and Cultural Anxiety*. New York: Routledge.
- García Canclini, Néstor. 1999. *La globalización imaginada*. Buenos Aires: Paidós.
- Gauthier, Xavière. 1981.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women's writing?', pp. 161–4 in Elaine Marks and Isabelle de Courtivron, eds., *New French Feminisms: An Anthology*. London: Harvester.
- Geary, David C. 1998. *Male, Femal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ex Differenc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George, Annie, and Kim Blankenship. 2007. 'Challenging masculine privilege: an unintended outcome of HIV prevention and sex worker empowerment interven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Politicising Masculinities: Beyond the Personal' conference, Dakar, October 2007.
- Gherardi, Silva, and Barbara Poggio. 2001. 'Creating and recreating gender order in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36: 245–59.
- Ghoussoub, Mai. 2000. 'Chewing gum, insatiable women and foreign enemies: male fears and the Arab media', pp. 227–35 in Mai Ghoussoub and Emma Sinclair-Webb, eds., *Imagined Masculinities: Male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Saqi Books.
- Ghoussoub, Mai, and Emma Sinclair-Webb, eds., 2000. *Imagined Masculinities: Male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Saqi Books.
- Gierycz, Dorota. 1999. 'Women in decision-making: can we change the status quo?', pp. 19–30 in I. Breines, D. Gierycz and B. A. Reardon, eds., *Towards a Woman's Agenda for a Culture of Peace*. Paris: UNESCO.
- Gilligan, Carol.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lass Ceiling Commission. 1995. *A Solid Investment: Making Full Use of the Nation's Human Capital. Recommendations*. Washington, DC: Federal Glass Ceiling Commission.
- Glucksmann, Miriam [writing as Ruth Cavendish]. 1982. *Women on the Lin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Glucksmann, Miriam. 1990. *Women Assemble: Women Workers and the New Industries in Inter-war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2000. *Cottons and Casuals: The Gendered Organisation of Labour in Time and Space*. Durham: sociology press.
- Goldberg, Steven. 1993. *Why Men Rule: A Theory of Male Dominance*. Chicago: Open Court.
- Grosz, Elizabeth. 1994. *Volatile Bodies: Towards a Corporeal Feminism*. Sydney: Allen & Unwin.
- Gutmann, Matthew C., ed. 2001. 'Men and Masculinities in Latin America' Special issue of *Men and Masculinities* 3, 3.
- Gutmann, Matthew C., and Mara Viveros Vigoya. 2005. 'Masculinities in Latin America', pp. 114–28 in Michael S. Kimmel, Jeff Hearn and Raewyn Connell, eds., *Handbook of Studies on Men & Masculinities*. Thousand Oaks: Sage.
- Habermas, Jürgen. 1976. *Legitimation Crisis*. London: Heinemann.
- Hacker, Helen Mayer. 1957. 'The new burdens of masculinity', *Marriage and Family Living* 19: 227–33.
- Hagemann-White, Carol. 1987. 'Gendered modes of behavior – a sociological strategy for empirical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at 3rd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Congress on Women, Dublin, July 1987. Published by Berliner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Praxis.
1992. *Strategien gegen Gewalt im Geschlechterverhältnis: Bestandsanalyse und Perspektiven*. Pffafenweiler: Centaurus-Verlagsgesellschaft.
- Halpern, Diane F., and Mary L. LaMay. 2000. 'The smarter sex: a critical review of sex differences in intelligence',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12: 229–46.
- Harding, Sandra. 1986.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rper, Catherine. 2007. *Intersex*. Oxford: Berg.
- Herd, Gilbert H. 1981. *Guardians of the Flutes: Idioms of Masculinity*. New York: McGraw-Hill.
- Hill Collins, Patricia. 1991.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New York: Routledge.
-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cquenghem, Guy. [1972] 1978. *Homosexual Desire*, trans. D. Dangoor. London: Allison & Busby.
- Holland, Dorothy C., and Margaret A. Eisenhart. 1990. *Educated in Romance: Women, Achievement, and College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llway, Wendy. 1994. 'Separation, integration and difference: contradictions in a gender regime', pp. 247–69 in H. L. Radtke and J. S. Henderikus, eds., *Power/Gender*. London: Sage.
- Holter, Øystein Gullvåg. 2003. *Can Men Do It? Men and Gender Equality – the Nordic Experience*. Copenhagen: 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
2005. 'Social theories for researching men and masculinities: direct gender hierarchy and structural inequality', pp. 15–34 in Michael S. Kimmel, Jeff Hearn and Raewyn Connell, eds., *Handbook of Studies on Men and Masculinities*. Thousand Oaks: Sage.
- hooks, bell. 1984.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Hooper, Charlotte. 2000. 'Masculinities in transition: the case of globalization', pp. 59–73 in Marianne H. Marchand and Anne Sisson Runyan, eds., *Gender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London: Routledge.
- Hountondji, Paulin J. 1997. 'Introduction: recentring Africa', pp. 1–39 in Paulin J. Hountondji, ed., *Endogenous Knowledge: Research Trails*. Dakar: CODESRIA.
- Htun, Mala. 2003. *Sex and the State: Abortion, Divorce, and the Family under Latin American Dictatorships and Democrac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yde, Janet Shibley. 1984. 'How large are gender-differences in aggression? A developmental meta-analysi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 722–36.
2005. 'The gender similarities hypothesi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0, 6: 581–92.
- Hyde, Janet Shibley, and Nita M. McKinley. 1997.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 results from meta-analyses', pp. 30–51 in P. J. Caplan, M. Crawford, J. S. Hyde and J. T. E. Richardson, eds., *Gender Differences in Human Cogn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2007. 'Women in national parliaments', www.ipu.org/wmn-e/world.htm.
- Irigaray, Luce. [1977] 1985.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trans. C. Porter and C. Burk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Jackson, Peter A. 1997. 'Kathoeys <gay> <man>: the historical emergence of gay male identity in Thailand', pp. 166–90 in L. Manderson and M. Jolly, eds., *Sites of Desire, Economies of Pleas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affee, Sara, and Janet Shibley Hyde. 2000. 'Gender differences in moral orientation: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6: 703–26.
- Jeffords, Susan. 1989. *The Remasculinization of America: Gender and the*

- Vietnam Wa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Pauline. 1994. *Feminism as Radical Humanism*. Sydney: Allen & Unwin.
- Kanter, Rosabeth. 1977. *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Kartini. 2005. *On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Kartini's Letters to Stella Zeehandelaar, 1899–1903*. Clayton: Monash University Press.
- Kemper, Theodore D. 1990. *Social Structure and Testosterone: Explorations of the Socio-bio-social Chai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Keough, Leyla J. 2006. 'Globalizing "postsocialism": mobile mothers and neoliberalism on the margins of Europe',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79: 431–61.
- Kim, Nadia Y. 2006. ' "Patriarchy is so third world": Korean immigrant women and "migrating" white western masculinity', *Social Problems* 53: 519–36.
- King, Dave. 1981. 'Gender confusions: psychological and psychiatric conceptions of transvestism and transsexualism', pp. 155–83 in Kenneth Plummer, e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Homosexual*. London: Hutchinson.
- Kippax, Susan, Raewyn Connell, Gary W. Dowsett and June Crawford. 1993. *Sustaining Safe Sex: Gay Communities Respond to AIDS*. London: Falmer Press.
- Kirk, David. 1993. *The Body, Schooling and Culture*. Geelong,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 Klein, Alan M. 1993. *Little Big Men: Bodybuilding Subculture and Gender Constructio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Klein, Viola. 1946. *The Feminine Character: History of an Ideology*.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 Kling, Kristen, Janet Shibley Hyde, Caroline J. Showers and Brenda N. Buswell. 1999. 'Gender differences in self-esteem: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5: 470–500.
- Kollontai, Alexandra. 1977. *Selected Writings*, trans. A. Holt. London: Allison & Busby.
- Komarovsky, Mirra. 1946.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and sex rol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2: 184–9.
- Kondo, Dorinne. 1999. 'Fabricating masculinity: gender, race, and nation in a transnational frame', pp. 296–319 in Caren Kaplan, Norma Alarcón and Mino Moallem, eds., *Between Woman and Nation: Nationalisms, Transnational Feminisms, and the Stat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 Press.
- Krafft-Ebing, Richard von. [1886] 1965. *Psychopathia Sexualis*, 12th edition. New York: Paperback Library.
- Kristeva, Julia. [1974] 1984.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aplanche, J., and J.-B. Pontalis. 1973.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 Laqueur, Thomas Walter. 1990. *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urie, Nina. 2005. 'Establishing development orthodoxy: negotiating masculinities in the water sector',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6: 527–49.
- Lees, Sue. 1986. *Losing Out: Sexuality and Adolescent Girls*. London: Hutchinson.
- Lenz, Ilse, Anja Szypulski and Beate Molsich, eds. 1996. *Frauenbewegungen International: Eine Arbeitsbibliographie*. Opladen: Leske & Budrich.
- Lessing, Doris. 1962. *The Golden Notebook*. London: Michael Joseph.
- Levin, Peter. 2001. 'Gendering the market: temporality, work, and gender on a national futures exchange', *Work and Occupations* 28: 112–30.
- Lloyd, Moya. 2007. *Judith Butler: From Norms to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2007.
- Lorber, Judith. 2005. *Breaking the Bowls: Degendering and Feminist Change*. New York: Norton.
- Luttrell, Wendy. 1997. *Schoolsmart and Motherwise: Working-Class Women's Identity and Schooling*. New York: Routledge.
- Mac an Ghaill, Máirtín. 1994. *The Making of Men: Masculinities, Sexualities and Schooling*.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Maccoby, Eleanor E., ed. 1966. *The Development of Sex Differenc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ccoby, Eleanor E., and Carol Nagy Jacklin. 1975. *The Psychology of Sex Differenc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ckenzie, John M. 1987. 'The imperial pioneer and hunter and the British masculine stereotype in lat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times', pp. 176–98 in J. A. Mangan and James Walvin, eds., *Manliness and Morality: Middle-Class Masculinity in Britain and America, 1800–194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acKinnon, Catharine A. 1983. 'Feminism, 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towards feminist jurisprudence', *Signs* 8: 635–58.
1989.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halik, James R., Benjamin D. Locke, Larry H. Ludlow et al. 2003. 'Development of the conformity to masculine norms inventory', *Psychology of Men and Masculinity* 4: 3–25.
- Malos, Ellen, ed. 1980. *The Politics of Housework*. London: Allison & Busby.
- Mane, Purnima, and Peter Aggleton. 2001. 'Gender and HIV/AIDS: what do men have to do with it?' *Current Sociology* 49: 23–37.
- Mannon, Susan E. 2006. 'Love in the time of neo-liberalism: gender, work, and power in a Costa Rican marriage', *Gender & Society* 20: 511–30.
- Marchand, Marianne H., and Anne Sisson Runyan, eds. 2000. *Gender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Sightings, Sites and Resistances*. London: Routledge.
- Martin, Patricia Yancey. 2006. 'Practising gender at work: further thoughts on reflexivity',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13: 254–76.
- Mead, Margaret. [1935] 1963. *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Meekosha, Helen. 2006. 'What the hell are you? An intercategory analysis of race, ethnicity, gender and disability in the Australian body politic',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Disability Research* 8: 161–76.
- Melville, Herman. [1853] 1969. 'Bartleby the Scrivener', pp. 159–90 in D. J. Burrows and F. R. Lippes, eds., *Alienation: A Casebook*. New York: Crowell.
- Menon, Nivedita, ed. 1999. *Gender and Politics in Ind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nzies, Jackie, ed. 1998. *Modern Boy Modern Girl: Modernity in Japanese Art 1910–1935*. Sydney: Art Gallery of New South Wales.
- Messerschmidt, James W. 1993. *Masculinities and Crime: Critique and Reconceptualization of Theor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7. *Crime as Structured Action: Gender, Race, Class and Crime in the Making*.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 Messner, Michael A. 2007. *Out of Play: Critical Essays on Gender and Spor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Midgley, Clare, ed. 1998. *Gender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Mies, Maria. 1986.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London: Zed Books.
- Mill, John Stuart. [1869] 1912.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in J. S. Mill: *Three Essay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Pavla. 1998. *Transformations of Patriarchy in the West, 1500–190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Millett, Kate. 1972. *Sexual Politics*. London: Abacus.
- Mills, Albert J., and Peta Tancred, eds. 1992. *Gendering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 Mitchell, Juliet. 1966. '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40: 11–37.
1971. *Woman's Estat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Moghadam, Valentine M. 2005. *Globalizing Women: Transnational Feminist Network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1991.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pp. 51–80 in C. T. Mohanty, A. Russo and L. Torres,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 *Feminism Without Borders: Decolonizing Theory, Practicing Solidar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ohwald, Ulrich. 2002.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Gender Equality in Japan and Germany*. Munich: Iudicium.
- Montecino, Sonia. 2001. 'Identidades y diversidades en Chile', pp. 65–98 in Manuel Antonio Garretón, ed., *Cultura y desarrollo en Chile*. Santiago: Andres Bello.
- Moodie, T. Dunbar, with Vivienne Ndatshe. 1994. *Going for Gold: Men, Mines and Migration*.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 Morgan, Robin, ed. 1970. *Sisterhood is Powerful: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New York: Vintage.
1984. *Sisterhood is Global: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Anthology*. Garden City, NY: Anchor.
- Morrell, Robert. 2001a. *From Boys to Gentlemen: Settler Masculinity in Colonial Natal 1880–1920*. Pretoria: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 ed. 2001b. *Changing Men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Zed Books.
- Mudimbe, V. Y. 1994. *The Idea of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Namaste, Viviane K. 2000. *Invisible Lives: The Erasure of Transsexual and Transgendered Peop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andy, Ashis. 1983.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Traditions, Tyranny and Utopias: Essays in the Politics of Awarenes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ples, Nancy, and Manisha Desai, eds. 2002. *Women's Activism and Globalization: Linking Local Struggles and Trans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 Routledge.
- Newman, Meredith A., Robert A. Jackson and Douglas D. Baker. 2003.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federal workpla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3: 472–83.
- Nilsson, Arne. 1998. 'Creating their own private and public: the male homosexual life space in a Nordic city during high modernit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35: 81–116.
- Novikova, Irina. 2000. 'Soviet and post-Soviet masculinities: after men's wars in women's memories', pp. 117–29 in I. Breines, R. Connell and I. Eide, eds., *Male Roles, Masculinities and Violence: A Culture of Peace Perspective*.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 O'Connor, Julia S., Ann Shola Orloff and Sheila Shaver. 1999. *States, Markets, Families: Gender, Liberalism and Social Policy in Australia, Canada,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dihi, Pamela. 2007. *Gender and Work in Capitalist Economies*.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 Oetomo, Dede. 1996. 'Gender and sexual orientation in Indonesia', pp. 259–69 in L. J. Sears, ed., *Fantasizing the Feminine in Indonesi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Okeke-Ihejirika, Philomina E., and Susan Franceschet. 2002. 'Democratisation and state feminism: gender politics in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3: 439–66.
- Oyéwùmí, Oyèrónké. 1997. *The Invention of Women: Making an African Sense of Western Gender Discours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Paap, Kris. 2006. *Working Construction: Why White Working Class Men Put Themselves – and the Labor Movement – In Harm's Wa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arker, Richard G. 1991. *Bodies, Pleasures and Passions: Sexu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Brazil*. Boston: Beacon Press.
- Parsons, Talcott, and Robert F. Bales. 1956.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Perkins, Roberta. 1983. *The 'Drag Queen' Scene: Transsexuals in Kings Cross*. Sydney: Allen & Unwin.
- Peteet, Julie. 1994. 'Male gender and rituals of resistance in the Palestinian intifada: a cultural politics of violence', *American Ethnologist* 21: 31–49.
- Peterson, Spike. 2003. *A Critical Rewriting of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grating Reproductive, Productive and Virtual Economies*. London:

Routledge.

Pfau-Effinger, Birgit. 1998. 'Gender cultures and the gender arrangement –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ross-national research', *Innovation* 11: 147–66.

Pizan, Christine de. [1405] 1983. *The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 London: Pan Books.

Pleck, J. H., and J. Sawyer, eds. 1974. *Men and Masculini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Poster, Winifred R. 2002. 'Racialism, sexuality, and masculinity: gendering "global ethnography" of the workplace', *Social Politics* 9: 126–58.

Pringle, Rosemary. 1989. *Secretaries Talk: Sexuality, Power and Work*. Sydney: Allen & Unwin.

1992. 'Absolute sex? Unpacking the sexuality/gender relationship', pp. 76–101 in R. Connell and G. W. Dowsett, eds., *Rethinking Sex: Social Theory and Sexuality Research*.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Radcliffe, Sarah A., Nina Laurie and Robert Andolina. 2004. '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gender and reimagining Andean indigenous development', *Signs* 29: 387–416.

Ray, Raka. 1999. *Fields of Protest: Women's Movements in Ind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eiter, Rayna Rapp. 1977. 'The search for origins: unravelling the threads of gender hierarchy',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9 & 10: 5–24.

Reynolds, Robert. 2002. *From Camp to Queer: Re-making the Australian Homosexual*.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Rigi, Jakob. 2003. 'The conditions of post-Soviet dispossessed youth and work in Almaty, Kazakhstan',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23: 35–49.

Risman, Barbara J. 1986. 'Can men "mother"? Life as a single father', *Family Relations* 35: 95–102.

1998. *Gender Vertigo: American Families in Tran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berts, Celia. 2000. 'Biological behaviour? Hormones, psychology and sex', *NWSA Journal* 12: 1–20.

Rogers, Lesley. 2000. *Sexing the Brain*. London: Phoenix.

Roper, Michael. 1994. *Masculinity and the British Organization Man since 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senberg, Rosalind. 1982. *Beyond Separate Spheres: Intellectual Roots of Modern Femin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owbotham, Sheila. 1969. *Women's Liberation and the New Politics*. Nottingham: Spokesman.

- Rubin, Gayle. 1975.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pp. 157–210 in R. R. Reiter,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a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 Rubin, Henry. 2003. *Self-Made Men: Identity and Embodiment among Transsexual Men*. USA: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 SAHAJ, SAHAYOG and TATHAPI. 2005. *Working With Men on Gender, Sexuality, Violence & Health: Trainer's Manual*. Alkapuri: Vadodara.
- Sahlins, Marshall. 1977. *The Use and Abuse of Biology: An Anthropological Critique of Sociobiology*. London: Tavistock.
- Sartre, Jean-Paul. 1968. *Search for a Method*, trans. H. Barnes. New York: Vintage.
- Sawyer, Jack. [1970] 1974. 'On male liberation', pp. 170–3 in J. H. Peck and J. Sawyer, eds., *Men and Masculini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Schofield, T., R. Connell, L. Walker, J. Wood and D. Butland. 2000. 'Understanding men's health: a gender relations approach to masculinity, health and illness', *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48: 247–56.
- Schools Commission (Australia). 1975. *Girls, School and Society*. Canberra: Schools Commission.
- Schreiner, Olive. [1911] 1978. *Woman and Labour*. London: Virago.
- Scott, Joan W. 1986.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 5: 1053–75.
- Segal, Lynne. 1994. *Straight Sex: Rethinking the Politics of Pleas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eifert, Ruth. 1993. *Individualisierungsprozesse,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und die soziale Konstruktion des Soldaten*. Munich: Sozialwissenschaftliches Institut der Bundeswehr.
- Severiens, Sabine, and Geer ten Dam. 1998.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orient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68: 595–608.
- Shen, Zhi. 1987. 'Development of Women's Studies – the Chinese way. Sidelights of the 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oretical Studies on Women',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20: 18–25.
- Sideris, Tina. 2005. ' "You have to change and you don't know how!": contesting what it means to be a man in a rural area of South Africa', pp. 111–37 in Graeme Reid and Liz Walker, eds., *Men Behaving Differently*. Cape Town: Double Storey Books.
- Silber, Irina Carlota. 2004. 'Mothers/fighters/citizens: violence and disillusionment in post-war El Salvador', *Gender and History* 16: 561–87.

- Simon-Kumar, Rachael. 2004. 'Negotiating emancipation: the public sphere and gender critiques of neo-liber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6: 485–506.
- Sinclair-Webb, Emma. 2000. 'Our Bülent is now a commando: military service and manhood in Turkey', pp. 65–92 in Mai Ghoussoub and Emma Sinclair-Webb, eds., *Imagined Masculinities: Male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London: Saqi Books.
- Smiler, Andrew P. 2004. 'Thirty years after the discovery of gender: psychological concepts and measures of masculinity', *Sex Roles* 50: 15–26.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1988.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tacey, Judith. 1983.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teele, Valerie. 1996. *Fetish: Fashion, Sex and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ienstra, Deborah. 2000. 'Dancing resistance from Rio to Beijing: transnational women's organizing an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s, 1992–6', pp. 209–24 in M. H. Marchand and A. S. Runyan, eds., *Gender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Sightings, Sites and Resistances*. London: Routledge.
- Stobbe, Lineke. 2005. 'Doing machismo: legitimating speech acts as a selection discourse',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12: 105–23.
-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08. *SIPRI Yearbook 200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oller, Robert J. 1968. *Sex and Gender*, vol. I: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London: Hogarth Press.
- Strathern, Marilyn. 1978. 'The achievement of sex: paradoxes in Hagen gender-thinking', pp. 171–202 in E. Schwimmer, ed., *The Yearbook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 London: Hurst.
- Stryker, Susan, and Stephen Whittle, eds. 2006. *The 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 'Taga Futoshi. 2007. 'The trends of discourse on fatherhood and father's conflict in Japan'. Paper presented at 15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Japa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Canberra, July 2007.
- Tanaka, Kazuko. 1977.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Modern Japan*, 3rd edition. Japan: Femintern Press.

- Temkina, Anna. 2008. *Sexual Life of Women: Between Subordination and Freedom*. St Petersburg: European University at St Petersburg.
- Tharu, Susie, and Tejaswini Niranjana. 1996. 'Problems for a contemporary theory of gender', pp. 232–60 in *Subaltern Studies*, vol. IX.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eberge, Nancy. 1991. 'Reflections on the body in the sociology of sport', *Quest* 43: 123–34.
- Thorne, Barrie. 1993. *Gender Play: Girls and Boys in School*.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Tienari, Janne, Anne-Marie Söderberg, Charlotte Holgersson and Eero Vaara. 2005. 'Gender and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s in the cross-border merger context', *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12: 217–41.
- Tinsman, Heidi. 2000. 'Reviving feminist materialism: gender and neoliberalism in Pinochet's Chile', *Signs* 26: 145–88.
- Tohidi, Nayereh. 1991. 'Gender and Islamic fundamentalism: feminist politics in Iran', pp. 251–65 in C. T. Mohanty, A. Russo and L. Torres,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Tomsen, Stephen. 1998. '“He had to be a poofter or something”: violence, male honour and heterosexual panic',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Gender Studies* 3, 2: 44–57.
- Torres, Lourdes. 1991.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in U.S. Latina biographies', pp. 271–87 in C. T. Mohanty, A. Russo and L. Torres,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Troiden, Richard R. 1989. 'The formation of homosexual identiti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7: 43–73.
- Twenge, Jean M. 1997. 'Changes in masculine and feminine traits over time: a meta-analysis', *Sex Roles* 36: 305–25.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7.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200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Vaerting, Mathilde [writing as Mathilde and Mathias Vaerting]. [1921] 1981. *The Dominant Sex: A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Sex Differentiation*. Westport, Conn.: Hyperion.
- Valdés, Teresa, ed. 2001. *El Índice de Compromiso Cumplido – ICC: una estrategia para el control ciudadano de la equidad de género*. Santiago: FLACSO.
- Valdés, Teresa, and Enrique Gomáriz. 1995. *Latin American Women: Compared Figures*. Santiago: Instituto de la Mujer and FLACSO.

- Vickers, Jill. 1994. 'Notes toward a political theory of sex and power', pp. 174–93 in H. L. Radtke and J. S. Henderikus, eds., *Power/Gender*. London: Sage.
- Waetjen, Thembisa. 2004. *Workers and Warriors: Masculinity and the Struggle for Nation in South Af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Waetjen, Thembisa, and Gerhard Maré. 2001. ' "Men amongst men": masculinity and Zulu nationalism in the 1980s', pp. 195–206 in R. Morrell, ed., *Changing Men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Zed Books.
- Wajcman, Judy. 1999. *Managing like a Man: Women and Men in Corporate Management*. Cambridge: Polity, and Sydney: Allen & Unwin.
- Walby, Sylvia. 1990. *Theorizing Patriarch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7. *Gender Transform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Walby, Sylvia, and Jonathan Allen. 2004. *Domestic Violence, Sexual Assault and Stalking: Findings from the British Crime Survey*. London: Home Office.
- Ward, Lester F. [1883] 1897. *Dynamic Sociology, or Applied Science*. New York: Appleton.
- Weedon, Chris. 1987.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West, Candace, and Don H. Zimmerman. 1987. 'Doing gender', *Gender and Society* 1: 125–51.
- White, Patrick. 1979. *The Twyborn Affair*. London: Cape.
- White, Sara C. 2000. ' "Did the Earth move?" The hazards of bringing men and masculinities into gender and development', *IDS Bulletin* 31, 2: 33–41.
- Williams, Walter L. 1986. *The Spirit and the Flesh: Sexual Diversity in American Indian Cul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 Wollstonecraft, Mary. [1792] 1975.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 Xaba, Thokozani. 2001. 'Masculinity and its malcontents: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struggle masculinity" and "post-struggle masculinity" (1990–1997)', pp. 105–24 in R. Morrell, ed., *Changing Men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Zed Books.
- Yeatman, Anna. 1990. *Bureaucrats, Technocrats, Femocrats: Essays on the Contemporary Australian State*. Sydney: Allen & Unwin.
- Yuval-Davis, Nira. 1997. *Gender and Nation*. London: Sage.
- Zulehner, Paul M., and Rainer Volz. 1998. *Männer im Aufbruch: Wie Deutschlands Männer sich selbst und wie Frauen sie sehen*. Ostfildern: Schwabenverlag.